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办

清华社会学评论

Tsinghua Sociological Review

第二十辑 No.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主 编 / 王天夫

执行主编 / 严 飞

本电子文件之权利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享有，仅供作者个人学习、研究、备份或申报个人成果等非商业性或非盈利性用途使用，未经社科文献许可不得将全部或部分内容用于复制、销售、传播等商业性或盈利性行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卷首语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是近年来被重新发掘出来的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于种族化学术界的控诉以及他对于全球社会学的拥抱，都为我们今天如何应对政治和科学领域的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近来知识界对于社会理论经典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展开了强烈批判。批判者认为，无论是古典社会理论，还是现代主流理论，都将白人男性所构建的理论的普适性视为理所当然。但除了批判和抛弃，我们对于经典西方社会理论的使用是否存在不同的出路？

在本辑的“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专题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将和徐晓宏、谢雯、郑作彧三位中国社会学理论家一起，探索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困境和出路。布洛维教授不但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劳动社会学家，而且对如何通过发掘杜波依斯的理论推动经典理论进步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四位学者将以马克思主义与杜波依斯观点的碰撞和融汇为例，讨论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如何才能服务于社会变迁，通过想象不可能之处来拓展未来可能的疆域。

本辑同时还设有“数字时代的技术与工作”专题，收录了5篇论文，旨在探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人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数字社会的浪潮下，数字化和自动化技术如何改变工作场所的管理方式和影响劳动技能？新技术又如何为工人的组织和团结开辟新的领域？本专题的讨论从不同的方面反思了“技术决定论”，展现了在技术革新中人力劳动的重要性，也思考劳动者如何能在技术变革中获得更大的好处。文章涉



及卡车司机、智能制造工厂工人、平台经济从业者和 AI 数据标注员等主体，讨论的议题涉及技术对就业、劳动技能、工作监控、工人互助团结等方面的影响。

本辑收录的其他重点学术论文包括：胡安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对“家国情怀”这一概念进行的量化分析；万怡等对社会计算的历史与学科发展进行的全面梳理和展望；孙小逸通过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进行的政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的研究；杜世超引入教育水平分层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是否对年轻世代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乔治·斯坦梅茨对后殖民主义社会学进行了批判性探讨，并提出了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本辑还收录了一篇学术长书评，探讨了《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Cloud Empires: How Digital Platforms Are Overtaking the State and How We Can Regain Control*）一书有关数字平台与国家、社会治理的议题。

严飞

《清华社会学评论》执行主编

• 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 •

- 社会学经典的去殖民化：与中国社会学家对话 …… 迈克尔·布洛维 / 1
论社会学自由主义：从全球南方/东方出发重构社会学经典
…………… 徐晓宏 / 16
杜波依斯与重构理论经典之争：一项知识社会学考察 …… 谢 雯 / 21
是社会学的去殖民化，还是再殖民化？与迈克尔·布洛维商榷
…………… 郑作彧 / 29

• 数字时代的技术与工作 •

- 巴西的社交网络与集体行动：卡车司机与外卖员的经验
…………… 约克·诺瓦克 马可·桑塔纳 / 35
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关于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调研
…………… 黄 瑜 旷轶丹 / 56
“机器霸权”的建构与解构：基于南方某自动化工厂的案例
分析 …………… 许 怡 / 86
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 邓韵雪 / 114
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
原子化挑战 …………… 梁 萌 周文泰 么珈仪 李 尧 / 142

• 学术论文 •

- “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 胡安宁 / 166



社会计算的内涵与前瞻…… 万 怡 郑 路 罗家德 吴国炜 / 189
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基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证分析…… 孙小逸 / 205

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杜世超 / 225

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乔治·斯坦梅茨 / 254

· 学术书评 ·

约束云帝国：数字时代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

——评《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

…… 张 健 / 298

《清华社会学评论》征稿启事 …… / 30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 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 ·

编者按：2022年5月8日，时间社（THiS：Theory, History, Society）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共同邀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学会前会长、国际社会学会前会长迈克尔·布洛维进行了题为“再构社会理论经典：从马克思到杜波依斯”的讲座，并邀请徐晓宏、谢雯、郑作彧、郇菁四位中国社会学者就布洛维教授的讲座进行回应，活动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龙彦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主持。本辑设置“杜波依斯和社会理论经典”专题，收录了布洛维教授的讲稿，以及徐晓宏、谢雯、郑作彧三位中国社会学者关于当代社会理论发展困境和出路的回应。

社会学经典的去殖民化：与中国社会学家对话

迈克尔·布洛维*

去殖民化的过程正像野火一样在美国学术界蔓延开来。每所大学都不得不反思其过往历史中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合作，例如这所学校是否建在从原住民手中征用而来的土地之上，抑或是以奴隶制的收益为基础，又比如校园中是否以雕像、肖像或建筑物命名的种种方式在缅怀某位种族主义者。一种要求通过重新分配物质和智识禀赋为过往的压迫做出补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学术部门中，有人呼吁对教学大纲和课程进行去殖民化，特别是对学术经典进行去殖民化。

历史一直是这场去殖民化运动的核心。起源于《纽约时报》的“1619年计划”将美国历史重新追溯到奴隶制的起源，而非1776年的《独立宣

* 迈克尔·布洛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本文根据2022年5月8日迈克尔·布洛维讲座“再构社会理论经典：从马克思到杜波依斯”的讲稿修改而成。作者感谢龙彦的邀请得以完成这篇文章，感谢谢雯、徐晓宏、郇菁、郑作彧的批评意见。译者：尹丹婷，欧盟伊拉斯谟世界计划“4CITIES”（欧洲四城）城市研究硕士。

言》。这成为这场去殖民化运动的导火索，将大量的历史学家推入公共领域的讨论中，为关于奴隶制遗产的主张辩护或争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段黑色历史被放置到日光下感到愤怒至极，继而创建了“1776委员会”作为反击，以被美化的历史作为所谓“爱国教育”的基础。这一委员会后来被拜登总统终止，但围绕“去殖民化”的政治斗争仍在继续，“批判种族理论”，包括“1619年计划”的文件，在学校里仍然是被禁止的。

各个学科都被迫审视自身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从事“去殖民化”的工作，逐渐意识到他们与殖民主义的共谋，以及关于被殖民者观点中的去人性化，而那些更具有科学血统的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审视自身历史的进程则相对缓慢。那些植根于主张西方思想普遍性的学科，如哲学或政治理论，也不大乐意揭开它们的过去，但也并非丝毫不受影响。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去殖民化运动的影响逐渐减弱。即便如此，后者的学术生态也逐渐对学者和学生十分有限的多样性越来越敏感。

社会学自然也逃不开这种批判性的自省。从一开始，社会学就认可或忽略了19世纪更广泛的社会语境，尤其是帝国的背景。随着这门学科开始聚焦社会不平等，它必须更加自觉地意识到它本身所维持或忽视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争论围绕着传统上定义了我们学科基础的权威人物的相关性展开。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都是欧洲白人男性，他们的著作横跨19世纪和20世纪初，但都将种族和性别问题边缘化了。他们的思想根植于帝国秩序中，却留下了太多没有被问题化的议题。一场关于如何看待这些学科权威人物的争论如火如荼。

一 回应经典的策略

去殖民化，即意味着承认、批判和消除经典文本中殖民化预设的存在，揭露植根于大都市经验的、有缺陷的普遍主义主张，这些主张忽视了殖民统治的模式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对去殖民化运动有四种相互竞争的反应：复原、拒绝、革命和重构。

至少在美国，复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许多人继续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作为社会学的参考点和基础。很多社会学家在这些经典人物的作品中受过教育，多年来一直在教授他们的理论，因此更倾向于投入到其连续性上。但他们的坚持不仅仅是某种惯性。这些经典理论在 19 世纪下半叶与市民社会一起出现，主张反对国家和市场的过度扩张。当我们回到 19 世纪后期，我们能看到迅猛发展的经济不平等，并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段随即迅速消失的进步性时期（Piketty, 2014）。当我们看到全球威权政权的萌芽，当我们看到劳动力、自然、金钱和知识的市场化在不断更新和深化，当我们通过数字化和社交媒体热情地参与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从而帮助强化和教唆监视和控制，简而言之，当市场和国家逐渐侵占自治的市民社会时，经典理论远非与现实脱节，而是作为一种堤坝以及抵抗运动的灵感承担着越来越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本质上是一场反殖民运动，反对国家和市场对市民社会的殖民化（Polanyi, 1944; Habermas, 1985）。

并非只有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主张提升市民社会的重要性，那些坚持复原主义的学者已经准备好了承认其他一直徘徊在经典边缘的人——齐美尔、米德、弗洛伊德——而如今，古典理论的课程还包括了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等女权主义者和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等学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学者的思想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被阐释利用。复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让步来调和那些要求废除学术经典的人的诉求。

接下来让我转向拒绝经典。这一举措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方面，有一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重点关注帝国作为社会学出现的重要背景，及其与种族和性别的关联。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经典因未能充分强调该背景而可能遭到批评。但同时他们也认为，与一些主要社会学家相关联的“经典”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任何所谓根本性的思想都是排他的，而去殖民化必须意味着包容性。例如，Julian Go（2016）提倡他所谓的观点现实主义，它拥抱观点的多元性，并且不基于作者的种族或性别来认可其观点，而是关注他们所采用的立场。认知正义取代了认知定式，对于建立在不同视角上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是否成立，并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这并不意味着经

典思想家被扫到一边，只不过是请他们从圣坛上下来，所谓“百花齐放”。

后殖民批判是拒绝经典的一条路径，另一条路径则是那些遵循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格言（1916）的科学家所信奉的：“对其创始人感到难以忘怀的科学注定是迷失的。”这些实证主义者驳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不是因为他们的白人男性欧洲中心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过时的方法论和过时的理论。这些经典人物可能具有历史意义，但与已经覆盖其起源的当代社会学实践并无关联。这些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型来发展社会学的科学家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在学科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分别遵循两条路径的后殖民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在拒绝经典这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持敌对观点。

接下来，让我转向对经典的第三种回应，我称之为革命性的回应。其核心想法是用新的经典替代旧的经典。有许多新经典的候选人被人们提及，但至今还没有人能匹配杜波依斯的资历。杜波依斯在1895年成为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是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写作专业文章、抒情散文、诗歌、小说和戏剧。他是一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全球知名的公众人物，在民权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与倡导和平的活动家。奥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在他的《被否定的学者：杜波依斯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一书（2015）中将杜波依斯视作美国社会学真正的但从未被承认的创始人，原因在于，杜波依斯所创立的亚特兰大学派比芝加哥学派早了整整20年，却因为学科内的种族主义未受到认可。同样重要的是，他最后50年的写作不仅以种族和阶级为中心，还充分聚焦了帝国主义。在莫里斯的影响下，Jose Itzigsohn 和 Karida Brown（2020）以“种族化的现代性”为话题，推进了以杜波依斯为经典的社会学。在这种回应中，人们通过将社会学植根于杜波依斯的作品来重构经典。

我认为上述这种革命性的举措有些太过激进，我们面临着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风险。即使我们承认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在种族和性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是很受限制的，但它们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它们不仅代表了一种抵抗市场和国家的政治立场，而且

正如亚瑟·斯汀康比（Arthur Stinchcombe）（1982）曾经写道的那样，它们仍旧可以被视作科学研究的典范，作为取代陈词滥调的、对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作为开展实证研究的研究问题和假设的来源。学科内奠基性的学者必然会忽略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在后来变得很显著。他们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跨时代的韧性，在于它们如何能够适应新的挑战、如何能够被重建以应对当下的危机。一门学科，就像一门科学一样，有其基本的假设，并能够从中不断发展重构出新的研究项目，以适应和消化内部矛盾和外部变化。这是我将在这次演讲接下来的部分中详细阐述的重构主义立场。

二 一种经典的理论

在重构经典之前，我们显然首先需要一种经典理论。我相信经典理论是由四种属性定义的：它是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地理性的和相对的。我将依次讨论这四种属性如何适用于社会学。

1. 经典是根本性的

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中所共有的过往经典的根本性原则是什么？我姑且提出四点。第一，它们具备一种历史性的观照，因此提供了一种预测未来的方式。第二，它们拥有道德基础，这些根基对认识世界及其可能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第三，它们拥有独创的方法论，使社会学家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把握世界，这在一些范例研究中得到了证明。第四，他们具备一种概念性框架，定义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及其再生产和转型理论。我相信这些根基仍旧影响着当下的社会学。即便这种联系并不总是可见或直接的，我们在各个社会学子学科中探究的主题本质上都可以追溯到由这些经典理论家所奠定的基本准则。

但为什么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应该被视为奠基人物呢？为什么我们要依赖于这些在一个多世纪前著书立说的人物？首先，他们当时正在经历并反思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占据霸权的时期，而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着的世界，即旧秩序最终被消解，其他的可能的新秩序被充分抑制的时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回到那个早期的历史阶段。

其次，他们每个人都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此他们必须证明他们的存在是正当的，要不断抵抗竞争性学科的敌意，他们必须阐明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中很轻易就被我们丢失了的哲学、道德和科学准则。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社会学提供了道德指南和科学基础。最后，这些理论家的立场是反对市场和国家的异化、商品化、剥削、排他主义的倾向，并以不同的理论体系捍卫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理想。

2. 经典是历史性的

这些奠基性的准则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经典有其自身的历史，且在这段历史形成前还有一些零散的实证经验。经典最初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37）的自发行动理论建立的，该理论基于马歇尔、帕累托、韦伯和涂尔干著作中偶然的相似之处。这些人物成为奠基性的人物，但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帕森斯自己在发展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相关的现代化理论时就放弃了马歇尔和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建构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这些基础建立的前提是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潜在价值共识和所有社会必须履行的四种功能。结构功能主义的前提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受到猛烈抨击，新兴的斗争不仅出现在美国，还席卷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批判性种族理论推翻并结束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统治性地位，并创造了一种新的经典——一种基于冲突而非和谐的经典。涂尔干和韦伯并没有被排除在外，而是在二者的相互比较中不断被重读。同时，人们还开始阅读马克思——一位帕森斯曾不屑一顾的人物的著作，因为前者的思想局限于 19 世纪。

3. 经典是地理性的

如果我们说经典是历史性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那么我们还必须考虑它是不是地理性的，即是否随着它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而变化。一方面，有部分人认为经典是“西方的”或“北方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关联。他们可能支持的是一种不受西方经典玷污的“本土”社会学的发展。Raewyn Connell（2007）对此观点做出过具体阐述，她主张一种和北方理论划清界限的“南方理论”，具体反映南方世界的现实状况。她拟出了一份学者名单，包含一些自称但大多数并非社会

学家的学者，而这群人往往被北方的学界忽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对所谓北方社会学的某种狭隘性的重要纠正，但话说回来，她提到的理论家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是在北方度过的，往往是在北方接受了教育，所以很难不受到北方理论的影响，因而使得她所倡导的彻底的两分是无法成立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领域，其中西方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但同时也包含西欧，占据霸权地位但同时也并不排除其他社会学的可能性，它们在全球领域内争夺着一席之地，并试图定义其自身的国家社会学。在这种观点中，冲突的焦点不在于“本土”和“支配社会学”之间，或是在“南方理论”和“北方理论”之间，而是发生在支配社会学的领域。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并非拒绝经典，而是针对特定的背景对其做出重新解释，甚至需要“本土化”北方经典本身，审视其自身的政治经济背景（Chakrabarty, 2000）。这样，各种国家的社会学就可以各自从韦伯、涂尔干和马克思那里汲取不同的养分，形成对其作品的不同阐释，从而带来对经典的多样重构。

4. 经典是相对的

经典不仅是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和地理性的，同时也是相对的。重构经典不是仅仅叠加另一位理论家的问题。经典不是简单加总，它由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之间的关系组成。因此，塔尔科特·帕森斯对经典的看法是基于各位理论家思想中相似的基础性的原则，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理论框架，植根于对涂尔干和韦伯的具体解读以及对马克思的有意识的排斥。然而，当马克思被放置回经典的框架的时候，我们并非要排除涂尔干和韦伯，而是要将其放置在和马克思的对话中。这就意味着对涂尔干和韦伯的新的解读。我们不再仅仅通过集体意识来解读涂尔干，而是开始通过劳动分工的异常形式来解读他的思想。于是一个崭新的激进的涂尔干在旧的保守主义的涂尔干的灰烬中重生，预测着社会主义的未来，即一种以职业群体为中心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我们不再通过韦伯的不同类型的行动和价值观的中心性来阅读他，而是开始将他视为一位关于支配和国家理论的思想家。韦伯的历史变成了某种理性化的实现，即支配与效率的独特组合。社会学不再被视为某种同质的、单一的学科，它成为各种相互竞争的研究项

目施展的空间。经典所提供的根本性原则是多样性而非趋同的起点。

帕森斯所提出的一种用单一性研究来全面定义社会学的想法，在他最疯狂的想象中或许的确定义了社会学，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极权主义的意味。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这种社会学的总体化的愿景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吵吵闹闹的学科，其中没有人占主导地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竞争性的结构比之前的单一性框架更加稳定。即便如此，后者仍受到去殖民化运动的猛烈批评，其中，杜波依斯即重建经典的特洛伊木马。

三 由杜波依斯进入经典重构

经典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回应当时那些挑战了价值共识、和谐、意识形态终结和现代化的理论假设的社会运动。经典并非抛开了韦伯和涂尔干，而是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对其展开新的阅读。如今，我们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尤其但不仅仅是在美国——这些运动呼唤着我们对种族不平等与种族不公以及气候变化、流行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关注。杜波依斯之所以成为最可能被纳入经典的社会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生活和理论深受其种族的影响。但杜波依斯不仅是“某个种族的人”，他还是泛非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和平活动家；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同时还受过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带入与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对话，将极大地改变社会学。接下来我将试图勾勒一下这些对话可能以何种形态展开，以及它们对社会学有着怎样的影响。

1. 涂尔干与杜波依斯

奥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2015）在一项研究中重点关注了杜波依斯写作《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Du Bois, 1996 [1899]）时期及亚特兰大学派。当时，杜波依斯立志成为一名专业社会学家，遵从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从其老师古斯塔夫·冯·施穆

勒（Gustav von Schmoller）那里学到的方法，进行细致的、根植于历史的实证社区研究。当时的杜波依斯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其基础性理论上都是涂尔干式的。杜波依斯的研究呈现了主要由非裔美国人聚居的费城第七区作为城市病态的典型场景，展示了由移民和种族歧视造成的社会解体，不由得让人想起涂尔干提出的强迫性的、失范性的劳动分工。杜波依斯提出了涂尔干式的道德诉求，敦促白人意识到黑人上层阶级的存在。杜波依斯声称，黑人中“有才华的十分之一”与白人精英有相似的文明意识。在杜波依斯的分层理论中，他和涂尔干一样，非常重视教育作为历史中的进步性力量，尤其是其对非裔美国人进步的影响。

除了《费城黑人》外，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Du Bois, 1989 [1903]）中令人动容的论文也受到了社会学的关注，尤其是他提出的“双重意识”的概念——生活在面纱之中的非裔美国人还被迫用白人压迫者的目光来审视自身。凯伦·菲尔兹（Karen Fields）（2002）提出了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与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的相似性，认为杜波依斯和涂尔干都是作为被歧视的他者在体验着世界：他们一位是非裔美国人，另一位是犹太人。很多时候，社会学对杜波依斯的探讨就到此为止，忽略了他接下来60年成果颇丰的职业生涯。

杜波依斯对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种族主义感到忧心忡忡，同时布克·华盛顿与白人精英的妥协令他愈发感到绝望。在研究资源越来越难以积累的同时，杜波依斯逐渐对科学对于黑人解放的作用失去了信心。总体而言，发现自己并不能说服白人相信非裔美国人同样也是人的杜波依斯选择了在1910年离开亚特兰大大学。之后，他转向了政治，联合创建了著名的民权组织（NAACP），并成为杂志《危机》的编辑。在接下来的24年中，他都没有离开该职位。1909年，他为激进派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撰写了一本传记《约翰·布朗》（*John Brown*）（Du Bois, 1996 [1909]），以支持在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反抗奴隶制的一次失败的起义，而这次起义被视作美国内战的一次预演。杜波依斯在赞扬约翰·布朗的文字中主要传达的信息是，黑人解放的代价固然高昂，但绝没有被压迫本身的代价那么大。这是一个全新的杜波依斯，在这里，他终于意识到非裔美国人的解

放不能依靠他人，而只能依靠他们解放自身。

2. 韦伯与杜波依斯

接下来，我们转向杜波依斯在《暗水》（*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Du Bois, 1999 [1920]）中对韦伯的含蓄批评。这本文学社会学合集以一篇著名的文章《白人的灵魂》开篇——这是与之前那篇《黑人的灵魂》的刻意对比。杜波依斯已经放弃说服白人，让他们相信非裔美国人也是人，而是反过来向非裔美国人证明白人是非人道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中得以体现——欧洲国家为了控制和剥削非洲相互斗争。他认为，如果我们认为西方文明是优越的，那是来源于其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暴力剥削——对人类、艺术珍品、原材料和思想的窃取盗用。杜波依斯所描述的西方历史与韦伯对理性化及其宗教起源的描述截然不同。在韦伯看来，暴力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可能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扩张中，暴力完全被清除了，现代资本主义仅仅基于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会计、家庭和工作的分离、法律制度和科学的应用。对于杜波依斯来说，资本主义的暴力，尤其是种族暴力，从未停止过。

《暗水》中的文章坚信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于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参与式民主和财富均等化。杜波依斯关于“男人的统治”、“女人的诅咒”和“工作与财富”的论文均指向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但前提都是首先要解决种族问题。他批评了那个时代许多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认为他们没有认真对待种族问题。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实现另一种平等主义，如果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即“肤色更深的种族”被排除在外的话。马克斯·韦伯对社会主义的承诺——自由、平等和民主，持更深的怀疑态度。对于韦伯来说，社会主义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任何达成社会主义的企图只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即理性化和官僚主义的加剧，自由和民主的消亡。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将成为部分官员的专政，而非所有工作者的民主统治。杜波依斯和韦伯都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其中一位拥护社会主义，而另一位则对之不予理会。

3. 马克思与杜波依斯

《暗水》代表着一个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的杜波依斯。他提出了一种社

会主义的愿景，但除了通过工人阶级统一的、自发的行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来实现它。而对于工人如何实现自发行动，杜波依斯没有提出清晰的途径。除了没有阶级形成理论，杜波依斯也没有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将如何动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意味着他必然要等待他的马克思主义时刻的到来。尽管杜波依斯在 1892~1894 年在德国读书时曾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也曾接受过柏林大学的教授们关于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教诲，但他似乎从未真正严肃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更不用说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了。直到 1926 年杜波依斯第一次访问苏联之后，他才一头扎进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关于美国内战的写作。这导致杜波依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巨大的志趣性转变，为他在 1935 年出版的杰作《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Du Bois, 1998 [1935]）提供了重要的灵感。这与当时主流的历史学派背道而驰，使得历史学家们还需要整整 30 年才能赶上杜波依斯的思想。

美国内战（1861~1865 年）之后的重建时期（1865~1877 年）一直被历史学家以及（白人）大众视作一场彻底的灾难，他们认为将非裔美国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只会导致腐败和混乱。杜波依斯站出来，对这一传统勇敢地提出了反对立场。早在 1910 年，他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了内战后重建的种种好处：选举权的扩大让非裔美国人得以成为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并带来了包括扩大全民教育在内的进步性立法。在《黑人的天赋》（*The Gift of Black Folk*）（Du Bois, 2009 [1925]）中，杜波依斯写到了非裔美国人从种植园到北方军队的种种贡献。这些主张后来在《美国的黑人重建》中以全新的理论框架再次出现。

《美国的黑人重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开篇，分析了美国内战的起源。以英国为主的纺织制造商对棉花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为奴隶制带来了土地和人口的巨大压力，进而威胁到了北方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这可以说是内战的开端，而其后续发展则主要靠杜波依斯所说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被奴役人口的“总罢工”来推动，这场罢工使得他们被允许加入北方军队，因而战争逐渐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表彰非裔美国人做出

的重要贡献，林肯于 1863 年宣布《解放宣言》生效，该宣言即预示了战后的一段时期的重建。杜波依斯逐州考察了跨种族民主在这段重建时期的发展——他也称之为“废除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以及资本主义本身如何能够创造超越种族秩序的可能性。而当奴隶制在北方被废除后，北方资本随即对如何促进南方非裔美国人的福祉失去了兴趣，这导致北方军队撤出南方，南方民主的进程因而被搁置，甚至发生了逆转。此后，南方被交还给昔日的种植园主阶级，他们着手建立了吉姆克劳的种族隔离秩序，通过建立白人所谓“公共和心理”工资将白人工人吸引到白人资本的一边。在整篇论文中，杜波依斯采取了阶级分析的视角来研究那些破坏和重建种族秩序的力量。杜波依斯的研究很有效地展示了马克思的思想如何能够被有效地重构并适用于分析美国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刻。杜波依斯并不将重建时期视作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而将其视作一次壮阔的失败。非裔美国人在重建时期的斗争所预示的某种真实的乌托邦，已将杜波依斯从《暗水》里想象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

杜波依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继续保持着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提出了非裔美国人社区应该利用种族隔离的现状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合作共同体。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波依斯进一步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向了全球，将他的泛非主义思想与非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运动结合起来。同时，他成为当时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位领袖，并选择站在冷战中苏联的那一边。因此，他成为美国政府的敌人，被指控私下为外国机构提供情报。在 1951 年的审判中，该案因缺乏证据而被驳回。气急败坏的美国国务院在接下来的 8 年中都拒绝为杜波依斯出具护照，而苏联和中国则向杜波依斯敞开了大门。杜波依斯公开支持苏联和中国推动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支持非洲和亚洲的反殖民运动。他在美国的公民身份逐渐变得岌岌可危，最终他在 1961 年加入了共产党并前往加纳以表示对美国政府的不满。1963 年，他在加纳去世，享年 96 岁。

四 今日社会学：重构经典与去殖民化社会？

以上即为对杜波依斯非凡的人生与思想的快速回顾。在其中我们能看

到如何从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视角来阅读杜波依斯，进而形成对他的著作更为理论化的系统的认识。这一过程同时也引导我们重新阅读杜波依斯之前的经典，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但我想要试着简单概括一下杜波依斯对传统社会学经典提出的五个挑战。

1. 一门解释性科学，透过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除了阶级外，也将种族纳入研究的核心，从奴隶贸易开始，一直延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2. 一门道德科学，提供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的维度，但同时呼吁对不断变化着的、阻挡人们实现这种可能的种种限制条件进行反乌托邦分析。

3. 一门反思性科学，社会科学家全然置身于他们所研究的世界之中，同时又身处各种各样的研究领域。

4. 一门跨学科科学，通过辨别学科边界以跨越边界，尤其注重社会科学、历史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

5. 一门公共科学，将社会学推出学术的茧房，通过构建公共辩论和公共问题进入公共领域。

将杜波依斯带入与经典的对话有彻底变革社会学的可能，但前提是我们对杜波依斯的生活和工作有全面的了解和把握。进入经典的一种可能的代价在于，我们仅仅考虑了杜波依斯早期的经验主义，而忽略了他的一些更为激进且重要的作品，这会大大削弱他的影响力。

严肃对待这样一种激进的社会学，即意味着承认这里生发出的观点，尽管呈现在普遍的、全球的语境下，但本质上是来自北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观点。从中国社会学的角度看，杜波依斯进入经典意味着什么？这种重建对于关于中国的研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研究有怎样的相关性？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所描述的重建是学术帝国主义的表现吗？中国社会学家或许对杜波依斯对于学术的贡献没有兴趣，而更愿意发展出更符合本土现实情况的、自己的经典。尽管杜波依斯的研究充分展现了全球视

野，以及他对苏联、中国和要求独立的非洲抱有认同并对美国政府秉持敌意，但杜波依斯的社会学仍然来自美国，即便其在美国处于边缘地位。因此，中国社会学家有可能会质疑杜波依斯与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的相关性，而更致力于发展一种抛开西方经典的本土社会学。无论是否去殖民化，经典仍然是西方的。或者，中国社会学家可能希望继续对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展开实证研究，而不受东西方经典研究的兴趣所在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关于经典的讨论都是无关紧要的，就如同在巴黎城内燃烧着熊熊大火时在一旁点燃火柴。

然而，西方霸权无法被我们如此简单地抛在一边。其背后支撑着它的是对这种霸权感兴趣的分配的制度性资源。举例来说，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排名系统旨在将中国大学的学术质量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做比较。而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往往就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培养了大量获得诺贝尔奖和其他学术奖项的学者，以及在“高影响力”、“国际性”（主要是美国）期刊中具有高引用次数的学者。世界上各个国家也会根据自己的大学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来评估这些大学并相应地分配奖励。而这些都是巩固美国霸权的方式。

而美国学术界的全球霸权在中国社会学的领域内不断被再生产，导致中国本土社会学本身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这引起了西方社会学的不同兴趣。那些从美国或欧洲的学术训练中受益的人可以在中国大学获得工作，他们对美国的霸权及其经典的延续或许会感兴趣。正如萨里·哈纳菲（Sari Hanafi）曾经写过的那样，西方的霸权让世界其他学者陷入了两种选择：在全球出版发表并在本土被消解，或在本土出版发表并在全球被消解。只有少数人能够挣脱这两种选择。

在一堆排名、评估和审计的纷繁复杂中，我们绝不能忽略了社会学的意义。对经典的去殖民化——对社会学的殖民化起源及其如何在当代社会学中再生产形成自觉——的确是一种进步性的、令人兴奋的、迟来的发展，但它不应分散我们对社会学在社会去殖民化中的作用的注意力。通过杜波依斯的视角重新阅读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今天的这种社会学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参考文献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nnell, Raewyn. 2007.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UK: Polity.
- Du Bois, W. E. B. 1910. "Reconstruction and Its Benefit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5 (4), 781-799.
- Du Bois, W. E. B. 1989[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Du Bois, W. E. B. 1996[1899].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 Du Bois, W. E. B. 1996[1909]. *John Brow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Du Bois, W. E. B. 1998[1935].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Du Bois, W. E. B. 1999[1920]. *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 Du Bois, W. E. B. 2009 [1925]. *The Gift of Black Folk: The Negroe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Square One.
- Fields, Karen. 2002. "Individuality and Intellectuals: An Imaginary Conversation between W. E. B. Du Bois and Emile Durkheim." *Theory and Society* 31(4), 435-462.
- Go, Julian. 2016.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5.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Itzigsohn Jose and Karida Brown. 2020. *The Sociology of W. E. B. Du Bo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 Aldon. 2015.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1982. "Should Sociologists Forget Their Mothers and Fathe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7, 2-11.
-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16. "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Science* 44(1134), 409-419.

论社会学自由主义：从全球南方/东方出发重构社会学经典

徐晓宏*

布洛维教授的演讲非常令人振奋，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对之做出回应。我从讲座和讲座所依据的两篇文章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从一个观念开始，我认为这一观念是布洛维教授讲座的基础，即“社会学随着 19 世纪欧洲和美国市民社会的出现而成长，并采用市民社会——这个在分析上不同于经济和国家的领域——的立场”。在布洛维教授 2003 年发表的文章《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中，他提出了“行动的社会”(active society) 的概念来描绘这样一个领域 (Burawoy, 2003)。我的回应将聚焦于社会学作为一门采用“行动的社会”立场的学科这一观念。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回答。在智识上，社会学应该辨识出社会中种种因果关系的力量：各种社会力量——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象征的——如何塑造我们的个人成就、心态、个性、惯习和生活方式等。在行动上，社会学需要发挥其知识上的诸多洞见，以建立一个“行动的社会”、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这些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公共辩论、审议以及公共政策而被社会全体认识、论辩和应对。也就是说，它应该让人们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大家同舟共济，可以一起对社会问题、不平等和权力悬殊做出改变，而不是屈服于失败主义和宿命论。

杜波依斯的著作也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涵。一方面，它丰富了我们对社会因果关系力量的理解：他对双重意识的分析，对沿着肤色区隔的“面

* 徐晓宏，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纱”的分析，对黑人妇女的性别化劳动的分析，对种族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关联如何塑造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分析，都采取了那些被边缘化然而又充满韧性和行动力的人们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学洞察。另一方面，他对内战后种族间民主（inter-racial democracy）的兴起和衰落的剖析很好地示范了一个“行动的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和动态关系。

我完全认同布洛维教授的观点，即社会学是一门采用“行动的社会”立场的学科，在建设这样一种“行动的社会”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而我的问题在于，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建设这样一种行动的社会努力是否面临不同的障碍，以及需要不同的社会学工具。现场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在美国做教授，在那里，社会学要对抗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霸权，这一霸权将社会问题个人化，遮蔽了社会的存在，并不断使商品拜物教翻出新花样。然而，在我所说的“全球南方/东方”，社会学还面临着更多的复杂问题。

我使用“全球南方/东方”的概念，而非“全球南方”，原因在于除了“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所隐含的全球经济不平等和殖民主义历史的内涵之外，“全球南方/东方”同时还明确地要求人们去关注挑战建设“行动的社会”的政治问题。我想澄清的是，我并不是想要复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的两分，而只是想要承认一种经验性的事实，即在全球南方/东方，存在积极寻求对“西方”的政治替代的努力。

在我看来，在全球南方/东方，建设行动的社会最大挑战是社会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在现代性中有着悠久的谱系历史，对此我在其他地方有更详细的论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行动的社会需要有政治化的空间。所谓政治化，我指的并不是党派性和两极分化，而是指把看似是个人问题变成公众讨论、辩论甚至争论的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公共立法和政策，作为一个社会集体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在很多全球南方/东方的语境中，社会的去政治化意味着社会被剥夺了重构自身的政治能动性，同时社会被两种力量掏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性理性化和原子化，另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

景下，社会学面临着沦为社会管理和技术官僚体系治理术的的工具的巨大风险。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社会学必须维护个体发表观点、自我表达和阐述社会问题的权利，也即政治化的权利。在布洛维教授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我想提出一种“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这种立场之所以是自由主义的，是因为它坚持个体在各种问题上发表言论、表达观点、获得尊严和选择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但它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行动的社会。它将社会，尤其是那些被压迫者和被边缘化的人所主要面临的问题政治化。它对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及其西方左派评论家所经常强加给全球南方/东方的错误选择采取坚决的拒绝。这种错误的选择认为，全球南方/东方必须在两条道路中做出选择，一条道路是世界主义精英所渴望的自由民主，另一条道路是号称能满足穷人需求的专制的稳定体制和家长式保护。对这一错误选择的拒绝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一种远比资产阶级“权利法案”更广泛的对自由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重构社会学经典在当今很多全球南方/东方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既要求对现有的各有侧重的经典进行重新解释，又要求提出潜在的新经典。我想从东亚社会的背景中提出几条线索，并询问布洛维教授，这些线索与他提出的关于建设全球性的行动的社会理论构想是否一致或有冲突。

我们先从马克思开始讨论。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是自由，而非平等。在他设想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批评自由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并非不平等或工人被剥削，而是因为工人被异化了。他们经历着与他们自身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他们自身和其他人相疏离的四种异化过程。也即意味着，他们并不自由。这种关于自由的概念与黑人激进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概念相当接近：这也是弗兰茨·法农（Frantz Omar Fanon）（1986）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中称其智识工作为“去异化”的原因之一。

类似地，杜波依斯的作品对东亚社会学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它审视

看似遥远的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问题。种族问题与东亚民族主义的兴起有深刻的关联，就如同它与美国白人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一样。但很遗憾的是，种族问题在东亚社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种族问题的背后，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概念对理解这些地方的社会排斥还有着更广泛的意义。他对黑人为了种族间民主展开的斗争的分析，可能会促使人们注意到劳工群体——而非传说中的“新中产阶级”——在东亚民主斗争中的关键作用。

尽管韦伯没有致力于建设行动的社会，甚至对其持怀疑态度，但他始终坚持多元主义的价值，强调在面对诸神纷争的世界时保持智识诚信（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必要性，并推崇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平衡，及其关于各种形式的权威和行政控制手段的见解，都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的行动的社会大有裨益。同样，涂尔干对道德个人主义的辩护，及其对社会团结的社会政治基础的探索亦是“社会学的自由主义”的珍贵思想来源。

同样，在建设行动的社会政治维度上，我们还可以将更多理论家纳入经典的范畴中来。在我看来，汉娜·阿伦特对于政治的理解及其对将社会碾压于行政国家之下的观念的批判，都是对社会去政治化的有力解药。在这方面，布达佩斯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基于其自身社会主义经验与阿伦特思想的对话，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家来说可能意味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样值得解读的还有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的理论的政治维度，他对于中国政治现代性探索的分析迄今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社会学的自由主义”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东方正在打一场西方已经获胜的战斗，而是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一个行动的社会的社会条件。在当前的民粹主义时代，虚假信息 and 假新闻的盛行，以及最近埃隆·马斯克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收购推特，都引向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政治中的“公共事实”这一基本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凸显了将社会问题政治化的空间需求与专业团体制度化的信任需求——这是涂尔干特别强调的一点——之间的张力。

这些专业团体当然也包含了社会学。今天，重构经典是重构社会学作



为一种职业的一部分。这一任务似乎可以完美协调社会学对于建设全球性的行动的社会及其自身专业整全性的双重使命。而这就是剩下的一个问题。这种协调看上去如此完美，以至于我想知道这是否就能解释为何布洛维教授能够在热情倡导公共社会学和热情介入社会学经典的辩论之间无缝转换。我对达成二者之间的协调并没有异议，但我不禁想到，这种调和是否与布尔迪厄的那种理论性的协调相似？正如布洛维教授曾敏锐而批判性地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性协调只将解放性的角色赋予了理论，而没有给予实践以解放性的角色，我想知道布洛维教授对超越这样一种完美的理论性协调有何看法。

参考文献

- Burawoy, Michael. 2003.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31(2): 193-261.
- Fanon, Frantz Omar. 1986[1952].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Pluto Press.

杜波依斯与重构理论经典之争：一项知识社会学考察

谢雯*

有关去殖民化的思考已成为近年来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旋律，各大高校的学术项目——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项目——开始进行教学大纲和培养计划的“去殖民化”。我们今天与布洛维教授的讨论核心是杜波依斯思想遗产的再发现，以及美国社会学界如何试图将杜波依斯的作品“经典化”，以达成学科经典“去殖民化”的目的。在中国读者眼中，这一争论可能会被解读为美式政治正确的一部分，似乎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而本文以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检视这场杜波依斯与社会理论经典重构的争论，将其视为一场“学术运动”（intellectual movement）。知识社会学内的讨论已指出，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都是一部学术运动的历史，这些学术运动挑战既定的学术范式和探索模式，重新定义争论的主题，重塑学者们的“智识注意力空间”（intellectual attention space）。这样的学术运动可能会赢得大量的追随者，并在一段时间内制度化，直到下一个运动出现，也有可能学术史的长河中逐渐被遗忘（Kuhn, 1962; Collins, 1998; Fricke and Gross, 2005）。那么，这一重构经典的学术运动能够走多远？杜波依斯的写作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称为社会学“经典”？将杜波依斯列入经典理论的局限是什么？中国社会学界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可以说，最新一轮围绕杜波依斯讨论的出发点是西北大学奥尔登·莫里斯（Aldon Morris）教授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被否定的学者：杜波依斯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在这本书中，莫里斯认为杜波依斯本身的学术贡献以

* 谢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及他所建立起来的亚特兰大学派，可以和芝加哥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相媲美。而学界长期以来对于杜波依斯贡献的漠视，正是由于美国学界内部的种族歧视。莫里斯对于杜波依斯的大力推崇，首先与他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对于社会学学科的课程内容的长期不满有关。他在整个社会学训练中发现，学界现有的理论常常忽视自己的族裔，而黑人社会学家杜波依斯的写作完全可以超越很多被捧上神坛的核心理论家。莫里斯的博士生导师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是很多社会学学生在入门时阅读的《社会思想名家》一书的作者。莫里斯曾询问科塞为什么没有将杜波依斯列为社会学的大师之一，科塞回答道：“社会学思想的大师是那些罕见的、建立起一整套理论体系的学者，而杜波依斯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Morris, 2015: xv）莫里斯并没有被说服。他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证明杜波依斯确实是一位社会学思想的大师。这部关于杜波依斯的著作，便是他的一个尝试。

《被否定的学者》甫一问世，便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莫里斯掀起的新一轮杜波依斯之争虽然看似是社会学内部的争论，但也反映了其背后的社会症候。自奥巴马上台后，平权话语表面的进步掩盖了美国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黑人地位的进一步下滑。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美式民主的华袍之下，是美国社会内部的撕裂以及群体性不满。“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始于2013年7月，前两年的抗议还只是局限在几个城市，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和示威活动。这样的社会层面的情绪也侵入到了学界内部。近年来学界内“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大学内部针对少数族裔的招生政策等便是整体社会变化的缩影。

过去几年，围绕杜波依斯的讨论持续发酵：学界已经不仅在讨论是否要恢复杜波依斯在美国社会学史中的地位，而是开始争论我们是否要将其视为社会理论“经典”。而具体如何将杜波依斯“经典化”，美国社会学界内部有着不同的声音。有学者坚持认为，现有的经典理论以欧洲为中心，对种族、性别以及帝国主义的秩序视而不见，因此“在根本上是不完整的”，“有致命的缺陷”，社会学需要彻底改变经典（Matlon, 2022: 553）。杜波依斯从全球性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强调种族因素经由殖民主义、帝国主

义、奴隶制时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塑造作用。对于杜波依斯来说，肤色线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olor line）——“亚洲和非洲、美洲和海洋岛屿的深色人种与浅色人种的关系”——是二十世纪的重要问题，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Du Bois, 1903: 1）。伊齐格森和布朗则在杜波依斯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种族化的现代性”（racialized modernity）的命题，推动了杜波依斯社会学的经典化运动（Itzigsohn and Brown, 2020）。而布洛维教授认为，在这一系列讨论中，社会理论经典的“革命派”和“拒绝派”过于激进，学界不应该彻底推翻现有的经典，社会理论三大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提供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假设，社会学仍然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研究项目。布洛维强调，虽然把杜波依斯带回来很重要，但我们要将其放置在与三大家对话的脉络中，社会学的发展应建立在与经典人物对话的基础之上。

这里，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下什么是社会学“经典”（canon）。每一个学科都会关注自己的起源。在任何最近的社会学入门教科书中，几乎肯定会在最初的几页中讨论创始者。被重点介绍的往往是社会理论三大家——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介绍性的一章也有可能提到奥古斯特·孔德、费迪南德·托尼斯、赫伯特·斯宾塞、格奥尔格·齐美尔和乔治·赫伯特·米德。这样一组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写作也被称为“古典社会学理论”（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ies）。对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关注和社会学“经典”的讨论有所重合，但是“经典”的范围会更窄一些。经典文本是一套有特权的文本，其解释和重新解释定义了一个领域。人们可以不断地重新阅读“经典”，以寻求新的理解。只有少数理论家的写作能够被视为“经典”，并且值得学界不断地品读。比如说，社会学家们可以发现并阅读韦伯的不被大众熟悉的文本，也可以不断重读学界已经熟悉的文本；人们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阅读涂尔干，或者通过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阅读涂尔干（Connell, 1997）。布洛维提出的重构经典的方式便是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视角来阅读杜波依斯，从而进一步发掘杜波依斯的思想遗产（Burawoy, 2021）。

经典社会学文本的选择，并不是在学科建立初始便达成了共识。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还没有意识到某些核心文本是可以定义学

科性质的，是需要特别研究的“经典”。相反，学界认为科学知识的进步是基础广泛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只是学科先锋当中的部分成员。社会学家们接受了 Charles Letourneau (1881: 6, 引自 Connell, 1997) 在学科史早期所阐述的观点，即“任何科学的开始，无论多么简单，都是一项集体工作，并需要许多有耐心之人的持续劳作”。在二战后的 30 年里，社会学作为一项教学事业在美国有长足的进步 (Turner and Turner, 1990)。这背后有两点原因。首先，美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开始积累巨大财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其次，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学生运动使得年轻学生们对于社会学兴趣陡增，美国社会学这时也迎来了扩张最迅速的时期。学生数量的增长需要教学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个性化的培养逐渐被标准化的培养计划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托于“经典”文本的社会学教学计划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自 80 年代开始，伴随着知识社会学视野的不断开拓，人们逐步意识到，经典理论的选择和讲授虽说为学生培养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教学方案，但其代价是缩小了社会科学的知识范围并掩盖了大部分的学科史。知识的传播与承认不总是由知识本身的绝对“质量”决定的，而是受到大量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对于学科“经典”的批判、反思与改进也随之开始。人们开始寻找被忽视的理论家，并修正本科生的教科书，在熟悉的创始人名单中加入了杜波依斯和简·亚当斯等人 (Macionis, 1993; Thio, 1992; Ritzer, 2010)^①。然而，这些早期的尝试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美国社会学家对该学科历史的一般性看法，学界依然认为，一小群来自欧洲内部的杰出的作者所书写的关

① 沿着美国社会学科学化发展脉络，学者们往往围绕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几位重要社会学家构建美国本土的社会学史 (Gouldner, 1970; Steinmetz, 2005)。杜波依斯以《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 为代表的早期研究和他建立起来的亚特兰大学派，是偏向学术的。在这一时期，杜波依斯更倾向于成为一名专业的社会学家。然而，出于对当时的政治界和学界的失望，杜波依斯离开了学术界，致力于黑人的解放运动，转向政治，联合建立 NAACP，并在二战结束之后，投身泛非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 (Lewis, 2000)。芝加哥学派中常常被忽视的女性社会学家简·亚当斯 (Jane Addams) 反对学术社会学、精英主义、偏执主义和知识主义。亚当斯建立了 Hull House，于 1931 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美国新政期间，她的许多关于社会保障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建立美国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Deegan, 1988)。这两位社会学家的被忽视，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内部的种族与性别歧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写作传统在战后美国的实证主义主流范式下成为“边缘”。

于现代性发生的文本，决定了学科的起始点和性质。美国社会学界虽然承认了黑人和女性社会学家对于学科史的贡献，但这些工作仍然停留在“装裱门面”（window dressing）的层面——在教科书当中象征性地加了几段话或者一两章的内容——而在深入改变惯习与学术实践的意义收效甚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一轮对于杜波依斯的讨论是颇有成效的，学者们集体探讨挖掘了多部杜波依斯的作品，推动了学界与大众对于杜波依斯的了解。但是，将杜波依斯列为社会理论经典，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杜波依斯的写作以描述性叙述居多，偏向经验，而非抽象的理论。笔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时，曾带领学生读过《费城黑人》中的部分章节。尽管学生们感叹杜波依斯早在 1899 年就开始使用调查研究方法，但在此之外，学生们表示缺少与杜波依斯跨越时空的理论共鸣。如果学界要把杜波依斯提至社会理论经典的地位，那么需要将他的作品进一步抽象化，并对他的“历史性的具体描述加以概括”（Burawoy, 2021: 551）。

学界仍需从杜波依斯的写作中提取出更多理论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完整的理论论述，激发新的社会学研究视野。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是学界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概念，它是杜波依斯在 1903 年的《黑人之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提出的：“人们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协调的努力；在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个交战的理想，只有顽强的力量使它不被撕碎。”在杜波依斯的笔下，美国黑人的历史就是这种双重自我争斗的历史，黑人一直在试图“将他的双重自我合并成一个更好的、更真实的自我”（Du Bois, 1903: 3）。莫里斯在他的书中特别强调，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概念，是在帕克的“边缘人”概念之前提出的，并且帕克的“边缘人”概念正是受到了杜波依斯的启发（Morris, 2015: 147）。莫里斯看重的是概念提出的先后顺序，以及杜波依斯的原创性，而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概念的“理论性”进行对比。帕克提出的“边缘人”概念指的是在人类迁移和现代城市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Park, 1928）：他们生活在边缘地带，不忠于或定居在一种文化中，拥有独特的立场，可以比其他人更客观地评估社会关系。对比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边缘人”强调的是在一个异质性的社会中的

位置结构所造就的人格特征，而“双重意识”的概念想要捕捉由种族偏见造成的美国黑人受压迫的情况，在抽象的理论概念当中多了一层道德控诉的意味。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的概念是否能够取代帕克的“边缘人”的概念，以及在“双重意识”这一概念的启发下，是否会生发出真正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都需要后续学者的进一步解读和实际应用。

经典理论能够影响社会学家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语言说话，如果杜波依斯在这场经典化运动之后仍能够保留影响，那么他的一些核心理论概念就需要进入社会学的理论“工具箱”，或者说社会学家的“语言体系”，否则这场杜波依斯经典化运动又将是一场昙花一现的学术运动。学界仍需纠正根深蒂固的对于“谁是经典”的偏见。阿伯特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经典理论”的来源这一问题上，美国学界仍然不自觉地偏重欧洲传统，轻视美国本土的理论传统，而这显示出帕森斯对美国学界的影响之深远（Abbott, 2006）。照此看来，将杜波依斯列为社会学经典的一部分，并将其在学科教育体系内制度化，其实不难；但最终，杜波依斯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进入社会学家的语言系统，成为学者们习以为常引用的理论来源，仍需要时间来检验。

讨论至此，我们会发现，关于何为“经典”的争论在当下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对于学科史的讨论会影响到我们的学科起源与认同、当下的学科建设方向，以及社会学家本身的思考方式。其实，中国社会学家在知识本土化过程中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中国社会学经历了重建初期对于西方理论的崇拜与大力引进，开始驻足反思，希望提出基于中国历史和实践的社会理论思考，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那么，在本土化的诉求下，学界需要把哪些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写作列入学科理论“经典”，又应该如何对待现有的西方经典？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概念是否能够进入中国以外的社会学语言体系，并获得承认？这些都是摆在中国社会学家面前的难题，需要一两代社会学家携手去解决。

概而言之，虽然这场重构经典的争论在中国读者的眼中，可能是美式“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但是这一争论在美国社会学界所激发的跨越世代、种族的社会学者的争鸣精神，值得中国学界关注。将这场学术运动视



为知识社会学考察的对象，会为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研究和本土化等议题上提供新的启示。

参考文献

- Abbott, Andrew. 2006. "A Brief Note on Pastur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47(5), 343–349.
- Burawoy, Michael. 2021. "Decolonizing Soci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W. E. B. Du Bois." *Critical Sociology* 47(4–5), 545–554.
- Collins, Randall. 1998.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nnell, Robert William. 1997.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6), 1511–1557.
- Deegan, Mary Jo. 1988. *Jane Addams and the Men of the Chicago School, 1892–191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Du Bois, W. E. B. 1899.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Du Bois, W. E. B.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ickel, Scott and Neil Gross. 2005. "A General Theory of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2), 204–232.
- Gouldner, Alvin W.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Itzigsohn, José and Karida L. Brown. 2020. *The Sociology of W. E. B. Du Bois: Racialized Modernity and the Global Color Lin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tourneau, Charles. 1881. *Sociology, Based upon Ethnography*. London: Chapman & Hall.
- Lewis, David Levering. 2000. *W. E. B. Du Bois, 1919–1963: The Fight for 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acionis, John J. 1993. *Sociology*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Matlon, Jordanna. 2022. "Politics, Crisis, and the Canon: A Commentary on Michael Burawoy's 'Decolonizing Soci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W. E. B. Du Bois.'" *Critical Sociology* 48(4–5), 553–557.
- Morris, Aldon. 2015. *The Scholar Denied: W. E. B. Du Boi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o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ark, Robert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6), 881–893.
- Ritzer, George. 2010.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Steinmetz, George. 2005. "Scientific Authority and the Transition to Post-Fordism: The Plausibility of Positivism in US Sociology since 1945." Pp. 275-323 in George Steinmetz (ed.). *The Politics of Method in the Human Sciences: Positivism and Its Epistemological Other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hio, Alex. 1992.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3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Turner, Stephen Park and Jonathan H. Turner. 1990.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是社会学的去殖民化，还是再殖民化？ 与迈克尔·布洛维商榷

郑作彧*

I

非常感谢布洛维教授的演讲，这场演讲非常吸引人，十分有趣。我学到了很多，也很感谢这场讲座的组织者的邀请。

近年来，杜波依斯获得了大量的关注。虽然他之前在社会学领域，或者说至少在美国社会学界，并非完全不为人知，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杜波依斯应该被视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正如布洛维教授所提到的那样，有人希望重写整个社会学直至今日的历史，将杜波依斯提升到独一无二的地位。另一些人则主张在社会学原有历史的基础上添加新的故事，将杜波依斯、涂尔干和韦伯放置在同一位置。布洛维教授无疑属于后者（Burawoy, 2021）。我和杜波依斯一样曾在德国的柏林学习过，所以能感到和他之间的联系，并对他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

在我看来，任何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有两个可能的原因（Connell, 1997）。一个是纯粹的巧合，另一个，用黑格尔（Hegel, 1987）或霍耐特（Honneth, 1994）的话说，是“为承认而斗争”的结果。这两个原因有时是重叠的，因为成功获得承认往往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这两个原因的比重是不同的。例如，在我看来，涂尔干和韦伯之所

* 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以成为经典人物，这在历史上的偶然性更大一些。如果帕森斯没有在德国学习，或者如果他是在柏林或科隆而不是海德堡学习，那么今天大家必须要阅读的就会是特洛伊奇（Ernst Troeltsch）或冯·韦瑟（Leopold von Wiese），而非韦伯（Max Weber）。或者说，如果帕森斯的著作没有大获成功，美国 and 全世界的社会学就不会实现学科独立，涂尔干和韦伯也就不会获得大师级地位。而如果没有涂尔干和韦伯作为社会学的经典人物，那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正如布洛维教授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曾追随的是那些实证主义者，我们会回到经典之前的世界——散乱而无目的的经验主义会把社会学变成经济学或政治学的一个小分支。我们也会失去社会学诞生以来予以立身的根基——反功利主义——而这在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在19世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性。（Burawoy, 2021: 551）

在我看来，布洛维教授重新发掘杜波依斯的著作即一种“为承认而斗争”的努力。如果杜波依斯将来真的成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那我认为这将会是布洛维教授和其他追随者努力争取承认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布洛维教授是历史的推动者，而我充其量只是一位旁观者。因此，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有这个机会与历史的推动者交谈。

II

我不太能直接做出杜波依斯是否应该成为经典的评论和判断，因为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但我对历史的推动者，即布洛维教授的动机很感兴趣。换句话说，我想问布洛维教授的是，为什么你对杜波依斯如此推崇？我们可以看到，米德（George H. Mead）也是他们的同时代人之一，但他顶多被认为是符号互动主义或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而没有被提升到与涂尔干和韦伯同样的高度。在那个时代，芝加哥的一些学者显然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虽然你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但你并没有特别站在芝加哥学

派那边。你甚至说过：“现在谁还读罗伯特·帕克？”（Burawoy, 2021: 547）但我们今天仍然在阅读米德的著作。为什么你和其他学者如今提倡将杜波依斯纳入社会学经典，而不是其他人，例如米德？

我的问题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问题。

第一，布洛维教授强调，在当代主流社会学的视角中，即与涂尔干、韦伯，甚至是马克思的思想相关的理论体系中，种族和殖民化的问题被忽视了。但为什么布洛维教授认为杜波依斯应该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而非像米德那样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的奠基人？也就是说，为什么杜波依斯不应该被认为与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霍米·巴巴（Homi Bhabha）或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处于同一地位，而必须被放置在与涂尔干和韦伯同一的地位上？

第二，杜波依斯常常因为他的黑人身份和他为美国黑人所做的努力而被重视。当下我们当然觉得这种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性如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这种说法正变得越来越有争议性。杜波依斯的重要性的贡献之所以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如今美国的“保持警醒”运动（stay woke movement）使得在所有领域的代表人物中都应该有黑人的身影，这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在美国社会学经典中纳入一位黑人可以避免逆流而行的麻烦。但之所以这种理所当然是有争议的，正是因为这种警醒主义和政治正确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成为一种压迫，所以也就有了相应的反对警醒主义的斗争。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的做法是否会将社会学轻易地推入支持或反对警醒主义的政治漩涡中？你如何看待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和保持警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你曾说过：“在这个种族、阶级和性别都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我们迫切地需要杜波依斯。”（Burawoy, 2021: 552）所以我很好奇：将杜波依斯纳入经典是否真的具有长久的学术重要性，还是它只是当今美国的一项政治正确任务？

我的第三个问题与上述政治正确性的压迫性有关。在殖民和种族问题领域，杜波依斯的许多努力无疑值得我们尊重，但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人，尤其是非美国人，他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做出了重要的根本性的贡献。例如，许多学者对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推

崇备至，认为他是社会学的创始人，甚至早于涂尔干和马克思（Dhaouadi, 1990）。但我想，想要提升伊本·赫勒敦的地位要比杜波依斯困难得多，因为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将一位伊斯兰学者纳入经典在西方世界是很难被接受的。

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例如，我来自中国台湾，如果我想要在国际社会学领域有所作为，那么我就必须符合主导国际社会学发展的国家，也即美国的偏好，这将使我不敢推崇伊本·赫勒敦。但这个例子让我想到，也许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去殖民化”和“去殖民化的社会学”区分开来。事实上，布洛维教授的一篇出名的文章《社会学的去殖民化》引起了一些学者，甚至是布洛维教授的学生，疑惑“去殖民化”究竟有何意涵（Oeur, 2022）。虽然围绕着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讨论，但我仍然没有看到一个对之明确的解释，相反，我在想，将杜波依斯的“去殖民化的社会学”纳入经典，是否意味着对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殖民化，这意味着一种二次殖民。

那么，第一次的殖民化是什么时候呢？答案是将涂尔干和韦伯奉为经典时。布洛维教授的一些文章提到，社会学经典人物是以欧洲为中心的（Burawoy, 2021）。但事实上，如今的这些奠基性人物根本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将涂尔干和韦伯奉为经典的实际上是美国人。虽然涂尔干创立了法国社会学，但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出版之前，他在整个法国社会科学中并不占显著地位。就韦伯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在帕森斯之前，德国学界并不认为韦伯是一个关键人物（Kaesler, 2016）。仅仅是在帕森斯在美国高度赞扬韦伯之后，德国才在1964年讨论是否应该从美国引进韦伯。而在那个时候，一些德国社会学家，例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仍然对韦伯持相当否定的态度（Topitsch, 1965）。也就是说，如今德国把韦伯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并不是因为德国自己如此提倡，而主要是由于美国社会学对德国社会学的一次学术殖民。

更不用提的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布洛维教授所谓的欧洲中心的社会学经典其实是由美国提供的话语想象出来的。因为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和其他地方的社会学学者都无法使用法语或德语阅读，而只能用英语阅读由美国提供的欧洲社会学。因此，大多数地方的学者理解这些经典人物都

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美国的视角（Cheng and Huang, 2021）。我们知道，布洛维教授本人来自英国，在赞比亚和匈牙利等地进行了多年的调查，无疑具有非常广阔的国际视野（Burawoy, 2000），但并非所有地方的学者都有丰富的资源或条件来摆脱美国的学术霸权。然而，由于涂尔干和韦伯都不是美国人，我们仍然可以具备想象其他世界图景的可能。但是，如果杜波依斯作为一位美国人，真的成了社会学的典范人物，那么，整个世界的社会学图景会不会完全变为美国人的想象？

也就是说，尽管杜波依斯努力在创造一种去殖民化的社会学，但是否有一种可能性，即把杜波依斯奉为经典实际上会在许多地方造成一种社会学的再殖民化？

III

我相信，修订社会学经典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布洛维教授在此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定的挑战。以你的地位，你明明可以选择不用走这样一条困难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钦佩你的勇气。

同时，像布洛维教授这样站在国际学术金字塔顶端的学者，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相信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而是因为他有毅力和能力冲破各种阻挠。我还发现，布洛维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并讨论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因此，我提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渴望通过这些问题向布洛维教授的回答学习。

参考文献

- Abdullahi, Ali Arazeem. 2012. "Ibn Khaldun: A Forgotten Sociologist?" *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43(3), 24-40.
- Burawoy, Michael. 2000.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awoy, Michael. 2021. "Decolonizing Soci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W. E. B. Du Bois." *Critical Sociology* 47(4-5), 545-554.
- Cheng, Tsuo-Yu and Xinye Huang. 2021. "Die Max-Weber-Rezeption in der chinesischen



- Soziologie. Historisch-gesellschaftlicher Hintergrund, Übersetzungen und Forschungsansätze.” Pp. 229–259 in Andrea Maurer(ed.). *Mit Leidenschaft und Augenmaß: Zur Aktualität von Max Weber*.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 Connell, Raewyn. 1997.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6), 1511–1557.
- Dhaouadi, Mahmoud. 1990. “Ibn Khaldun: The Founding Father of Eastern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5(3), 319–335.
- Hegel, G. W. F. 1987.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tuttgart: Reclam.
- Honneth, Axel. 1994.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Kaesler, Dirk. 2016. “Max Weber Never Was Mainstream, But Who Made Him a Classic of Sociology?” *Serendipities* 1(2), 121–137.
- Oeur, Freedren Blume. 2022. “Canon Fodder and the Intimacy of Dialogues.” *Critical Sociology* 48(4–5), 559–569.
- Topitsch, Ernst. 1965. “Max Weber und die Soziologie heute.” Pp. 19–38 in Otto Stammer (ed.). *Max Weber und die Soziologie heute: Verhandlungen des 1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Heidelberg 1964*. Tübingen: Mohr Siebeck.

巴西的社交网络与集体行动：卡车司机与外卖员的经验

约克·诺瓦克 马可·桑塔纳*

摘要：本文探讨巴西的卡车司机和平台外卖员如何以社交媒体为工具进行工人组织和集体行动，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在2018年卡车司机罢工及2020年平台外卖员所组织的名为“手机软件刹车”（“Breque dos apps”）的全国性行动中的作用。作者旨在探索工人使用社交媒体来组织行动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检视互联网2.0的有效性对工人运动的正面作用以及社交媒体可见性对工人动员的负面作用。因工人行动的方式不同，这两种因素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关键词：社交网络 集体行动 连结行动 卡车司机 外卖员 巴西

一 引言

工人集体行动和社交媒体的作用在过去几年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Lazar et al., 2018; Garelli, 2020; Maffie, 2020）。本研究基于一个更大的关于连结行动（connective action）逻辑的理论框架（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区别于早期的集体行动逻辑（Offe and Wiesenhal, 1980），连结行动表现出一种更加独特的组织行动力。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巴西的卡车司机和外卖员的经验，他们将社交

* 约克·诺瓦克（Jörg Nowak），巴西利亚大学环境与农村发展研究系教授；马可·桑塔纳（Marco Santana），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译者：初静怡、肖扬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校对：黄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本文的一个较早的英文版为：Nowak, Jörg and Marco Santana. 2023. “Social Media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Brazil: The Experience of Truck Drivers and Delivery Workers.”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DOI: 10.1080/08854300.2023.2201996。

媒体作为工人组织的工具和集体行动的要素。我们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在 2018 年卡车司机罢工和 2020 年平台外卖员所组织的一场名为“手机软件刹车”的全国性罢工中的作用。本文旨在探索工人使用社交媒体来组织行动的可能性及局限性。

在工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文献中，学界有个共识，即互联网 1.0 对工人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Heckscher and McCarthy, 2014; Saundry et al., 2012）。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互联网 2.0 才真正产生了影响（Pasquier and Wood, 2018; Wood and Lehdonvirta, 2019; Wood et al., 2018; Maffie, 2020）。虽然互联网 1.0 对传播的形式以及思想的流通已经产生了影响，但由于它不具备互联网 2.0 的普及性、个人性和日常使用性等特点，因此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交流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另外，从电脑到智能手机的发展也增加了工人阶级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

有学者对连结行动持乐观态度，认为其可以激发自下而上的力量（Castells, 2015; 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但实际上，工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可见性对他们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除了一般的社会运动行动者所面临的风险之外，工作场所的行动主义还伴随其他风险，如工人会被他们的现任雇主解雇或不被未来的雇主录用（Lazar et al., 2018: 440）。因此，在 Treem 和 Leonardi（2012）所指出的社交媒体的四种功能中，“可见性”对工人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个过程中，伪造身份或集体身份可以降低一些风险。

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互联网 2.0 对于工人行动的有效性以及社交媒体可见性对工人动员的负面作用，会因工人动员方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其中，不同类型的工人抗争方式包括：a. 街头抗议和占领广场运动，如欧洲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 movements）和 2013 年 6 月巴西的抗议活动；b. 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或某个特定企业公司的抗争；c. 不同企业和工作场所工人之间的联合抗争。

通常，a 类抗争——我们称之为“街头抗议”——往往用来证明社交媒体的正面作用（Castells, 2015; 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但 b 类抗争——我们称之为“工作场所抗争”——才是学者研究社交媒体对工人动

员作用的主要议题 (Lazar et al., 2018; Maffie, 2020)。我们所关注的卡车司机和平台外卖员动员的两个例子属于 c 类, 在该抗争类型中社交媒体的作用还未得到广泛的研究。我们称作“普通工人抗争”(general workers protests) 的 c 类具有 a 类的一些特征, 例如呼吁加入行动的是街头大众, 因此行动者能被匿名保护。但它也具有 b 类的一些特征, 例如抗争中提出诉求议题会受限, 以及可见性所带来的一定危险。

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社交媒体作为动员的工具可能有一些局限性。社交媒体在运动爆发的初期对于动员可能是有用的, 但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它对于巩固工人的动员工作帮助不大。因此, 问题在于, 我们讨论的是完整意义上的、涵盖传播和组织双方面的连结行动, 还是社交媒体只起到局部作用的集体行动? 在后一种情况中, 社交媒体起到的作用更多是一种交流和信息的传播与宣传, 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组织。Maffie (2020) 发现, 工人在线上社区与其他工人的互动, 使得大家形成了对工会更积极的看法, 并提高了参与组织工作的兴趣。因此, 社交媒体可能有鼓动作用, 但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组织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必须在线下完成。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还需要考察, 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策略上的互补性。(Khalil and Storie, 2021)

连结行动的文献还存在一个不足, 那就是这些文献没有调查以下问题: 如果社交媒体推动了最初的大规模动员, 那该技术对于后续的行动是否继续起促进的作用? 前后的行动是如何延续的?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同意 Lazar 等人 (2018) 的看法, 强调需要了解工人运动中社交媒体的使用, 并且要注意技术的使用并非没有矛盾性。也就是说, 在工人使用社交网络时, 运动的进展实际上会受社交网络的逻辑支配, 始终不要忘记这些网络平台是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的逻辑下产生的。

本文将分析巴西的两个行业群体近年来所开展的抗争, 包括卡车司机和平台外卖员运动。卡车司机的罢工爆发于 2018 年 5 月, 这场运动让整个国家停摆了 10 天。自雇卡车司机抗议燃油费的上涨以及价格变化的不可预期性。他们支持取消燃油税并要求国家出台法律对最低运费进行保底。我们所感兴趣的关注点在于, 这次罢工可以说是巴西工人在罢工中使用社交媒体

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第二个抗争是“手机软件刹车”运动，由平台外卖员发起，并于2020年7月1日和25日分别进行。在新冠疫情蔓延的紧急关头，外卖员们停止了送单，他们要求更高的单价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次运动的特点也在于社交媒体的大力使用，但使用方式与卡车司机罢工有所不同。

二 网络化的社会运动和数字网络行动

21世纪10年代抗议热潮席卷全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卡斯特尔（Castells, 2015）在专著中对技术在这些社会运动中的使用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网络化的社会运动”（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s）。这些运动被认为是在铺开“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变革的新路径”（Castells, 2015: 4）。运动通常在社交网络的自治空间中发起，之后行动者将这种讨论带入公共空间，从而在公共空间中发展出自由的社群。

由于制度性的公共空间，即宪法所授权的议事空间，已被当权的精英及其关系网络的利益所主导。因此，社会运动需要开辟一个新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不应受限于互联网，而应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场所中。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占据城市空间和象征性的建筑（Castells, 2015: 10）。

因此，我们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时，要实现现实和虚拟的对接（articulation）。这个连接起数字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场所，将成为一个自治的交流空间。交流的自治性将成为社会运动发展的关键，并将使运动与社会大众的关系超越现有的控制，包括交流方面的控制。此空间将成为反权力的网络，与权力的网络对抗。当社会行动者发现行动难以推进时，交流就会起根本性的作用。在行动者发现同伴遇到困境时，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愤怒转化为行动，并升华为更激进的愤怒以克服恐惧。

Bennett 和 Segerberg 合写的文章也发表于21世纪10年代的社会运动热

潮中，他们“研究了当交流成为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时，组织动力所产生的变化”（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 739），认为要理解这个过程，必须要区分两种逻辑：一种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另一种是连结行动的逻辑。尽管两者会出现在相同的行动生态中，但我们仍需要对它们进行学理上的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在于通信技术的使用，而在于通信技术使用的方式。在集体行动中，技术和通信网络的使用不一定会改变群体组织的基本原则，也未必改变行动的动态（action dynamics）。相比之下，数字媒体网络可以改变组织规则，促进技术和个人行动之间的良好互动（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 751）。

从这个意义上看连结行动的逻辑的话，通信网络的作用就不仅是减少组织和动员的经济成本，也不仅是加速信息的传播。Bennett 和 Segerberg 所强调的是，基于信息共享的通信网络即使在组织层面也发挥着核心的作用。通信网络自身就是组织者，就是组织结构本身。连结行动的核心内容是“数字网络行动”（Digital Networked Action, DNA）。在当下社会，正式的组织越来越难以吸引个体的参与，而群体的纽带逐渐被大规模的、流动的社会网络所取代”（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 751），因此，连结行动的模式在当今能发挥积极作用。当政治行动自身对个人和集体来说都在发生变化时，思考连结行动的意义将非常重要。

Kavada（2018）强调线上人群与线下社会运动之间的学理性的区别，认为两者虽然有交叉重合的趋势，却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她认为，线上群众的出现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正在为社会运动搭建一个新的舞台。在这里，集体行动与连结行动不会有严格的区分。Fominaya（2020: 305）则认为，有学者太过于强调连结行动的动员能力，这种观点带有片面性，因为它忽略了现有集体行动结构对支撑社会运动所起的作用，这些线下网络是大多数线上动员的支柱。

在 Zeynep Tufekci 2017 年出版的题为《推特和催泪弹》（*Twitter and Tear Gas*）的书中，她强调社交媒体的使用推动了社会运动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在不加入机构的情况下也能被组织起来（Tufekci, 2017）。但她在书中也提醒读者，这往往意味着运动的参与者无法掌握政治行动的要领。她用

攀登喜马拉雅山来做类比：“珠峰毕竟是珠峰：攀登的过程极其艰辛危险，不容任何闪失。”（Tufekci, 2017: xii）虽然网络动员可以使组织者跳过传统组织的第一阶段，但它往往是在“没有事先培养起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能力和其他集体动员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这些能力能帮助他们迎接下一步不可避免的挑战”（Tufekci, 2017: xiif）。从长远来看，网络动员虽然规模壮大且发展快速，但会出现缺乏弹性的问题。就2011年以来的社会运动而言，Tufekci 断定，这些运动将难以根据情况来调整策略。例如，美国1955~1964年的民权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经历了各种策略的创新。相比之下，2011年之后的抗争运动虽然在起始阶段有策略创新，但运动无法调整策略来适应第二阶段的情况。“因此它们在萌芽阶段就面临最危险的处境，运动虽然规模庞大、人力充足，却往往准备不足且不堪一击。”（Tufekci, 2017: xiii）

Tufekci 认为在非数字化的运动中，大规模的游行和占领运动往往发生在运动的晚期，而在许多数字化的组织运动中它们却在早期就出现了，因此，两种运动呈现不同的轨迹。Tufekci 用“临时性组织”（ad hocray）一词来指称缺乏周密计划的数字化组织运动，而用“策略僵局”（tactical freeze）来形容“这些运动没有能力推动策略调整和诉求的协商，以至于无法推动有形的政策改变”（Tufekci, 2017: xvi）。

我们认为关于利用数字网络进行快速大型动员的研究，可以应用于那些大型的召集跨企业工人团体参与的工人运动。虽然，相较于民主运动或反紧缩运动（anti-austerity movements）的参与者，外卖员或卡车司机的职业身份更趋同，但后者的动员也仍是建立在薄弱的社会联结之上的。这是因为他们受制于多个雇主、中介公司和托运人，另外也面临着法定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的多样性。因此，我们认为跨企业的大规模工人动员的潜力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连结行动相似，而连结行动所面临的情况已在关于街头抗议的文献中分析了。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与街头抗议相比，连结行动在工人运动中的实施在哪些方面改变或调整了其整体特征，又在哪些方面与街头抗议一样受到了“临时性组织”与“策略僵局”的影响？



三 2018 年卡车司机罢工

巴西的卡车司机是一个多元化的职业群体，主要分为拥有自己卡车的所谓自雇卡车司机和作为运输公司雇员的卡车司机。在大约 150 万名卡车司机中，大约有 55 万名注册的自雇卡车司机和 34.4 万名有正式雇佣合同的卡车司机（CNT，2019a：11；CNT，2019b：22）。自雇司机的卡车比运输公司的小得多，平均载货量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然而，托运人更愿意使用自雇卡车司机，因为他们的运费更低，而且他们无法将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托运人。相反，运输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就考虑随柴油价格上涨而调整运费。自雇卡车司机因此必须承担从合同签订到货物运输完成两个时间段之间任何的成本上升。这个时间间隔往往是一个月或更长，这使得自雇卡车司机很难计算成本。

卡车司机所面对的不仅是孤独的旅程，更是艰苦的劳动过程。巴西大多数地区路况很糟，如马路在雨季变泥泞、路面缺乏铺设和养护，这导致了大量的事故发生，也增加了车辆的维修费用。除了休息时间短和睡眠不足之外，卡车司机还要承受其他让人不堪重负的困境，包括道路基础设施的缺乏，如修理店、餐馆和旅馆很少，再加上抢劫和盗窃货物的发生率很高。他们常常因要获取新的货运合同、交通堵塞或在港口排队而经历漫长的等待，这会导致带薪工作时间的减少，另外，延期交货也会被罚款。有关货运价格的研究显示，在 2002~2018 年，除了在农忙收获季节，普通自雇卡车司机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内都没有盈利（Costa et al.，2018）。由于这种价格-成本的差价自 2014 年以来不断扩大，许多卡车司机负债累累。

在巴西，卡车司机的代表权是个众人皆知的头疼问题。全国自雇运输商联合会（CNTA）这个工会在 2012 年合并了代表自雇卡车司机的各种组织，随后却在 2017 年 12 月加入了由大型运输公司控制的全国运输联合会（CNT）。运输公司所隶属的 CNT 成功地游说推动 CNTA 并入 CNT，从而使前者中立化（Huertas，2021）。

有许多像 Abcam（隶属于 CNT）和 CNTA 这样的机构声称它们代表 70 万名自雇卡车司机，但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值得商榷。大多数卡车司

机协会和工会是在地区的基础上运作的，通常是基于一个州，甚至是州以下的区域，因此行业的代表性相当碎片化。CNTA 被并入 CNT 已经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巴西卡车司机代表权长期以来受运输公司的“幽灵”所困扰，这些企业协会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动员自雇卡车司机参加如 2012 年的罢工，以及 2018 年的部分罢工。在公路运输行业，司机与雇主之间会有一些利益重叠，如希望改善道路基础设施、降低油价以及提高运费。同时，我们也很难明确区分工人和雇主，因为自雇卡车司机往往有 1~3 辆卡车，其中一些人会将车辆出租给其他司机。

巴西的卡车司机在 2012 年和 2015 年也发动过大规模的罢工，例如，在 2015 年的罢工中卡车司机封锁了 120 条街道。但 2018 年的卡车司机罢工规模更大，有将近 40 万人参与了为期 11 天的行动，封锁了 700 条街道 (Nowak, 2022)。其他职业群体的工人，例如网约车司机、平台外卖员和校车司机也加入了这场运动。而石油平台的工人先是在卡车司机罢工爆发时进行了小规模停工，随后又在卡车司机罢工的最后两天发起了全面罢工。各行业不满情绪的爆发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如特梅尔政府当时只有 8% 的低支持率。这次罢工也得到了运输业部分企业的大力支持，因为它们对柴油价格的下调感兴趣。与早期的卡车司机罢工相比，2018 年罢工的关键在于因其参与人数众多、规模庞大而受到抵制。卡车司机强烈要求对最低运费进行立法，这引起了部分运输公司和中介机构的不满，因为最低价格能赋予自雇卡车司机更多的自主权以对抗运输公司和中介机构。另外，自雇卡车司机往往不能自主地签订合同，而需要在法律上依赖于这些公司。代表农业企业和工业界的强大游说团体反对关于最低运费的立法，并最终阻止了该法律的实施。他们在 2020 年初成功地发起了针对该法律的宪法诉讼，目前该案件尚有待裁决。但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在案件作出裁决之前，暂停所有基于该法律的处罚。

尽管 2018 年卡车司机的罢工运动规模庞大，并且能够摆脱运输行业企业协会的控制，但结果并没有成功地改善卡车司机的状况。其所争取到的大多数条款只执行了 6 个月，而法定的最低运费即使在最高法院废除对违反该法的处罚之前，也很少得到有效执行。

WhatsApp（在巴西口语中被称为“Zap”）在2018年的罢工中作为动员的媒介经常被新闻媒体所渲染。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更容易、更快速的动员方式，卡车司机组织的代表也一直对社交媒体的动员效果持积极的态度。但如果我们从Tufekci对“临时性组织”和“策略僵局”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角度来看2018年的卡车司机罢工，我们会看到一个矛盾的结果。卡车司机在2012年和2015年的早期行动中也是以社交媒体为手段进行动员的，但WhatsApp作为大众媒介只在2018年的罢工中才得以广泛使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它对2018年10月和11月的总统选举也有影响）。由于卡车司机运动不是新近爆发的，而是早有历史传统，因此“临时性组织”不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参与的组织机构数量众多，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以前没有过组织经验的卡车司机和其他职业群体，但幸好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已具有丰富的动员经验。这场运动在摆脱了“临时性组织”的弊端的同时，面临“策略僵局”的消极影响：设置路障的做法卡车司机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已经发展成熟且被证明是有效的，在此次罢工中司机还把路障设置在一些关键地带，如石油仓库和港口。但除了更有效地使用这类既定策略之外，2018年的罢工没有发展出其他新的策略。该罢工动员了人数众多的盟友参加，但没有进一步推动他们之间的联合。这些盟友包括要求调低汽油价格的优步司机和外卖员，以及石油平台工人。石油平台工人坚持认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应该调整其价格政策，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石油价格脱钩。

因此，“临时性组织”对卡车司机来说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他们更受到“策略僵局”的制约。2018年的罢工其实比早期的罢工运动提供了更多的行动空间，但组织者并没有很好地进行利用。早期的罢工运动虽然参与的人数不少，但还没有达到那么大的规模。到2018年罢工时，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运动变得规模庞大和不可控制，以至于在这样一个拥有许多组织核心的庞大而分散的运动中根本难以发展任何新的策略。唯一值得注意的策略创新是部分卡车司机要求军队介入^①，这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估

^① 卡车司机中一小部分保守的群体要求军队介入，这与2015年开始的弹劾罗塞夫总统的行动有关联。这样的诉求实际上是要让巴西回归1964~1985年的军事独裁时期，因此是非常保守的。

计是因为没有其他重大的猎奇新闻可以捕捉。另外，除了联邦政府以外，卡车司机和盟友并没有在行动中针对或点名其他人或机构，但最终他们也没有对政府采取任何直接行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几十万人封锁街道，罢工变得规模庞大，难以被有效地控制，这是罢工难以实现战术创新的重要原因。

在2018年的罢工之后，有九次类似的罢工行动重演，但都因为参与不足而走向失败。在这期间，尽管有一些卡车司机的代表与石油工人和平台外卖员的工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但也改变不了结局。这些运动除了结果不成功以外，在战术创新方面也没有多少成果。而新闻媒体和公众一直将卡车司机罢工与堵路捆绑在一起，或者说，如果卡车司机没有成功进行街头封锁，新闻媒体就会认为罢工失败。

四 外卖员的“手机软件刹车”运动

快递/外卖行业在巴西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其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Lapa, 2021）^①。新冠疫情使其从业人员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而言，这个职业群体由配送产品、文件和商品的工人组成，在传统意义上，他们的身份是“摩托小哥”。他们可以正式或非正式地被企业雇佣——从地方性的餐馆、药店到大公司——或者他们也可以与外包中介签订劳务合同。在全国各地，这些从业人员都有代表他们的工会。

目前巴西的失业率攀高，社会流行“企业家精神”的意识形态话语，同时，所谓“平台”或数字应用程序（如iFood、Rappi、Uber Eats、Loggi等）快速发展，这些平台通过宣扬快捷简单的赚钱方式招揽骑手。在此背景下，平台工作成为大批工人谋生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疫情前的2019年，在平台上找工作的人数已呈爆发性增长。

^① 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就有奴隶和自由工人从事相关活动的记录，他们在城市里送货或者接送旅客。他们被称为“获奖者”（葡萄牙语为 *ganhadores*）（Reis, 2019）。

2020年，巴西进入突发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形。疫情蔓延的风险迫使众多经济行业被关停，政府也实施了隔离政策，此时，快递/外卖上门服务已不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更多的是为了安全。对快递/外卖业务的需求激增，主要集中在家庭对食品外卖的需求。同时，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平台外卖员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此外，不像其他行业的人员，这些外卖员需要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他们需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一直上街工作。他们成为疫情中一个“必要部门”（essential sector），即使官方并没有正式对此承认。

2020年，平台外卖员人数的增多使得平台实现了扩张，外卖员的组成结构也起了变化。2020年11月，该行业约有68万名外卖员（Lapa, 2021），主要是男性（95%）、年轻人（38%在20~29岁）和黑人（60%）。女外卖员尽管只占从业人数的5%，但这个比例有上升的趋势。人员结构的变化，再加上疫情的暴发，使得送外卖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摩托车以外，许多外卖员开始骑自行车——有时从某银行资助的城市交通服务项目“租用”——甚至步行配送。在整个过程中，外卖配送者的身份突破了“摩托小哥”的局限，而成为“外卖员”（葡萄牙语为 *entregador*）。

无论如何，这些外卖员都与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相关联，平台与他们是控制与从属的关系。尽管平台试图规避与外卖员的关系，只把自己伪装成餐饮服务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但实际上，这些应用程序自始至终都在控制外卖员的行为。比如说，这些应用程序开启配送的进程，规定配送的时间并支付薪酬，另外还建立了不透明的惩罚规则。这整个过程是由算法的逻辑来支配的。通过规避与外卖员之间的劳动关系，这些应用程序无视工人权益，从而剥削这群规模庞大、零散化、个体化和不稳定的劳动力。

在疫情的背景下，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数量和性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工作日趋不稳定，此时，名为“手机软件刹车”（以下简称“刹车”运动）的两次罢工爆发了。这是发生在巴西的一系列零散工人运动和罢工行动达到高潮的表现。2020年7月1日和25日发生的两次“刹车”运动可算作工人运动成功的例子，尽管它们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通过“刹车”运动，平台外卖员形成了一个集体性主体，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诉求，并在公共场合进行组织和动员。具体来说，外卖员在巴西的不同城市发起了规模不同的罢工和示威，甚至蔓延到几个重要的州首府城市，它对外卖配送服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得到了消费者的支持，第一次“刹车”运动爆发期间平台的下单量明显减少了。尽管平台试图缓和这些冲击，但还是体会到了这场动员的影响。

外卖员是工人阶级中最弱勢的群体，基本不受保护，他们不得不在感染新冠病毒和挨饿之间做出悲惨的选择。在疫情暴发之初，面对政府发放的微不足道的紧急防疫物品，这些快递员不得不冒着感染和死亡的风险走上街头谋生。正如一首名为 *Rap dos Informais*（非正式工人的说唱）的歌曲所说：“现在穷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走上大街感染病毒致死，要么躲在家里饿死。死在家里和死在街上，两者我都不情愿。”

和其他行业类似，平台公司利用疫情增加它们的收入并加强了对外卖员的控制。随着大量新人的涌入，公司的收入增加了，外卖员的收入却减少了。在疫情期间，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和收入都下降了。因此，外卖员的状况在疫情期间更加恶化。他们开始提出诉求，要满足“基本保障中的基本”（basics of the basics）。最突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提供个人防护物品（如酒精消毒液和口罩）、开放厕所、购买摩托车事故保险，以及取消不合理的惩罚措施（如限制骑手接单的“封锁”）等。从这些诉求来看，这明显是一场争取认可和工作尊严的运动。

平台并没有坐视不理。它们的惯常做法是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运动现场，对运动施压和进行阻碍，至少也会挫伤运动的士气。一些骑手公开披露了他们的工作条件，这些信息通过社交网络得到了广泛传播。一个名为“物流操作者”（Logistics Operators）的人力资源中介公司试图阻止这场运动。另外，平台公司限制了一些运动参与者接单，尤其是那些在组织动员方面表现突出又被社交媒体曝光的人。

尽管罢工得到了其他不同工人团体的支持，但这场运动仍远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工会运动。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工会占领了外卖员代表权的一席之地，但也有许多行业协会和独立团体争夺代表权，后者所支持的

立场很不一样。与世界各地的经验相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组织和动员方式同时起作用。参与者建立一个职业团体，虽然成员遍布国家的各个不同区域，且各自有自己归属的团体和协会，但是大家通过社交网络和 WhatsApp 群建立紧密联系，保证了运动的潜力和实力。无论如何，从其自身的组织性和公开提出的诉求来看，这场运动本身就已经取得了成功，它甚至是职业群体政治化的一个重要过程，如建立了政治团体“反法西斯外卖员”（Entregadores Antifascistas）^①。

在这场运动中，社交网络得到了深度和广泛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社交网络已是外卖员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工具，但在“刹车”运动这个具体案例中，它推动了职业群体政治组织的建立，被称为数字行动主义（digital activism）。毫无疑问，使用最多的是 Zap，它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参与者建立了不同的 Zap 群，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甚至还与国际同行建立了联系。大家在群里交流信息，互换意见并展开辩论。Zap 群里总是有许多争议，主要源于参与者的不同立场。例如，在其中的一个群里，不同群体就劳动法律是否适用于平台劳动者展开了争论。有些人认为《劳动法》（CLT）的标准可以套用，有些人则认为该法已经过时，要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法规，还有一些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立法监管，因为他们认为立法会对他们的工作和收入进行限制。

除了 Zap 之外，另一类社交媒体也被广泛使用，包括脸书、油管 and 推特。这些工具既被工会、协会和团体使用，也被外卖员个人使用。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的主页和频道上发帖。巴西由北往南的几个城市的外卖员，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发布视频，描述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状况，谴责平台对外卖员的压榨，呼吁大家动员起来，还有人宣传他们在当地的组织情况等。

这些社交媒体使用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在第一次“刹车”运动中，外卖员创建了一个呼吁消费者声援运动的网页，在网页上描述了他们的艰苦工

^① 一些外卖员团体把他们的行动与反对博索纳罗法西斯独裁及争取民主联系起来，见 https://www.instagram.com/entregadores_antifascistas/。

作环境，敦促消费者支持“刹车”运动，在罢工期间停止下单。另外有一些视频显示优步司机也效仿这个做法，呼吁乘客参与“刹车”运动以支持他们的诉求，但这一举措似乎不太成功。

该运动清晰地展现了集体行动和数字行动的结合。线下的组织活动多种多样，包括在整个城市布局外卖员的会合点、在购物中心门口堵路，以及在城市的不同地区集结大批骑摩托的外卖员进行围堵。这些策略创新会根据运动开展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动。所有这些行动都被实时记录并发布在社交网络上，进行广泛传播。受众既包括无法加入运动的外卖员，也包括职业群体之外的更广大的公众。这确保了在运动发生期间，动员过程一直在公众的视野范围内。

从某个角度来看，网络上的行动也并非欠缺纲领性和组织性。诸如在运动名称的讨论上，大家最后选择“刹车”，以区别于传统的用语“罢工”，以强调“刹车”一词的象征性意义。而实际上，运动的组织者并没有“刹车”，他们持续地监测运动的进展，并在一些地点呼吁更多外卖员加入纠察线或帮忙设置路障。

这场罢工也是一个不断随机应变的新构建运动（new conformation movement）。遵循“临时性组织”的原则，很多行动并没有遵循既定的路线，而是被重新创造。新的展演可以为将来的行动提供很好的剧本：如在行动的场所前堆叠外卖箱，或是几十辆摩托一起穿越市区。当然，许多经验是从小规模罢工或者其他工人运动中吸取的，但组织者对其进行了策略创新。

分析这一运动的影响需要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来考虑。我们可以说，2020年7月1日和25日的运动推动了社会、政治和工人世界发生改变。立法机器开始运转起来，在像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些地方，市和州两级的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处理在运动中各群体提出的诉求，即要求对平台施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在联邦层面，众议院总统与平台外卖员代表进行会晤，而在巴西议会里已经开始对大约20个法案进行处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运动的其中一部分目的是尝试探索新的行动空间，寻求谈判和政策制定的渠道，这样可以避开或至少降低“策略僵局”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些运动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是平台拒绝改变其劳动管理和剥削的方式，因为这是它们盈利战略的核心。

代表外卖员的团体和组织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不同的团体包括自治组织、工会和协会等自运动宣布开始以来就争相出场并表现活跃，竞逐代表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的内部分歧也很明显。这些团体在两次“刹车”运动中的参与度有明显下降。在第二次罢工的日期确定之前，圣保罗工会发起了一场单独的行动，而该行动并未被正式归属于几天后即25日爆发的“刹车”运动。运动发展的重点在于在不同的机构之间找到了相似性：如在更横向的机构（如所谓“自组织”和一些协会）与更纵向的机构（如工会）之间，或在更具社会运动结构的组织与更制度化的组织之间。

平台企业断定运动会失败，也不遗余力地破坏运动。这些企业受到了冲击，并试图通过公开宣传和广告，在舆论中打造一个不同版本的骑手劳动状况故事。它们在这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试图维护因被曝光而受损的品牌形象。但是，平台也被迫坐下来进行谈判，尽管这不意味着它们会接受外卖员的诉求，但至少可以看出它们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它们的“伙伴”生活在最好的世界上。

运动对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外卖员是隐形的，现在，公众开始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他们在城市居民的房前屋后奔波，在社会上却不被关注。“刹车”运动的政治和组织效果及其影响仍是不确定的。两次动员会将工人运动引向何方还没有定论，且仍然饱受争议。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工人的、政治的和组织性的选择。

五 经验的比较：社交网络的局限性与可能性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2018年卡车司机的全国性罢工和2020年平台外卖员的“刹车”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传统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Khalil and Storie, 2021）的战术互补性是很明显的。虽然2018年卡车司机的罢工只简单重复了早年的抗争剧本而没有尝试策略创新，但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动员的能力，有助于运动脱离早期组织者的掌控范围而扩

大开去。在某些方面，这与发生在 2013 年 6 月和 7 月的街头抗议很相似，当时左派激进分子抗议公共交通票价的上涨，进而使运动演变成一个涵盖各种诉求的大型运动。卡车司机的罢工吸引了同样受到高油价影响的其他职业群体的广泛参与，并推动了卡车司机与石油工人的联合行动。矛盾的是，大量的抗议者和机构的参与反而变成了一个缺点，这是由于运动没有得到整体的协调，也没有选出有代表性的机构。这样的话，运动的诉求难以统一，同时也很难为与石油工人和其他团体实现联盟打下良好的基础。运动的参与者由多个怀有不同议题和诉求的组织组成，其中一些组织甚至代表运输公司，但没有建立一个代表罢工的全国性论坛。

虽然一些卡车司机组织在罢工后组成了全国性的联盟，但其代表性也存在问题。事实证明，这个联盟难以在 2021 年发起更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尽管至少有三个导火索事件得到了媒体的积极响应，但卡车司机的反应却很迟钝。只有 2021 年 11 月在巴西最大的港口桑托斯进行了一场地方性的罢工，并随后促成了一项集体协议，但这个例子没有在其他地方复制。这个例子得以打破卡车司机运动中的策略僵局而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选取了一个特定的咽喉点（choke point）——一个主要港口。桑托斯的卡车司机的另一项战术创新是他们在一次公开的听证会上与约 70 家运输公司谈判最低运费价格，因此他们改变了向政府请愿的举措，而是要求运输公司负责任。

在传统的集体行动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只是一个扩大动员规模的工具。与此不同，平台外卖员从一开始就使用社交媒体。卡车司机的堵路做法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但外卖员的大规模行动只在配送受平台支配以后才出现。虽然在平台出现以前已经有外卖员了，但他们很少组织起来进行广泛参与的集体行动。因此，“刹车”运动体现了连结行动和集体行动的共同作用。在 21 世纪 10 年代末一系列的地方性抗争发生之后，该运动作为第一次全国性的动员实现了策略创新。这也是疫情期间巴西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疫情期间使用平台点餐的新需求也为罢工提供了动力。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20 年 7 月为期两天的全国性罢工仍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全国性动员。这些运动的领导者试图将行动延伸到首都巴西利亚，以便在

2020年9月游说国会进行立法。这是他们在全国性运动后试图打破策略僵局的第一次尝试，但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直到2021秋天，外卖员才实施了一种新策略，这似乎又回到了全国罢工之前的地方动员阶段，主要是在圣保罗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的中型城市开展为了满足在地诉求的行动，包括地方性的罢工及阻止下单的行动。这场运动在大约10个城市蔓延爆发了，其中一些运动持续了几天，迫使国内最大的外卖平台iFood宣布上调配送费。几周后，最高劳工法院（TST）在2021年12月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宣布优步的网约车司机与平台有正式的雇佣关系，这个做法可能会扩展到其他平台。这是继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通过立法之后，劳动关系正规化趋势扩大化的又一个例子。

两个运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诉求

卡车司机提出多项诉求，而各项诉求之间有矛盾之处。另外，不同的卡车司机组织之间难以对诉求达成共识。相反，外卖员群体尽管对于政府立法监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他们的诉求基本是一致的。

2. 动员方式

卡车司机使用传统的手段进行抗争，如设置路障（而不是封锁政府大楼或大型的仓库），但也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吸纳了更多同行及同行机构的加入。相反，外卖员一开始就展开全国性的动员，包括呼吁消费者停止下单，也鼓励外卖员开展街头示威。到了运动的后期，他们转向餐馆和商场，进行堵路。社交媒体从一开始就是行动的组成部分。相较之下，卡车司机是到后期才借用社交媒体这个既有的动员手段，而外卖员从行动一开始就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

3. 策略改变

卡车司机在2018年的罢工中沿用了传统的抗争剧本，通过设置路障来阻止货物的运输，尽管该策略使得运动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却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改善。组织者缺乏策略创新，导致运动陷入僵局。对比之下，外卖员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把全国性动员转变为地方性行动，推进了封路等行动，从而迫使平台快速地回应他们的诉求。

六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社交媒体使用对工人行动的促进性及局限性。我们分析了两个不同职业群体的运动，它们有着不同的轨迹、历史以及背景，在组织和动员方面以各自的方式广泛地使用了社交媒体。我们的案例表明，互联网 2.0 对工人行动主义的促进作用及社交媒体可见性对工人运动的负面效果，在不同情境中的影响程度不一，取决于工人动员的具体类型。我们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对于推进行动是有用的，但从中长期来看，很难巩固工人的运动。这需要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之间进行战术互补。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平台外卖员的例子中，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的结合利用促进了工人能力的提升。当全国性罢工只在运动最初取得成功但难以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战术继续推广时，外卖员通过尝试克服策略僵局得到了能力提升。而在卡车司机罢工的案例中，集体行动与连结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通过运用社交媒体，设立路障的效果得到了加强，但这并没有解决卡车司机之前在政治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如把运输公司和司机的利益混在一起，结果使得运动在诉求和行动方面缺乏连贯性；连结行动发动了大批抗争者加入，但这只是激化了这个老问题，而没有提供解决方案。

因此，连结行动并不是工人运动的万能药，尽管技术看起来能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参与，但它可能会激化劳工运动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何处理集体行动和连结行动之间的具体关系，对劳工运动的成功很重要。在集体行动层面持续存在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连结行动来解决，需要通过战术创新来给连结行动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很明显，这两类工人（平台外卖员和卡车司机）的组织工作所面临的问题都集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对所要寻求的法律地位缺乏共识。他们是愿意继续当自由职业者，还是更倾向于在《劳动法》的框架下建立正式的雇佣关系以享有法定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两个职业群体存在分歧的第二个方面是，他们是更愿意加入像工会或协会这样的法团组织，还

是喜欢更政治化和战斗性强的组织？两种倾向在两个职业群体中都不相上下，所以这两种倾向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共存，并使工人内部产生分裂。对外卖员群体尤其重要的工人自组织和协会，也可能表现出一些弱点，如工人代表性的碎片化。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两个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一些平台外卖员在2018年加入了卡车司机的罢工。在2021年11月的小规模卡车司机罢工期间，也常常可以见到卡车司机和外卖员一起参加公共集会。虽然两个职业群体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不同，但他们碰到的许多问题都是相似的。但目前他们的连结是短暂的，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社交媒体已被证明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连结工具，它将那些工作过程不在共同的工作场所而四处分散的工人真正地联系起来。但每个职业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政治倾向也各异，这些问题难以通过社交媒体解决。因此，Tufekci提出的“临时性组织”的问题与本文涉及的两个案例研究关联性不太大，而策略僵局却是工人运动中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一个征兆。因此，片面地依赖连结行动可能会深化这种策略僵局的弊端。

参考文献

- Bennett, Lance and Alexandra Segerberg.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 Castells, Manuel. 2015.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Polity, UK: Cambridge.
- CNT(Confederação Nacional de Transporte). 2019a. *Anuário CNT do Transporte 2019*. Brasília: CNT.
- CNT(Confederação Nacional de Transporte). 2019b. *Transporte em Números, Dezembro 2019*. Brasília: CNT.
- Costa, L., E., F. V. Da Rocha, and J. V. Caixeta Filho. 2018. "Transporte Rodoviário de Grãos no Brasil: Comportamento do Mercado de Fretes e Endividamento do Setor[Grain Road Transport in Brazil: Behavior of the Freight Market and Sector Indebtedness]." 56° Congresso SOBER, *Transformações Recentes na Agropecuária Brasileira*, 29 de julho a 1° de agosto.
- Fominaya, Cristina F. 2020. *Democracy Reloaded: Inside Spain's Political Laboratory from 15-M to Podemo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relli, Rebecca. 2020. "Educators United Online." Pp. 102 - 111 in R. Kolins Givan, A.

- Schrager Lang (eds.). *Strike for the Common Good*.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eckscher, Charles and John McCarthy. 2014. "Transient Solidarities: Commit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2 (4), 627–657.
- Huertas, Daniel. 2021. "O Bolsonarismo Dentro das Boleias [Bolsonarism Inside of the Truck Cabins]." *Outras Palavras*, September 10, <https://outraspalavras.net/direita-assanhada/o-bolsonarismo-dentro-das-boleias/>.
- Kavada, Anastasia. 2018. "Connective or Collective?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Online Crowd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Activism." Pp. 108 – 116 in Graham Meikle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and Activism*. New York: Routledge.
- Khalil, Ali and Leysan Storie. 2021. "Social Media and Conn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the Saudi Women's Movement for the Right to Drive." *New Media & Society* 23(10), 3038–3061.
- Lapa, Raphael Santos. 2021. "O Trabalho em Plataformas Digitais e a Pandemia de COVID-19: Análise dos Dados da PNAD/IBGE [Work with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 Analysis of PNAD/IBGE Data]." *Mercado de Trabalho & Conjuntura* 71, IPEA. <https://repositorio.ipea.gov.br/handle/11058/10658>.
- Lazar, Tamar, Rivka Ribak, and Roel Davidson. 2018. "Mobile Social Media as Platforms in Workers' Unioniz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3(3), 437–453.
- Maffie, Michael David. 2020. "The Role of Digital Communities in Organizing Gig Workers." *Industrial Relations* 59(1), 123–149.
- Nowak, Jörg, 2022. "Do Choke Points Provide Workers in Logistics with Power? A Critique of the Power Resources Approach in Light of the 2018 Truckers' Strike in Brazi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9(5), 1675–1697.
- Offe, Claus and Helmut Wessenthal. 1980. "Two Logics of Class Action: Theoretical Notes on Social Clas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 67–115.
- Pasquier, Vincent and Alex Wood. 2018.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as a Labour Campaigning Tool: Lessons from OUR Walmart and the Fight for 15." In ETUI Policy Brief, 10, *European Economic,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 Reis, João José. 2019. *Ganhadores: a Greve Negra de 1857 na Bahia [Gainers: The 1857 Strike of Black Workers in Bahia]*. São Paulo: Cia das Letras.
- Saundry, Richard, Mark Stuart, and Valerie Antcliff. 2012. "Social Capital and Union Revitalization: A Study of Worker Networks in the UK Audio-visual Industri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0(2), 263–286.
- Treem, Jeffrey W. and Paul M. Leonardi. 2012. "Social Media Use in Organizations: Exploring the Affordances of Visibility, Editability, Persistence, and Associatio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36, 143–189.

Tufekci, Zeynep. 2017. *Twitter and Tear Gas: The Power and Fragility of Networked Protes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ood, Alex J. , Mark Graham, Vili Lehdonvirta, and Isis Hjorth. 2018.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3(1), 56–75.

Wood, Alex J. and Vili Lehdonvirta. 2019. “Platform Labour and Structured Antagonism: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of Protest in the Gig Economy.”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doi-org.ezp-prod1.hul.harvard.edu/10.2139/ssrn.335780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人工智能背后不可或缺的“人工”

——关于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调研*

黄瑜 旷轶丹**

摘要：2020年，数据标注员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人工智能训练师。但颇具争议的是，劳动者到底扮演着“训练师”还是“AI 富士康工人”的角色？本文结合 STS 对人工智能的探讨，对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劳动贡献和劳动状况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一方面，人力贡献因其“具身性”和“默会知识”的特征而对算法的机器学习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图像数据标注员在众包的劳动关系中面临权益无保障及身心受损的困境。

关键词：人工智能 数据标注员 具身性 默会知识 不稳定劳动

一 引言

近日，ChatGPT 的出台再次把人工智能推上热搜。这个号称“最强 AI”的技术，突破了谷歌和百度的关键词搜索功能，可以与人聊天、帮助写论文甚至协助法官进行判案。对比之前的人工智能热点新闻，如 2016 年谷歌旗下的“阿尔法围棋”系统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和 1997 年 IBM 开发的“深蓝”程序战胜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OpenAI 公司所研发的这个程序因其深入大众日常的技术而被广泛关注。

* 本研究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队伍建设子项目“技术与劳动的社会学研究”的资助。

** 黄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旷轶丹，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



基于大预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技术，ChatGPT 的爆红引发了各界的争论。业界声称 LLM 技术代表着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之前 AI 判别式（Discriminative AI）模型的训练方式，而发展为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的方式（Hsu and Griffiths, 2010），因此代表着机器已接近人类的智能。但也有不少反对声音认为 LLM 技术仍是基于对已有数据库的搜索，所以算法本身并不会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举出的例子包括：对于现有研究不多的前沿课题，ChatGPT 所给出的信息往往是不准确的；ChatGPT 也无法自己过滤有毒有害信息，甚至有引文曝光 ChatGPT 的开发公司 OpenAI 曾在肯尼亚以低于 2 美元的时薪雇用工人来筛选有害信息；有两家知名的 AI 绘图软件甚至被三名艺术家起诉“侵犯版权”（Stoket-Walker and Noorden, 2023; Perrigo, 2023）。

这些争论的焦点其实还是 AI 诞生以来大众所关注的老话题，也就是关于“强人工智能”的争论：AI 能否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是否会取代甚至控制人类（Searle, 1992; 王彦雨, 2018）？不少持乐观态度的科学家认为，凭借大量数据的出现和算法模型的成熟，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是，也有不少持谨慎甚至悲观态度的人文学者，如德雷弗斯和柯林斯，对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形式化建模取向感到不满，认为其忽视了人类学习当中体现的具身性和互动性。

本文援引 STS 研究中对人工智能的讨论，探讨人工智能行业中一群被忽视的“人”——无人驾驶汽车图像数据标注员。他们通过调动自身的具身性和互动性知识，识别各种包括模糊和阻挡的路况，把一张张图片转变成机器可以读懂的结构化数据，为后续的算法模型运算奠定了基础。当下的算法学习基于概率论的推演原理，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集作为归纳总结的基础。因此，向算法提供数据集的数据加工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再加之样本数据集的加工属于“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中对于机器而言困难但对于人类而十分简单的基础性任务，所以其所需技能门槛较低，以数据加工为主的 AI 人工辅助产业呈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

因此，尽管数据标注员在 2020 年成为国家认定的人工智能训练师，但是他们的劳动并没有得到认可和尊重。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随后人工智能行业被炒作，市场规模从 2017 年的 544.9 亿元扩大到 2020 年的 1858.2 亿元。^① 但与行业的“一夜暴富”相比，贵州的数据标注员承担着低薪的“微工作”（Tubaro et al., 2020）。为何高科技技术仍需要劳动密集型的人工劳动？在这一劳动过程中，数据标注员究竟扮演着“训练师”还是“AI 富士康工人”的角色？数据标注员的劳动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

二 人工智能的 STS 研究

（一）符号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这个词正式发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强人工智能”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人工智能计算机之父图灵在 195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计算机与智能》，他提出“机器能思考吗？”的问题（Turing, 1950）。为了确定答案，他设计了一个其称作“模仿游戏”的试验。游戏中有一男一女的参与者 A 和 B，询问者 C 需要进行一系列发问，从而通过 A 和 B 的文字作答来判断两人的性别。接着，A 的角色被机器取代，如果询问者所作错误判断的次数像一男一女真人参加时一样多，就证明机器“会思考”（think）。但随后，这个试验被哲学家质疑能否为智能属性提供充分的解释，因为数字计算机所展示的只是一种符号处理的功能（德雷福斯，1986）。

“人工智能”这个词真正进入历史是 1956 年的事情，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提出，他当时与哈佛的明斯基、IBM 以及贝尔实验室组成团队，研究如何把机器变得智能。他提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目的是要与当时流行的“控制论”区别开来（Engster and Moore, 2020）。

随即，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人工智能进入了早期“符号人工智能”（Symbolic Approach to AI）的发展阶段，也被称为“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Good Old-Fashioned AI, GOF AI）。符号人工智能将人类的认知过程

^① 《预见 2021：〈2021 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全景图谱〉》，<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210803-dad34c8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3 年 12 月 22 日。

形式化和逻辑化，认为这一认知过程可以让计算机通过符号模拟的方式实现（高新民、付东鹏，2014）。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纽厄尔和西蒙。他们首先让计算机获得有关初等逻辑中问题求解过程的经验数据，如证明数学定理、进行棋类博弈和理解英文散文的意义等；随即，他们把这种逻辑中的启发法抽象出来，用在通用问题当中，解决像如何使三个食人族和三个传教士过河而不让食人族把传教士吃掉的类似问题（德雷福斯，1986）。

尽管符号人工智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也暴露了这一研究范式巨大的弱点。其相信人类行为肯定能形式化为数字计算机的启发程序，因此专攻的领域主要为棋类博弈、语言翻译、问题求解和模式识别，但对不确定、高度情景化的任务难以胜任。

人文社科领域对符号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开始进行反思，其中，哲学家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与社会学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的讨论尤其引人注目（德雷福斯，1986；Collins，1990）。二人都指出人工智能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具备真正的人类智能，这是因为科学家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但前者从现象学出发，后者则从知识社会学出发。

德雷福斯（1986）首先批判符号人工智能对理性主义传统的预设，这种观点认为，思维的作用就是让外在的特有原则（笛卡儿）或规则（康德）来指导无结构的经验。但这种认识论把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忽视了知识是具有情境性和具身性的。德雷福斯以著名的彼得-保罗酒杯（见图1）为例，说明并不存在所谓图像与背景的先验区别。人们在识别普通的空间和时间中的物体时，根本不需要事先查找列表来参照那些可分离的、中性的、具体的特征。如同样一层模模糊糊的东西，当人们知道面前是一个蜡制的苹果时，会把它看作灰尘；而当看到的是一个新鲜的苹果时，它就变成了水汽。各个细节的意义及它们的样态是由人对整体的感知来确定的。

援引梅洛-庞蒂的理论，德雷福斯（1986）说明了人的学习主要不是依靠对形式化规则的表征（representation）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躯体作为一种“协同系统”不断与外部环境互动而掌握的。梅洛-庞蒂提出了两个概念：“意向弧”（intentional arc）和“最有效控制”（maximum grip）。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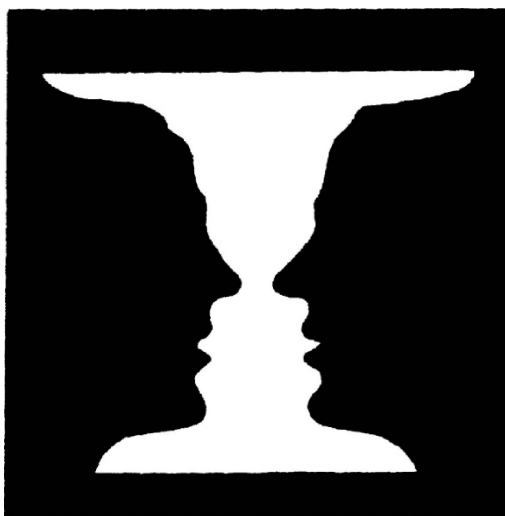


图1 彼得-保罗酒杯

资料来源：德雷福斯，1986：248

向弧是指学习者在行动中对情境（situation）的变化进行细致的辨别，从而进行调整和回应以达到目的。以学习开汽车为例，新手起初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缓慢地遵守一些脱离情境的规则，但是随着驾驶技术不断成熟，当学习者达到专家水平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则放在路况上面，从而形成应对策略，此时开车成为一种针对情境的直觉反应。如果说意向弧描述的是一种无表征的学习方法，那么最有效控制则表达了无表征目标的行动过程。他举了一个人们去美术馆看画的例子，人们去美术馆看画时，自然会调整到一个很适合看画的不近不远的最佳距离，既能够完整地看到整幅画又不至于看不清细节。人们之所以能做到，不是因为大脑有一个预设的目标，而是基于感官对情境的反应和调整所形成的技能（Dreyfus，2002）。

总而言之，德雷福斯认为不具备人类身体的机器绝不可能具备真正的人类智能，其论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其一，符号人工智能在设计中要求计算机必须遵循严格定义的规则、对完全确定的数据进行运算，所配的程序充其量只是对一系列假说进行检验，以确定哪一组同固定的数据最相符，这与人类的认识方式大相径庭。人类认识方式的特征是高度情境



化的，将身体作为整体与外部环境互动。其二，人类面对不确定性很大的问题时具有抽象出本质的能力，并且能够在目标模糊的情况下迸发出创造性。这是由于人类是通过反馈来学习的，从而能在身体上形成直觉的认知。

德雷福斯从现象学出发，分析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柯林斯从知识社会学出发，强调人类知识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语言学习为例，德雷福斯会强调学习者必须亲自去讲这门语言的地方，与那里的人切身互动，这要求先具备身体条件。但柯林斯认为现有的计算机之所以不能流利地掌握人类语言，除了缺少大脑和其他器官以外，是因为还缺少社会化过程。两人曾就“轮椅上的玛德琳”这个例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玛德琳是英国神经内科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所著《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书中的一个病人（萨克斯，2016）。玛德琳天生是个盲人且身体残疾，在早年几乎全身都不能动。尽管“身体”在她的认知中所发挥的作用很小，但是她还是能通过学习书面和口头的表达获得知识和文化素养。玛德琳的例子证实了“最小的具身性论断”（minimal embodiment thesis），即具备学习语言的最少的身体条件就可以习得语言。用柯林斯的话说，“她是通过沉浸在语言世界中学习语言的，而并不是身体力行地存在于生活形式中”（柯林斯、埃文斯，2021：76）。但实际上，在玛德琳这个例子中，柯林斯的结论与德雷福斯的观察并不矛盾。德雷福斯所指的“身体”并不是纯粹生理性的，而是包含象征意义上的身体（“类人的身体”）。其强调的是需要具备和人类相同的基础生理结构和思维结构，保证其认识世界所依赖的物质载体的基本结构和运作原理与人类是相同的，这样的物质载体即可被称为“人类身体”，局部的残缺（如残疾人的身体）并不影响。

与德雷福斯强调个体性的路径不同，柯林斯强调专长所属的社会群体性。他认为个体必须先实现语言上的社会化，融入一个社会群体，才有可能具备该群体的互动型专长。他在对横向激励大气压（TEA）激光和引力波的案例分析中，提出了两种专长概念：可贡献型专长（contributory expertise）与互动型专长（interactional expertise）。前者指具体完成某件事的能力，也就是科学家投入科研的能力，如操作引力波探测的仪器、记录实验数据、

修理存在故障的机器等，但仅仅有可贡献型专长并不能实现成功的实验复制，科学家的个人交往、亲身接触所传递的默会知识也同等重要。互动型专长是指与同样具备专长的人谈论某个科学议题的能力，就像柯林斯自己通过对引力波探测领域发展的调研，尤其是长年累月对科学家进行访谈和对实验室进行参与式观察，使得他对与引力波相关的概念了如指掌，可以熟练地与其他引力波专家进行交流（贺久恒，2020）。

柯林斯认为互动型专长来源于非形式化的或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默会知识”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Polanyi, 1967；波兰尼，2017），他认为知识的获取是一个主观过程，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面，与个人的直觉和领悟能力相关。因此，知识的掌握离不开个体的阐释，而这个阐释的框架又与学习者观察的双眼密切相连。这个理论挑战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认识论，强调认知是一个充满情境性的过程。之后有不少持实践论的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学者拓展了波兰尼的理论，强调动态的认识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知识获取，因为人类的行动需要基于社会成员在特定情境达成共识（Feldman and Orlikowski, 2011；Nicolini, 2011）。这些实践论者超越了波兰尼的个体认识论，强调社群互动对形塑个体行为的重要性（Pettersen, 2018）。柯林斯则把默会知识这一概念应用到互动型专长的分析当中，强调默会知识的掌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是掌握默会知识的唯一途径，只有沉浸在拥有该知识的社会群体中才能获得该知识（柯林斯、埃文斯，2021）。但波兰尼把这个概念用于分析科学家的时候，他陷入了一种精英主义的误区，认为科学家是唯一拥有默会知识的人，是唯一了解自己能力和目的的人，因此他们必须自治（rule themselves）。柯林斯认为，波兰尼意图建立一个“科学王国”，只有拥有可贡献型专长的人才能评论自己的同行。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即使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决策往往也是由那些拥有互动型专长的人做出的。因此，外行并非不能领导内行，但掌握默会知识是关键。

回到人工智能这个议题上，在柯林斯看来，机器若要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则必须先习得人类的所有知识与技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又必须以社群互动为中介，否则无法习得所有的知识，故而其格外强调交流

(“语言上的社会化”)的重要性。柯林斯认为,在达到语言的社会化之前,人工智能不可能在其他领域具备与人类同等的智能(Collins, 1990)。

总结一下德雷福斯与柯林斯对人工智能的争论,二者实际上都认同且强调人类认知中情境性、社会性、整体性的特征,但是两人争论的起因则是二者对这种认知特征产生来源判断的差异。德雷福斯认为,这种认知特征是人的身体、生理特征使然;柯林斯则认为,这种认知特征是人的社会性使然,而这种社会性又集中表现在语言交流和社会化上。

(二) 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

符号主义引领的人工智能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寒冬之后,接下来的30年间,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开发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但即使当代科技的进步使得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日渐成熟,人工智能也仍难以克服情境性应对这一薄弱环节。斯蒂格尔通过对特斯拉2016年无人驾驶汽车撞车事故的科技社会学分析(Stilgoe, 2018),揭示出无人驾驶汽车在数据生产、技术设计与应用的各个环节都大量地与人、与社会、与具体情境相关:一方面,制造商希望借助无人驾驶技术算法的不可解释性与现实世界切割,从而规避监管与相应的责任追究;另一方面,算法迭代需要依赖实操情境中的试错经验以及算法与人类司机、其他无人驾驶汽车的合作与联系,在系统无法起作用的关键时刻做出必要的人为干预。撞车事故发生之后,各制造商纷纷增配人为干预检测系统,这些做法证实了情境性感知的不可缺失以及“完全自动化”的不可实现。

由上可知,虽然“强人工智能”的论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呼声渐高,但是它在社会科学领域被相对悲观的学者反驳,他们强调人类知识独特的整体性、情境性、默会性与具身性等,指出人类认知在人机互动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二者的统合——人类认知的独特性与重要性以及数据的情境性和社会性——在即使号称“最自主”的算法数据技术中仍得以体现,表明了人类认知作用的不容忽视。

上述文献对本文分析贵州自动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员的劳动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尽管媒体一再渲染人工智能可以进行“机器学习”,但

是如果没有人工劳动对数据进行标注预处理,那么算法模型的深度学习是不可能做到精准的。在数据标注的过程中,图片识别和标注环节均需要运用人的具身性知识(德雷福斯,1986),而审核环节所需的技能在社会性互动中产生(柯林斯、埃文斯,2021)。本文的贡献在于把德雷福斯和柯林斯的争论从对抗性的变为互补性的,两人所推崇的知识类型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算法数据标注不同环节所需要的不同知识来源。

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学界的极大关注,但是目前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科技哲学角度出发,围绕“强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争论,即AI能否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并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王彦雨,2018;顾骏,2018;金观涛,2017);二是从社会学和管理学出发,讨论如何对人工智能实行社会治理,以降低其风险(刘露等,2021;陈小平,2021)。但这些文献较少进行实证研究,因此难以理解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结合情境性知识和互动性实践来模拟人类的智能。例外的是贾文娟和颜文茜(2022)对数据标注员的研究,他们从“认知劳动”的角度出发,指出管理方如何通过劳动控制使数据标注员的自然认知转化为与计算机程序相匹配的产生式认知,从而生产出符合电脑需要的标准化数据。这一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悖论,也就是人工智能的生产过程实质是让人学会像机器那样思考,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她们的调研对象主要是一个开发AI教育产品的公司,因此数据员所标注的图片大多是算术题,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自然符号转化为算法模型使用的标准化数据。他们所处理的是已经形式化的知识(数字和方程式),所以该例子难以和上述人工智能的STS争论形成对话。而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无人驾驶汽车的图像数据标注,是对图片而不是数字进行处理,所以需要的不是标注员的理性逻辑运用能力,更多的是情境化、具身性和互动交流型的知识。因此,我们的调研能填补人工智能STS研究中实证方面的空白,通过具体的田野调研案例解释人工智能知识生产面临的认识论和社会学方面的矛盾。



三 研究方法

(一) 田野点概况

贵州省于2016年获批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并先后与阿里巴巴、华为、苹果、腾讯等科技巨头公司签订协议，在数据业务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本文所调研的企业A公司为贵州省贵阳市一家以承包AI数据标注为主要业务的AI数据生产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根据该公司的官方介绍，其总公司于2017年在杭州成立，除贵州省外，还在浙江、江西等地设有8家分公司。据观察，笔者所在的这家分公司应属于加盟性质，其加工数据的来源多是国内某数据标注众包平台，其具体标注也多是由该平台操作。同时，由于政府实施大数据产业扶持政策，贵州省大量同类型企业得到了来自政府的政策补贴。该公司在笔者离职不久后^①搬迁至本地的大数据核心建设区，获批了新的办公场地，在场地租金以及员工宿舍租金上都得到了一定补助。

目前公司承接的业务类型以AI自动驾驶汽车方面的图像标注为主，如车辆、车道线标注。截至笔者离职前^②，该公司共有62名员工（普通标注员及小组长）、4名项目经理及1名总经理。其中，小组长6名，负责监督组员并承担质检员工作；项目经理中，2名负责标注辅导和监督，1名负责员工招聘，1名负责日常工作管理。在员工方面，男女比例为2:1；年龄段在18~25岁；学历上本科学历的占25%，高中、专科及技术院校学历的占45%，专科以下（小学及初中）学历的占30%。员工的平均工作时间为1~2个月，以笔者工作时此批员工为例，大部分员工为2月中旬入职，到4月初时，人员已更换80%以上。

^① 2022年4月前后。

^② 笔者于2022年3月22日离职。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参与式观察及访谈为主。本文第二作者于2022年2月25日通过某招聘App联系该公司进行应聘，2月26日到该公司面试，2月28日至3月22日以数据标注员的身份在该公司从事汽车图像3D框标注的工作，每日工作时间为7.5小时；在标注的同时，记录标注的具体步骤及出现的问题等。同时，笔者利用每日的工作间隙以及休息时间同公司员工进行无结构及半结构访谈，参与访谈的总人数为15人，每日访谈时间在1小时左右。

四 无人驾驶中的算法与技能

无人驾驶系统大致可分为感知、规划、控制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包含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硬件系统主要负责“执行”层面的操作工作，且其生产构成也多涉及装配、制造等工程学部分，而非知识生产的部分，故而在讨论“无人驾驶的知识生产”时，多指代无人驾驶系统中作为“大脑”存在的软件系统部分。无人驾驶的软件系统基本是由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算法构成的，因而，“无人驾驶的知识生产过程”实则指向“无人驾驶的算法生产过程”。

无人驾驶的算法生产主要由三个关键部分组成：数据、模型结构及训练过程。其中，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大体决定了模型的性能，模型结构决定了模型效果的上限，训练过程决定了逼近上限的速度与程度（Patel, 2018）。涉及低技能知识生产的部分集中在数据环节，高技能知识生产的部分则集中在模型设计环节。对应感知、规划、控制这三个无人驾驶系统组成部分的，分别是感知和定位算法，预测、决策和规划算法，以及控制算法（Pendleton et al., 2017）。以上三种算法中，其数据的现阶段处理仍需借助大量人工劳动力的——包含“低技能”环节——主要为感知算法。感知算法依靠传感器拍摄的图片，将图片中的汽车以及车道线等准确定位（“目标检测”）或划清边界，从而判断前方物体、方位及可行驶的路段，以作为之后决策

的先决条件。而感知算法的训练需要大量高质量、场景丰富的人工标注汽车及车道线图片，在经过此“低技能”环节的数据预处理后，生产出的数据用以训练由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设计的数学模型，即“高技能”环节。通常而言，无人驾驶系统的训练流程为：①将几十万张人工标注的图片混合上百万张虚拟图片传送给算法进行训练；②无人驾驶系统上路测试并收集反馈，其中重点记录效果不好的情况；③收集至少上千张与造成效果不好的情况相似的图片，再次进行人工标注；④再用这上千张图片对算法进行训练；⑤再上路测试。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无人驾驶系统的准确率和安全性达标为止。

由此可知，无人驾驶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低技能”和“高技能”环节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持续性的“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现阶段数据的预处理以及特殊情况的数据处理离不开人工标注（“低技能”），而算法模型的建立（“高技能”）又离不开数据的训练。算法模型的建立需要人工标注数据的支持，但出于希望减少对人工标注数据依赖的原因，“高技术”人员又在不断建立新的模型，引发对新的人工标注数据的需求。简言之，无人驾驶知识生产中的“低技能”环节和“高技能”环节与其说是一条单向而层级分明的链条，不如说是首尾相接、不断往复的循环。

笔者所进行的数据标注任务为汽车图像 3D 框标注，经标注后的图像将服务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感知算法训练。汽车图像 3D 框标注是由数据标注员在特定标注平台上借助简单的标签选择和拉框工具，在提供的道路实况图片中框出所出现的车辆，并对车辆的相应属性进行标签选择。其中，车辆图像是“输入项”，而人工所标注的车框和标签是“输出项”，一张经过标注的图片则是“输入-输出”相匹配的样本（见图 2）。当算法接触足够的显示“输入-输出”对应关系的样本后，就能够自主判断出新的、未被标注的图片中的车辆情况（Shestakosky, 2017），从而使得以摄影成像为主要传感方式的自动驾驶汽车实现判断路况的目标（见图 3）。

下文通过对“识别”、“标注”和“审核”这三个汽车图像标注主要环节中人力贡献的详细分析，引出对 AI 数据标注中人力贡献之价值的论述。



图2 人工标注的单辆汽车



图3 一张完整的经过标注的汽车图像

五 数据标注中的具身性与互动性知识

（一）识别：整体性的认知

认车是汽车图像标注的基础。首先，识别出车辆的存在并判断车的类型所需的分类观和认知，本来就不是算法预先具备的知识，而是人工需要去“教”给它的；其次，这一环节同样是操作意义上的基础，只有先判断出图片中是否存在车辆、是否需要标注，才能进行之后的工作。根据前述标注步骤，识别工作主要包含三个面向：识别“出”车、识别车的类型以及识别车辆体积的范围。然而，作为标注过程中的基础环节，指导资料中涉及“认车”领域尤其是判断车辆是否存在规则基本缺失。原因看起来似乎不言而喻：识别出一个模糊的图像是不是车，不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吗？然而，这一项对于人而言再“自然”不过的技能，对于 AI 来说是最为困难的，因此，该环节成为汽车图像标注过程中人力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环节。

AI 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持有一条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的准则，以纪念机器人学先驱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即“困难的问题很容易，而简单的问题却很难”。意思是，对于早期的 AI 而言，人类无须思考就能做的事情（比如走路）似乎无法模仿，而国际象棋等具有认知难度的任务对于计算机来说却非常容易（Kellogg et al., 2020）。人类对生活情境中熟知物体的感知和判断更多是基于长期的情境化知识积累，以遇到相似情境时做出推演和联想。以汽车图像标注为例，基于笔者自身经验以及对其他数据标注员的采访调查，模糊情况、黑夜情况、遮挡情况被一致认为是车辆识别、判断及其他环节中最难标注的类型，而其困难程度的区分可用表示三种情况且互相之间各有重合的圆圈来呈现，情况重合越多，识别的困难程度就越高（见图 4）。原因在于，在此三种情况下，车辆图像只能呈现局部特征或者非常模糊的轮廓，而这种“残破的局部特征”对具有不同视觉感知观的人类和计算机所造成的辨识困

难程度是不同的。计算机模拟人类进行视觉识别的方式主要基于特征搜索，即将“角”“弧线”等形状概念转化为计算机语言形式，使得计算机能够通过搜索相应形状特征来识别图形（Fourcade and Johns, 2020），即“从局部推导整体”。而人类的视觉感知则建立在事先对整体的预设上，即通过物体所处的具体情境，先对其整体状态做出推论，再基于此状态，将识别到的局部与脑海中认为符合该状态的整体进行连线。因此，和人的识别方式相比，计算机的识别仍是基于对形式化规则的代表，而不是基于情境化的推导。正如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人脸识别系统尽管能把一张图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对上号，但它根本不知道它所识别的是一张脸，因为它在设计上只是把新输入的数据与用之前输入数据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对照（Elish and Boyd,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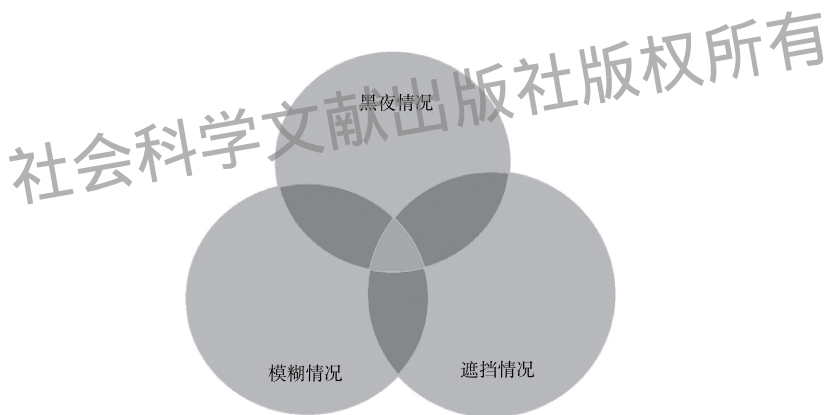


图4 三圆圈图例：标注中常遭遇的困难情况及对应的困难程度

以汽车标注中常见的一种视觉偏差为例，汽车的后视镜在图像像素低的远景情况下，很容易被识别为另一辆车。这种错误对于计算机而言基本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基于特征搜索，模糊情况下的后视镜轮廓与面包车的外形轮廓相近。对于人而言，标注员最常用的分辨此类情况的方法，就是观察目标图像与路面相接的位置是否与周围其他车辆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因为同一道路上的车辆，其底部连线应与道路面水平或贴合。这样先关注物体所处具体情境，之后再对其进行识别判断的认知观即“从整体推



导局部”。这种识别方式类似于梅洛-庞蒂的“意向弧”，标注员的观察不是从形式化的“长方形”“直角”等类别出发，而是通过对汽车所在路面的情境进行细致辨别得出的结果。因此，对于识别困难的情况而言，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整体认知观有助于车辆图像的识别。

在汽车图像 3D 标注的识别环节中，一方面需要借助人体的汽车认知观和分类观进行车辆识别，另一方面对判断进行再审核时借助的也是人力。这在印证“莫拉维克悖论”的同时，再次肯定了人的整体认知观和具身性知识经验对训练自动驾驶汽车算法的价值。

（二）标注：情境化知识的效力

不同于识别环节，标注环节相关规范与要求的示例和客观技巧较多，仍然需要以人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这一需要在被标注员称为“脑补”的情况下最为明显。

此处的“脑补”指的是，在 3D 框的绘制中，标注员遇到汽车图像不完整（有截断、遮挡或者像素过低、过于模糊）时，需要运用自身的想象力对图像的完整形态进行想象，然后根据想象出来的完整汽车图像对其进行立体几何的标注。这一过程不同于图像完整情况下 3D 框的绘制，前者具有相对明晰、细致的规范要求（见图 5）；在“脑补”情况下，相对于后续的车框绘制，更为重要的是先行的对于图像完整态的想象，而这一“想象”依据的更多是主观方法。

“脑补”的诀窍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较为量化的方法，如比例缩放。以“已知部分车辆图像大小：完整车辆图像大小=现实车辆部分大小：现实车辆整体大小”为公式，通过比例关系推算完整图像大小。但若处于模糊、黑夜、大面积遮挡等难以标注的情况下，量化方法的效力就极其有限，“比如说这车只露了一个车顶，就很难去判断它的大小，因为首先连它是什么类型的车都不好确定，大部分四轮车的车顶都长得差不多”。^①

^① 来自标注员 HY 的访谈。

2.2.1.2 伪3D几何

1. 伪3D框具体形式及几何要素要求：

①想象存在一个立方体，贴合车辆，绘制标注该立方体投射到图片后的可见顶点。标注结果可能是6个点或4个点。

②点位顺序：先标注车头面的四个顶点，再标注车尾面的四个顶点。每个面从左上角顶点开始，按顺时针顺序依次标注。如下图所示，标注顺序为0→1→2→3→4→5→6→7。

注意：将车辆实际朝向作为判断左右的依据，不以画面左右判断。

对于不可见的点位，不需要在照片上进行标注，按顺序输出空坐标即可。



2. 整车标注伪3D框的边界位置如下：

①当车辆可见面为一个面，可见车头或车尾。

a. 伪3D框标注结果为4点框；

b. 伪3D框要求：左右边沿紧包车辆两侧且垂直；下边沿为车尾面接地位置，与车辆保险杠基本平行；上边沿包围车辆顶部，与车辆顶部轮廓基本平行。

c. 如下左图所示，车辆发生倾斜时的标注结果。

d. 如下右图所示，车辆未发生倾斜时的标注结果。此时需要注意伪3D框标注与2D框标注的差异。通常情况下，伪3D框下边沿位置，相对于2D框下边沿位置更偏下。



②当车辆可见面为一个面时，可见车辆某一侧身。

- a. 伪3D框标注结果为4点框；
- b. 伪3D框要求：左右边沿紧包车辆两侧，需垂直；下边沿为车辆侧身接地位置，前后车轮角点位于该边上；上边沿包围车辆顶部，需符合车辆整体趋势；
- c. 如下图所示，注意上边沿，需符合其他车辆趋势，避免突变。



图5 来自标注平台所发布的汽车标注手册中关于标注框绘制的规范及要求
资料来源：A公司内部发布的标注工作指导手册。

在实际情况下，第二类主观方法的可适用性更强。第二类主观方法主要基于情境化知识，标注环节的“情境化”具体指以图片中车辆所处的周边环境及物体为参考系，对需想象车辆图像的完整态进行合乎情境的推理。一个常见的例子即为根据道路上的车道线对行驶中被严重遮挡车辆的“脑补”，标注员在此情况下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因车辆被严重遮挡而过大地“脑补”被遮挡车辆的大小（如过分地拉长）。而参考地面上的车道线则可

帮助校正这个拉长的范围，因为在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是不能超出既定车道的，所以若“脑补”出的车辆大小已经超过车道，则说明“脑补”过大。另一个例子则是对路边连排停车中被高度遮挡的车辆的脑补，在此情况下，通常是根据临近车辆的大小和类型来对目标车辆进行推想的。如被遮挡车辆的临近车辆为一辆越野车，而被遮挡车辆的车顶与其平行，那大概率上该车也为相似大小的越野车。

由上述内容可知，在标注环节中，由于实际的图片情况并不总是如指导资料中的示例图片那般清晰无遮挡，形式化知识的效用是非常有限的；相反，以标注员为主体的具身性知识所发挥的效力更大。

（三）审核：互动性知识的生产

审核环节不仅指代质检员的审核工作，还包括标注员在完成识别、标注环节后，对所标注结果在提交前的自我审核和确认，以及被打返重做后的修改过程。因此，审核环节同样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其知识来源于员工之间的互动。柯林斯强调，人工智能要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首先得学会与人交流，因为交流互动是形成“默会知识”的重要途径。柯林斯、埃文斯（2021）把互动型专长看作公民民主参与科学决策的重要条件，却没有看到互动不一定能打破权威，甚至互动自身也可能是基于一定等级架构的。

数据标注的审核是不同主体在知识权威链条之间互动的结果。经过前面分析的识别和标注两个环节，标注员积累了基于整体观和情境性的具身性知识，但各自的具身性知识的权威程度具有差异，需要审核员进行纠错，然后重做，这样才能使结果更接近可被机器识别的结构化数据，形成标注默会知识。在客观标准所发挥的效力极为有限时，标注员会依据自身经验总结出一套判断原则和标准，如遮挡和截断程度如何选择等。但如果标注仅仅涉及主观经验，那么标注的结果将会千差万别，无法帮助机器进行深度学习。因此，默会知识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依赖审核环节的互动。

然而，不同标注员个体对自身的这套知识的信任度具有差异，有的标注员认为自己的标准正确无误，甚至敢和经理、钉钉工作群线上“小助

手”或甲方质检员对抗；有的标注员则是通过不断试错，由提交后被打回重做的情况，“看运气”地试探自己的这套知识和审核系统标准的重合性，由此在试错过程中不断修改自身的知识标准。

根据所涉及主体及其标注知识权威性的差异，笔者总结出一条关于规范标注知识的传导路径，即标注知识权威链条，具体如下：

⑥甲方质检员>⑤钉钉工作群线上“小助手”>④经理≥③公司质检员/小组长>②标注老手>①标注新手

此链条彰显了标注员主观具身性知识与质检员形式化的结构性数据之间的张力。

①标注新手、②标注老手：对于标注新手而言，由于具身性知识的缺乏以及在权威链条中互动所积累的经验的缺乏，其处于链条的底端。表现形式为，对标注规范不熟悉，在遇到相异的标注见解时没有任何发言权，需要听从链条上端其他主体的意见。新员工入职时有简短的培训，但是笔者基于自身的培训经验认为，实际上观摩“老手”标注过程1小时左右，比自行阅读指导手册更能上手，这也体现了数据标注形式化知识的有限效力。

③公司质检员/小组长、④经理：相较于标注新手和标注老手，此二者的具身性知识积累更加丰富，故其标注默会知识与规范知识的重合度更高。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较前者的经验更加丰富。但需注意的是，不同于组织管理结构上经理优于公司质检员/小组长的默认关系，在实际的标注知识权威链条中，公司质检员与甲方的互动频率更高，所以其更能实时调整以适应变动的标准。而经理虽然有丰富的标注经验，但是在业务上脱离于具体流通的标注任务链，所以有时对标注规范变化的敏感度不如公司质检员/小组长。就标注知识的权威性而言，经理在经验上占优势，公司质检员在把握规范变动上占优势，二者的标注知识权威性不相上下。

⑤钉钉工作群线上“小助手”、⑥甲方质检员：他们处于权威链条中的顶端，其要求和标准被视为“规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规范”

也并非静止不变的，这种变动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其具身性知识的本质，无法规避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差异（如不同的质检员对于某些模糊情况下的标注，判断和要求不一）；二是其规范受到甲方需求变化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出现前后抵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做出调整。如在笔者入职早期，对于机动二轮车的标注要求是，车框上边高度以车把手为标准，不能包含后视镜；后期却突然做出调整，转变为以后视镜高度为准。更为明显的一种情况还在于已被严重遮挡/截断的车辆图像是否还标注出来的问题。规则上表示的是只要被遮挡/截断部分超过 90% 即可忽略不标注，然而在实操中，90% 的量化标准很难进行判断；有时明明标注员在询问线上“小助手”时后者表示可以忽略标注，但是提交后，甲方质检员却打回图片要求标注出来重做。这种不断处于变动状态的规范标准，使得标注权威条链中标注知识的能动性特征更加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标注员与“知识权威”的互动过程中，标注员的主观具身性知识不断被“规范”，成为可供机器学习的结构性数据，同时，“规范”也因标注员的纠错和重做过程而得到完善。但不同于柯林斯设想的民主式互动，数据审核环节的互动是一个底层被规训、高层权威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对自动驾驶汽车数据标注中汽车图像 3D 标注环节进行了拆解，展现了各环节中人为主体的劳动贡献。在识别环节，人类独特的整体认知有助于在困难情况下对物体识别的判断；在标注环节，情境化知识解决了残缺图像的补足问题；在审核环节，员工的互动使得标注员的行为更规范，也使得甲方质检员所依赖的“规范”得到不断完善，进而使得高效地适应变动的需求标准成为可能。由此，可以进一步尝试打破先前对 AI 数据生产中人力因素的贬低：在试图对算法进行“社会化”时，也必然需要传递给它们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即认知观和分类观。在这个层面上，算法训练所需的数据标注工作实质上是一种认知观教学。因此，AI 数据生产中的人工数据标注劳动的重要性理应受到重视，且其劳动价值也应该得到肯定。但在实际情况中，数据标注员所拥有的具身性和互动性知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因所需要的教育投入不高而只属



于“简单劳动”（马克思，2004）。数据标注员因此也难以获得较高的回报，甚至面临令人担忧的劳动状况。下文的第二部分将聚焦数据标注员的劳动境况及其成因，呈现这对关系之中应给予重视的张力。

六 作为“微工作”的数据标注劳动

（一）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数据外包与“微工作”

近年来，神经网络人工智能被炒作起来，声称通过机器的深度学习能使算法具备人类的智能，从而实现各种“无人”技术（Mnih et al. , 2015; LeCun et al. , 2015）。但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得知，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依靠“高技能”的算法建模，而且离不开“低技能”的数据预处理。如果没有海量的稳健的基础数据来“投喂”模型，那么模型的深度学习也不可能是准确的。数据在整个 AI 系统中尽管处于首要地位，但是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是价值最低的（Sambasivan, 2021）。因此，媒体往往把数据标注产业称为大人工智能的“富士康”（轩中，2018；易柏伶，2020）。这里既指数据标注在 AI 产业中所占的价值份额类似于富士康工人在苹果产业链中的占比那么低，也指数据标注员的劳动如富士康工人般廉价和异化。

最近，社会学家开始把数据预处理工作称为“微工作”（Tubaro et al. , 2020），这形象地揭露了数据外包与平台劳动不稳定性的双重特征。谷歌、Facebook、微软等科技巨头作为承包商，出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技术的目的，将对大量的经过处理的数据集的需求进行切割，依托给各数字平台分派为片段处理。其中，数字平台作为任务托管处和数字劳动力中介，一方面负责将大型项目数据分解为一系列小任务，分发给匿名的全球劳动力，从每笔交易中抽成（Press, 2021）；另一方面和劳动力之间构建“一次性交易”的劳动关系，劳动力根据平台发布的任务选择领取或拒绝，劳动成本更低，且周转时间更快。由此可见，“微”工作的“微”具有多个层面的指代意义。下文主要从数据标注工作在薪酬和劳动者地位两个方面的“微”，讨论“莫拉维克悖论”所暗示的人类优势中的巨大阴影。

（二）“微”薪酬：高替代性的互动性知识的贬值

前文有关“莫拉维克悖论”的分析，主要侧重于该准则对人类相较于于机器所具有的独特优势的强调。然而，需要认识到，这些独特优势——具身性和社会性的技能——对于人类而言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进行培养，所以标注员的工作极易被取代。这种高替代性所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降低了标注员的市场谈判能力。如前文所提及的，一名新手标注员入门，大概只需观摩 1 小时的老手标注操作，再辅之以标注手册等相关指导资料即可。所以，尽管成为“老手”，即对标注的具身性和互动性知识的熟练掌握，是一个日积月累且需要和其他相关主体不断互动的过程，但是准入的低门槛仍然限制了标注员与资方谈判的能力，由此带来一个最为直观的影响，即标注员无保障的低薪酬。表 1 为笔者进行田野调查时所在 A 公司标注员的实际薪酬收入标准。一般情况下，工作一个月左右的熟练工能够达到的单日报标注框数在 2000 个左右。因此，熟练标注员的每月工资通常稳定在 3100 元左右，低于贵阳当地私营企业的月平均工资 4726 元的水平。^①

表 1 A 公司标注员的实际薪酬收入标准

标注框数（个/天）	底薪（元）	全勤奖励（元）	提成（元）	综合工资（元）
1300（最低标准）	2000	200	—	2200
1300~1500	2000	200	$(\text{实际标框数}-1300) / 2 \times 0.12$	2200~2212
1500~1700	2500	200	$(\text{实际标框数}-1500) / 2 \times 0.12$	2700~2712
1700~1900	2700	200	$(\text{实际标框数}-1700) / 2 \times 0.12$	2900~2912
1900 以上	2900	200	$(\text{实际标框数}-1900) / 2 \times 0.12$	3100~3112

此外，数据标注外包途径的差异对互动性知识的生产以及具体的薪酬

^① 《贵州省 2021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https://rst.guizhou.gov.cn/zwgk/zfxxgk/fdzdgnr/tjxx/tjgh/202206/t2022062075083582.html>。

获得过程也有影响。当前数据标注工作的外包主要有两种途径：专门的线上数据标注平台和线下的标注承包团队。前者是个人以自雇佣者的身份直接通过平台领取完成标注任务，并由平台发放薪酬；后者则是通过加入线下的承包团队，由团队布置标注任务和发放薪酬。需要注意的是，线下承包团队的任务领取和标注工作仍然需要在标注平台进行，区别在于是以团队身份而非个人身份。在互动性知识生产的层面，线上平台的自雇佣者只涉及与平台审核员的互动，所以其互动性知识积累的周期更长（“上手慢”），早期标注任务的通过率更低。相反，线下承包团队的标注员由于互动主体和层次的多样及分化，互动性知识积累的周期短（“上手快”），早期标注任务的通过率更高。在薪酬计算方面，线上平台的自雇佣者没有最低任务量的要求，其薪酬按完成任务数计件结算，且标注框单价略高于线下承包团队；其弊端在于，平台没有底薪和任务分配保障。与之相反，线下承包团队的标注员在有底薪和任务量分配保障的情况下，需要面临的是相对低的标注单价、因无法完成最低任务量而面临被清退的风险，以及底薪要求标准不断提升的霸王条款。

因此，这两种外包途径在互动性知识生产和具体薪酬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在实践中其实相互抵消了。以笔者在 A 公司的经历为例，若相同标注熟练度（相等的互动性知识积累量）的标注员选择在平台接单，在完成相同任务量的情况下，越熟练的标注员在平台获得的薪酬比在线下承包团队中获得的越多；因为此时他们的互动性知识积累已经足够，在标注单价更高的平台可以获得更高的薪酬。然而，在前期，在线下承包团队中比直接在平台接单更具优势，因为此时团队工作互动的情境能更快地增加标注员互动性知识的积累，使得他们的任务通过率高于平台自雇佣者，底薪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更有保障。然而，互动性知识的积累对薪酬差异的影响始终是短期的，一旦达到了足够的熟练度，互动性知识积累量的增加对薪酬水平的提升作用就越来越小。标注单价仍然对标注员的收入起着决定性作用，甚至在实际中还难以达到上文所提的 3100 元这个工资标准。

除了低廉的标注单价，标注员的实际薪酬待遇及加薪、升职的考核标准还是一个动态变化且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公司所要求的“基础任务

量”会随着标注员平均标注完成量的提升而不断提升，底薪却保持不变。譬如在笔者当初入职两周的节点，公司管理层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发现，标注员每日的平均标注图片数量增加了 10 张，由此决定将底薪要求的每日任务量的标准也增加了 10 张。并且，这样的趋势和标准还会不断保持，“以后只会不断提高，大家就会标得越来越快”^①。这造成的结果就是，虽然标注员的标注速度和熟练度在不断提升，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没有随之提升，因为底薪的达标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干得越多，并不会挣得越多，反而面临不断被清退线驱赶的境地。

（三）“微”地位：从具身性劳动变为“人工”机器人

从表面上看，图像数据标注的知识是具身性的，来自人的直觉，完成任务似乎不费什么力气。但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承包公司希望通过不断压低成本在同行竞争中取得优势，所以“莫拉维克悖论”所指的对于人类而言十分简单的基础性任务渐渐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身心都造成巨大的冲击。比如，上文提到的底薪要求标准不断提升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员工为完成任务不断延长工作时间。在笔者入职第一周时，单日的最低图片标注数量为 50 张，所以在午休时间很少有加班的现象；然而，到了第二周提至 60 张并声明清退政策后，几乎所有的标注员在午休时间都在加班，并且有大量的标注员因在下班时间后没有达到任务要求量而只能被迫加班。据笔者了解，他们的加班时间在 2~3 个小时。这样综合下来，大部分标注员每日的实际工作时长约为 11 个小时。尽管规定每周有 1 天的休息时间，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仅有的 1 天休息时间也同样被占用，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负责更多数量的标注图片审核工作的质检员身上。需要注意的是，这样被迫加班情况的普遍出现并不是由于标注员自身的能力不足，而是管理层有意识地以超过单位时间以及平均标注速度的任务量布置工作产生的结果。在和该公司一名项目经理的交谈中，笔者曾经以调侃的方式表达了不断提升最低任务量要求的不合理之处，该经理则表示：“就是需

^① 来自公司 H 经理。



要逼一逼，才能把潜力激发出来。你看看你们原来每天只能标 50 张，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标 70 张以上了。”

然而，这种所谓的“潜力激发”，是以员工的超负荷工作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代价的。长时间、相对静止、重复的工作姿势使得大部分员工都在休息间隙以及加班时间抱怨过自身生理上的不适，如眼部疲劳、视线模糊、肩颈酸痛等，这与指、腕关节劳损有关。

该公司的工作环境看似和白领工作高度接近，实际上，工作内容的分异使得标注员的劳动境况更像是电脑屏幕前的“人工”机器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标注速度，标注员多半选择以固定的姿势长时间地紧盯屏幕。在此过程中，唯一活动的只有手部——进行鼠标的挪移，以及在键盘上简单地输入。为了更加清晰地辨认图片，尽管座椅有靠背，但笔者发现几乎所有标注员都选择了以更为前倾的姿势凑近屏幕，根本无法以更加轻松的靠坐形式进行工作。笔者曾多次听见标注员暗含担忧地调侃道：“你说我们这样一直标去，会不会瞎啊，我感觉我这段时间看东西都眼花了。”在心理方面，不断提升的基础任务量以及日渐紧张的工作氛围也使得部分员工出现了强烈的焦躁和挫败情绪。在笔者工位旁边、和笔者同一时间入职的标注员小 T 曾多次表达了对自己被清退的担忧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怀疑：“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但我真的不行，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不行。”并且她在后期对标注工作出现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标注量远低于其他标注员以及要求任务量。最后，在其小组长（其工位旁边、同一时间入职的另一位员工 HW）的劝解、辅导下，酌情略微降低其任务量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缓解。然而，小 T 最终还是在领取了 1 个月的薪酬之后便离职。

在笔者开展田野调查期间，尽管标注员在闲聊时会透露出对低薪酬的抱怨和不满，但从未有人从自身技能价值的角度向资方表达过提薪需求。在他们的自我认知以及资方的流行话语中，对标注工作的定义是“有手就能干”，这种对其劳动价值的贬低，也进一步限制了标注员的市场谈判能力。由于工作零散化，工人流动性大，虽然标注员在工作过程中有一定的互动，但是其组织性和团结性都有待加强。这样产生的结果之一就是他们

的反抗多是“用脚投票”，而不是集体行动。如上文提及的小 T，她作为一名普通的新手标注员，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切割的、片段化的，为数不多的需要和其他员工互动的时刻，就是当其标注操作出现阻碍和困难，需要请教他人、获取他人帮助的时候。而在此时，小组长尽管可以为其提供个人辅导，但是并不会鼓励她并且与她联合起来对公司制定的任务量标准提出质疑。她最后的反抗，也是以个人的离开为结局，并没有对不合理的薪酬体制、任务制定标准产生任何影响和改变。

七 结语

本文以笔者在贵州省贵阳市一家 AI 数据标注承包公司担任数据标注员的经历为例，呈现了在 AI 数据标注中的人力贡献与其劳动状况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在 AI 数据标注的各个环节，以人为主体的具身性知识与互动性技能发挥了最大作用，这使得算法对人类社会分类及认识的学习成为可能。这样的“认识观”教学的可行，得益于两个方面：①识别数据的整体性要求与人类认知的情境性认识观，这对应了德雷福斯关于人类知识具身性特征的论述；②人类认知的社群性特征，使主观的具身性知识通过审核和纠错得以变为机器可以学习的结构性知识，这对应了柯林斯关于互动型专长以及语言上的社会化的论述。通过揭示在标注各个环节中具身性知识与默会知识的相互转换与相互支持，笔者统合了二者的争论：默会知识的形成需要具身性知识的社会实践，而具身性知识的形成同样是建立在既有的默会知识之上的。对数据标注环节的分析，使我们看到 AI 的“高技能”算法建模是建立在“低技能”的数据预处理基础之上的。虽然机器能自己“深度学习”，但是人力的贡献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由于 AI 标注产业的结构性边缘地位，数据标注员的“微工作”难以获得合理的回报。由于互动性知识的需要，单纯的线上众包模式不利于新人的培训，因此催生了像 A 公司这样的数据标注承包公司。但劳动者面临的不断提高的绩效考核标准，使得薪资实际上被不断压榨。本来看似简单的具身性、凭借直觉就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不断加班的劳动密



集型工作，劳动者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AI的产业链上，数据的重要性处于首位，但是数据预处理的低价值使得整个行业面临发展瓶颈。学者已经提出我们需要关注“数据级联”（data cascades）这一现象，这是指因低估数据的质量而对下游模型任务造成负面影响的复合事件。如在人工智能的疾病诊断系统中，尽管模型是通过在无噪声的数据上训练而建成的，但是对原始数据处理不重视，没有认真清理图像上的小灰尘斑点，妨碍了后续对眼科疾病的预测（Sambasivan, 2021）。目前，业内已经形成共识，“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AI要真正获得人工智能，就必须在认识论和劳动价值论上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 奥利弗·萨克斯，2016，《错把妻子当帽子》，孙秀惠译，中信出版社。
- 波兰尼，2017，《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徐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小平，2021，《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科技与社会》第2期，第4~14页。
- 德雷福斯，1986，《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宁春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顾骏主编，2018，《人与机器：思想人工智能》，上海大学出版社。
- 高新民、付东鹏，2014，《意向性与人工智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贺久恒，2020，《机器习得人类知识的前提：具备身体抑或掌握语言？》，《清华社会学评论》第2期，第46~62页。
- 金观涛，2017，《反思“人工智能革命”》，《文化纵横》第4期，第20~29页。
- 贾文娟、颜文茜，2022，《认知劳动与数据标注中的劳动控制——以N人工智能公司为例》，《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42~64页。
- 柯林斯、埃文斯，2021，《反思专长》，张帆译，科学出版社。
- 刘露、杨晓蕾、高文，2021，《面向技术发展的人工智能弹性治理框架研究》，《科技与社会》第2期，第15~29页。
-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 莫里斯·梅洛-庞蒂，2001，《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 王彦雨，2018，《基于历史视角分析的强人工智能论争》，《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第6期，第16~27页。
- 轩中，2018，《人工智能行业中隐藏的“富士康”式劳动密集型产业》，《互联网周刊》第21期，第26~27页。
- 易柏伶，2020，《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数据标注时薪缩水一半，欠薪高发》，《第

- 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100852901.html>。
- Collins, Harry. 1990. *Artificial Experts: 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Dreyfus, Hubert. 2002. “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 Merleau-Ponty’s Critique of Mental Representati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 367–383.
- Elish, M. C. and Danah Boyd. 2018. “Situating Methods in the Magic of Big Data and AI.” *Communication Mongraphs* 85(1), 57–80.
- Engster, Frank and Phoebe V. Moore. 2020. “The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apitalism.” *Capital & Class* 44(2), 201–218.
- Feldman, Martha S. and Wanda J. Orlikowski. 2011. “Theorising Practice and Practicing Theory.” *Organization Science* 22(5), 240–253.
- Fourcade, Marion and Fleur Johns. 2020. “Loops, Links and Ladders: The Recursivity of Social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ory Society* 49, 803–832.
- Hsu, Anne Showen and Thomas E. Griffiths. 2010. “Effects of Generative and Discriminative Learning on Use of Category Varia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32: 242–247.
- Kellogg, Katherine C., Melissa A. Valentine, and Angèle Christin. 2020. “Algorithms at Work: The New Contested Terrain of Control.”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4(1), 366–410.
- LeCun, Y., Yoshua Bengio, and Geoffrey Hinton. 2015. “Deep Learning.” *Nature* 521, 436–444.
- Mnih, Volodymyr, Koray Kavukcuoglu, et al. 2015. “Human-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Nature* 518, 529–533.
- Moravec, Hans. 1990. *Mind Children: 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 New Hav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icolini, Davide. 2011. “Practice as the Site of Knowing: Insights from the Field of Telemedicine.” *Organization Science* 22(3), 602–620.
- Patel, Ashish. 2018. “Chapter–6 How to Learn Feature Engineering?” *Medium*, 18 July 2018.
- Pendleton, Scott D., Hans Andersen, et al. 2017. “Perception, Planning, 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Machines* 5(1), 6.
- Perrigo, Billy. 2023. “Exclusive: OpenAI Used Kenyan Workers on Less Than \$ 2 Per Hour to Make ChatGPT Less Toxic.” *Time*, 18 January 2023. <https://time.com/6247678/openai-chatgpt-kenya-workers/>.
- Pettersen, Lene. 2018. “W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not Outsmart Complex Knowledge Work.”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3(6), 1058–1067.
- Polanyi, Michael. 1967. *The Tacit Dimension*. New York: Garden City.
- Press, Alex N. 2021. “Microworkers are ‘Disempowered to a Degree Previously Unseen in



- Capitalist History' . " *Jacobin*, 22 November 2021.
- Sambasivan, Nithya. 2021. "Seeing Like a Dataset from the Global South." *Interactions* 28 (4), 76–78.
- Searle, John.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hestakosky, Benjamin. 2017. "Working Algorithms: Software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Work and Occupations* 44(4): 376–423.
- Stilgoe, Jack. 2018. "Machine Learning,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Governance of Self-driving Ca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8(1), 25–56.
- Stoket-Walker, Chris and Richard Van Noorden. 2023.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Generative AI." *Nature* 614, 214–216.
- Tubaro, Paola, Antonio A. Casilli, and Marion Coville. 2020. "The Trainer, the Verifier, the Imitator: Three Ways in which Human Platform Workers Suppor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 Society* 7(1), 1–12.
- Turing, Alan.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236), 433–46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机器霸权”的建构与解构：基于南方某自动化工厂的案例分析

许 怡*

摘 要：在中国制造业经历的新一轮产业升级当中，先进制造业所使用的自动化技术如工业机器人、数控设备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凌驾于工人之上的霸权地位。这种霸权地位，不仅体现为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即人的劳作以机器的运转为中心，还体现在机器对人的观念和认知的垄断——让资本、舆论甚至工人自身都普遍认为机器比他们更优越。本文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双重分析视角，意在探讨机器作为一种人造器物是如何获得这种霸权地位的，以及这种霸权是否可能在具体的生产场域中被解构。基于笔者在南方某自动化工厂的田野调查和对数十家自动化工厂的一手调研资料，本文尝试破除自动化机器在效率、质量、稳定性及安全性方面必然优于工人这一迷思。破除机器迷思，将有利于人们重新反思和解构机器霸权，有利于工人提升其议价能力，并且重新回到指向“以人为中心”、真正意义的“人机协作”，以及可实现技术与社会双重升级的技术选择的讨论中。

关键词： 机器人 技术选择 机器霸权 机器意识形态 机器迷思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以自动化和“机器换人”为路径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浪潮。据统计，中国自 2013 年起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销售市场，增速蝉联全球第一；截至 2022 年底，中国的机器人

*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智能制造趋势下的劳动体制变迁研究”（19BSH086）的资助。

密度首次超过美国，达到 322 台/万人，成为全球排名第五的国家（IFR，2017，2022）。在中国制造业经历的这一轮技术升级当中，先进制造业所使用的智能制造装备如工业机器人、自动化高档数控机床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被国家列为重点发展领域，还成为企业技术改造和生产运作的中心——工序的调整、岗位的安排、人员的配备和裁减等均围绕机器而设计。机器不仅在资源获取上专享政策优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也凌驾于工人之上，这种类似于霸权式的地位，本文称为“机器霸权”。

“机器换人”代表的是一种以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工厂为发展目标的技术升级路径，它不仅将工作流程直接自动化，还使用自动化及数字化体系来监控及管理人工作业。“机器换人”涉及的是技术升级路线的选择之争，但当人们质疑机器是否应该取代工人的时候，质疑之人通常会被贴上“反对技术进步”的标签，甚至被认为是当代“卢德分子”。事实上，德国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对于制造业的升级路线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除了高度自动化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强调的是人类在生产流程中起到的中心作用，如使用小组作业、机床的厂内编程、员工参与自动化解决方案的构建及实施等。德国后来的实践表明，他们放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

然而，在中国，对于技术选择想象的匮乏常常使人们陷入讨论的误区，即认为技术升级的路线必然要经历高度的自动化和“机器换人”，反对自动化则是反对技术进步，有悖历史发展趋势。而对于技术进步持审慎态度的立场往往基于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如担忧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问题，或者对工人产生去技能化/技能两极化的后果。从技术的社会影响切入的视角似乎暗含着一种潜台词，即如果某项技术伴随着什么负面后果，那我们去修补这种后果即可。这种视角或多或少承认了技术的必然性。反之，如果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影响，而是技术选择的社会建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分析这项技术的合理性，以及其是否具有必然性。

因此，本文认为，技术的选择和发展方向应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它的发生受诸多政治、经济及社会因素的影响。正如工业社会史学家戴维·诺布尔（2007：388）所言，“应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社会进程，而不是一种自动的超越性的决定力量……它与其他社会进程一样，充满了冲突

与斗争，而其最终结果总是无法预测的”。国内学者黄瑜（2020）也指出，“机器换人”不应该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前提是让工人参与到技术决策中来，成为机器的主人。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当下中国制造业所采取的技术发展路径进行回溯性思考，分析“机器换人”所面临的宏观、微观环境以及相关社会群体（政府、企业、工人）在此环境下如何形塑（或被塑造）他们的态度认知和行动策略。本文提出了“机器霸权”这一概念框架，意在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机器作为一种人造器物（artifacts），是如何获得这种霸权地位的？这种霸权地位由哪些相关社会群体或部门参与建构，以及经由怎样的过程而形成？这种被建构出来的“机器霸权”或称“机器迷思”在具体的生产场景中可否被解构？其对于工人来说有什么潜在意义？

二 机器霸权：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本文提出的“机器霸权”这一概念框架，主要基于对四类文献的思考：第一类是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于机器生产的讨论；第二类是关于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第三类是有关霸权的理论及其在劳工治理领域的运用；第四类是对于技术垄断文化的剖析及新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表现分析。以下将对这四类文献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机器生产

劳动过程理论最早的奠基人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即有关于劳动过程的论述；一百多年后，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则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形成。以上两部著作堪称经典，本部分将简要回顾二者对于机器生产的讨论。

回溯机器发展的历史，机器在资本增殖过程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马克思（2004）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有通过机器占有妇女、儿童等补充劳动力、延长工作日以及强化劳动，以此使得工人的劳动从属于机

器。在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中，机器与工人之间是对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马克思，2004：486~487）

继马克思之后，布雷弗曼（1979）进一步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行业中，资本家如何通过对劳动过程进行“分工”和“科学管理”，以及利用“机械化”等科学技术手段，将劳动控制权从工人手中转移，从而导致劳动的全面退化。他指出，机械化是造成劳动退化的关键因素——现代意义上的机器，就是机器本身具备了确定的运动路线，并可通过内部的运动进一步控制工具或工件的运动，以此把工人降低为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在布雷弗曼看来，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是机器演变的关键性因素，而这种控制方式则完全由资本家所操控。因此，机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使工人群众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劳动”——资本主义这个“主人”站在了机器后面，支配和吮吸工人的劳动（布雷弗曼，1979：172）。布雷弗曼和马克思一样看清了机器的阶级属性，但他认为机器不过是资本家意志的体现，只是阶级矛盾的替罪羊，“使人类衰弱下去的不是机器的生产力，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使用机器的方式”（布雷弗曼，1979：206）。

马克思和布雷弗曼关于机器的论述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机器不生产剩余价值，但它支配和剥削工人的活劳动；二是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力包含在阶级关系中，成为资本家进行阶级控制的工具。尽管马克思和布雷弗曼都揭露了机器作为一种技术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属性，其形成与发展遵循资本的意志，为资本服务，但他们并未向人们展示其他技术选择的可能性。这不禁让人疑惑：我们反对的是技术？还是那些只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对此，工业社会史学家诺布尔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二）技术的社会建构观

诺布尔的观点代表的是一种技术的社会建构观，其核心在于解释技术如何被社会所形塑。有别于探讨技术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建构论者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这些影响发生之前，在技术生成之前，社会是如何形塑技术的？（MacKenzie and Wajcman, 1995）诺布尔（2007）的研究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数值控制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选择”，政府、美国军方以及企业管理者在影响机器设计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历史性角色。在自动化的技术选择上，决策者们最终选择了对工人去技能化的“数值控制技术”，而非另一种需要依赖熟练技术工人的“记录-回放”技术。在长达二十年的技术选择和落地过程中，工会作为“相关社会群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企业工会和地方工会从最初的技术设计、选择，到后来的技术试点应用，再到为工人争取不变的薪资待遇和劳动控制权，一直在与资方进行协商和抗争。但工会最终落败——从“技术动力”^①的角度理解，军方对性能与命令的重视、管理层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技术狂对技术的迷恋，都成了刺激这种不计成本与生产率的自动化浪潮的强大动力，其力量远胜于工会。

诺布尔的研究一方面说明了技术进步是一种社会进程和社会选择，其发展的方向并不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警醒人们应该重视争夺对技术的控制。他列举了一些对抗资方技术选择控制的例子，如欧洲工会团结了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设计偏向于劳工的技术；国际机械师协会提出了一个“技术的权利法案”，对新技术的采纳设置条件以保障工人的利益。简言之，社会建构观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发展的不同可能性，对于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其影响上，而应探讨如何形塑对工人乃至对人类社会有

^① “相关社会群体”和“技术动力”这两个概念均来源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COT），前者指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将会对技术做出特定的理解，并对技术的设计进行谈判协商；后者指的是当一个技术系统靠资本、技术和人来增值时，它就建构起了技术动力，这种动力赋予了技术系统特定的方向感和速度感。受篇幅所限，无法对SCOT进行详细介绍，可参见Bijker（2010）。

利的技术，以及弱势方如何加强对技术发展路径的争夺。

（三）霸权式劳工治理

本文的分析框架同时借用了葛兰西（2000）的“霸权”（hegemony）概念。葛兰西提出的“霸权”概念是一种有别于国家暴力的统治手段，它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对文化、意义的建构和操纵，使被统治者自愿臣服于统治者的意愿和治理手段。有别于历史上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不再仅凭武力来对付它的反对者，而是通过建立“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将其道德、政治及文化的价值观建构成日常行为和习俗，并获得被统治者的积极认同（葛兰西，2000：38）。结合福柯（2003）后来发展的理论，霸权的实施可以理解为统治集团经由论述和规训的方式，让被统治者从内在认同统治者的治理方式并按照其要求行事，同时统治者也赋予被统治者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使其自愿地服从于这种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支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占领。

霸权式统治也被用于基层的劳工治理。葛兰西（2008：336）评价泰勒制，认为劳动群众有“通过互相劝说的方法或通过个人提出意见和个人接受意见的方法养成与新的劳动方法和新的生产方法有联系的新的心理生理的本领和习惯”。劝说、自愿认同成为工人参与现代工厂劳作的心理基础。然而，葛兰西（2008：344）也指出，泰勒制虽然可以让劳动者的身体“机械化”，即以很紧张的速度重复着简单的姿势和动作，但工人的脑子被解脱出来进行其他思维活动，这种思考使工人不大可能保持其驯服性，这正是工业家们所担心的。由此可推断，霸权式治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资本家通过塑造积极认同获得了劳工的配合，似乎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延续；另一方面，霸权式治理也包含了反霸权的潜能，即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经由批判性思考可以被打破。

当代不少劳工社会学家受到了葛兰西思想的影响，他们借鉴霸权理论解释资本家对工人的治理和控制，其中最经典的当属布洛维（Burawoy）的研究。布洛维（1985）对“强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两种劳工治理的方式做了详细的区分，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工厂政体”

是“霸权”式的，其特征是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干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从而促使工厂的控制手段由强制向“制造同意”转变。资本家通过“赶工游戏”，让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和生产工具上获得一种驾驭感，工人仿佛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宰者，而不是被机器控制的“异化者”（Burawoy, 1979）。机器也成为资本家形塑工人“认同”的工具，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机器与工人之间的紧张斗争看起来截然不同。然而，这并非工人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工厂政体”从专制体制向霸权体制转变的结果。可见，“专制”与“霸权”两种“工厂政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依赖强制的手段驯服工人，而后者则通过说服、观念灌输、内化、规训等非强制的方式获得工人对生产活动的自愿服从，从而使工人参与对“自我”的剥削。

（四）技术垄断与数字专制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及布洛维对其在劳工治理中的运用帮助我们理解了技术如何参与霸权式治理。而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技术逐渐获得一种垄断地位——技术不仅仅是霸权式治理的参与方，其本身亦成为一种霸权。

文化批评家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一书中指出，“技术垄断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波斯曼，2019：58）。他认为技术垄断文化的起点正是泰勒制，因为泰勒的思想勾勒出了技术垄断世界的预设，如效率是劳动和思想的首要目标；技术在精打细算方面总是胜过人的判断；人的评判并不稳妥可靠；等等。波斯曼（2019）将技术垄断界定为一种文化，即认同它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产物。他把技术垄断比喻为一种游戏机制——新的技术摧毁了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了一种新的知识垄断。与此同时，新的技术也持续不断地对文化和制度进行入侵，以使整体环境适应该技术的发展。

相对于波斯曼主要批判的电脑技术和医疗技术，对于现代生产技术垄断文化的批判则主要出自劳动过程研究者。例如，20世纪90年代，当信息和通信技术被应用于劳动过程的控制管理时，有学者将其比喻为“电子化的全景敞视监狱”——管理者通过掌握信息即可监控工人的日常工作、

生产效率，以及其是否遵守生产流程和规章制度，同时也让工人内化了这种管理策略以实现自我规训（Sewell，1998）。到了21世纪初，劳动过程研究者开始关注数字技术。菲佛（Pfeiffer，2017）在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专制政体”——数字化的人造器物成了资本家控制工人和使工人原子化的工具，并且强化、结合了此前的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和新兴的数字技术控制策略：借助电脑对工人进行官僚控制，通过机器、流水线实现对工人的物理控制，以及使用可佩戴的身体设备监控个体的行为从而实现工人的身体控制。菲佛认为，在数字专制政体中，数字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声的强制”（Pfeiffer，2017：35）。国内学者邓韵雪（2023）对于中国智能工厂的研究也发现，智能摄像头、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资方监控劳动者的新方式，并形成了一种“数字理性霸权”。但她也指出，这种数字化监控并非没有漏洞，工人可以通过拒绝分享数据而削弱劳动控制的有效性。

基于对上述四类文献的回顾，我们已经意识到新的技术正在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生活、文化、制度的各个层面，它不仅在物质上改造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也通过各种论述和文化入侵塑造着人们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技术具有葛兰西提出的霸权统治的特征。也正因此，我们不能仅看到技术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尽管生产制造技术实施的具体范围在生产制造和劳动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借助建构主义的视角，追问这种影响是如何形成的，甚至这种技术取向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把视野扩展到劳动过程之外，考察关于机器的主流论述是如何形成的，哪些机构和群体在影响相关论述的形成，又或者是这些论述如何塑造相关社会群体的认知和态度，并最终导致某种技术实现了它对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占领。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了多种质性研究方法。对于制造业企业一手资料的获取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实地调研法以及田野观察法。笔者于2018~2021年

陆续对广东省近 40 家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访谈或实地调研，其中主要包括实施了“机器换人”的企业，以及少量机器人制造商、集成商和机器人应用培训机构。在企业层面，访谈对象主要为企业管理层，包括人力资源部门管理者、技术部门管理者等，这部分访谈对象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升级状况和劳动力状况提供整体性介绍。另外，笔者也通过多种渠道访谈到了拥有相关经历的一线工人，包括正经历着企业自动化升级的工人和机器人培训学院的学员。在调研的近 40 家企业里，笔者可以实地参观车间的共有 20 家。通过短暂的实地参观，可以了解工厂的自动化升级和机器对工人的替换情况，也可以简单观察机器与工人之间的分工，但是无法深入了解机器、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互动以及车间的微观政治。于是，笔者从中选取了三家企业并设法进入其中展开较为长期的田野式观察。2018 年 7~8 月，笔者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应聘，先后进入了一家家电厂和一家办公家具厂。2020 年 7 月，笔者获得了一家足球厂（代号：D 工厂）的管理层允许，以研究者身份在厂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田野观察。基于上述方法，笔者共累积了近百份小组访谈及个人访谈记录、10 余家企业的车间观察记录，以及约 6 万字的田野观察记录。

除了通过多种方法获得一手资料，本研究还使用了文献分析法。文献主要是 2012 年以来主流报刊媒体的报道，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笔者以“机器换人”为关键词，检索并浏览了近千条相关报道；借助对 50 余篇典型报道的话语分析，得以了解媒体报道所呈现的对机器的看法和报道倾向。同时，笔者也收集整理了近 10 年来与产业升级转型、智能制造、机器人产业发展、技能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包括国家级的指导性文件，以及各省份、珠三角各城市的地方性政策文件，从而了解整体的政策导向和各地的具体实施方案。

本文第四部分主要结合了文献分析法以及笔者在多家企业调研所获取的资料和信息，第五部分则主要基于对 D 工厂的案例分析。D 工厂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生产足球、运动水壶等运动用品的小规模民营企业，全厂员工仅一百余人，生产工人不足百人，其业务既包括给国外运动品牌代工，也有自主品牌生产。2018 年，该企业全新投产了一条高度

自动化的足球球片生产线，开始生产热拼贴款的高端足球。次年，企业主在看到收益后，又相继投产了第二、第三条不同型号的自动化生产线，产能更高，每条生产线所需工人数量更少。尽管球片生产工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自动化，但位于后端的拼贴和检测工序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工序，依靠的是熟练的拼球女工，从技术上而言其暂时无法被机器所替代。

相较于在前两家工厂开展的参与式观察而言，笔者在 D 工厂有比较充分的行动自由和交谈自由，可以自由出入车间观察各个生产工序流程，并且在不打扰工人工作的前提下与工人交谈。而在前两家工厂，由于笔者进厂的身份是普工，工作时间必须在固定工位上工作，笔者能够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受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劳动过程和人机分工的情况，却较难对所在工位和生产线以外的情况有更深入地观察。从样本选择来看，选取 D 工厂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并非刻意选择，因为绝大多数企业并不会同意研究者在厂里进行长时间的调研。尽管本文以 D 工厂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但也辅以其他研究方法所得的资料加以佐证，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并非基于孤例。

四 机器霸权的建构过程

如前文所述，机器霸权是一套以自动化机器体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和管理体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管理体制，机器霸权的形成必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建构过程。本部分，笔者将分析机器霸权的建构，并将其归纳为三个过程：机器意识形态的打造；政策倾斜和资源汇集；机器对劳动过程的支配。以下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一）机器意识形态打造

“机器意识形态”一词首先由波斯曼（2019）提出，他借此批判人们对医疗技术设备的迷信以及对计算机技术的盲目崇拜。在本文中，“机器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对机器生产的盲目崇拜，相信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装备必然更高效、更保质、更稳定可靠、更安全。这套信念认为机器

不仅可以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占领市场高位，还能引领国家发展，在此基础上甚至发展出一种认为机器全方位优于工人的“机器神话”。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战略，这无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科学与唯科学主义却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如果说科学是一种基于实证研究和理性分析的综合性知识体系，那么唯科学主义则是一种相信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现象、也可以解决一切人类社会问题的信仰体系。它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权威，主宰人们对一切的认识和行为模式（波斯曼，2019）。机器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唯科学主义，相信只要借助机器的力量、只要机器足够先进，就可以解决生产中的一切问题，实现高质高产的生产目标。机器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人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机器本身的发明和生产凝聚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等的劳动，而机器的操作和使用维护也离不开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的劳动。

在中国，机器意识形态的萌芽最早出现在 2013 年，并于 2015 年达到顶峰。经检索发现，标题包含“机器换人”的报刊报道在 2012 年仅有两条，2013 年激增到 270 条，2014、2015 年更是爆发式增加至 606 条和 839 条，若包含资讯类网站的报道和转载，后两年的检索结果则多达每年数千条至近十万条。^①“机器换人”的话题在 2013 年主要出现在浙江省的地方日报以及一些以企业家为读者群的工商类、市场类报纸上，从 2014 年起开始蔓延至长三角、珠三角的媒体，随后更成为全国性主流媒体经常报道的对象。结合政策文件分析，“机器换人”是一项始于浙江省的区域性政策和实践，随后快速蔓延至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其他地区，2015 年后更成为全国性的政策实践。

在浏览了近千条关于“机器换人”的报道后，笔者发现这些见诸报端的关键词多为“减员增效”“提高生产率”“解放劳动力”“技术红利”“推动产业升级”“拉动投资”“必然趋势”，等等。绝大多数报道从正面积极阐述了“机器换人”在各方面的作用，仿佛只要机器“上马”，制造

① 若以“机器人”为标题关键词检索，报刊报道的数量自 2013 年起高达每年六七千条，网站覆盖数量则为每年近十万条。

业企业面临的各种发展瓶颈和挑战都能迎刃而解。只有极少数报道关注到“机器换人”可能带来的问题和潜在威胁，但这些为数不多的报道几乎淹没在一片叫好声中。其中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可能代表了企业主们的理性逻辑——《温州老板的精明账本：招千人不如花1亿元买机器》。该文通过两家企业的成功案例分析了“机器换人”的投入与产出，其结论是使用机器不仅节约了用人成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张文婷、章斐然，2015）。

如果说“划算”是企业主的基本理性逻辑（尽管可能是缺乏远见的），那还未形成一种机器意识形态。媒体对于机器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在于，它们只关注“机器换人”这一高度自动化的技术升级路线，而鲜少报道那些渐进型的、更注重劳动者的技能养成但同时收效缓慢的技术改造路线，这使得其他的技术选择未能进入大众视野，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机器成了技术升级的唯一选项。例如，媒体广泛宣传了东莞的首家“无人工厂”，尽管“无人工厂”实际只是一个车间，只适用于部分工序，且同样需要工人看管，但它可能迅速成为一种导向。又如，有报道宣称机器可以数十倍地提升生产效率，而实际上这只发生在个别行业的极个别工序，但这足以驱使很多中小企业哪怕贷款也要上机器。在夸大机器作用的同时，这些报道却甚少提到大规模引入机器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机器的调试和维护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产品品种或型号切换后机器的适用性；特殊工序自动化成本过高或难以自动化；等等。极具倾向性的媒体背后是代表这一技术选择的利益相关方——机器人制造商、自动化装备供应商等资本力量。他们为媒体提供了大量成功的案例和数据，并且常常作为访谈对象、专业人士出现在报道中。作为技术红利的受益者，他们也必然成为机器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和鼓吹者。

不仅是媒体，许多地方性政策也陷入了这种机器意识形态。事实上，关于制造业升级的全国性政策文件中并未明确提出“机器换人”的策略，但许多地方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却把智能制造的目标简化成了“机器换人”，因为直观而言，机器代表的是先进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工人代表的则是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广东省的一份规划文件公开明确地提出了若干指

标，如要求到2020年，机器人产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机器人数量达到100台/万人（广东省人民政府，2015a）。从实际完成情况来看，广东省的机器换人率远超预期，而这一成果又促使政府部门制定了新的目标——2021年出台的《“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要实现翻番，即接近500台/万人。如无意外，中国届时将成为全球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

当机器成为先进制造的代表时，“机器换人”成了一种“竞赛”，企业主通过竞赛比拼市场竞争力，地区之间通过竞赛比拼产业升级速度，国家则通过比较机器人的产量、销量、密度等数据比拼制造业发展水平。对于是否引入机器以及在多大范围内使用机器已经不仅仅是出于理性的计算和分析，对机器的狂热崇拜、对机器作用的夸大想象都成了“机器换人”热潮的背后推手。机器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关于“机器优越”的神话便开始主宰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关于何为发展、何为升级的想象。

（二）政策倾斜和资源汇集

在“机器神话”的宏大论述中，产业升级政策不断向“机器换人”式的技术路径倾斜，极大地加快了企业“换人”的步伐。率先通过政策倾斜推动“机器换人”的省份是浙江省，早在2013年，浙江省就提出五年内投入5000亿资金推动机器换人（仇锋平，2013）；广东省紧跟其后，计划在三年内投资9430亿元推动两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广东省人民政府，2015b）。

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有机会获得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政府在制定当地产业升级转型的规划时已决定重点扶持哪些产业，逐步淘汰另一些产业。^①由此，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使得资源逐步汇集到了与机器人研发及应用密切相关的行业，使得那些难以应用机器人的行业或是需要渐进式技术积累的企业在此浪潮中不断被排斥和边缘化。一些转型升级成本

^① 如广东省人民政府2015年制定的《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年）》就对各市重点发展的产业作出了指示。

过高或难以转型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例如制鞋业、服装业等，则在缺乏政府扶持和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不断外迁、内迁或关停。

在政策扶持和资源汇集下，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空前迅速。在“机器换人”的早期，大多数企业购置的机器设备多从国外进口，价格昂贵且后期维护不便。但随着资源的聚集，国内机器人制造商和集成商的发展势头如雨后春笋，国内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和其他机器设备价格不断下调，性能也不断提高，销量更是节节攀升。据笔者持续数年参观某大型自动化装备及工业机器人展览会了解到的情况，2018年售价为十几万元的国产工业机器人，到2020年价格已下降至不到5万元，个别制造商的产品甚至卖到了3万元左右；2019年时市场上的协作机器人主要为国外品牌，每台本体机价格即高达20多万元，到2020年时则已出现国产品牌的协作机器人，售价约为9万元/台。另有报告显示，工业机器人的成本回收期在2012年时为5.2年，2015年时已降至1.73年，到2020年时估计下降至0.77年（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机器人价格的下调使得“机器换人”的成本大大下降，也使得对机器的推崇不再停留在意识层面，机器开始大规模、全面地（不仅是试点）在大大小小的工厂里落地了。

政策的支持不仅在实施层面推动了机器意识形态的落地，也在认知层面进一步强化了“机器优越”的观念，从而巩固了“机器霸权”。由于政府和企业都以机器替代率、生产效率等作为技术评估的主要指标，而这些指标无疑可以获得大量正面的案例和数据，从而证明了这项技术选择的正确性和合理性。问题是：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是否经过了不同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群体的全面综合论证？技术的评价指标是否过于单一？技术对社会各个面向的影响是否被充分考察？很显然，经济指标之外的技术影响并未得到全面的考量和评价。

（三）劳动过程支配

机器霸权的最终建立还是要回归到劳动过程中，即资本通过机器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支配。当绝大多数企业选取了以自动化机器系统为中心的技术改造路径时，机器便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与此同时，工人在生产中需

要掌握的技能不断被机器取代，自主性逐渐丧失，而工人“去技能化”的结果又进一步加强了机器所享有的霸权。

对于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如何导致工人面临新一轮的“去技能化”以及资方如何借助新技术强化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笔者在以往文章中已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许怡、叶欣，2020）。此处主要讨论机器意识形态如何在生产过程中被转化成机器霸权。

一是管理层对机器与工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管理层的眼中，机器高效稳定且不带情绪，而工人却会犯错、偷懒、情绪化；机器是提质增效的动力，工人则是增加经济和管理成本的负担；机器若出现故障问题会被宽容，会被归结为是人的问题，是使用者没有调试好或者配合好机器，工人若犯错则是他们自身的能力问题或者主观态度问题。如何强化工人的服从？那就是想方设法将核心工作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上，让机器成为生产过程的主导和中心。这种核心工作和技能的转移也是劳动过程控制权的进一步转移，相对于泰勒制流水线的“概念”与“执行”分离（布雷弗曼，1979），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则是将分工中执行的部分也转移给了机器。

二是工人对机器霸权的接受。笔者发现，工人对机器的认知并非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有时候是不经思考地接纳了媒体所宣扬的那套“机器优越论”。比如，D工厂的工人被询问“觉得机器快还是工人快”时，他们大多数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机器快。如果笔者出示数据说明工人比机器更快，有些工人甚至会下意识地带入管理者的那套说辞——“工人做久了会累，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得就会慢；但机器就不会，机器是稳定的”。在其他工厂的访谈也显示，不少工人认同“机器承担了大部分的、最重要的劳动，而工人只是起辅助性作用”的说法。可见，在机器意识形态之下，工人也对自身的劳动价值产生了怀疑并且自我贬值。

但仅仅在意识层面认可机器还不够，资方还通过各种策略让工人主动或被迫接纳机器。一种情况是在自动化程度高、机器运行稳定的生产线上，工人的工作很轻松，甚至可有可无。例如，笔者调研了一家高度自动化的电子产品企业，其每条生产线只保留一个“开机员”的岗位，从事该岗位的开机员表示：“每天上班，只要把料放好，机器就自己做了……不

需要什么技术。”可有可无的主观感受让工人觉得自己的劳动完全附属于机器，并产生了“机器确实比人优越”的认知。另一种情况是工人被迫接受机器的支配。在一些人工辅助的半自动化生产线上，机器往往会加快工人的工作节奏、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也因此导致了工人和机器的冲突，只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工人的退让和被迫接受。笔者在调研中曾观察到一个例子：在一家生产办公椅的工厂里，管理层将后段工序的包装和搬运机器人的工作节拍设定得太快，给前段工序的工人带来一种强烈的赶工压力，有老工人偶尔破坏包装箱的外形使机器无法识别从而暂停运转。但这种夺回工作节奏掌控权的尝试很快被管理层识破，老工人被调离原岗位，原岗位由新工人接替。机器对工作节奏的掌控权再次被确立，工人不得不适应这样的节奏和强度，否则就只能离开。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管工人是主观上认可机器的优越性并臣服于机器，还是迫于管理层的权威、被动接受机器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者，机器霸权终究在生产车间中建立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机器霸权建构的三个过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先后顺序。尽管从逻辑上来说似乎有先有后，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机器对车间生产的掌控可以强化机器意识形态，政策的出台也可以强化机器意识形态，而机器意识形态的巩固又进一步促进了政策的倾斜并扩大车间的机器霸权。也正因此，如果有一个环节受到质疑或被打破，那么整个机器霸权也将受到挑战。

五 车间机器霸权的解构与再建构

（一）在具体生产场景中解构机器霸权

在产业升级的宏大话语中，中国制造业已经历了近十年的技术改造实践，机器生产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车间生产运作都获得了其霸权地位。然而，正如一些劳工学者所言，车间是一个劳资双方角逐的“战场”，霸权统治亦是一个开放性的、争夺性的历史过程（Edwards, 1979; Lee,

1998)。机器霸权亦不例外。在工人不断被机器排挤和替代的过程中，工人也在挑战着机器的权威和中心地位。本部分将围绕论述中常见的三个“机器迷思”，在具体的生产场景中解构所谓的“机器霸权”。这三个机器迷思分别是：①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快；②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品质更高；③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稳定。所谓“迷思”，代表的是一种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即相信机器必然在各方面比工人更优越。这种对机器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忽视了机器的不足，也贬低了人的劳动在生产中的重要性。

1. 解构机器迷思之一：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快

提高生产效率无疑是机器展示其优越性的主要方面。确实，许多证据表明，机器在生产制造的很多环节都可以发挥提效的作用。在广东省，过去十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近一倍（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编，2021）。这些证据也造就了一个机器迷思——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快。然而，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以及在不同的生产工序和工艺中，机器在生产效率上并不总是优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是机器与工人共同协作的结果。

笔者在 D 工厂的田野观察当中，比较了同一工序机器的生产效率和工人的生产效率，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熟练工人的生产效率和机器相当甚至比机器更高，而新手工人的生产效率则比机器低。由于 D 工厂运行中的自动化球片生产线有两条，A 产线生产六边形的 3 号小球片，B 产线生产 1 号、2 号大球片——其形状和面积相当于 4 块连在一起的小球片，因此笔者需要分别对不同产线、不同型号球片的特定工序进行比较。于是，笔者选取了折边工序和涂边胶工序进行观察和记录。这两道工序也是 D 工厂仅有的两道可供比较的工序，原因是大部分生产工序要么由机器完成，要么由工人完成，只有在产量要求较大的时候，管理者才会把原本由机器生产的工序分配给工人生产，从而增加产量。

第一道比较的工序为折边工序，即通过热压技术对球片各边进行压模定型。B 产线的折边工站加工一片 1 号球片的平均用时是 45 秒；而在另一处人工操作的非自动化机台上，工人加工一片 2 号球片的平均用时是 15

秒。工人加工球片的用时仅为机器的三分之一。惊讶于工人相较机器的效率之高，笔者询问了一位生产主管，得知两种型号的球片材质不同，压模时长有大约 5 秒的差异，而在扣除压模时长差异后，自动化机器生产仍需约 40 秒/片，比工人加工要慢得多。

第二道比较的工序是涂边胶工序，即为完成折边的球片各边涂上胶水。笔者记录和比较了机器、熟练工人以及新手工人工加工两种型号球片各自的生产效率。同样是 1 号球片，B 产线的边胶工站加工一片的平均用时为 17 秒；熟练工人加工一片的平均用时为 15 秒；对于新手工人工，其上岗头一个星期加工一片的平均用时为 34~60 秒——上岗前两天用时接近 1 分钟，几天后效率提升将近一倍，但仍低于机器和熟练工人。对于生产另一型号即 3 号球片的 A 产线，机器加工平均用时 8 秒/片，熟练工人平均用时 9 秒/片，新手工人工平均用时 25 秒/片。表 1 是对两个生产工序机器和工人生产效率的比较。

表 1 机器生产与工人生产用时比较

工序	自动化机器	工人	
		熟练工人	新手工人工
折边	1 号球片：45 秒/片 ^①	2 号球片：15 秒/片	— ^②
涂边胶	1 号球片：17 秒/片	1 号球片：15 秒/片	1 号球片：34~60 秒/片
	3 号球片：8 秒/片	3 号球片：9 秒/片	3 号球片：25 秒/片

注：①扣除材质区别导致的压模时长差异，机器用时仍需约 40 秒/片。

②由于折边工序的人工生产需要操作机台，因此管理者只安排熟练工人操作，不会安排新手工人工操作。

在 D 工厂中，除了可以直接比较机器与工人的生产效率，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说明机器生产并不总是比工人更快。例如，在笔者调研期间，A 产线的分拣工站已经停运多时。分拣工站位于生产线的最末端，其功能是将前段工序加工好的球片按照一定规律分拣摆放，最后再传送到拼球线。对于分拣工站停运的原因，D 工厂的设备工程师张工解释说，由于 3 号球是 32 片式的，分拣机器在抓取球片时速度跟不上，只能停运。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由两名工人进行人工分拣。A 产线出现的这个问题恐怕在产线设计

时就已经注定了，但要通过产线改造纠正这个缺陷所投入的成本是资方短期内不愿意承担的，于是通过灵活的、廉价的工人来弥补机器的缺陷成了权宜的选择。

对 D 工厂多个工序的观察比较至少可以说明，机器并非必然比工人更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由其生产工艺所决定，或是受加工材料特质的影响，又或是产线本身设计就存在问题。D 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足球相较于其他工业机器人应用广泛的行业产品，如电子电器、汽车汽配等，生产的材料和工艺差异较大：一是材料软，二是涉及多次刷胶，造成球片易粘连，这些都是机器生产的不利因素。事实上，不仅是 D 工厂的例子，一些其他证据也表明机器并不总是比工人快。笔者调研的一家齿轮生产企业曾进行过两个机器人实验项目，但比较后发现自动化产线的生产效率还没有人工产线高，自动化产线产量是 320 件/天，而非自动化产线产量是 400 多件/天。原因是他们公司产品“种类多、批量小”，产品切换后机器调试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有些种类的产品甚至无法用机器生产。对于产品多样化，或者使用的材料、工艺特殊的企业，机器效率反而更低的情况其实非常普遍。归根结底，工人在灵活性、适应性和能动性方面还是优于机器的。

既然机器生产未必比人工生产更快，那么许多企业主为什么还是要用机器来取代工人呢？笔者认为，企业主建立自动化产线有双重动机：一方面是为了减员以便管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力，从而获取更多的订单。虽然熟练工人的速度比机器快或者和机器相当，但是新手工人的速度则比机器慢多了。一旦人员流动率变高，过分依赖工人则会导致生产速度的不可控。另外，受机器意识形态的影响，机器人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在特定行业建立自动化产线也为企业带来了“行业先驱”“科技创新”等荣誉，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形象，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

2. 解构机器迷思之二：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品质更高

尽管普遍认为机器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人工生产更有保障，但实际上 D 工厂的情况恰恰相反。笔者通过与质检员的对话了解到，在自动化产线的折边和涂边胶工序中，机器生产的不良率比人工生产更高，原因仍然与足

球片材料的特性及生产工艺有关——球片材质偏软，影响机械手的抓取和摆放的准确度；涂胶后球片黏度高同样影响机器操作。质检员表示，机器生产的不良率是动态变化的，在设备调试好的时候，不良率较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不良率会变高（比如机器臂的末端沾上了过多的胶），这时候就要找设备工程师重新调试机器了。

为了验证机器生产不良品的情况，笔者曾特地在 A 产线的折边工站旁观察过该工站机器的运作，并记录下三种或导致不良品的失误情况：第一种是机械手抓取球片后没能准确地把它摆放在模具里，从而导致热压时把球片压坏，变成废品；第二种是传送带运来的球片有重叠，机械手无法抓取，需要工人暂停机器并将来料清走；第三种则是机械手漏抓，来不及抓取传送带上的球片，导致球片掉落，需要人工再次投料。笔者测算了折边机器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的报废量，15 分钟报废了 4 片球片；而工人通过人工操作机台完成的折边工序，几乎不会出现不良品。

自动化产线不仅在折边与涂边胶两个核心工序中容易生产不良品，在后端分拣工序中也经常出现差错。如前文所述，A 产线的分拣工站因其设计上的缺陷已被停用，经过改良的 B 产线分拣工站也被停用了一段时间。笔者询问 B 产线的组长和工人，他们都说因为觉得机器不好用，所以没有开。该分拣工站的一名女工反映说：“机器分拣拣得不好，胶涂得合不合格它分辨不了，拣完以后我还得人工再拣一遍。”这名女工提到的机器分拣不良的情况，指的是机械手目前的能力只能通过识别球片上的二维码，将球片抓取后按照设定的程序进行分拣。然而机器无法识别前段涂胶工序的合格情况，因此仍然需要工人用荧光检测笔照射球片胶面，用肉眼判断是否有断胶、漏涂等不合格情况。

通过上述观察和访谈可知，在 D 工厂的案例中，机器在折边、涂边胶、分拣三个工序中都比工人更容易生产出不良品。在实际生产当中，由于质检员只是定时巡检、抽检，而机器本身又无法识别不良品，机器生产的不良率并不能被完全统计，其生产的不良品也未必可以被完全筛查出来。如果没有后端分拣工人兼任质检工作，这些不良品将被传送到更后段的拼球工序，并由拼球线女工承担相应责任。数名拼球线女工均表示，在产品最后的全检阶

段如果发现不合格的球会找到负责拼球的工人——每个拼好的球上会贴上拼球工的编号，可以修补的就要修补，无法修补的则要罚款。“不管是折边的问题，还是涂胶的问题，上面（管理层）不管的，都是找我们（负责）。所以我们拼球的时候就要看下球片的折边好不好，不好的话就不要用。”

3. 解构机器迷思之三：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稳定

人们对于机器性能和运作都比工人更稳定的迷思常常来源于他们对机器作为一种人造器物的迷信。他们认为机器既不会感到疲劳，也不会产生情绪，更不会像人一样具有自由意志，因此认为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稳定。然而，在现实的生产场景当中，频繁的机器报警、或大或小的机器故障引发的生产线停顿才是自动化工厂的常态。

笔者在 D 工厂田野调查期间曾记录了多次生产线机器故障或报警，以下是其中的两段记录：

7月16日，B产线翻转工站，从16:50~17:20，30分钟内出现9次报警，包括停顿、卡料，不包括漏抓（漏抓后球片掉落到传送带下方，需要重新人工投放，但不会引起报警）。每次工人都要从背胶工站跨过产线的梯子过来处理，主要是看下有没有卡料，然后再按启动按钮。该工人负责看管两个工站，因此当他站在一个工站的时候，他需要时时留意另一个工站的报警指示灯。

7月23日，B产线的分拣工站早上运行了一会儿就因故暂停了，张工在检修，机器的操作界面上显示“存在寿命预警器件”，询问得知有一个灯源坏了。这边还没修好，组长又来叫张工去看另一边的点胶机，说是球片出现断胶，点胶嘴不出胶了，张工只好又跑去调试点胶机，所幸那边的故障比较快就处理好了。后来张工又得出外采购维修分拣机器所需的配件，只好让电工也来帮忙修理。直到中午吃饭时间，分拣工站的机器才修好。停工期间，一直由工人人工分拣，但是也不耽误生产进度。下午的时候，分拣工站虽然已经开始运作了，但是短时间内发生了多次异常，从14:20~14:35

的15分钟内，发生了10次异常，其中约有三四次报警，另外六七次则是未报警的失误：漏抓、卡料、摆放错位等，都是需要人工介入处理的。

由上述观察可见，自动化机器远不如人们想象的运行稳定。D工厂的证据显示，小到耽误一两分钟的常规化报警，大到耽误数小时的零部件故障，再到因生产线设计缺陷或加工材料特性导致的长期运行不良，机器的不稳定给生产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亚于工人因疲倦或偶尔情绪不满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在D工厂调研期间，笔者虽然不时听到工人对薪资待遇或管理方式有所抱怨，但这些不满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也并未因此影响生产。相对于机器，工人“情绪化、会怠工”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管理层的担忧和想象，而非经由比较得出的客观事实。

工人通过长期与自动化机器共事，不断地看清机器的各种不足和漏洞，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相对于机器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工人可以在机器产能不足的时候补足产能，甚至做得比机器更好更快；工人也可以协助处理机器生产过程中所遗留的各种问题，如处理卡料、帮机器捡漏、识别不良品；个别熟练工人甚至可以在机器运行过程中对机器进行即时调试，如擦掉多余的胶水、调整摆放不正等。尽管某些操作不符合安全生产规范，却显示出一种工人对机器的优越感——因为工人可以预知机器的运行轨迹，所以无须畏惧。而管理层对于这种违规操作持默许态度，因为如果每次卡料或小故障都要停机后再处理，生产速度将大大降低。

因此，笔者认为，受产品本身的特性、工艺要求以及自动化产线研发和运作的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机器生产并非总能在效率、品质和稳定性上优于人工生产，所谓的“机器神话”并不必然成立，机器生产只适用于特定产品类型、工序或工艺条件。

（二）资方对机器霸权的维护与再建构

在实际生产中，当工人自然而然地发现机器的漏洞并破解机器迷思后，工人重新看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他们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恢

复。然而，这与资方采取“机器换人”策略的初衷背道而驰。为了持续维护机器的霸权地位，管理层需要重新确立机器的权威及其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对 D 工厂的田野观察，笔者发现管理层采取了科学的改进方法以及强化管理权威两种方式维护机器的霸权。

如前文介绍，B 产线的分拣工站由于报警过于频繁及无法识别不良球片等问题，负责该工站的组长和看机员停止了分拣机器的运作，看机员采用人工分拣的方式保持该工序的正常运转，上级管理者在日常巡视的时候也默许了这种方式。如此，工人发挥了自主性以应对机器运行不良，生产的进度和质量得以保证，本应是好事。然而，当该厂的最大股东——李总来巡厂的时候，果断中止了这种工人“自由发挥”的工作方式。李总把现场的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训斥了一通，指责他们“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总是用‘土方法’解决问题”，并强调“不能让工人自行发挥想象”，“标准化作业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投入的机器全白费了”。

在李总的指示下，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尝试了多种“科学的改进方法”——提高烤箱温度、给机器涂抹防粘涂层、降低球片黏性等。在尝试了这些方法后，生产总监吴总反馈说：

翻转工站现在很少报警了，之前老报警是感应器的问题，已经做了调试，机身也做了清洁保养，涂上一层铁氟龙可以防止胶水粘上去。机器运行顺畅的话，这个岗位和投料的岗位可以合并，一个看机员就可以了……（针对球片太黏导致的机器报警）我们调高了烤箱的温度，由 65℃ 调至 70℃，让球片黏度没那么高了……机器就是这样，要不断去调试。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管理权威，避免工人发挥自主性，管理人员在机器上方加了一个显眼的提示牌，写着“禁止随意关机，有异常按灯通知组长”。如此，工人的自主性被剥夺了，工人只能依上级主管指示完成相应的工作，哪怕遇到容易解决的机器生产导致的问题，也无权自主处理。

在运用了科学的改进方法后，机器频繁报警的问题确实得到了缓解，

原本闲置的机器重新被启用。然而，机器的恢复运作并没有减少工人的工作量，也无益于提升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相反，机器的正常运行仍然处处依赖工人“土方法”的介入。例如，B产线的分拣工站仍然需要工人完成机器未能完成的工作，如人工分拣不良球片、未喷码及没有位置存储的球片，以及人工下料和添加料。折边工站和点胶工站的看机员的日常工作是在机械手运行的间隙伸手进入加工区以抚平球片、处理卡料。这种操作既不符合安全规范，也不符合管理层的“科学设定”，但是脱离了工人“土方法”的干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机器将无法正常运转。可见，所谓的“科学方法”和“土方法”之间未必存在一条客观的界线。科学的方法不过是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在生产中积累的知识与智慧转移到机器上面，以此来改良机器。但讽刺的是，来源于人的劳动价值的机器最后却被用于替换人的劳动。

另外，强化管理权威的方法虽然在短期内维护和再次确立了机器霸权，并且削弱了工人的自主性，贬低了工人的劳动价值，但是长期而言，车间里的机器霸权可能让企业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出于机器意识形态，高层管理者总是习惯把机器的故障和问题归咎于人，人成为机器缺陷的“背锅者”和“补锅者”，这种处理方式最终将反噬企业，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举例来说，在D工厂，因为机器故障导致生产延误等问题而挨训最多的是生产线的主管或组长。A产线主管小徐，入职两年多，从A产线投产之初就负责该产线。小徐告诉笔者，A产线刚上线的时候问题多，他天天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才能下班。工资是固定的，每月七千多，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在高强度高压力之下，小徐提出辞职。他说：“老板没有挽留我。现在产线顺了，只需要找一个组长来负责就可以，工资只要四五千。我走了老板还可以省些钱。”在小徐提出离职后，负责管理整个车间的吴总先后约谈了两名有经验的一线工人，想要提拔他们为组长，但都遭到了拒绝。以往的工厂研究通常反映基层工人晋升困难、晋升渠道太少，这也是导致工人流动率高的因素之一，但是D工厂的工人却拒绝晋升，这有悖常理。对此，小徐解释说：“他们都看得到（组长）这个活儿不好做，工资

也没有高多少。”笔者又找到了其中一名拒绝晋升的工人刘姐询问原因，她觉得做组长压力太大了承担不了，“我自己看机器，就知道这些机器是不是会出问题。看一台还好，要管一条线就顾不过来了。到时候产量做不出来，又要被老板叫去骂。每个月就多三五百元，不值得”。

不仅基层管理岗位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境，D工厂看机员岗位的流失率也非常高。在2020年2~7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B产线的看机员已经换了两拨，原因据说是工资待遇不高，工作内容单调，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事实上，在自动化产线投产之初，A产线的看机员岗位是有一定技能要求的，工人承担着“多能工”的角色——上下料、处理卡料、机器报警后的复位重启、球片的初步检测和摆放等。当时为了激发工人的积极性，管理层允诺给看机员发放岗位津贴，每人每月300~500元，这批享有岗位津贴的工人基本都留下来了。然而随着生产线运转逐渐稳定，后面入职的看机员不再享有此待遇，其薪资水平下降为普工标准，于是工人不断流失。遗憾的是，D工厂的管理逻辑仍然是机器优先，同时想方设法地削减岗位和节约用人成本。

六 结语：探索解构机器霸权的意义

在2016年南京召开的“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董事、中德智能制造研究院的负责人霍尔格·科尔博士对中国兴起的“机器换人”热潮发出提醒，他说：“发展智能制造，不能用机器来挤压人；人拥有最高智能，任何时候都不该被忽略。”他指出，德国20世纪80年代的“无人化工厂”设想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都要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机器为中心（颜芳，2016）。科尔博士的看法也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之一。遗憾的是，作为智能制造的德方专家，他的提醒似乎没有得到政府和企业界的足够重视——从后续几年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的销量来看，“机器换人”的热度有增无减。

本研究基于对数十家自动化工厂的一手调研资料和大量的文献分析，提出了“机器霸权”这一概念框架，并阐述了机器霸权的一般性建构过

程，以及解构此霸权的微观实践。机器霸权的一般性建构经由三个过程，即机器意识形态的打造、政策倾斜和资源汇集，以及机器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机器霸权的建构过程体现了在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的特定情境下机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属性如何被塑造。但霸权式治理的特点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争夺性的历史过程，存在反霸权和被解构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通过一个工厂案例，在具体的生产场景中发现和解构了三个机器迷思，即“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快”“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品质更高”，以及“机器生产必然比人工生产更稳定”。借此，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破除了“机器必然比人更优越”的迷思，挑战了机器的霸权地位和千篇一律的“机器换人”式的技术改造路径。

本文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机器换人”式的技术升级路径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试图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还原这一技术选择的建构过程并对其进行解构。剖析机器霸权的建构过程是为了揭示技术的选择是一个社会进程，但它并非中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在这个进程中争夺着对技术的控制权。但这还不够，只有对其进行解构，才有可能打破机器霸权、澄清机器迷思、消除机器意识形态。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意义上的尝试。

本文认为，解构机器霸权的意义可以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对于企业的意义。企业应该意识到，对机器和技术的盲目崇拜并不总能提升效率和改善产品品质，提质增效往往是人与机器共同努力、相互配合的结果；尊重劳动者，提升其技能水平、改善其劳动待遇、充分发挥其能动性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其次是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意义。政策对于技术选择的方向和最后落地起着极大的作用，然而目前大多数政策考虑的只是技术的经济效益，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影响。技术对劳动者的就业、收入、技能等各方面的影响，以及更广泛的对于劳动力的迁移、家庭消费能力、劳资关系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影响均应被评估并纳入考量。除此以外，产业政策的制定应该有相关社会群体的代表参与，工会、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均应参与其中，而非仅由科技、经贸或工信等部门主导，这些部门也应该充分聆听相关社会群体的声音。未来的技术扶持政策，应该指

向“以人为中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协作”，以及可实现技术与社会双重升级的技术选择。最后是对工人的意义。目前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缺乏有效的工人代表机制，在此情况下，如果工人能够看到机器的局限与不足，则可能从个体层面尝试把机器的不足转化为自己的议价能力，例如要求涨薪；同时，这也有利于激励工人提升其技能水平，重拾在工作中的主体性。然而，这些个体层面的行动尽管并非无益，却难以对企业的技术选择产生影响。只有当工人群体的组织基础和代表机制变得更强大、更有效时，才有可能把对机器霸权的解构真正转化为集体的议价能力，也有可能对技术改造的方向和方法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奥·葛兰西，2000，《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安东尼奥·葛兰西，2008，《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
- 卡尔·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 程红、陈文津、李唐，2018，《机器人在中国：现状、未来与影响》，《宏观质量研究》第6卷第3期，第1~21页。
- 戴维·诺布尔，2007，《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邓韵雪，2023，《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二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广东省人民政府，2015a，《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年）》，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44/post_144148.html#7。
- 广东省人民政府，2015b，《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43/post_143801.html#7。
- 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编，《广东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
- 哈里·布雷弗曼，1979，《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张伯健校，商务印书馆。
- 黄瑜，2020，《当农民工遭遇“机器换人”——技术与劳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米歇尔·福柯，2003，《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尼尔·波斯曼，2019，《技术垄断》，中信出版集团。
- 前瞻产业研究院，2020，《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发展驱动因素分析：新旧动能转换期、数字经济及全网时代》，<https://bg.qianzhan.com/trends/detail/506/200120-8fb33c0e.html>。
- 仇锋平，2013，《浙江拟5000亿实施“机器换人”》，《东方早报》11月7日。



- 许怡、叶欣，2020，《技术升级劳动降级？——基于三家“机器换人”工厂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第23~46页。
- 颜芳，2016，《工业升级不是“机器换人”》，《新华日报》12月18日。
- 张文婷、章斐然，2015，《温州老板的精明账本：招千人不如花1亿元买机器》，<http://finance.people.com.cn/money/n/2015/0504/c42877-26940773.html>。
- Bijker, Wiebe. 2010. “How is Technology Made?—That is the Ques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4, 63–76.
- Burawoy, Michael.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Verso.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IF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2017. “Robots: China breaks historic records in automation.”<https://ifr.org/news/robots-china-breaks-historic-records-in-automation/>.
- IFR. 2022. “China overtakes USA in robot density.”<https://ifr.org/ifr-press-releases/news/china-overtakes-usa-in-robot-density>.
- Lee, Ching kwan.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cKenzie, Donald and Judy Wajcman. 1995. “Introductory Essay: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pp. 2 – 25 in 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ed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feiffer, Sabine. 2017. “Industrie 4.0 in the Making—Discourse Patterns and the Rise of Digital Despotism.” pp. 21 – 41 in Kendra Briken, Shiona Chillias, Martin Krzywdzinski, Abigail Marks (eds). *The New Digital Workplace: How New Technologies Revolutionize Wor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ewell, Graham. 1998. “The Discipline of Teams: The Control of Team-Based Industrial Work through Electronic and Peer Surveilla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3(2), 397–428.

数字时代的劳动监控：基于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

邓韵雪*

摘要：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数据的生产、收集、集成和分析成为劳动监控的关键环节。基于对四家工厂的案例研究，本文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劳动监控的影响。本文发现，智能摄像头、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已经成为资方监控劳动者的新方式，并推动了数字驱动的劳动监控的兴起。本文分析了工厂中的员工活动监控、生产过程监控和算法监控的主要方式，并指出数字驱动的劳动监控呈现三个新的特点：第一，监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方通过生产数据和劳动者个人数据的生成、流通、集成和分析自动化，使得劳动监控更为全面、持续、精准；第二，数字化劳动监控突破了工作场所和劳动过程的范围，使得劳动监控的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第三，在监控的技术方面，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运行关键在于塑造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全能性的想象。但是，一些工人积极通过日常抵抗的方式削弱了数字化劳动监控的有效性。本文认为，在数字化劳动监控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重视对工人数字权利的保护。

关键词：数字技术 劳动监控 智能制造 数字权利

一 前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被加速应用于制造业的工作场所中。2022年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试点示范类项目超过1500个，工业App数量达到28.32万个（张辛欣，2022）。随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 邓韵雪，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制造业‘机器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及干预机制研究”（19CSH045）的资助。

数字技术日益被运用于劳动监控领域，对劳资权力关系造成了重要影响（Warin and McCann, 2018）。

劳动监控是指管理层实时监控、记录和跟踪员工绩效、行为和个人特征的行为（Ball, 201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场所中的劳动监控是资方在劳动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Lyon, 1993）。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监控的主要方式经历了从“具身的监控”（embodied surveillance）到“技术驱动的监控”（technology-driven surveillance）的转型（Lyon, 2003）。在早期的劳动监控中，主要是由工厂主、管理人员、工头等对劳动者进行直接观察、测量和记录。例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福特就通过计时器记录工人完成生产动作的时间，以提高生产效率；他甚至雇用了专职人员调查员工在厂外的私人生活，以发现可能干扰其工作表现的个人问题（Ajunwa et al., 2017）。随着电子摄像头、远程监控体系、计算机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资方在工作场所中的监控能力获得了突破性的提升，监控的范围、程度和有效性大幅拓展。技术驱动的监控使得资方可以获得大量关于生产过程和工人个人的信息，从而加强对工人日常工作的直接监督，更及时精确地测量工人的生产绩效，更严密地考核其是否遵守标准操作流程（Frenkel et al., 1998；姚建华, 2021）。

随着物联网、人脸识别摄像头、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工厂中劳动监控的方式和逻辑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但是，现有关于中国技术升级与劳动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对劳动者就业、技能水平、议价能力的影响（Huang and Sharif, 2017；Sharif and Huang, 2019；许怡、叶欣, 2020），较少关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劳动监控的影响。因此，一些重要的问题尚没有得到深入探讨。例如，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监控呈现怎样的特点与发展趋势？数字驱动的劳动监控对劳动者造成了哪些影响？劳动者的抗争方式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主要基于四个工厂的案例研究，分析数字驱动的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和特点，并讨论劳动者应对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行动策略。

二 文献回顾

(一) 监控理论：全景敞视主义与后全景敞视主义

关于监控的研究主要受福柯对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研究的影响（Thompson, 2003）。全景敞视监狱是由边沁提出的一种可以实行自动化监控的建设原则和空间策略。该建筑物包括一个位于中心的哨塔，以及以其为圆心的一圈牢房。牢房之间彼此分隔，每间牢房都有一扇面向哨塔的窗户。米歇尔·福柯（2003）指出，这种空间设计导致了监视者和囚犯间的“不对称的注视”（asymmetrical gaze）：监视者可以从哨塔中随时观察囚犯的饮食起居、一言一行，而囚犯却无法看到监视者的行为。这种不对称的注视创造了不确定性，即囚犯虽然知道自己处于监控之下，但又不确定监视者是否正在注视他。为了避免言行被惩罚，囚犯内化了监视者的目光，并通过观察自己、调整自己的行为参与到对自身的监视中。在此基础上，福柯（2003）进一步分析了学校、军营、医院和工厂的运作机制，展现了权力如何通过全景监控塑造了驯服和具有生产力的现代主体。总体而言，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核心机制是利用空间技术制造注视和知识的不对等，以实现监控的自动化和可持续化，从而塑造自我规训的主体。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主要基于对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监控机制的分析。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等通信信息技术的发展，监控模式开始出现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当代社会中监控机制的转型，并建构了后全景敞视主义（post-panopticism）的理论框架（Wood, 2010; Brivot and Gendron, 2011; Clarke, 1988; 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 Deleuze, 1992）。研究认为，与全景敞视监控相比，后全景敞视的监控机制呈现一系列显著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监控技术方面，全景敞视的监控权力主要通过对空间的封闭、分割、塑造可见性程度等实现对主体的管控与塑造，而在当代社会中，监控

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空间设计，而主要基于对个人行为的数据痕迹的追踪和掌握（Clarke, 1988; Zuboff, 2019）。例如，罗杰·克拉克（Clarke, 1988）提出了数字监控（dataveillance）的概念，认为后全景敞视监控主要基于对海量数字信息的识别、收集和分析，从而管理和影响主体行为。第二，在监控的权力结构方面，全景敞视主义强调监控权力的中心性，监控主要表现为等级式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注视，而在当代社会中，监控权力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主要呈现“根茎状”（rhizomatic）结构^①，监控权力具有非等级化、分散和灵活的特点（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第三，在监控对象方面，全景敞视监控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身体，重点是通过规训权力的运作对身体进行调节和矫正，而后全景敞视监控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去肉身化的数字化个体（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或个人行为的数据痕迹（Zuboff, 2019）。例如，凯文·哈格蒂和理查德·埃里克森提出了监控组装（surveillance assemblage）的概念（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他们认为，当今社会的监控机制的运作逻辑是先把身体从具体的物理属地和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将身体分割、转化为数据流，然后再将碎片化的数据流在不同的计算中心（如金融机构、购物中心、警察局）中重新组装。监控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方便移动和测量的“数字替身”（digital doubles）^②，以便对个人行为进行预测、诱导和调节（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第四，在监控权力与主体的互动关系方面，全景敞视主义强调监控是全能

① 凯文·哈格蒂和理查德·埃里克森的研究提出了“监控组装”的概念，指出当代监控的特点之一是监视网络中存在多种不同的监视技术和实践（如社交媒体监视、全球定位系统、电子监控摄像头等）。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是中心化的，而是呈现分散、非层次化的特点，类似于植物多分枝的根茎。不同的监控技术收集的离散数据流可以在不同的时空情境被组合起来，从而使得监控网络更具灵活性，以适应不同情况的监控需要。因此，他们提出了监控权力的根茎状结构的比喻。（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

② 在凯文·哈格蒂和理查德·埃里克森的研究中，“数字替身”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对个人的碎片化信息和行为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和分析，从而创建关于个人的虚拟数字形象。通过生成数字替身，监视机构可以在个人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对个人行为进行模拟、预测和操纵。例如，当一名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平台浏览和购买商品时，该消费者的购物时间、购买的商品、浏览记录等数据可能被平台进行汇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购物平台可以创建关于该消费者的数字替身，从而更好地掌握其个人特点、购物习惯、消费喜好和行为模式等。网络购物平台可以进一步基于数字替身预测消费者未来的购买行为，从而开展更精准的广告推送和个性化的营销服务。（Haggerty and Ericson, 2000）

的、无处不在的，个人难以逃离监控，因此不得不内化观察者的目光并参与到对自身的监控中，而后全景敞视监控理论强调，虽然监控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但并不是全能的，主体有资源和能力对监控体系进行操纵和利用（例如，Bain and Taylor, 2000）。此外，被监控主体的行动策略更加多元、复杂，不是简单地服从和默许监控，而是积极地渗透、抵抗，甚至积极利用监控体系，从而塑造了监控机制的运作（Timmons, 2003；韩炳哲，2019）。因此，监控系统不能只被视为资方强制或者技术进步的产物，而应该从具体的权力关系中进行理解，并分析多元行动者在塑造监控系统中的角色和互动（Sewell and Wilkinson, 1992；Marx, 2016）。

全景敞视主义和后全景敞视主义的监控理论对于劳动监控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全景敞视主义与后全景敞视主义之间虽然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并不是对立或割裂的关系。在现实的监控情境中，往往存在二者的交织与融合，因此需要具体分析监控技术背后的运行逻辑和权力机制。一些学者将上述理论的成果应用于劳动监控的分析，重点分析了技术变迁背景下劳动监控的性质的转变与新形态。

（二）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应用，一些前沿研究分析了资方运用新技术开展劳动监控的实践、劳动者对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的看法和行动策略，以及围绕劳动监控展开的权力博弈。其主要研究内容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研究分析了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如何影响了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的运作，特别是法律制度、国家政策框架、工会和集体谈判制度等对劳动监控模式的影响（Payne et al., 2023；Bernhardt et al., 2023；Krzywdzinski et al., 2023）。其中，乔纳森·佩恩等学者（Payne et al., 2023）对比了英国和挪威的零售业中数字化劳动监控的情况，发现挪威更有效地限制了资方在工作场所应用数字技术。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挪威有更强有力的保障劳动者数字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法律制度，这使得工人和工会有更强的“制度性力量”（institutional power）。因此，即使在工人的结构

性力量比较薄弱的行业中，工会也能通过动员法律等制度削弱资方应用数字化监控的能力。而在英国，由于法律保护比较薄弱，工人更多地依靠结社性力量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但是，在一些工会组织比较薄弱的超市中，工人就很难与资方就数字技术的应用开展博弈。此外，马丁·克日夫津斯基等学者（Krzywdzinski et al.，2023）的研究指出，由于德国工会和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相对均衡，德国采用了“统合主义”（corporatism）的模式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统合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工会参与了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还参与了人工智能的行业标准的制定。此外，根据德国劳动法律的有关规定，在引入和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时，资方必须咨询工会并与其进行协商，而且用于监测工作表现和工人行为的技术系统必须经由劳方和资方共同审查和决定。在塑造技术形态的过程中，德国工作委员会和工会建构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human-centered AI）的理念，强调人工智能技术的首要目的是促进人的福祉和尊严，并在人工智能的设计、规范、应用等过程中有效地保障了工人权益。因此，这些研究认为，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实践是嵌入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并受到法律、劳动关系等制度的制约。

第二，一些学者基于工厂案例研究，重点分析了工作场所中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监控的运作机制及特征（Zuboff，1988；Sewell and Wilkinson，1992）。其中，肖莎娜·祖博夫（Zuboff，1988）基于对美国工厂的分析，提出了“信息化的全景敞视监狱”（information panopticon）的比喻，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强化了资方收集、记录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从而加强了劳动监控。她指出，一方面，在智能工厂中，资方对“信息”的掌握构成了劳动监控的核心。资方通过运用计算机自动测量和记录工人的生产活动，使得工人的工作表现被量化为客观的数据，并实时展示给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系统如同一个“单面镜”，可以让资方随时随地观察工人生产活动的情况，还可以对工人的工作效率进行比较和排名，并纠正工人违反标准生产流程的行为。由于资方可以实时了解工人的生产情况，使得工人不得不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得劳动监控内化了。但另一方面，祖博夫认为，为了让这套信息化管理系统发挥效果，需要让工人能

够查看和理解有关生产的数据，以进一步提高其工作表现（Zuboff, 1988: 356），从而为工人操纵和利用数据创造了空间（Zuboff, 1988: 351）。此外，格雷厄姆·苏埃尔和巴里·威尔金森（Sewell and Wilkinson, 1992）也分析了信息技术对工厂中劳动监控的影响，并提出了“电子化的全景敞视监狱”（electronic panopticon）的概念。他们的研究强调，除了管理者对员工的纵向监控之外，资方运用电子信息系统建构了生产小组内部的横向监控。通过电子信息系统，资方可以公开展示各生产小组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出勤信息，促使小组内部进行横向监控，加强工作小组各成员的互相观察和自我规训。与传统的全景敞视监视不同，权力的运作不是制造被观察者之间的彼此隔离，而是促成他们之间的连接和信息交流，通过测量、排名、组间竞争等策略推动劳动者间的相互竞争。因此，在电子监控系统中，工人处于电子眼的纵向监控和同事的横向监控的双重压力下，从而推动工人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训。

第三，一些研究分析了工会等工人集体组织限制和调节技术驱动的劳动监视的行动策略（Payne et al., 2023; Lloyd et al., 2022; Cirillo et al., 2020）。研究指出，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工会提出了新的挑战，资方往往通过不召开协商会议、不通知工会代表等形式拒绝工会参与关于技术改造的决策（Payne et al., 2023）。但是，工会通过塑造内部团结、积极运用集体谈判制度、动员社会力量的支持等策略，有效地影响了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方式、时空等，保护了工人的数字权利和隐私权。例如，卡洛琳·劳埃德等学者（Lloyd et al., 2022）基于对英国和挪威食品和饮料加工业的研究发现，虽然英国的法律对于劳动者数字权利的保护比较薄弱，但一些工会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成功地限制了资方在工作场所中监控工人的做法。例如，在一家饮料加工工厂，工会要求资方在安装摄像头时，必须与工会签订协议，列出所有摄像头的清单，并限制摄像头安放的位置和拍摄的内容；工会还规定，资方在调看摄像头拍摄的内容时，必须有工会代表在场。西里洛·瓦莱里娅等学者（Cirillo et al., 2020）对意大利汽车制造业工厂的研究发现，工会成功地通过签订集体合同的方式限制技术监控的使用范围，规定工业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系统)不能用于采集劳动者个人的工作速度和生产绩效数据,也不能用于对工人的纪律处分。此外,乔纳森·佩恩等学者(Payne et al., 2023)的研究发现,挪威工会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公开“点名并指责”滥用数字技术监控劳动者的公司。由于挪威的消费者比较关注劳动者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因此这一策略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四,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劳动者个人对技术驱动的监控体系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他们影响和塑造监控体系的多样化的行动策略(Anteby and Chan, 2018; Bain and Taylor, 2000; Brivot and Gendron, 2011)。米歇尔·安特比和柯蒂斯·陈(Anteby and Chan, 2018)分析了美国机场安检工作中的技术监控与个人化的抗争策略。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安检员工将技术监控视为资方强制的管理策略时,不是简单地内化监视的目光,而是会尽量逃避监控(如借上厕所离开工作岗位),但员工的逃避策略也会促使资方进一步增强技术监控。彼得·贝恩和菲尔·泰勒(Bain and Taylor, 2000)基于对英国客户服务中心的研究,强调了工人的集体抗争在塑造技术监控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认为,电子全景敞视监狱的隐喻夸大了技术监控的有效性,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技术监视并不是全能的、无法逃避的,而是存在诸多权力的间隙,为工人的日常抗争提供了空间。此外,研究发现,除了抵抗劳动监控的策略外,劳动者还会通过自我展示、监控他人等方式主动参与到劳动监控的建构中。例如,马里恩·布里沃和伊夫·根德龙(Brivot and Gendron, 2011)基于对法国巴黎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民族志研究,呈现了劳动者建构技术监控网络的复杂图景。他们的研究发现,资方应用了电脑信息管理系统来呈现律师的工作成果,其本意是加强对工作质量的监控。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律师一方面通过主动展现和暴露有利于自己的工作信息来建构自身的可见性,从而影响他人对自身工作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积极审查其他律师(包括级别更高的律师)的工作成果,从而形成横向监控和自下而上的监控。在这一情境中,劳动监控不是简单地体现了资方的意图,而是被塑造为建构可见性和监视他人的游戏。

在国内研究方面,一些前沿研究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监控的

新特征，分析重点是网约车、外卖、快递等服务业平台经济中的算法监控（冯向楠、詹婧，2019；庄家炽，2019；陈龙，2020，2022；韩文龙、王凯军，2021；Huang，2021）。这些研究认为，基于数据收集、互联与分析的劳动监控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劳动控制的基本特征之一，对平台工人的自主性与劳动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冯向楠、詹婧（2019）的研究指出，外卖平台通过智能手机、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可以对骑手的位置、送餐路线和工作进度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基于算法派送订单、增加劳动强度、加强劳动控制。陈龙（2020）分析了外卖行业中的“数字控制”，指出平台系统通过收集骑手的运动轨迹和运动状态等数据，将骑手转变为数据生产者，并通过分析算法组织和调节骑手的劳动过程，从而强化劳动秩序、降低骑手的工作自主性。韩文龙、王凯军（2021）的研究指出，外卖平台通过将骑手的行动路线等信息实时传递给消费者，实行算法与消费者的共同监督，从而将消费者转变成劳动监控的主体。庄家炽（2019）对平台企业快递员的研究发现，资方通过包裹上的条形码和信息监控系统加强了对工人的劳动管控和工作追查。

国内研究也生动地展现了平台工人如何反过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抗争，挑战资方的算法监控（Chen，2018；孙萍，2019；Lei，2021；Liu and Friedman，2021）。这些研究指出，平台工人通过积累有关算法的知识和经验、动员社会关系、形成在线集体组织等方式对抗数字化劳动监控，提高劳动报酬和权益。其中，陈羽洁（Chen，2018）对网约车平台的研究指出，司机会采取“算法行动主义”的策略。例如，她通过调查数据发现，约40%的网约车司机在手机里安装抢单软件，或者在多个手机设备上注册车辆，以绕过平台企业的算法监控，争取回报更高的订单。与此类似，孙萍（2019）的研究发现，外卖骑手会采取“逆算法”的劳动实践，如通过与店家合作下虚假订单以获得平台的奖金，或与其他骑手私下进行转单来逃避算法的时间监控。

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技术如何形塑劳动监控和劳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维度。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现有关于技术进步与劳动监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由于中国的资方-国家-劳工-技术关系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新技术对中国劳动监控模式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其次，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新兴的服务业平台经济企业，较少关注传统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监控的影响。考虑到制造业工厂的工作组织、劳动过程等与外卖、网约车、快递等服务行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两种产业中劳动监控的异同。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主要分析中国智能工厂中，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了劳动监控的模式，以及工人针对数字化劳动监控的抗争方式。

三 研究方法

2018年7月至2023年1月，笔者在广东省和湖南省对超过50家制造业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参观了企业的生产车间，并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在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4家工厂进行案例研究。选取这4家工厂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在制造业中属于数字化转型比较深入的企业，已经应用了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其中3家企业被政府或行业协会评选为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工厂。因此，这4家企业为我们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劳动监控的影响提供了窗口。笔者在这4家工厂中共收集了48个深入访谈案例，访谈对象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针对管理人员，访谈的重点主要是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因、现状，数字化转型对生产过程、员工管理、劳动关系的影响。针对专业技术人员，访谈的重点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遇到的困难，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针对普通员工，访谈的主要内容是数字化转型对工人技能、劳动体验、劳资互动的影响，以及员工关于数字技术驱动的劳动监控的看法。以下对4家工厂应用数字技术的情况做简要介绍。

A工厂是一家位于长沙市的机械装备制造业工厂，共有员工约500人。A工厂所属企业为上市公司，该工厂从2016年开始推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并自主研发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到2018年，该工厂基本实现了数字化转

型，并于2022年被评为全球“灯塔工厂”^①之一，属于数字化转型的全球标杆企业。在被调研的4家企业中，A工厂的数字化程度最高，应用了智能摄像头、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

B工厂是一家位于汕头市的玩具制造业工厂，所属企业为上市公司，共有员工496人。该工厂从2016年开始推行数字化升级，2017年成为智能工厂，是粤东的智能制造样板工厂。该工厂应用了工业物联网和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后者主要包括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ERP系统）和制造执行系统（MES系统）等。

C工厂位于深圳市，是一家汽车电子制造业工厂。该工厂是汽车配件行业的二级供应商，共有员工约170人，主要生产汽车点火模块、传感器、微电机控制器等产品。该工厂从2017年开始推行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应用了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包括ERP系统、MES系统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System，PLM系统）等。

D工厂位于深圳市，是一家电子制造业工厂，全厂约1100人，主要产品是键盘、鼠标等。D工厂所属企业为上市公司，该工厂从2012年开始探索数字化转型，2015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第一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厂。该工厂主要应用了人脸识别摄像头、物联网和工业信息管理系统（ERP系统、MES系统）等数字技术。

四 数字化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与特征

根据对智能工厂的实地调研情况，本部分将重点分析资方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实施劳动监控，主要介绍智能摄像头、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技术在建构员工活动监控、生产过程监控、算法监控方面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智能工厂中数字化劳动监控的主要特征。

^① “灯塔工厂”项目由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发起，目的是在全球寻找制造业工厂数字化转型的标杆。截至2022年，全球共有90家工厂入选，其中31家位于中国。

（一）智能工厂中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

1. 智能摄像头与员工活动监控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摄像头日益成为资方增强对员工的活动监控、提高劳动者可见度的新方式。据咨询公司 IHS Markit (2019) 的报告，到 2022 年，全球新生产的网络摄像头中，有 50% 将配备深度学习功能，能对被拍摄的物体进行识别和分类。基于机器视觉的监控系统日益被应用于分析工作场所摄像头捕捉的实时视频。

智能摄像头通过结合人脸识别技术和行为分析系统，使得资方可以对员工活动进行自动化的观察、记录和分析。以笔者调查的 A 工厂为例，该工厂共安装了 300 多个智能摄像头，实现了对生产车间的监控视频全覆盖。这些智能摄像头具备人脸识别和行为识别功能，能自动识别员工的一些“异常行为”，如工作时间看手机、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违规摆放物料、不按规定着装等。因此，与传统的电子摄像头相比，该工厂的智能摄像头不仅能记录和观察工人的行为，而且能识别工人的脸和身份、判断工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违规行为的范畴。例如，如果一名工人在工作时玩手机，智能摄像头会自动识别工人的违规行为，然后抓拍人脸，识别其身份，并把照片作为证据上报给信息管理系统，之后管理人员会根据系统记录和证据对工人做出扣除绩效的惩罚^①。系统会自动保存员工违规的有关记录，包括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发生时间和持续时间、抓拍的照片等，如果工人对惩罚有异议，管理人员还可以调取视频和抓拍的照片作为证据。

与传统的电子摄像头相比，智能摄像头不仅制造了“持续的凝视”，而且通过对工人行为的自动识别、分类、判断，实现了“行为即数据”的转变，使工人在工厂空间中自动变成了数据生产者。此外，智能摄像头取代了管理者的部分监视职能，可以自动地对工人实施持续的、具有认知和判断功能的监视。

^① 据 A 工厂的工人介绍，如果在厂区内违规玩手机，每被抓拍一次会被罚款 200 元，罚款会直接从工资中扣除。

2. 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与生产过程监控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是实现工业 4.0（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之一。通过将传感器、机器设备、产品和系统等连接到互联网，物联网可以实现对物体的实时数据采集和交换，使得物与物、人与物之间可以进行数据的互联互通。中国互联网协会（2021）的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1.7 万亿元。在应用物联网的基础上，制造业企业开始应用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对物联网收集的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和管理。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 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ES 系统）、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 系统）等。以制造执行系统为例，根据 IDC 公司的报告，2021 年中国该软件系统的市场达到 38.1 亿元，年增长率为 23.3%（IDC，2022）。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增强企业对人力、物力、设备、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数字化管理，增强资方对生产、销售、客服等经营环节的信息掌控能力。

物联网的应用使得资方可以进一步对生产过程进行数据化改造，实现海量、细颗粒的生产数据的生成和上传，从而可以对工人的生产表现进行实时测量和掌握。A 工厂的一名经理介绍，该工厂有 1540 个传感器和 200 多台机器人，每天产生的数据量超过 30TB。通过物联网技术，资方可以掌握每台关键设备的实时工作状况，如机器正在运行的订单、开机率、故障率、电流电压数据等。物联网的应用显著地提高了资方的数据采集能力，使得物品的生产过程被转变为虚拟的数据生成过程，实现了“生产即数据”。物联网使得资方可以直接获得关于机器运作和生产情况的大量数据，从而增强资方对工作环境和工人工作表现的监控。

物联网和工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应用推动了劳动监控从在场监控到远程监控的转型。例如，制造执行系统（MES 系统）可以监控、追踪、记录产品的制造流程的情况，以提高生产过程的协调性和效率，加强质量控制。管理者不用前往生产车间，只要登录该系统，就可以了解生产情况的实时数据。B 工厂的一名管理人员介绍道：

通过 MES 系统，就是我坐在办公室，我可以看到每一台设备的生

产状态，我点每一台设备我都知道当前生产什么机型、它的过程不良率，以及过程中的成品直通率、不良率或者是生产效率，甚至是哪个员工在这个线体操作，全部在系统上可以查得到。（访谈，20180910）

当笔者在办公室访谈这名管理人员时，他就现场演示了该系统。笔者在田野笔记中写道：

他在系统中随机点开了一个生产部门的监控画面，我通过电子画面能清晰地看到一名工人正在向一台注塑机器中投入原料，工人在画面中被用绿色的画框标记，而机器和物料分别用红色和蓝色的画框标记，这表明系统能够对监测对象的类型进行识别和分类。在监控画面中，还可以局部放大一台机器或者一名工人，观察设备和工人工作的细节。（田野笔记，20180910）

远程监控系统极大地降低了管理者视察生产情况的成本和难度。任何登录该系统的人员都可以进行实时监控（real-time surveillance），了解整个生产系统中每台机器、每名工人的工作进度和实时生产情况，这使得现场工人不仅可能受到基层管理人员的注视，而且可能受到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注视，因此提高了工人和生产过程在资方眼中的可见性。用B工厂管理人员的话说，就是“董事长坐在办公室，就可以了解所有设备生产的情况”（访谈，20180910）。

此外，通过物联网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系统），资方可以将劳动者的个人信息与产品信息进行绑定，从而建立劳动者对产品质量的长期责任制度，实现“回溯监控”（backtrack surveillance）。C工厂主要生产汽车的电子产品，该工厂采用了物联网和PLM系统，每个产品上都会标记一个二维码，要求每个工序的工人在加工产品时，扫描该二维码，以记录工人的工号、加工程序等信息。C工厂的一名管理人员说道：

我们每个产品有一个唯一的二维码，可进行追溯，也就是说这个产

品发到外面去以后，三年、五年出现问题以后，还可以把那个二维码告诉我，我还可以追溯，当时的生产情况、哪个操作员、用的是哪一批的物料、用的是什么样的工艺都是可以追溯的。（访谈，20180907）

据该管理人员解释，该系统的作用之一是加强劳动者的个人责任，万一不合格的产品造成安全事故，还可以追踪其生产责任。通过将工人的个人信息与产品信息绑定，该工厂促使工人确保产品质量，并为自己生产的工序负责。工人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数字劳动，实际上也参与到了对自己的数字化监控中。

3. 工业互联网与算法监控

在大量收集和占有数据的基础上，资方还会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大数据进行互联和分析，从而为决策和管理提供依据。祖博夫（Zuboff, 1988）的研究展示了资方如何通过运用计算机记录的数据分析工人的生产效率、检查工人是否遵守了标准作业流程。但是，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还难以实现数据之间的互联互动以及对海量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而随着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发展，资方对于海量生产数据的集成和分析的能力大为增强。工业互联网不仅包括物联网技术，还涵盖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多种数字技术的应用（Li et al., 2017；邵占鹏，2021）。笔者对案例工厂的调查发现，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将企业内部的人脸识别与行为分析系统、物联网、各类工业信息管理系统等多种方式收集的离散数据整合起来，通过挖掘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提高资方对生产信息和工人工作表现的掌控。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资方通过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试图实现以算法为基础的劳动监控。以 A 工厂为例，该工厂在建设智能工厂时，强调的一个原则是要“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将多层次的数据（如机器人的生产数据、人脸摄像头的的数据、电表数据等）集成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分析工人的在岗率、所操作的设备的运作情况、消耗的原材料和物料情况等，通过多维度数据的对比分析综合衡量工人的生产绩效，考察工人的生产表现是否符合标准操作流程。A 工厂的一名技术经理介绍道：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加工设备，这个工人首先会用氧气去加工物料。加工完之后他的作业台是会有废屑的，按照正常的流程，我们培训你这个时候应该用空气去吹的，但现场的工人不这样，为了省事，我手上就有氧气，用氧气吹。我们通过（算法）把它检测出来了。你说拿着这个氧气去吹，第一个造成浪费，第二个是安全隐患。这个都是可以通过算法给它全部检测出来的，所以这个威力就很猛。（访谈，20201017）

在这个案例中，在应用算法技术之前，管理者很难对工人违规使用氧气的行为进行准确的识别，因为监控摄像头不能从视觉上分辨氧气和空气，管理人员也不可能实时盯着工人的操作流程。此外，由于每名工人的生产效率不同、产量也会根据订单的变化而存在差异，所以也不能简单地通过记录工人的氧气消耗量来判断其是否遵守生产流程。但在应用算法技术之后，算法可以计算每名工人的实时产量数据、工作时长和氧气消耗量等数据，通过将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就可以算出这名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加工产品所消耗的氧气量是否存在异常偏高的情况，从而减少工人违规使用氧气的情况。因此，以算法为基础的劳动监控使得资方对劳动者生产表现的测量和观察更为复杂、全面和系统，从而增强了对工人的劳动监控。

（二）数字化劳动监控的特征

资方通过运用智能摄像头、物联网、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提高了对生产信息的收集、集成和分析能力，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产流程、减少能源浪费、提高产品质量等提供了数据依据，从而进一步加强精益生产、提高利润率。但在此过程中，数字化劳动监控也可能损害工人的数据权利和个人隐私，增加工作压力，进一步降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笔者认为，与传统的劳动监控方式相比，数字化劳动监控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其核心特点是监视者的非人化。随着机器/算法取代人类观察者，劳动监控变得更为全面、

持续、精准。案例研究发现，人脸识别摄像头和行为分析系统、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不仅使数据的采集和流通自动化了，而且使数据的分析和利用自动化了。以电子摄像头和智能摄像头的对比为例。在电子全景敞视监控模式中，虽然电子摄像头可以实现持续的监控，但监控体系并非全能的、密不透风的（Bain and Taylor, 2000）。因为虽然电子眼可以不知疲倦地记录工人的日常行为，但是仍然需要管理者去识别和分析工人的行为。工人们知道摄像头可以看到每个人，但监控摄像头的人会有选择地观看（Browne, 2015）。因此，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了解管理人员的行为模式，从而判断和预测自己何时更可能不被观察（Bain and Taylor, 2000: 12）。例如，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选择上夜班是我国制造业工人逃避资方监管的日常策略之一。由于中高层管理者通常不会上夜班，夜班的监管比白班更为放松，工人偶尔打瞌睡、玩手机也不会受到惩罚。

但是，智能摄像头具有人脸识别和行为分析的功能，可以实现对违规行为的自动识别、记录和上报，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工人在工作场所中的自主性。A 工厂的一名车间管理人员说道：

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工人比较喜欢上晚班……以前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白天上班多好，我的生物钟也正常是吧？我上晚班我还得熬夜，这对身体就是一个很大的损耗。但其实不是的，他们工人宁愿上晚班，为什么？白天的话有人管，晚上自由度非常高。……以前没有数据，你不可能总是盯着他。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数字化（监控）系统，你逃不了了。现在 A 厂的工人你问他喜欢上什么班，大家都会说上白班好一点。（访谈，20201014）

因此，随着监控流程的进一步自动化，劳动监控变得更加有效和难以逃避。

第二，数字化劳动监控突破了工作场所和劳动过程的范围，使得劳动监控发生在多种时空情境中。如前文所述，资方应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

统后，当下游厂商、消费者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题时，可以反馈信息给工厂，工厂管理者还可以再追查劳动者生产时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责任，从而使得对生产责任的追溯变得更为精准。随着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资方还可能加强对供应商生产情况的数字化监控，从而使得劳动监控扩展到生产链的上游。因此，劳动监控的时空正在变得更广泛、更多样、更复杂。

第三，在权力技术方面，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运行关键在于塑造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全能性的想象。通过数字技术的日常运作，资方试图让工人相信，人工智能摄像头“总是能知道你是谁，总是能知道你是否违规”，从而促使工人自动观察自己的行为，以符合资方的行为规范。以D工厂为例，在日常的劳动监控中，智能摄像头的使用频率很高。D工厂实行“人脸考勤”，工人每天上班都需要通过刷脸进入厂区。当工人刷脸时，摄像头旁边的显示屏会显示工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工号和证件照，及其打卡时被抓拍的照片。与此类似，A工厂会对工人的违规行为进行“每周通报”，公开展示智能摄像头抓拍的违规工人的个人信息和照片，例如展示工人违规看手机被抓拍的照片，以及这名工人的姓名和工号、违规行为的文字描述、罚款的金额等。笔者通过访谈发现，在密集的人脸识别摄像头和行为分析系统的监视下，工人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从而不得不在一些情况下自我观察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一名已经从A工厂辞职的技术工人在解释离职的原因时说：

公司内外几百个摄像头，无死角监控抓拍，这就是所谓数字化管理……（被抓拍）看手机罚款、吸烟罚款、没戴安全帽罚款，下班忘记关公共区的灯还是罚款，有的部门一个月抓拍罚款能罚好几万。……在这里上班的时候，感觉时时刻刻都在被监视，真是战战兢兢，就怕哪里违规了要罚款。（访谈，20230105）

与格雷厄姆·苏埃尔和巴里·威尔金森（Sewell and Wilkinson，1992）的发现不同，资方的逻辑不是让监控更隐蔽，而是让监控更可见，并建构工人对数字技术是无处不在、明察秋毫、自动监管的想象。在此过程中，

资方试图向工人强调数字化监控的权力和能力，从而引导工人规范自身的行为，塑造自我规训的主体。

此外，笔者认为与外卖、网约车等服务业平台经济相比，制造业工厂的数字化劳动监控存在两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在监控的持续性方面，服务业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监控具有离散性、间断性、相对易脱离的特点，而制造业工厂中的劳动监控更为持续、整合性更高、相对更难脱离。在前者中，平台工人的工作时间和空间呈现高度碎片化和流动化的特点，而且工人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具有非正规性，这使得平台工人在退出工作应用程序时，就可以暂时脱离算法监控和消费者监控。换句话说，平台工人可以比较方便地实现从被凝视的“前台”到不被凝视的“后台”的转变——通过在手机中退出登录应用程序暂时脱离角色、避开算法和消费者的视线^①。这一情况有利于平台工人增强对工作和自我的控制感，从而为他们带来一些积极的心理和情感效果。但是，在制造业工厂中，工厂空间具有封闭性，且工作时间具有连续性，使得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处于被观察的“前台”，受到算法的实时凝视和管理者的不对称凝视。与服务业平台经济中间断性的劳动监控相比，持续性的劳动监控更可能降低工人的自主性、深化无力感，从而造成更为负面的情感体验。

其次，在监控对象方面，服务业平台经济中的劳动监控的主要对象是劳动者的数字痕迹，平台工人通常被抽象为数据流或数字符号。例如，消费者在手机应用程序上监控骑手在电子地图中的位置和行动轨迹时，看到的并不是肉身化的骑手，而是去实体化的、抽象化的图形符号。通常只有当消费者与骑手直接接触时，才会激活对平台工人的着装、行为、情感等的直接身体监控，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通常不存在对肉身的实时监控。而在制造业工厂中，劳动监控的重点既包括工人的行动和生产的数字痕

^① 在这里，笔者借用了欧文·戈夫曼（1989）“拟剧理论”中“前台”与“后台”的概念。前台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公开展示自我的领域，个体在前台进行角色表演，通过运用语言、行为举止、外表、仪态等塑造自我在观察者眼中的印象，以符合社会对某一角色的期待；后台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不被观察的私密领域，个体在后台可以脱离观察者的凝视，因此可以放松社会期望，展现真实的情感和自我。

迹，也包括对工人的肉身的实时监控。在封闭的工厂空间中，由于电子/智能摄像头的应用，以及工厂管理人员（如工头）与工人较为频繁的直接接触，工人的一举一动可能都处于机器/算法与管理者的凝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观察者眼中的暴露度更高、更具有可见性、隐私性更低，同时导致工人对身体和自我的控制度更低。更具持续性的、严密的劳动监控可能是劳动者（特别是青年）“逃离制造业”的原因之一。总体而言，智能工厂的监控技术同时体现了全景敞视主义和后全景敞视主义的特征，既存在基于空间封闭技术的对肉身的直接监控，也有基于对抽象化的、作为数字流的劳动者的数字化监控。

五 数字化劳动监控体系下工人的日常抵抗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没有发现工人为了反对数字化劳动监控而开展集体行动的案例。总体而言，制造业工人在资方推行数字化劳动监控的过程中处于“失语”的状态，难以限制数字技术在工作场所的应用。例如，MES 系统的环节之一是负责工序的工人需要扫描产品的二维码，以记录产品和工人信息，这需要工人付出采集数据的劳动，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笔者访谈了一名 MES 系统供应商，问她会不会有工厂工人抵触 MES 系统的应用，这名供应商回应道：

对我们来说，工人的抵触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我们会把扫码和绩效结合起来，如果不扫码，那就不承认你完成了这个产量，绩效考核就不合格。（访谈，20201015）

这一回答反映了工人在数字技术的应用方面比较缺乏议价的能力。研究显示，工人集体行动的主要目标至今仍然是维护合法权益，或者争取更高的工资（例如，Elfstrom and Kuruvilia, 2014），反对人脸识别摄像头、算法技术对工人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利用还没有成为当下工人集体行动的主要诉求。

尽管如此，工人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仍然会积极利用数字技术的权力间隙，通过拒绝分享自己的经验、协作数据造假等行为来挑战数字化劳动监控的有效性。例如，笔者在 D 工厂发现了一起工人拒绝分享自己的观察和生产经验而造成工厂损失的案例。D 工厂的一名员工在上夜班时，根据自己的经验发现设备自动生产的产品有异常，他猜测应该是工程师在设备中输入的参数有问题。按照工厂的规定，他应该把设备停下来，并上报有关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一情况上报，而是在监控镜头前开始了“劳动表演”，他像往常一样正常地给设备上下料，整个夜班都在按标准作业流程继续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整晚都在认真地生产废品”（访谈，20201017）。等第二天管理者上班时，发现昨晚生产的产品存在瑕疵，这造成了大量物料的浪费，使得工厂损失了 60 多万元。这名工人说：

我们老员工凭经验有时目测就能发现（产品）问题，但就是不管。这种情况半年内就发生了两次，我们都心照不宣了。（访谈，20201017）

有趣的是，数字化监控系统反而成了证明这名员工“无辜”的证据。当管理者检查监控录像和设备数据时，发现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工程师输入的参数有误，而不是员工的操作失误或违反生产流程。这名员工也“装傻”，表示自己不清楚正确的参数应该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产品问题。最后，这名工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研究认为，严密的监控体现了资方对劳动者的不信任（Holland et al., 2015），可能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增加工人抗争、采取破坏行为或不配合的情况（Ball, 2010）。本文也发现，严密的数字化劳动监控使得工人缺乏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不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在访谈过程中，A 工厂的一名工人吐槽道：

摄像头无处不在，让人感觉全方位不被信任。……每天都有人被

抓拍，然后就是通报和罚款。让人感觉你想把公司当家，但他们只想薅你羊毛。（访谈，20230105）

研究指出，尽管当下的大众舆论在不断强调技术在生产中的中心性（具体可参见本辑中许怡的论文），但技术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在技术升级过程中仍十分需要基层工人的参与和贡献。例如，在本辑中，黄瑜和旷轶丹的研究指出人工劳动在人工智能的训练过程中仍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在缺乏工人合作的情况下，数字化劳动监控在提升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的作用往往比较有限。有时工人仅仅是简单的不作为、不配合，就可能对资方造成生产损失，从而削弱数字化监控体系的有效性。

六 讨论与结论

随着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笔者认为，在数字化劳动监控体系中，资方运用数字技术将工人的日常行为、劳动工具、生产活动、产品等数据化，并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占有、收集、分析和应用，深化了对工人生产表现的测量、量化计算以及多维度分析。本文分析了智能工厂中的员工活动监控、生产过程监控和算法监控的主要方式，并指出数字化劳动监控的特征表现为监控流程更加自动化和非人化、监控的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以及积极塑造劳动者对数字技术的全能性的想象。与服务业平台经济的劳动监控相比，工厂的劳动监控更具持续性、整合性、相对更难脱离，不仅包括基于空间封闭技术的肉身监控，也包括基于数据捕捉技术的数字化监控。

工人并不是简单地被迫接受数字化劳动监控，而是通过拒绝分享生产经验等行为削弱了资方劳动控制的有效性。在一些情况下，工人反过来利用了数字化劳动监控技术，给资方造成了生产上的损失。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夸大工人的日常抵抗的力量。目前，我国工人在企业数字化升级过程中仍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很难以集体的形式参与到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决策中来。

如前所述，数字技术的设计、应用和运作是嵌入具体的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中的。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劳工政策、劳动关系制度（如集体协商制度）、工会组织、社会力量（如消费者运动）等约束和调节了资方开展数字化劳动监控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隐私权和数据权（Payne et al. , 2023; Lloyd et al. , 2022; Gasparri and Tassinari, 2020; Cirillo et al. , 2020; Krzywdzinski et al. , 2023）。例如，在法律方面，欧盟成员国从2018年开始实行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了员工更为广泛的数据权利，并增强了对资方收集、传输、保存和处理员工个人信息的监管^①。该条例有利于提升员工的数据保护意识，并为员工反对资方的数字化劳动监控行为提供了法律基础（Aho and Duffield, 2020）。在劳工政策方面，挪威政府为工会代表提供了关于数字技术的培训，帮助工会更好地了解数字技术的特点及其对工作的影响，以帮助工会参与到数字技术应用的谈判过程中（Lloyd et al. , 2022）。此外，英国、挪威、德国等国的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社会倡导、政治游说等策略，积极影响和参与制定国家关于技术发展的战略、技术的行业标准和发展理念、企业的技术升级计划，从而有效地限制了数字化劳动监控对工人权益的侵害（例如，Lloyd et al. , 2022; Krzywdzinski et al. , 2023）。因此，尽管数字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作场所，但资方采集和分析工人个人数据的方式和程度受到了诸多限制（Aho and Duffield, 2020）。

与上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我国保护工人的数据权和隐私权的制度框架和社会力量比较薄弱，导致数字化监控技术对工人的数字权利和个人隐私造成了更大的损害。例如，在工厂应用人脸识别摄像头、制造执行系统、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时，被访谈的工人反映企业并没有告知员工收

① 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数据主体对于数据有知情权、访问权、更正权、可携权、删除权、反对权等权利。例如，知情权是指企业在收集员工的个人数据时，必须告知员工收集数据的目的和法律依据，以及个人数据的保存期限；删除权是指员工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数据；等等。该条例还规定，企业必须任命一名数据保护官，负责监督公司的数据保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如果企业违反该条例，可以被处以最高2000万欧元或其全球营业额4%的罚金（以高者为准）。具体可参见 <https://gdpr.eu/tag/gdpr/>。

集信息的目的和方式，员工也没有签署书面的授权同意，也不清楚工会是否参与了关于应用数字技术的协商。本文认为，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障工人的“数字权利”（digital right）应成为重要议题。目前，十分有必要通过相关法律保护工人的隐私权和数据权，限制人脸识别摄像头等数字技术在工作场所中的使用，发挥工会在参与国家关于技术升级的战略制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中的作用，提高工人在应用数字技术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本文初步分析了数字化劳动监控的主要方式和特征，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第一，本文重点分析了资方对劳动者的纵向监控，没有探讨劳动者之间的横向监控以及自下而上监控的可能。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工厂会在车间中用显示屏展示不同生产线、不同班次（如白班/夜班）的产量，公开对比生产小组之间的生产绩效。那么，这种数据公开是否会促成工人之间的生产竞争和相互监控？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第二，本文只讨论了工人如何通过日常的抵抗回应工厂的数字化劳动监控体系，没有探讨数字技术制造同意的可能。在本辑中，许怡的研究指出，塑造“机器霸权”是新一轮产业升级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机器霸权主要体现为机器在生产中的中心作用，以及机器人劳动优越于人工劳动的观念和认知。与她的研究发现类似，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观察到资方在有意塑造“数字理性霸权”。资方在论述中强调，算法不会受到人情、个人偏好的影响，能更真实、客观地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因此管理更为可靠、公平，从而减少工人对算法控制的质疑。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工人对数字技术多元化的看法和回应。第三，随着数字化监控技术的应用，工人不仅表现为具体的、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也表现为抽象的、被数据化的虚拟劳动者（数字替身或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同时，生产过程不仅表现为生产物质产品的过程，也表现为生产非物质的数据的过程。那么，这两种类型的劳动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和互动？数字替身/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如何具体影响了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意识形态和劳资互动？物质化的生产过程与非物质化的生产过程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与张力，二者的关系如何影响了劳动过程？

这些问题在本文中没有被分析和讨论。笔者认为，以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上述三方面的问题，从而深化关于数字技术与劳动监控的研究。

参考文献

- 陈龙, 2020,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6期, 第113~135页。
- 陈龙, 2022, 《两个世界与双重身份——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与劳动关系》, 《社会学研究》第6期, 第81~100页。
- 冯向楠、詹婧, 2019, 《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平台劳动过程研究——以平台外卖骑手为例》, 《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第61~83页。
- 韩炳哲, 2019, 《透明社会》, 中信出版集团。
- 韩文龙、王凯军, 2021, 《平台经济中数据控制与垄断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当代经济研究》第7期, 第5~15页。
- IDC, 2022, 《中国制造业MES市场分析及厂商份额, 2021》,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CHC49926622>, 10月27日。
- 米歇尔·福柯, 2003,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三联书店。
- 欧文·戈夫曼, 1989,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黄爱华、冯钢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 邵占鹏, 2021, 《工业互联网作用下的结构与权力变迁——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视角》第5期, 第85~104页。
- 孙萍, 2019, 《“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 《思想战线》第6期, 第50~57页。
- 许怡、叶欣, 2020, 《技术升级劳动降级？——基于三家“机器换人”工厂的社会学考察》, 《社会学研究》第3期, 第24~48页。
- 姚建华, 2021, 《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智能监控的溯源、现状与反思》,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 第92~100页。
- 张辛欣, 2022, 《夯实数字化基础, 为提振工业赋能》, http://www.news.cn/tech/2022-09/27/c_1129036843.htm, 9月27日。
- 中国互联网协会, 2021,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 <https://www.isc.org.cn/article/40203.html>, 7月13日。
- 庄家炽, 2019, 《资本监管与工人劳动自主性——以快递工人劳动过程为例》, 《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第25~42页。
- Aho, Brett and Roberta Duffield. 2020. "Beyond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rivacy, Regulation and Big Data in Europe and China." *Economy and Society* 49(2), 187-212.
- Ajunwa, Ifeoma, Kate Crawford, and Jason Schultz. 2017. "Limitless Worker Surveillance."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5, 735-776.
- Anteby, Michel and Curtis K. Chan. 2018. "A Self-fulfilling Cycle of Coercive Surveillance:

- Workers' Invisibility Practices and Managerial Justific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9(2), 247–263.
- Bain, Peter and Phil Taylor. 2000. "Entrapped by the 'Electronic Panopticon'? Worker Resistance in the Call Centre."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15(1), 2–18.
- Ball, Kirstie. 2010. "Workplace Surveillance: An Overview." *Labor History* 51(1), 87–106.
- Bernhardt, Annette, Lisa Krfsge, and Reem Suleiman. 2023. "The Data-driven Workplace and the Case for Worker Technology Rights." *ILR Review* 76(1), 3–29.
- Brivot, Marion. and Yves Gendron. 2011. "Beyond Panopticism: On the Ramifications of Surveillance in a Contemporary Professional Setting."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36(3), 135–155.
- Browne, Simone. 2015. *Dark Matters: On the Surveillance of Blacknes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ulie Yujie. 2018. "Thrown under the Bus and Outrunning It! The Logic of Didi and Taxi Drivers' Labour and Activism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New Media & Society*, 20 (8), 2691–2711.
- Cirillo, Valeria, Matteo Rinaldini, Jacopo Staccioli, and Maria Enrica Virgillito. 2020. "Trade Union's Responses to Industry 4.0 amid Corporatism and Resistance." *LEM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20/21.
- Clarke, Roger A. 198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veillance."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31(5), 498–512.
- Deleuze, Gilles. 1992.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 3–7.
- Elfstrom, Manfred and Sarosh Kuruvilia. 2014. "The Changing Natur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7(2), 453–480.
- Frenkel, Stephen J., May Tam, Marek Korczynski, and Karen Shire. 1998. "Beyond Bureaucracy? Work Organization in Call Cent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9(6), 957–979.
- Gasparri, Stefano. and Arianna Tassinari. 2020. "'Smart'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Making? Insights from Analysis of Union Responses to Digitalization in Italy." *Industrial Relations* 75(4): 796–817.
- Haggerty, Kevin D. and Richard V. Ericson. 2000. "The Surveillance Assembl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4), 605–622.
- Holland, Jeffrey P., Brian Cooper, and Rob Hecker. 2015. "Electronic Monitoring and Surveillance in the Workplace: The Effects on Trust in Man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ccupational Type." *Personnel Review* 44(1), 161–175.
- Huang, Hui. 2021. "Algorithmic Management in Food-delivery Platform Economy in China."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8(2), 185–205.
- Huang, Yu and Naubahar Sharif. 2017. "From 'Labour Dividend' to 'Robot Dividend':

-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orkers' Power in South Chin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 53–78.
- IHS Markit, 2019, *Security Technologies Top Trends for 2019*, <https://cdn.ihs.com/www/pdf/1218/IHSMarkit-Security-Technologies-Trends-2019.pdf>.
- Krzywdzinski, Martin, Detlef Gerst, and Florian Butollo. 2023. "Promoting Human-Centred AI in the Workplace. Trade Unions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Regulating the Use of AI in Germany."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29(1), 53–70.
- Lei, Yawen. 2021. "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6(2), 279–309.
- Li, Jian-Qiang, F. Richard Yu, Genqiang Deng, Chengwen Luo, Zhong Ming, and Qiao Yan. 2017. "Industrial Internet: A Survey on the Enabling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19(3), 1504–1526.
- Liu, Chuxuan and Eli Friedman. 2021. "Resistance under the Radar: Organization of Work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s Food Delivery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86, 68–89.
- Lloyd, Caroline, Jonathan Payne, and Secki Jose. 2022. *Trade Unions and Digitalization in Norway and the UK: Findings from the Food and Drink Processing Sector*. UDIG, De Montfort University and Cardiff University.
- Lyon, David. 1993. "An Electronic Panopticon?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Surveillance Theor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1(4), 653–678.
- Lyon, David. 2003.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Marx, Gary T. 2016. *Windows into the Soul: Surveillance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yne, Jonathan, Caroline Lloyd, and Secki P. Jose. 2023. "They Tell Us after They've Decided Thing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Unions and Digitalization in Retail." *Industrial Relations* 54(3), 3–19.
- Sewell, Graham and Barry Wilkinson. 1992.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Surveillance, Discipline and the Just-in-time Labour Process." *Sociology* 26(2), 271–289.
- Sharif, Naubahar and Yu Huang. 2019. "Achiev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Automation in Dongguan, China."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24(2), 237–253.
- Thompson, Paul. 2003. "Fantasy Island: A Labour Process Critique o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1(2), 138–151.
- Timmons, Stephen. 2003. "A Failed Panopticon: Surveillance of Nursing Practice via New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18(2): 143–153.
- Warin, Robbie and Duncan McCann. 2018. "Who Watches the Workers?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Available at: <https://neweconomics.org/2018/06/who-watches-the-workers>



- Wood, David M. 2010. "Beyond the Panopticon? Foucault and Surveillance Studies." Pp. 245–264 in Jeremy W. Crampton and Stuart Elden (eds.).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Foucault and Geography*. Aldershot,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Zuboff, Shoshana. 1988.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Zuboff, Shoshana.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虚拟社群中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原子化挑战*

梁 萌 周文泰 么珈仪 李 尧**

摘要：平台经济灵活用工模式和个体化的劳动过程，使平台劳动者的原子化问题越发严峻。本文将网约车行业作为平台行业中原子化问题的典型行业，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微信群线上观察所获得的田野资料，试图呈现平台劳动者基于租赁公司的中介型虚拟社群和司机个体的自发型虚拟社群所促发的社群关系和应对策略。在两类虚拟社群中，网约车司机群体都自主地发起了信息、情感的互助行为，形成了突破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局限的可持续社群关系，并发展出应对平台管控和原子化的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等策略。虽然范围有限（仅限于劳动领域）、应对路径单一（仅限于个体化的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了网络社会、数字零工双重冲击下劳动者应对与调适的可能性，以及该群体的能动性自主性。

关键词：平台劳动 网约车 原子化 虚拟社群

一 去垄断化时代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的挑战

网约车行业的蓬勃发展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一方面，它的出现给交通出行领域的商业运营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它在为民众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策略和消费偏好；另一

*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青年项目“北京市互联网+服务业和谐劳动关系建构及社工实务干预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SRC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玉燕、张家齐、刘紫涵同学也参加了本文的田野调查。

** 梁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周文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本科生；么珈仪，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本科生；李尧，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方面，它给就业形态、就业结构和用工模式带来了显著影响。相关报告显示，2021年网约车客运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约为31.9%，在网民中的普及率为46.36%。在就业人数方面，以网约车行业最大的平台企业滴滴公司为例，2018年通过滴滴平台注册并至少完成一单获得收入的司机数量为1166万人，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的网约车新就业总量位列前三。网约车司机有21%来自一人就业家庭，12%是退役军人，51.5%是进城务工人员，6.7%为重点扶贫人员，大家出于要获取额外收入、灵活、可长期从事等原因选择网约车这一职业。“80后”已经成为网约车司机的中坚力量（占比46.96%）。^①

数据表明，网约车行业的确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劳动者从网约车等行业得到了就业机会、获得了劳动报酬，却也因平台经济整体呈现“零工经济”的特征而身处非正规就业的不利境地。平台企业将劳动者作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双方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仅签订了信息服务合同，名义上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因此也不会提供与雇佣关系相关的劳动保障（吴清军、李贞，2018）。不仅如此，基于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平台运营模式的开发，平台劳动者面临多途径、多主体的管理控制，平台C2C、B2C等业务模式，又使平台劳动者失去了大部分传统工作中所能获得的工作内的社会网络及其支持，从而形成了极具原子化的工作关系特征。因此，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者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其处于弱势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杜鹃等，2018）。

从网约车行业的特征来看，车既是生产工具也是劳动空间，其所具有的流动性和封闭性，使网约车司机相较于外卖骑手和家政劳动者更难以形成工作领域的支持网络。一方面，他们难以像家政工那样通过与客户建立起长期服务关系而维持零工工作中稳定的订单来源（梁萌，2017），也没有如外卖骑手一样拥有较为明确且聚集的劳动空间，从而形成工作伙伴关

^①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滴滴平台就业体系与就业数量测算报告》，2019年9月。

系（陈龙，2020）；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全方位的电子监控、算法规训和企业管理控制。因此，网约车司机显然是在工作中更加弱势同时也更加原子化的平台劳动者群体（陈龙、孙萍，2021）。

基于以上特征，既有研究一直关注有关劳动者的自主性、社会支持等问题，提出平台运营机制建构了劳动者的认同，从而在主观方面产生了对平台劳动的“同意”（吴清军、李贞，2018）。但是这种被建构的“同意”是否足以缓解平台的强控制给劳动者带来的压力？在网约车平台一家独大的垄断阶段，由于劳动者选择空间有限且难以澄清，近年来在网约车平台去垄断化、多元化发展的竞争阶段，网约车司机的劳动策略显然已经做出了多方面调整，其中包括个体化的反抗和组织化的支持。本文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试图梳理澄清作为平台劳动者的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平台劳动的强控制与原子化等弊端，以及进一步探究其中的策略选择、机制特征，同时鉴于既有研究对网约车司机自组织的关注，以及随着行业发展中介组织及其虚拟社群影响的日益显著，本文将后者作为分析重点，尝试对网约车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组织模式类型进行补充和丰富，并通过其与自组织等模式的对比，对该模式下网约车司机的行为模式和社群关系实践策略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这种特征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工作中，也是网络社会中整体社会结构和社会整合的重要议题。因此，对网约车司机原子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特征和应对方式进行讨论，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结构与变迁。

二 文献回顾

1. 网约车的实证研究：车既是资产也是生产工具的行业特点

从平台劳动视角对网约车领域展开的研究较为丰富，同时，网约车行业虽然与外卖、家政等同属于平台经济，但其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也使相关研究观点具有行业特色。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网约车行业最初是以共享经济面貌出现的，因此其行业核心劳动者群体是自有车的车主，这些人利用空闲时间分享车的使用权，也是典型的共享经济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

发展框架。然而，基于空闲时间分享的目的很难保障市场的稳定且持续增长，也不符合政府对行业规范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因此平台企业将劳动力的主体由兼职共享车主逐步转换到全职网约车司机（杜鹃等，2018）。这一转换带来了两点变化。一是就业群体由有固定资产（车）且时间宽松灵活的城市中产群体转换为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转移的体力劳动者、流动人口群体和城市再就业群体，前者对运营车辆带来收入的依赖程度并不高，而全职司机则以网约车为主要收入来源。二是车作为生产资料的从属性问题。共享经济中车是车主所有的，而大部分全职网约车司机入行时都难以负担购车成本，因此网约车产业开始以租赁、金融贷款等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这虽然解决了全职司机入行的门槛问题，但是在租赁、贷款等环节再次让渡了本就微薄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一解决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网约车行业的产业结构，由原来的平台、乘客、司机三方主体演变为平台、租赁公司、乘客和司机四方主体。

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劳动关系。有学者从控制程度和控制方法等角度提出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应该属于雇佣关系（齐昊、马梦挺、包倩文，2019；赵磊、韩玥，2021；Wood et al.，2018）。也有学者提出平台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平台劳动者是独立承包商，而非雇佣劳动者（李敏、符平，2019）。另外，结合与平台之间的经济从属性，还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在雇员和独立承包商之间设立一个新的中间类型（王天玉，2020）。因此，虽然既有研究对平台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属于雇佣关系整体上存在争议，而网约车行业由于车作为大额固定资产是由劳动者提供而非平台提供，使得雇佣关系的判断更加具有张力，但是显然这一争议混淆了共享车主和全职网约车司机与资产之间的关系。在两类司机经济收入本就悬殊的基础上，共享车主对车的购置是主动的，是基于其经济基础的自然购置，其有关车的产权是明晰和全面的，而全职司机对车的购置是被动的，这是其就业的唯一策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全职司机的车辆并不能全然被认定为资产，反而是贷款或租赁的风险和代价（赵磊、韩玥，2021）。也因此，车辆的租赁或购置实际上加剧了全职司机的弱势地位以及对行业、平台以及租赁公司的从属性。当然，这也体现出

车同时作为资产和生产工具是网约车行业相对于其他平台经济行业的显著特征。

在这一特征之下，网约车劳动在平台劳动的另一个核心研究议题——劳动过程方面也呈现独有的特点。当然，首先网约车司机的劳动是具备一般平台劳动控制的普遍特征的，既存在技术与算法方面对接单和驾驶的控制（张树沁、户雅琦，2021），也存在平台在劳动规范、薪酬激励方面的运营控制，还包括平台对其与乘客之间互动的情感劳动方面的管理控制（吴清军、李贞，2018；赵磊、邓晓凌，2021；杜鹃等，2018）。而在这些普遍的控制类型之外，车作为该行业的主要劳动空间，具有流动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在政府政策和平台企业对乘客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关注下，政府和平台企业引导司机在车内安装了全方位监控的电子设备，使得网约车在接单期间的位置、声音和影像等信息都是被收集并保留记录的（赵磊、邓晓凌，2021），从而更加接近于福柯意义上空间内的人有着被时时监控感受的环形监狱比喻（福柯，2003；郑广怀、朱苗，2022）。同时，政府出于安全因素和竞争等方面的考虑要求网约车行业平台、车辆和司机需要分别具有从业资格证，特别是车辆和司机的证件，成为大部分司机选择通过挂靠来规避政策风险而不得不得被租赁公司管理的重要前提。因此，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平台劳动存在多种控制策略和多元控制主体，但是在网约车行业整体控制策略的形成过程中，车既作为资产又作为生产工具、既是劳动工具又是劳动空间的复杂属性是相关策略形成机制的核心影响要素。

2. 社会整合危机与原子化问题

社会整合危机是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而产生的。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发展和个体主义的兴起，在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的代际关系、家庭结构和社区网络都发生了根本变迁，绝大部分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因此消失，个体虽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团结危机，也即社会原子化危机，这一危机之下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组和社会整合的危机，从而导致社会整体的失序和失范问题（鲍曼，2002）。

面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原子化问题，社会学家从理论层面给出的解决方

案是建构适应工业社会的联结宏观国家和微观个体的中间组织，其中的重要类型就是基于工业社会分工特点的组织——职业团体。以职业团体来重构人们的集体意识和有机团结，使社会在此基础上再次整合，以应对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原子化危机（涂尔干，2017：40）。后继学者意识到这一理论框架的价值（田毅鹏、吕方，2010），进而在这一宏大框架之下陆续开展了针对现代企业组织、职业团体等方面的实证研究。

针对企业内部关系结构的实证研究认为，现代企业组织内部存在两种团结关系：一种是正式的契约关系，强调企业需要用正式的制度规范来建构组织内部关系，包括正式且明确的薪酬激励、奖惩规则和生产安排等制度体系规范，以明确个体之间，层级之间，以及个体与层级、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和互动规则 [Mayo, 1933 (2003)]；另一种是非契约关系，即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源自生产组织之外，劳动者进入组织后为了应对环境变迁的挑战仍然会运用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来应对工作中的问题，进而影响正式契约关系的构成。然而，这两种关系也并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指出正式的契约关系嵌入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中更有利于组织内部关系的和谐与结构的稳定（Granovetter, 1992），也进而发展出在具体组织研究领域的组织忠诚度、心理契约等经济学、心理学领域相关的研究议题。以我国市场化改革后的农民工进入制造业工厂的企业组织内关系研究为例，相关研究证实了农民工之间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在工厂中仍然发挥作用，并成为该群体应对正式制度挑战的重要资源（闻翔、周潇，2007；朱妍，2017）。

然而，平台经济中的数字零工问题再次破坏了工业社会将企业作为中间组织促进社会整合的既有方式。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不再结成正式的契约关系，而传统社会关系也在网络社会发展过程中越发疏离（田毅鹏，2012、2016；江虹、林滨，2017），从而使平台劳动者再度面临更加严峻的原子化危机（陈晓、王道勇，2020）。虽然人力资源等学科已经开展了针对此议题的探索性研究（刘艳巧、王佳玮，2020；何建华、高永端、常莉俊，2022），但是其仍然在工业组织的传统框架下讨论已经发生本质变化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关系与结构议题，难以突破既有框架给出产业组织模

式、劳动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以后的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企业组织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也难以呈现数字经济、网络社会的极速发展对社会结构和整合方式产生影响的具体线索。

3. 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组织类型及实践

在平台劳动的研究领域中，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组织类型主要有三种：工会组织、非工会组织和自组织。工会组织包括源自制造业时代的传统工会，这类工会在集体谈判方面比较擅长，但在那些将平台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的国家或地区比较难以扩大其在新型产业非正规用工模式中的影响力，而新兴工会组织则比较擅长吸纳和动员平台劳动者参与针对具体大公司的倡导活动，但也会因创办时间较短、规模较小和激进的诉求而限制了其影响力。非工会组织是指平台劳动者联合建立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这类组织的设立并非直接指向劳动者权益议题，但在全球南方国家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争取权益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组织是指平台劳动者长期或临时组成的人数范围较小的、诉求较为一致的小组，这类小组开展集体行动也可能仅维系日常互动（Bessa et al., 2022）。

当然，这些组织类型在集体行动、集体谈判或社会对话等方面都有利于帮助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状态的挑战和争取合理劳动权益。同时，这些组织在平台劳动者组织和动员的方式方面存在共同点：一方面，使用社交软件促进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信息的传递；另一方面，虚拟社群的进入和集体行动的发生又直接植根于线下面对面对面的活动组织。因此，在这三种组织中线上虚拟社群主要作为线下活动的支撑工具而存在，并非组织的核心活动目标（Schou and Bucher, 2022; Lei, 2021; Yu et al., 2022）。

基于网约车行业车既是生产工具又是劳动空间的流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线下联络与互动更加困难，网约车司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进行组织？虚拟社群的作用又是怎样的？既有研究发现，网约车行业呈现鲜明的国别、地区间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差异。针对印度网约车司机的研究发现，该国网约车司机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司机的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使用技能较低，极大地妨碍了司机直接通过线上方式建构虚拟社群，而是首先通过在司机日常聚集的线下地点进行面对面的游说、聚合和寻求技

术支持，进而才能建立起虚拟社群开展线上互动。由于司机首先是基于日常聚集地高度重合而建立的群体，这类虚拟社群也较为容易转换为线下同一物理空间范围内的互助和互动（Parth et al. , 2023）。有关我国珠三角城市中网约车司机虚拟社群的研究则发现，网约车司机虚拟社群的形成主要包括基于地缘（老乡）、业缘（前工友）和性别（男性气质）等一般社会经济特征形成的个体间线下社会关系，线上虚拟社群的司机将与自己存在线下社会关系的其他司机纳入虚拟社群，其社会关系既是虚拟社群接纳与信任的基础，又是线上关系的纽带（Zhou and Pun, 2022）。

因此，有关网约车司机应对原子化挑战的现有研究主要体现出司机以自发方式形成自组织，但在组织过程中与其他平台劳动相同之处在于同样存在线上和线下的双重沟通和互动，也都能形成线下基于一致利益的诉求行动。因此，从既有研究来看，网约车行业面对的原子化挑战更加具体和严峻，也出现了网约车司机自组织模式下的联合方式，且线上虚拟社群同样偏重于作为向线下活动转换的中介和工具。

基于以上对既有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选取平台经济中的网约车行业作为典型行业，对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化用工模式所带来的劳动者原子化趋势及其应对机制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获得田野资料，2018~2023年我们访谈了32名全职网约车司机和1名租赁公司的总经理，地点在北京、杭州、兰州、广州等多个城市，工种方面包括专车和快车司机，平台方面以网约车头部企业D平台为主，由于司机的跨平台操作涉及主流市场中的多个中小型平台，车辆所有权性质方面则包括自有车辆、租赁车辆、以租代购和自营车辆。除此之外，笔者亦在8个网约车司机微信群中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观察，将通过观察获得的对话线索和图片资料作为田野资料纳入本文后续的分析当中。

三 自发组织与中介组织：网约车司机应对原子化的组织方式

在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受到网约车行业发生了转折，

即以 2021 年 7 月为分水岭，网约车行业实际上经历了一次整体的生态调整。2021 年 7 月，网约车行业当时的头部 D 公司被责令整改，相关 App 下架。这一事件给了其他中小平台突围的机会，它们纷纷开始推出招募司机和客户的优惠政策，同时一些平台也得以进行跨领域经营，例如，高德开始重点推动其聚合中小平台入驻的网约车综合平台业务。网约车行业也因此由一家独大的垄断阶段再次进入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这一行业生态的变化，给司机、租赁公司等带来了新的挑战 and 机遇。以本文所关注的全职网约车司机为例，既有研究观察到司机针对平台高压政策的调适或反抗以消极的个体化方式为主，如“用脚投票”也就是离开网约车行业。另外，抱怨和吐槽是司机日常中使用比较多的自我调适方式（赵磊、邓晓凌，2021），而行业垄断被打破之后，为了争取司机、保障运力，平台企业特别是中小平台纷纷制定了相对友好的运营政策，网约车司机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本文对原子化现象下网约车司机工作领域中的社会支持与关系实践的梳理也正是基于这一变化。

本文所涉及的大部分网约车社群成员虽然来自各地，但是主要以北京为接单工作地点。这一城市中劳动者入行前的职业背景更加多元且居住更加分散，因此区别于作为制造业劳动者聚集的珠三角地区，这些网约车司机的地缘、业缘所结成的一般社会关系影响更小，虚拟社群的作用也更加突出。整体来看，本文认为网约车司机工作中社会关系的建构主要来源于两类虚拟社群组织：一类是中介组织，这是租赁公司为了招募和管理司机而建立的，会按照司机与公司的关系分类建群；另一类是自发组织，这是由某个网约车司机作为群主建立的微信群，通过群成员各自拉熟识的司机入群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几百人的以网约车司机为职业身份的微信社群。这两类社群的形成基础不同、司机来源不同，互动互助等行为模式也存在差异，本文接下来将分别予以介绍。

1. 中介组织：基于租赁公司司机招募和管理形成的虚拟社群

平台发展的关键一方面是吸引乘客，另一方面是保证运力稳定。因此，在多平台竞争的局面中，通过租赁公司批量招募司机就成为平台间争夺运力的重要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网约车司机群体实际上成为租赁公司负责招募

和管理的对象，也是租赁公司从与平台的合作中获利的重要筹码。

而从司机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选择直接在平台企业注册而是通过租赁公司第三方协助注册，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部分司机本身承担不起全款买车的费用从而不得不以租赁、以租代购或者入职车队^①等方式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为租赁公司旗下的自营司机；另一部分司机虽然已有车辆或者自行贷款购置了车辆，但是由于自身能力或证照、资质等原因而无法直接在平台注册，他们带车挂靠到租赁公司，由租赁公司协助其处理注册问题，这部分司机被租赁公司称为挂靠司机。对于这两类司机，租赁公司会分别设立微信群。除此之外，租赁公司还会建立一类蓄水池的司机微信群，即在一些网约车司机聚集的场景下（如疫苗注射或者体检培训等）邀请网约车司机入群，然后在群中发布招募广告。因此，由租赁公司组织的网约车社群存在自营司机社群、加盟司机社群和招募司机社群三种类型。

围绕这三种社群，租赁公司的管理和服务也是差异化的。在管理方面，针对自营司机，租赁公司负责司机入行时的注册支持和接单与驾驶规范培训，虽然名义上有车队和队长，但是租赁公司和队长实际上很少介入个体司机的劳动过程，对此管理策略的选择，租赁公司经理的解释是：

（司机入职后）队长领他们可以给他们一些跑车方面的指导。队长就是大概跟他们说一下怎么跑，不会说得太详细。我自己也试过，一开始管太多，他们就会依赖你，有时候凌晨2点打电话给队长问车没有油了、车轮胎没气了、跟乘客吵架了、车脏了咋处理。管太多了，他们就会没有轻重之分。另外就是你给他们培训接单技巧之后，其实效果也不一定好。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有的人跑1200元一天，有的人就只能跑600元，两人相差很大，要是给600元的培训接单，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听不进去，受文化水平限制的，他的思想更顽固。

① 租赁方式下司机需要按月向租赁公司支付车的租金，租赁关系结束后车仍然属于公司；以租代购的方式相当于贷款买车，司机按月支付贷款，贷款偿还完毕后车辆归司机所有；入职车队的方式则是租赁公司以每月完成一定标准的订单量即可获得底薪的方式招聘司机加入公司车队。

所以我们也就不做这样的工作了，从效果来说非常差，浪费了很多时间。(租赁公司 G 经理，2023 年 2 月访谈)

对于加盟司机，与自营司机一样，租赁公司会得到司机在平台上每月流水中一定比例的抽佣，这个抽佣主要是从平台的抽佣中提取，不会使司机端的收入减少，因此司机加盟是受到租赁公司欢迎且司机自己没有经济损失的。而针对加盟和潜在招聘司机社群，参照以上自营司机的情况，租赁公司也就更加没有进行管理的动力了。

因而，对于租赁公司来说，组建不同社群的目的主要是提供服务来留住司机以形成稳定的运力池，从而获得更大额度的平台抽佣。租赁公司一般会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服务是平台选择建议。租赁公司收集不同平台的派单和抽佣等政策和运营情况，汇总分析后会在群里不定期发布（见图 1），从而建议司机注册新的平台或者在运营过程中视不同情况切换平台接单，实现司机劳动收入的最大化。当然，最终平台选择决策权仍然在司机自己手里，租赁公司仅是建议而非强制。当一个平台承诺给租赁公司更大额度的抽佣时，租赁公司会更积极地推动司机转换平台或拉拢司机注册，但能否实现目标



图 1 租赁公司在虚拟社群中发布的平台免抽佣信息

最终也要视司机是否能真正留在该平台且获得收益来决定。从这一角度看，在面对多元网约车平台和利益分享的情况下，租赁公司与网约车司机之间的利益是绑定的，二者不存在明显的利益矛盾。

第二种服务是与平台谈判。一方面，租赁公司在选择合作平台时会和司机一道向平台争取最大利益。

关于大家关心 X 平台加盟的事情，目前正在商谈细节，我要求①给我们车队倾斜派单；②少抽佣。X 平台的答复是原则上没问题，对我们车队的规模也是有要求的。X 平台目前难以实现这样的功能，正在招聘 IT 技术来写代码以实现这些功能。（租赁公司经理在车队群里向司机汇报与平台的谈判结果，2022 年 7 月）

从以上信息来看，租赁公司将司机规模作为基础条件，在派单规则、抽佣水平等核心平台运营原则方面都拥有谈判空间，从而给租赁公司和司机群体带来利益，这是个体司机完全难以做到的。

另一方面，当自营司机或加盟司机在平台上被乘客投诉而面临比较严重的惩罚时，租赁公司会出面为司机争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例如：

在我们车队，司机跟乘客吵架了，或者车有问题，我们从中能起到协调的作用。相对来说，司机处理这些争议很难，比如可能跟乘客吵起来或者有的乘客也提一些过分要求，就是把手机丢车里了，让给送到北六环，那司机可能在城里面或者南六环，司机说我有时间成本我也烧油，我给你送过来要 200 元钱，乘客说你讹诈。经常会出现吵起来的情况，这时候他就会投诉司机，公司就起到沟通的作用，说明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所以司机是无责的。或者说司机被封号了，我们会跟平台说这个司机我们来教育教育，然后让他注意改善避免这种行为，然后你再给他开放。

如果是他自己注册的话，平台给他封号就封号了，平台不可能

给他沟通的机会，沟通也有成本并且也不值得冒风险这么去做。而有车队相对来说就会稍微好一点，毕竟有业务联系，经常沟通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作用也是有限的。（租赁公司 G 经理，2023 年 2 月访谈）

虽然在惩罚方面谈判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也仍然有司机从中获益，因此这也是司机们看重的一个方面。

第三种服务是行业信息的分享。租赁公司会在所有类型的群里不定期发布与网约车行业密切相关的信息，包括车辆保险折扣、国家政策法规及其变化和解释、车辆运营管理风险等（见图 2）。特别是车辆运营管理风险提示，租赁公司会有选择地按照自营群、加盟群和招募群三个类别进行逐级递减式的信息发布，也即自营群内发布最详细和及时的执法部门检查风险地点，加盟车队次之，招聘群则主要在组建初期发布，一旦招募潜力耗尽就会较少发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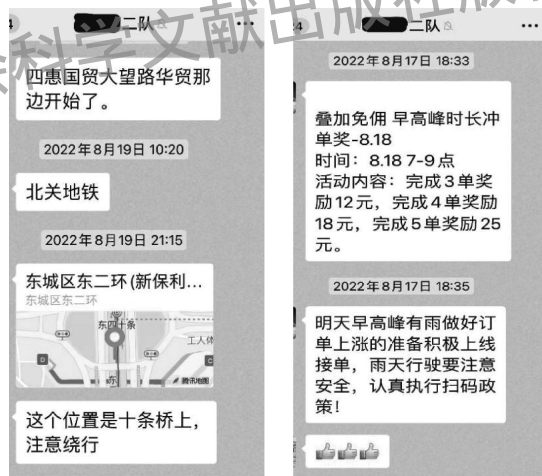


图 2 租赁公司在虚拟社群中发布的行业相关信息

因此，从租赁公司对三类司机社群的管理和服务策略来看，在自由竞争阶段，租赁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头部平台绑定并不得不代替平台履行管理司机职责的原有合作框架，进而争取到一个更加独立的经营空间，与此同时，与司机之间的关系也因管理职责的消解而更加松散疏离。

即便是合作最为紧密的自营司机，租赁公司也并没有像垄断阶段一样对其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而是在二者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保留了司机运营的较大决策权。

从这一角度来看，相关研究者在垄断阶段所观察到的平台—租赁公司—司机这一跨越组织边界的控制链条（赵磊、韩玥，2021），正在因竞争阶段多平台生态的出现而消解。从网约车司机原子化趋势的角度来看，控制链条的消解实际上也将部分地降低其在组织内部基于契约关系等正式制度而获得支持或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当然，以上判断是仅从正式制度所形成的契约关系视角来看的，这也是传统组织分析框架的重点，但数字劳动领域的组织特征是基于正式制度的运营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虚拟社群。这些虚拟社群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具有了跨越时空边界的功能，从而将物理空间分散、工作时间错位的司机群体重新聚合，且群内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和平等的群体关系，使得虚拟社群在租赁公司的管理之外具有自主发展出互动关系的可能性。从本文对这些虚拟社群的观察来看，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促进作用。

第一个层面是对职业群体和职业身份的认同。各类社群里经常会有司机抱怨平台，其他人也会对其观点表示赞同，也有司机会吐槽乘客，例如在群里有司机提到有问题的乘客一旦“上车后你给赶下去也不行也扣分”“投诉乘客也没用，拉黑也没用”“之前乘客也有星级，3.0以下的可以无责取消，现在没有了，一看全是垃圾乘客没法弄了”，会引起其他司机的共鸣，大家正向诉苦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其他成员的理解和安慰，或者司机晒出“好单”或“差单”也会得到群成员的祝贺或者安慰，在群里有司机会在获得高额奖励的时候晒出手机里的订单付款页面，更多的时候是司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将当天的流水页面分享出来，虽然收获有大有小，但是大家在群里交流讨论也让彼此对近期的订单情况和基本收入水平有所了解，缓解一些个体的不安情绪。在互动过程中，司机建立起对这个虚拟社群的认同，也建立起全职网约车司机这个职业身份的边界。

有关劳动者认同的既有研究提出，劳动者群体间的抱怨是其建立共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Lei, 2021; Yu et al., 2022），从社群的以上群

聊中也可以看到劳动者在日常话语中不仅将对乘客、平台的不满表达出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作为劳动者的利益、结构位置等方面的认知，从而成为其认同自身职业身份的重要意识前提。

第二个层面是形成了互助关系。租赁公司的信息并不是永远及时和全面的，虚拟社群中的司机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有关平台抽佣优惠、运营规则修改以及查车罚款信息等都会第一时间在群内发布，提醒大家抓紧转换新平台、兑现优惠以及规避惩罚；另一个明显的互助则体现在提升接单技能、分享跑车经验这方面，只要群里有司机提问，就会有人热心分享经验而不会考虑大家实际上也部分地存在竞争关系。例如，我们在群内看到有司机询问“哪位知道 AA 限号给派五环里边的单子吗”，很快就有群友回应“不派”；有司机提出到京南某机场要么线下排队好久才能上客，要么线上订单很少，当即就有司机给出了自己摸索的接单技巧——“我们首汽约车都是证照齐全的，到机场排队有单，但我就不用排队马上就能走，停车楼的订单竞争激烈，但是如果打开美团，然后去机场东边的航油站听单就能马上走”。这些信息使虚拟社群成员之间形成了对社群的依赖，使群成员在主观认同的基础上能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因为我们有这个群，人们没事发发牢骚什么的，都是开网约车的。有认识的朋友加到里边了，这个朋友给那个朋友加进去，那个朋友给这个朋友加进去，越来越多了，有的大部分不认识，有的根本都没见过面，只是在群里说说话。在外头开车肯定挺无聊的，没事不忙的时候唠唠嗑，缓解压力。也有呢一般哪块活好，有的人就在群里说。有的堵车也在群里说一声，尽量别往这儿来。（哈尔滨网约车司机 L，2020 年 12 月访谈）

司机群基本上都有，每个平台都有。群里会说一下哪里单多。然后就是都在交流查车，我们一天到晚在查车这块提心吊胆的。关键查车还挺多。（北京网约车司机 Y，2022 年 10 月访谈）

有时候也看群消息，我们跑D平台的一个群，我们私家车也加入一个租赁公司，然后一个月开一次会，我们都有群，查车什么的大家互相提醒一下。还有也就是各个平台通过我们司机在群里介绍。（北京网约车司机XH，2021年7月访谈）

当然，在信息分享的过程中，个体间的沟通互动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社群以及对自身作为网约车从业劳动者身份的认知和认同。

第三个层面是线上虚拟关系可以转化为线下实地活动。网约车司机在劳动过程中的流动性非常大且日工作时间较长，这些都不利于线下面对面活动的开展，即便是租赁公司出面组织也未必能成行。但基于线上关系，司机群体能够开展线下互动。当然，在这一类型的虚拟社群中，线下互动的可能性更小、频率更低，但同时又是摆脱了租赁公司管理而自发组织的活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线上虚拟社群关系的强度。

这个线下见面也分人。有的人就比较热心，喜欢说你今天跑到哪儿了？我们一起见个面。有时候就是在那儿一起抽根烟聊一聊，或者说约定一天一起吃个饭，他们都是比较喜欢聚餐，之前还有好多司机约我一起吃饭，确实有。（租赁公司G经理，2023年2月访谈）

由此可以看到，虽然虚拟社群是由租赁公司组织建立的，但是租赁公司在自由竞争阶段的经营策略选择和线上社群的特点又为司机在其中自主建构关系、自发互动提供了机会。也因此，司机才得以在与平台、租赁公司的正式契约关系、管理关系双双消解的情况下，仍然建构起基于职业群体和职业身份认同的非正式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没有止步于虚拟空间，而是在主观认同、利益分享、线下互动等多维度互动基础上形成了稳定的社群关系。

2. 自发组织：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交叉形成的虚拟社群

除了租赁公司之外，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类网约车司机自发组织的虚拟社群，这类社群没有任何正式组织基础，只是由某个热心司机建立起来

的，之后大家各自邀请同行入群，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职业身份为边界的虚拟社群。但这类社群与既有研究中基于传统社会网络延展的自组织社群不同，一般它的建立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是会结合某一类具体的社会身份，另一个是会设立群主审批入群的半封闭社群边界。在社会身份方面，开展田野调查时我们遇到的主要是以工作地域和性别两类社会身份为社群边界补充要素的虚拟社群类型，例如，以北京、杭州等城市工作为识别司机身份的补充维度。这类社群只接纳在某个具体城市工作的司机入群，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都是入群的必备条件。同时，我们遇到了基于女性和网约车司机双重身份形成的虚拟社群。这类建构虚拟社群的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交叉，主要是为了在数以千万计的网约车司机中划分出自己社群的边界，以建立社群的合法性和成员对社群的认同。

在自发组织的虚拟社群内部的互动和关系方面，我们发现与中介组织的虚拟社群在大部分功能上具有一致性，既包括在主观方面建立起对职业身份的认同，也包括在客观方面的互助行为和少量的线下互动。而其与中介组织的虚拟社群相比最大的差异是，一旦社群成员获得群内认可，则无论司机辞工或转行都不会引发其在群体身份方面的合法性危机。

疫情期间，我们在某个以工作地点为交叉社会身份的司机社群中观察到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 A 司机由于跑网约车收入不理想，在群里告知大家他将车转手后回老家做餐饮生意去了，生意开业后他在群里发布了招揽顾客的广告，虽然限于地理位置，群内成员无法照顾他的生意，但是大家仍然热情地与他聊天，他也回应大家“过来请你吃羊汤，顺带炖大鹅”。另一个案例是疫情期间网约车整体收入水平严重下降，于是一部分司机选择转行成为闪送员，他们注册且接单成功后也会在群里和大家分享信息，告诉大家现在闪送“单量可以，单量多”以及“网约车以前能注册闪送，但现在不能用车注册闪送了”。离开网约车行业转行成为闪送员的先行者们会一一详细解答并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

自发组织的虚拟社群，相比于中介组织的虚拟社群更体现出超越职业关系形成的社群关系的牢固性和认同度。虽然两者都是基于职业身份认同建立起来的，但是自发组织的虚拟社群在运行过程中具备了脱离职业身份

的可能性，也即自发组织的司机之间的社群关系具备更明显的独立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呈现这种关系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虽然平台的零工化用工推动了网约车司机的原子化，但是司机群体基于行业内的丰富生态体系，也在能动地寻求建立起各类基于职业身份、社会身份的关系网络。这部分地缓解了平台劳动原子化给司机带来的压力。

当然，囿于发展阶段和地域分布的限制，本文所观察到的网约车司机虚拟社群表现出与既有研究之间的较大差异。在社群形成方面，既有研究提出虚拟社群的形成是以面对面的互动为前提的（Parth et al.，2023；Zhou and Pun，2022），而本文中的中介组织是基于租赁公司的管理意图建立起来的，自发组织则是由熟人拉入群的，因此群内大部分司机没有面对面的线下互动基础，大家沟通和互动的起点主要是虚拟社群和网约车司机的职业身份，这实际上使得认同和团结的形成更加困难，当然，一旦产生也更加弥足珍贵。

四 网约车司机的调适与反抗策略：隔空取暖与游牧接单

有关组织忠诚和心理契约的既有研究认为，工作中的社会关系将会极大地影响劳动者的劳动行为（李原、郭德俊，2006）。那么以上虚拟社群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对群内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行为影响又是怎样的？确切地说，这种社群关系如何帮助网约车司机应对行业生态变迁所带来的挑战并获得更好的收益？

一方面，网约车行业竞争阶段形成的平台和租赁公司管理责任的消解，使网约车司机原子化问题更加严重。然而，由虚拟社群形成的职业身份认同与线上线下社群关系和互动，使网约车司机得以在传统企业组织和基于地缘、血缘的关系之外获得了基于职业身份的虚拟社群认同。基于这种认同，社群成员们在情感、信息和技能等各方面都发展出较为深入的互动和联结，并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使这种虚拟互动得以部分地转化为线下互动，也突破了职业身份的固有边界使这种关系不因该行业的高流动性而被削弱，显示出社群关系在时间维度的可持续性。因此，虚拟社群中的司

机成员可以持续稳定地从社群中获得主客观的支持和帮助。当然，鉴于线下活动偶发和小众的特点，以及主要以聚餐等休闲活动而非利益诉求为主，司机更多的是以虚拟社群中的联结和互助为主，呈现基于该关系的社群隔空取暖的集体行为特征。

群里有联系，你看我们之间是很熟悉的，经常能碰到的我们那几个司机，我们之间会有微信群，然后没事也聊聊天，去聊接单的经验之类的东西。一般就是说，有的时候会聊什么地方一说爆单了，我们的爆单就是说单量一下特别多的地方，就聊这些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家属在老家，然后一个人在北京，有时候生活方面的也是在群里边瞎聊。（北京网约车司机 G，2022 年 10 月访谈）

女司机这个比例倒是越来越大，要是女司机联络上了就会加个微信，我们加了微信就会建一个群，然后有什么事可以在群里面互相沟通，能帮的就帮帮忙。我前一阵子，疫情前一段时间跑夜班的，轮胎没有气了，晚上的时候群里说了一声，看看谁离得近谁就过来。两个人一块帮个忙，换换轮胎。或者是有喝多了叫不醒的乘客，群里问问怎么解决。反正要是有一个女孩或者女的，她就会有点无助，不知道怎么办好。认识的人多了，就有离得近的，或者一块出个主意，帮帮忙。[北京网约车司机（女）L，2022 年 8 月]

另一方面，虽然网约车行业竞争给网约车司机提供了多平台接单的可能性，但是头部企业的黏性和惩罚条款，必然会极大地阻碍个体司机对接单策略的实践。虚拟社群中成员间的信任，使得先驱者的经验和建议会最大限度地得到传播和认可，从而更有可能转化为社群内司机的群体接单策略。实际上，我们在相关社群中也会经常观察到司机展示不同平台的优惠政策，大家共同对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从而选择转换平台的具体策略，例如是全职从一个平台切换到另一个平台，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或因应城市不同区域而选择临时切换不同平台，从而保证大家获得最大的回报。

社群内基于信任的传播和效仿，使切换平台这种游牧接单的主动策略得以取代之前只能被禁锢在头部平台等待接单的被动策略，使游牧接单逐步发展为现阶段大部分全职网约车司机的核心接单策略，既提升了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又使劳动者在面对平台经济中的多渠道、多主体的强管理控制策略之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和主导权。

当然，现在选择性大了，网约车平台也多了，都会有一个选项，到时候对比一下哪个好、哪个单量大，最终回归到最原始最根本的就是哪个挣钱多，怎么挣钱怎么来。（广州网约车司机 LIU，2021 年 11 月访谈）

我原来跑大平台，现在也接了高德、美团，还有百度，你只要想接单，就是所谓的快车单，你就把人家平台的按钮点开，它就直接给你派单，或者你抢单也行。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闲着，你索性就拉点单点，就凑凑流水。大平台现在也不怎么管了，因为疫情以来司机都交车了，它的生意做不好，对吧？你把车送回去，它三年包不出去，那是一堆废铁，任何生产价值都没有，所以它现在就不是像原先那样了，就不许你各平台接单，它自己都是把别的平台引进来了，还管我们干嘛。（北京网约车司机 S，2022 年 8 月访谈）

需要说明的是，游牧接单的策略虽然是虚拟社群内发起并取得共识的，但在线下的实践仅限于个体的决策和行动，在长期的观察过程中我们尚未发现多人或团体以统一策略进行同步实践的迹象。因此，在虚拟社群内形成对职业身份和接单策略等方面的集体认同，最终并没有（或者很难）转化为线下集体维度的具体实践或行动^①。这是该类型虚拟社群的重要特点。

① 在我们观察的社群中这并非偶然现象，无论是中介组织还是自发组织，为了虚拟社群的长期存续，群内讨论的规则倾向于较为严格的自我审查，以防触发关键词而被解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屏蔽了集体化的或反抗式的策略的讨论与实施。

五 结论与讨论

基于本文前述部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平台经济中劳动者原子化问题并不是一个以单一维度衡量的发展程度问题，而是涉及多主体、多领域的复杂系统。从网约车行业来看，平台整体零工化的设计确实促发了劳动者原子化倾向，且在平台从垄断阶段向竞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平台、租赁公司两个组织管理控制均有所减弱，劳动者仅有的与租赁公司的正式制度管理关系也被消解，从而在基于职业组织的正式关系维度呈现较为彻底的原子化状态。

然而，基于租赁公司建立的中介型虚拟社群以及网约车司机发起的自发型虚拟社群，社群内司机群体间产生了超越组织边界的对广义网约车司机职业身份的认同以及基于认同的信任和互助，而这里的关系和互动更具备突破虚拟空间限制而转化为偶发小众的线下互动的可能性，以及独立于职业身份仅凭借社群关系即可持续发挥作用的特点。基于这种虚拟社群的认同与互动，网约车司机群体得以形成了隔空取暖和游牧接单的劳动策略，并使其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能从社群中获益。这一方面体现了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者原子化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平台劳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在网络社会时代应对原子化挑战的具体路径及其可行性。

当然，作为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众多策略和模式中的一类，我们也看到本文所涉及虚拟社群的独特性。这类社群线上认同的形成并非基于前期的线下互动基础，也即其前期的社会经济背景多元且一般社会关系网络薄弱，而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司机们仍然能够形成职业身份认同和互动互助等实践，显示出劳动者极强的能动性和应对挑战的韧性。这类社群在线上职业身份和接单策略等方面的集体认同最终转化为线下个体取向的策略实践，而非既有研究中的集体取向（Parth et al., 2023; Zhou and Pun, 2022），这显示出这一组织类型的局限性，从而总体上呈现主观维度认同强烈而客观维度行动乏力的特点。

Silver (2003) 在其《劳工的力量》(*Forces of Labour*) 一书中提到基

层劳动者因不具备技能和结构优势而主要选择以联合的方式开展与资本的斗争，并称其为联合的力量。那么以上网约车司机虚拟社群产生的劳动策略是否属于工业时代劳动者联合力量的延续？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二者存在较大差异。虽然虚拟社群的确会产生身份认同，但是其群体性仅存在于认同的主观层面，而在具体劳动行为中劳动者的接单策略是以个体化的决策和实践展开的，没有展现出集体联合的特征。由此案例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集体认同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以及进一步看到有关联合的力量讨论的局限性问题，即联合未必会带来力量，特别是未必会产生集体的力量，从本文的案例来看即表现出这种力量的个体化趋势。

同时，这类关系的边界非常清晰，即虽然虚拟社群可以产生突破虚拟空间和脱离职业身份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但是我们观察到这些互动和关系的边界也仅限于职业相关的公共范畴而无法拓展到对于中国人来讲更加核心的私人生活领域，也即难以转化为一般社会关系。因此，虽然社群关系的确有助于平台劳动者应对劳动挑战，助力其与平台进行博弈，但其采取的行动策略仍然是个体化的且悬浮于本土社会关系之外，影响的范畴和作用都是有限的。

因此，平台劳动者应对原子化挑战的模式在时间、社会经济背景、劳动者特征等多维度的影响下形成了多元且丰富的实践，对这些实践的梳理和澄清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呈现平台劳动者及其困境与能动性，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网络社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 埃米尔·涂尔干，2017，《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陈龙，2020，《“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13~135页。
- 陈龙、孙萍，2021，《超级流动、加速循环与离“心”运动——关于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劳动的反思》，《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第29~37页。
- 陈晓、王道勇，2020，《个体化视野下的快递小哥职业困境及其应对》，《社会工作》第6期，第90~96页。
- 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2018，《从有产者游戏到互联网劳工——一项关于共享经济与劳动形式变迁的定性研究》，《社会学评论》第3期，第39~49页。

- 何建华、高永端、常莉俊, 2022, 《数字化平台企业网约工心理契约: 内容、测量与服务绩效影响验证》, 《商业经济与管理》第3期, 第5~15页。
- 江虹、林滨, 2017, 《新部落与青年“重嵌”社会的理路探索》, 《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第35~41页。
- 李敏、符平, 2019, 《网约车经营模式的传统回归: 一个市场控制观的视角》, 《浙江社会科学》第6期, 第15~24页。
- 李原、郭德俊, 2006, 《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及其内部关系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5期, 第151~168页。
- 梁萌, 2017, 《强控制与弱契约: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第47~59页。
- 刘艳巧、王佳玮, 2020, 《心理契约对员工与平台企业合作稳定性的影响——以滴滴出行为例》, 《企业经济》第11期, 第45~52页。
- 米歇尔·福柯, 2003,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齐格蒙特·鲍曼, 2002, 《个体化社会》, 范祥涛译, 上海三联书店。
- 齐昊、马梦挺、包倩文, 2019, 《网约车平台与不稳定劳工——基于南京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 《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期, 第204~224页。
- 田毅鹏, 2012,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以社会原子化为分析视角》, 《探索与争鸣》第12期, 第65~69页。
- 田毅鹏, 2016, 《乡村过疏化背景下村落社会原子化及其对策——以日本为例》, 《新视野》第6期, 第26~31页。
- 田毅鹏、吕方, 2010, 《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 第68~73页。
- 王天玉, 2020, 《互联网平台用工的“类雇员”解释路径及其规范体系》, 《环球法律评论》第3期, 第85~100页。
- 闻翔、周潇, 2007, 《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 一个批判性的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第29~39页。
- 吴清军、李贞, 2018,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第137~162页。
- 张树沁、户雅琦, 2021, 《技术机会获取与控制权交换过程——对网约车平台技术的互构视角分析》, 《社会学评论》第4期, 第219~238页。
- 赵磊、邓晓凌, 2021, 《被“车”捆绑的自由——T市W网约车平台劳动控制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4期, 第14~21页。
- 赵磊、韩玥, 2021, 《跨越企业边界的科层控制——网约车平台的劳动力组织与控制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5期, 第70~90页。
- 郑广怀、朱苗, 2022, 《活在“硅笼”: 数字监视社会的基本逻辑》, 《新视野》第1期, 第115~121页。
- 朱妍, 2017, 《组织忠诚的社会基础: 劳动关系“嵌入性”及其作用条件》, 《社会学



研究》第2期，第76~102页。

- Bessa, Ioulia, Simon Joyce, et al. 2022. "A Global Analysis of Worker Protest in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LO Working Paper* 70. Geneva: ILO.
- Granovetter, Mark. 1992. "The Sociological and 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bor Market Analysis: A Social Structural View." Pp. 187–216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Lei, Yawen. 2021. "Delivering Solidarity: Platform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Contention in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6(2), 279–309.
- Mayo, George E. 1933 [2003].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arth, Shalini, Dharma Raju Bathini, & George Kandathil. 2023. "Actions in Phygital Space: Work Solidar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App-based Cab Drivers in India."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38(2), 206–229.
- Schou, Peter Kalum and Eliane Bucher. 2022. "Divided We Fall: The Breakdown of Gig Worker Solidarity in Online Communities."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111/ntwe.12260>.
- Silver, Beverly J. 2003. *Forces of Labou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d, Alex Mark, Graham Vili Lehdonvirta, and Isis Hjorth. 2018. "Good Gig, Bad B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3(1), 1–20.
- Yu, Zizheng, Emiliano Treré, and Tiziano Bonini. 2022. "The Emergence of Algorithmic Solidarity: Unveiling Mutual Aid Practices and Resistance among Chinese Delivery Worker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83(1), 107–123.
- Zhou, Yang and Ngai Pun. 2022. "Affording Worker Solidarity in Motion: Theoris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Agential Practice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New Media & Society*,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221130474>.

“为家”者亦“为国”：家国情怀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胡安宁**

摘要：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将其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化时，需要在脱嵌历史传统制度背景的基础上，以一种中立、直接和经验的方式来明晰个体、家与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家国情怀可以定义为行动者表现出的一种认知倾向，即家与国在对个体的超越性上形成的正向关联。这一概念化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学理论背景下分析家国情怀。进一步，以多元行动理论为分析框架，凸显家国情怀如何受文化意义诠释层次（宏观或者微观）影响。通过分析公众生活态度调查数据，以下论辩得到了经验验证：对于儒家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诠释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家国情怀水平，而对于儒家文化意义微观导向的诠释则伴随着更低水平的家国情怀。

关键词：家国情怀 “扳道夫”理论 文化的动机功能 儒家传统文化

一 引言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也是国民基本文化素养和道德追求的重要内容（陈望衡、张文，2021）。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家整体的文化政策导向，还是个体日常的教育过程，都强调了对家国情怀的培育和弘扬，实现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高昕、杨威，2021）。然而，当从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用词上升到具有社会科学意义的学理概念时，家国情怀仍有进一步细化和明晰的空间。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社会实现路径与机制研究”（22ZDA081）的阶段性成果。

** 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例如，既有对家国情怀的考察偏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附着于传统家国同构制度设计之上的精神状态（张军，2019），这使得学者的分析聚焦于宏观共同体，社会现实中的行动者付之阙如。仅就共同体而言，家和国之间也缺乏细致的区分，而是以“家国一体”的论辩一言以蔽之（刘余莉、聂菲璘，2021）。因此，既有对家国情怀的分析在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共同体之间仍需进一步的理论勾连。这种理论层面的模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操作层面上，家国情怀被简化为一种抽象的道德状态，进而妨碍了社会科学研究者客观考察个体对家国情怀的接纳程度，以及围绕家国情怀所可能呈现的人际异质性。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家国情怀理解为行动者表现出的某种认知特征，即认可“家作为私人共同体对个体的超越”与认可“国作为公共共同体对个体的超越”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换言之，“为家”更有可能“为国”。这一概念化以家与国两种共同体对个体的超越为线索，让“情怀”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更加具体和客观；以“行动者”所体现出的认知特征为基本分析单位，让家国情怀摆脱了对特定（历史）制度设计的依附，使其更具当下现实意义；以集体-个体的动态关系为基础，让家国情怀的研究与社会学的理论关怀（如社会资本与信任研究、费孝通先生对于公与私问题的经典分析等）相衔接。基于这一家国情怀的界定，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行动者所呈现的家国情怀“程度”如何与其对传统儒家文化观念的接纳度相关联。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拓展了文化社会学既有理论，构建了一个多元行动分析框架来凸显传统儒家文化的动机性功能（motivational function）。这一理论拓展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进行展示，以此在实践层面上探索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提升个体家国情怀水平这一现实问题。

二 理论背景与理论建构

（一）家国情怀：一个未尽的社会科学议题

家国情怀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是将其作社会科学

意义上的概念化，无论是在理论界定还是在经验测量方面都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具体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把“家”带回来。既有对家国情怀概念的使用，常常偏重于“国”之一端，将家国情怀诠释为一种类似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情感力量。从这种理解出发，国作为家的一种制度或者文化上的延续，自然成了分析的焦点。与之相比，家在家国情怀概念中的角色被严重削弱甚至忽略。但是，单纯强调“国”而忽视“家”并非家国情怀理念的题中之义。例如，张军（2019）指出，家国情怀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因为家国情怀中包含了家之一侧朴素的乡梓之情。陈望衡、张文（2021）亦强调家和祖先对于个体家国情怀塑造的重要性。相比于“重国轻家”的诠释路径，对于家国情怀一个更加平衡的理解应当是认识到家国情怀中“家”的作用，以及“家”和“国”作为超越个体的共同体彼此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相和性。在这方面，刘余莉、聂菲璘（2021）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传统意义上“国”和“家”的区分只是在于治理主体不同，前者由诸侯治理，后者由卿大夫治理。因此，二者作为个体之上的共同体，彼此之间存在共生共存的关系（高昕、杨威，2021；张军，2019），达成一种所谓的“互本性”（陈望衡、张文，2021）。顺着这一思路，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之一应当是“家”和“国”两个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对个体的超越，以及这种超越之间的一致性，而非片面偏向于“国”这一共同体。

第二，把“个体”带回来。家国情怀作为凸显“家”与“国”的概念，无疑重在共同体而非个体。但是这种共同体导向的基础或曰出发点在于个人。换句话说，家国情怀对于“家”和“国”的重视，并非单就家国谈家国，而应当是以个体为参照来谈家国。这一点在既有文献中也有所体现。例如，经典的“修齐治平”一论呈现了从个人修养到家庭和睦进而到国家稳定的顺次过渡。正是在此意义上，刘紫春、汪红亮（2015）指出，家国情怀的基本特点在于以个人为基石，以家庭为纽带，以国家为最大的家。刘松（2019）从主体自由和制度约束的角度论证了家国情怀所隐含的共同体和个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并将家国情怀理解为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达成的民族和睦和文明提升。可见，对家国情怀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分

析，需要关注的并非纯粹和抽象的“家”和“国”，而是要关注相比于个人，家和国所体现出的超越状态。质言之，家和国的共同参照点在于个体。顺此分析路径，在描述家国情怀的时候，我们需要展现的并非脱离个人而就家国进行抽象论辩，而应当是以个体作为“参照”所形成的家国超越。

第三，把“传统制度”带出去。在现有研究中，家国情怀作为一种情感特征，往往和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放在一起讨论，即将家国情怀视为家国同构制度设计的伴生物（刘紫春、汪红亮，2015；刘余莉、聂菲璘，2021；钱念孙，2020）。按照这一思路，家国情怀往往类比为移孝作忠等家国同构的内在文化意涵。诚然，个人主观偏好乃至文化禀赋的培养都和特定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但是，文化相比于制度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胡安宁，2020）。在此意义上，片面强调家国情怀对于特定制度设计的依附忽略了家国情怀相比于具体制度设计所具有的长久文化生命力。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传统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早已不复存在。但即使如此，我们今天仍大力提倡和鼓励家国情怀，这恰恰反映出作为个体文化倾向的家国情怀与传统制度设计之间的脱嵌。鉴于此，在经验层面上考察家国情怀，需要更加注重行动者的态度与价值判断，而不是强制将其安置于一种特定历史制度环境之中。对家国情怀的考察需要跳出历史制度设计的樊笼，从行动者那里寻找经验证据。

第四，情怀“客观化”与行动者“具体化”。从理论进一步落脚于经验层面，我们需要从两个方向对家国情怀的概念进行优化。其一，情怀一词需要“客观化”。家国情怀常常被理解为某种眷念与爱戴的心境、情感上的认同或者自觉担当的意愿（张军，2019）。这一理解虽不妨碍日常交流，但作为学理概念却仍显片面。这是因为，以正面情感来界定家国情怀，使得这一概念的经验表达容易成为基于个案特征所作出的“非此即彼”的规范性（normative）和规定性（prescriptive）的“是非”判断。这种判断容易因情感偏向而缺乏描述上（descriptive）的客观性，并疏于对家国情怀“程度”的把握。因此，在经验操作上把握“情怀”，我们需要更为具体和中性的表述。其二，我们需要对承载家国情怀的“个体”进行具体化。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常被视为一种集体

性的宏观文化表现。相比而言，对于集体文化之下个体层次的文化表现却研究甚少。现有研究早已指出，即便在特定集体文化之下，个体层次的文化特征也具有很强的异质性（Martin，2010）。具体到家国情怀，范可（2016）指出，家国情怀这一概念应当被看作一个理想型而非现实生活的直接描述。即使在传统社会，家国情怀的个体表现也呈现大传统-小传统之间的差异：有文化的士大夫与普遍缺乏读写能力的大众对于家国情怀的理解不尽相同。在当下中国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异已超越教育水平，涉及其他多种社会人口学特征。因此，在经验层面上，个体所呈现的家国情怀应当更为“具体”，展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当我们从一般生活用语上升到社会科学学理意义上的理论概念时，家国情怀需要在脱嵌传统制度设计的前提下，以一种更为中立、客观的考量来明晰个体、家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为家”者亦“为国”

顺着上文的思路，本文提出一个具有社会学学理意义的家国情怀概念：家国情怀是行动者表现出的一种认知倾向，即家与国在超越个体方面达成的正向关联。换言之，从个体出发，“为家”者亦“为国”。这一界定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行动者”、“超越”和“正向关联”。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考察家国情怀在个体层面所呈现的人际间差异，并以此跳脱出历史制度设计的羁绊，在当下社会围绕社会成员来弘扬家国情怀。从“超越”的角度出发，可以把个人带入家国情怀的讨论，以其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点来凸显“家”与“国”相对于个体所具有的超越性、独立性和共同体属性。同时，在共同体一端，该定义注重“家”与“国”分别作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共同体的区分及其各自相对于个体的超越，以此来避免“重国轻家”的局限。从“正向关联”的角度出发，我们让家国情怀一词变得可观察和可操作，以此克服了“情怀”一词的模糊性和情感导向上的片面性，让我们可以从更加客观、中立的角度来思考家国情怀在个体层面上的经验表现。

以上对家国情怀的界定可以将对家国情怀的分析与社会学的主流理论

对接。例如，福山（Fukuyama，1999）的信任半径理论强调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社会资本并不必然体现在个人对他人信任水平的高低上，而是体现在个人对他人信任范围的大小上。这也是班菲尔德（Banfield，1967）基于其意大利田野调查所得出的主要结论：一个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保障取决于社会成员多大程度上可以跳出自身小群体界限，实现一种指向“他人”的超越性。可见，无论是福山还是班菲尔德的分析，其核心议题的重要面向都是共同体对于个体的超越，这与本文对家国情怀的界定是一致的。因此，上述概念化让家国情怀的分析更具社会学的理论意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公私划分的角度来理解家国情怀也与费孝通先生所论述的差序格局概念相关联（费孝通，2004）。在其差序格局分析中，费老提出，差序格局的交往模式关系到中国社会群己和人我界限的划分。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公私问题就社会交往而言具有伸缩性。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路拓展，把各种共同体置于个体差序格局结构之中（例如阎云翔，2006），那么，差序格局下公私关系的伸缩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之上面向特定共同体的超越性。

综上所述，对家国情怀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研究，需要对其进行更为审慎的概念化，强调行动者表现出的“为家”与“为国”之间的正向联结。通过这种概念化，我们可以借助更为丰富的国内外社会学理论资源来提升对家国情怀问题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如何达成这种超越以弘扬家国情怀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动机功能入手进行讨论。

（三）文化动机功能的回归

在个体认知层面上谈及超越，本质上涉及的是行动者在具体实践中在个体和共同体（家或国）之间所体现出的侧重与偏好。例如，每个行动者都有其自身的个体化的利益关注，但是一个人之所以表现出家国情怀，却在于其可以将个人利益置于家 and 国的利益之后，从而在利益导向上呈现家国利益相比于个体利益的某种优先性。如果说人们关注自身利益近似于一种生物性的自发行为，那么做到以家国为导向来超越个人利益就是一种社会

文化行为了 (Berger & Kellner, 1965)。从这个简单实例可以发现, 家国情怀的塑造和发展需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正如韦伯经典的“扳道夫”隐喻所言, 个体特定行动背后的动因取决于指导这一行动的文化轨道 (Eastwood, 2005)。换言之, 人们之所以不将目光局限于个人自身而是转向家国并在家国之间达成一致, 背后需要特定文化意义的引导。

文化意义对于个体行动或者倾向的引导可以说是文化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在既有文献中, 这一问题涉及文化动机功能与合法化 (legitimization) 功能的争论。如图 1 (a) 所示, 所谓文化的动机功能, 是指个体行动或者倾向受到特定文化意义的影响。不同文化观念塑造了不同的行动特点或者偏好-倾向。文化的动机功能集中体现于韦伯经典的新教伦理命题 (韦伯, 2007; 叶静怡, 1999), 也与现代结构功能主义对于文化系统的讨论相一致 (帕森斯, 2012; Münch & Smelser, 1992)。与之相比, 文化的合法化功能则质疑了文化的动机功能。其基本论证逻辑是, 如果文化意义决定了行动和倾向, 那么有同样行动模式或者倾向的行动者在谈到背后的动机时, 应该可以表达出彼此一致的文化意义。但是正如社会学者斯威德勒 (Swidler, 1986) 的文化工具箱理论所指出的, 现实生活中具有同样行动模式或者偏好的个体并不能在行动意义的陈述上体现出一致性。据此, 斯威德勒 (1986) 提出, 文化意义更多地发挥了一种合法化的功能, 即人们基于所处的社会环境来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文化意义来描述甚至“包装”自身的行动或者偏好。那么, 文化意义就成为行动之后的一个合法化工具。这一“行动中的文化”的论述进路如图 1 (b) 所示。

文化的合法化功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思考了文化意义对于个体行动和偏好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无形中拒斥了文化对于行动的引导功能 (肖文明, 2022)。如果文化意义只是行动之后的一种装饰性工具, 那么文化这一概念的社会学价值也就被极大地削弱了。实际上, 在文化工具箱理论之后, 亦有研究与文化合法化理论形成对话, 并试图回归文化的动机功能。例如, 维希 (Vaisey, 2009) 认为, 指导和规制行动以及偏好的是一种长时间实践后形成的潜在认知模式。因此, 个体并不一定能够明言或者系统阐述这种潜在的文化动机。按照这一分析逻辑, 斯威德勒所发现的明言文化

意义上的不一致性并不足以否定文化的动机功能。奎恩 (Quinn, 2018) 基于其自身所做的人类学研究指出, 斯威德勒过度关注了被研究者陈述中过于分散的细节, 忽视了貌似散乱的陈述内容背后所存在的更高抽象层次上的文化一致性。

在上述理论背景下, 本文提出, 在考察文化和行动或者偏好之间的关系时, 需要超越传统文化动机理论对单一文化意义的关注, 也需要超越文化工具箱理论对单一行动结果的文化意义反溯。文化意义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在行动者层面的“多对多”式的关联。也就是说, 不同文化意义和不同行动之间发生关联。这一分析思路可以视作一种多元行动理论, 如图 1 (c)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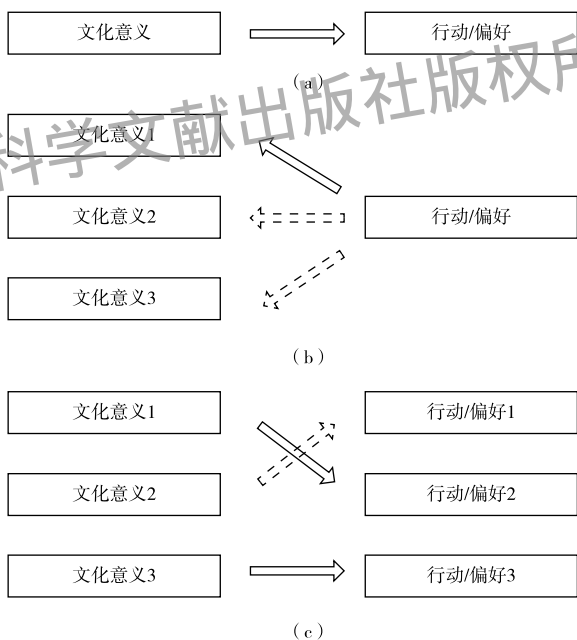


图 1 文化引导功能的多理论模型

说明: 图 1 (a) 展示了文化的动机功能, 强调了特定宏观文化意义对于个体行动/偏好的塑造; 图 1 (b) 展示了文化的合法化功能, 强调了个体利用特定的文化意义对行动/偏好进行合法化; 图 1 (c) 展示了本文提出的多元行动理论, 涉及多种文化意义和多种行动/偏好结果。其中文化意义的落脚点不再是宏观层次, 而是微观个体层次。同一个体可以同时运用多种文化意义诠释, 并在特定的情境下促进行动/偏好的发生。

具体而言，所谓多元行动理论，意指对于行动者而言，其所持有的文化意义是多样化的。例如，同样是儒家文化，在个体层面可以落脚于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也可以落脚于家国一体的宏大叙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确实可以如工具箱理论所理解的那样，可以被行动者所选择和使用。但是和工具箱理论不同的是，本文主张，这种选择与使用并不是行动/偏好事后的选择和合法化，而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环境或者自身社会属性，对文化进行的个性化的理解或者诠释。因此，多元行动理论与文化工具箱理论相比，在分析逻辑时序上是反过来的。文化工具箱理论从结果推知原因，而本文提出的多元行动理论则遵循了文化动机分析的基本论辩逻辑，从文化出发触发个体特定的外在表现。只是与韦伯或者帕森斯所预设的文化动机功能不同，这里所谈的文化不是一种内部一以贯之的宏观文化叙事，而是经过个体理解和诠释之后所达成的一种个性化的微观文化诠释，亦即个体文化（Lizardo, 2017）。换言之，这里涉及的文化意义不是个体之“外”通行的宏观建构，而是个体之“内”对于某一文化的自身理解。因此，这一理论进路强调了在同样的宏观文化之下，个体文化层次上的异质性。这些多重文化意义并存于个人头脑之中，基于情境的不同，触发不同的行动模式和倾向。

关于本文提出的多元行动理论的一个经验实例是胡安宁和周怡（2013）对儒家文化的经验分析。虽然国人共同生活于同一宏观儒家文化下，但个体对于儒家文化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带来不同的行动表现。胡安宁和周怡（2013）的经验研究表明，如果将儒家文化理解为一种家庭主义导向的文化，则儒家文化会妨碍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升。但是，如果将儒家文化理解为中国人共享的一种身份认同，则儒家文化有助于一般信任的建立。可见，从多元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文化的动机功能不再是宏观集体文化的动机功能，而是个体异质性文化诠释下，特定个体文化的动机功能。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便可以克服传统文化动机理论和文化合法化理论之间的张力，通过考察行动者个体文化的动机功能来思考如何弘扬家国情怀。具体而言，按照多元文化理论，影响个体家国情怀“程度”高低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于个体文化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本文认为，关键在于

个体文化所构建的意义本身在宏观和微观之间所具有的导向性差异。

（四）个体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和微观导向

在既有文献中，学者们往往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文化意义进行宏观-微观的导向区分。例如，经典的 etic 和 emic 视角的对比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前者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后者强调了文化的个体性以突出所谓的“内部人视角”（Harris, 1976）。在中国本土研究中，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分（沈毅，2007），前者倾向于一种集体性的统一的文化文本，而后者则落脚于个体特异性，涉及更加弥散化的文化表现。本质而言，这种本体论角度的分析看的是在何种层次上来“界定”文化意义，界定的主体是研究者。但是，正如上文所言，多元行动理论更加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行动者如何诠释和理解文化。正如胡安宁与周怡的研究（2013）所指出的，同样的文化意义，在个体层次可以被用来指引个体生活，也可以被用来构建某种身份认同。因此，就文化意义导向而言，进入人们头脑中的文化意义，可以是宏观导向也可以是微观导向。这种差异涉及的是个体对文化意义适用层次的偏好，也就是“怎么用”的问题，而非文化“是什么”的本体论定位。二者的关系在于，无论文化意义导向的方向如何，均是在行动者个人层面以一种个体文化的形态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个体文化的本体论设定下，对文化意义的诠释和使用方向会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分。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行动者而言，个体文化的不同导向层次具有现实影响力。例如，基于新近文献关于文化动机和导向功能的分析，行动者所诠释的文化意义乃至文化图式可以帮助行动者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通过有针对性的导向调整，保证个体生活的顺利进行。此外，个体文化意义的不同导向本身涉及行动者的价值定位（Hunzaker & Valentino, 2019），因此会影响行动者有关对错问题的价值判断。最后，个体文化的诠释方式往往日用而不自知，具有不言自明性（胡安宁，2022），在无意识之间调节了个体的注意力分配，自动过滤掉那些与其个体文化意义导向不匹配的生活事件。即使出现和自身个体文化意义主导导向相左的生活事件，个体也会通过生成认知不协调的感受予以应对（Harmon-Jones &

Mills, 2019)。这些机制都意味着，个体文化意义诠释的宏观导向和微观导向并不仅仅是个人如何看待和理解文化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关联着个体的行动和偏好。

从个体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和微观导向区分出发，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家国情怀的培育。如上文所述，我们将家国情怀界定为一种偏好或者取向（是否“为家”也会“为国”）。那么，影响这种偏好或者取向发生与否或者程度强弱的文化因素之一就是人们对于某些个体文化意义（下文的实例会具体考察这里所论及的个体文化意义的实质含义）不同导向层次的理解和诠释。这一分析路径如图2所示。基于多元行动理论，对于行动者而言，个体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会通过作用于行动者触发其对个体的超越，进而提升其家国情怀；而个体文化意义的微观导向则会通过作用于行动者而削弱其家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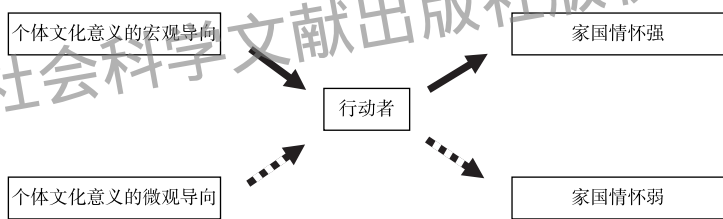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导向与家国情怀

三 家国情怀与儒家文化：一个分析实例

（一）儒家文化诠释的集体导向与个体导向

上文的讨论集中呈现了本文的理论论辩，但没有明确家国情怀背后特定的个体文化意义究竟是什么。诚然，不同的文化意义都有可能与家国情怀相关联，从而适用上文提出的论辩逻辑。因此，个体文化意义究竟指涉什么，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予以确定。在这一部分的实例分析中，我们将家国情怀背后的个体文化意义定位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观念。具体而

言，我们将基于多元行动理论的分析进路，在个人层面上考察儒家传统文化的不同导向层次如何影响人们的家国情怀。

在进入具体的经验分析之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通常我们会把儒家文化和传统集体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细观儒家文化的基本主张就会发现，儒家文化的很多论述兼具宏观面向和微观面向，因此为行动者的个体化诠释提供了充分的空间（陈冬，2014）。这方面一个最直观的表达应该就是孔子所提出的“修齐治平”理念。按照这一思想，国家的有效治理和家庭的和睦团结离不开个人层面的品性培育和思想修养。因此，个人层面的修身与集体层面的家庭、国家的善治之间呈正面相关性。除此之外，儒家的义利观也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有机统一。虽然义偏向于宏大治，利更具私人导向，但儒家传统并不是片面强调舍利取义，而是反对见利忘义（杨清荣，2005）。例如，荀子提倡“义利相和”、“重义兼利”和“重义尚利”，本质上就是力图实现个体与共同体在利益导向上的协调统一。这种统一性也体现在“知行合一”的思想之中。按照“知行合一”的理念，宏观层面的道德良知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要通过个体具体的实践才能够真正达成的至善状态。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个人行动达成对于普遍德性的“真知”（迟成勇，2018）。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个人修身与义利相和并非提倡人与人无差别的完全一致，而是在讲求“同一”的同时，兼具对个体个性和差异性的尊重。儒家“和”的理念亦正如音律相和的比喻一样，讲求的是“和而不同”，从差异中寻求彼此的协调（Chan，2013）。

综上所述，在行动者看来，儒家文化观念可以面向宏观家国，也可以面向微观个体。因此，行动者在对儒家文化进行理解与诠释的时候，就有了自身发挥的余地，可以在个体文化层面呈现偏向微观导向或者偏向宏观导向的特点，以此形成个体层次文化意义理解上的特异性。这种差异化的诠释和导向也是个体能动性（agency）的体现。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文化诠释的宏观导向与微观导向之间的区分主要在于程度强弱，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分关系。

（二）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课题组于 2005~2007 年在全国 10 地进行的“公众生活态度调查”。该调查选取了 10 个调查点，分别是北京、石家庄、保定、太原、太谷、成都、罗江、绵阳、射洪和资阳。调查点的选取主要考虑地域分布和规模。调查的抽样过程如下：首先分别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取一个大城市，被选中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太原和成都；然后，在这 3 个大城市周边，分别选取中等规模和小规模调查点。在最终选取的 10 个调查点中进行随机抽样。随机入户调查全部为入户面访，抽取的总样本量是 1299，有效样本量为 1254。随机入户调查的复核率为 75%，复核成功率为 30%。关于该调查更为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见康晓光（2008）。

公众生活态度调查数据是目前为止围绕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较全面的分析资料，其中包含了本文理论论辩中所需要的各种变量的测量题器。与之相比，其他现有的全国性调查资料（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等）历年数据均不能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当然，公众生活态度调查数据的一个明显缺陷在于其时效性较差。作为一项数据收集于 2005~2007 年的全国性调查，多大程度上依旧可以反映当下价值观念因为缺乏历时性资料无法经验确知。鉴于此，本文的经验分析更多的是起到示例的作用，以此将本文提出的理论论辩置于一个具体的经验研究场景之中。尽管如此，考虑到文化观念本身具有比较强的历时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基于既往数据的经验发现其可以支持本文的理论主张，那么我们便有更为充分的动机来收集更具时效性的调查资料以作进一步的探究。

如上文理论论辩部分所述，家国情怀的测量需要考虑：①家和国两个共同体对于个体而言所具有的超越性；②这种超越性彼此之间的相关性特征（是否正相关）。对于①，我们通过相关的测量题器可以直接询问被研究对象。而对于②，我们则采用有限混合模型（Finite Mixture Modeling, FMM）进行估计（关于有限混合模型的基本原理详见下文）。在国家超越个人方面，我们采用的问题是被研究对象对下述陈述的同意程度（简称国

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即“为了国家利益, 个人应该准备牺牲自身的利益”。题器选项是 1=很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很同意。在家庭超越个人方面, 我们采用的测量是被研究对象对于以下陈述的同意程度(简称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即“为了家庭利益, 个人应该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二位”。题器选项是 1=很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很同意。

除家国情怀之外, 我们还需要测量个体对于儒家文化诠释的导向性。具体来讲, 儒家文化的宏观导向强调了儒家文化对于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意义, 而儒家文化的微观导向则强调儒家文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的意义。前者我们采取了被研究对象对以下陈述的认可程度来测量(简称儒家与国家发展), 即“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应该高举儒家旗帜”, 后者的测量则采用了被研究对象对“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奉行儒家的道德规范”这一陈述的认可程度(简称儒家与日常道德)。两个问题的答案选项均是 1=很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很同意。

除这些关键变量之外, 我们在下面的经验分析中也考虑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1=女; 0=男)、是否接受大学教育(1=是; 0=否)、是否中共党员(1=是; 0=否)、婚姻状态(1=在婚; 0=其他)、地区(1=东部; 2=中部; 3=西部)以及月收入(log 转换)。本文所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发现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发现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3.855	0.889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3.844	0.895
年龄	39.496	11.837
性别(女)	46.507%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是)	10.428%	
是否中共党员(是)	10.636%	

续表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婚姻状态 (在婚)	83.107%	
地区		
东部	45.047%	
中部	10.636%	
西部	44.317%	
log 月收入	7.074	0.684
N	959	

(三) 分析策略

本研究通过考察对“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同意程度与对“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同意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特征来测量家国情怀。换言之，如果超越个人面向家庭的利益导向和超越个人面向国家的利益导向之间存在正相关，我们就验证了“家”和“国”两个共同体在超越个体性方面具有正相关关系。为此，我们拟合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因变量为“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自变量为“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控制变量如上文所述，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补充分析中也拟合了排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相关经验发现其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一致。

在探索了家国情怀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接下来考察家国情怀程度如何因个人对儒家文化的诠释导向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这里采用的方法是有限混合模型 (McLachlan et al., 2019)。之所以采用有限混合模型而没有使用传统的交互项回归方法，是因为我们模型中的关键自变量和对儒家文化的诠释导向变量均为有限选项的分类变量，其交互项和回归模型主效应之间可能存在多元共线性关系。在本研究中，这一问题确实存在。当引入“儒家与日常道德”这一变量及其与“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交互项之后，两个变量及其交互项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是 19、20 和 42；而引入“儒家与国家发展”这一变量及其与“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交互

项之后，两个变量及其交互项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别是 11、19 和 29。这里的多元共线性问题表明，常规的交互项分析方法在此并不适用。

与交互项分析相比，有限混合模型采取了另外一种分析策略。其假设所分析的样本是由不同类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构成了潜在的人群分组，每个人群分组 i 对应的人数比例为 π_i 。那么基于总体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经验模式就是各个潜在群组内部模式的加权平均。以 x 来指代“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同意程度， y 指代“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同意程度，二者的回归模型系数为 β ，那么我们可以将二者的关系表示为 $f(y|x, \beta)$ ，其中 f 为某一概率密度函数。假设在总体中潜在群组有 c 个，则：

$$f(y|x, \beta) = \sum_{i=1}^c \pi_i f_i(y|x; \beta_i)$$

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不同群组的 β_i ，其代表了对应于该特定人群，“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之间的共变模式，也就是针对这一特定人群的家国情怀独有特征。例如，如果整个样本有两个潜在群组，一个群组的 β_i 统计显著为正，另一个群组的 $\hat{\beta}_i$ 统计不显著，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家国情怀仅在前一个群组中显著存在。如果整体数据中“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那么这个正相关也是由潜在的第一个群组主导形成的。在使用有限混合模型时，我们需要指定群组的数量以及概率密度函数 f 的类型。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首先用两个群组数量 ($c=2$) 估计有限混合模型，然后不断提高 c 的取值，并查看模型拟合优度是否得到改善。如果增加潜在群组后，模型拟合优度没有显著改善，那么我们保留既有群组数量及其对应的分析结果。至于概率密度函数的类型，我们基于常规操作选择了正态分布 (Zhou & Hu, 2013)。

(四) 经验发现

对家国情怀的整体描述性发现参见图 3。可以发现，“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二者的趋势线的斜率显著为正。因此，平均而言，认可家庭对于个人

利益的超越也倾向于认可国家对于个人利益的超越。这二者的正向共变性体现了家国情怀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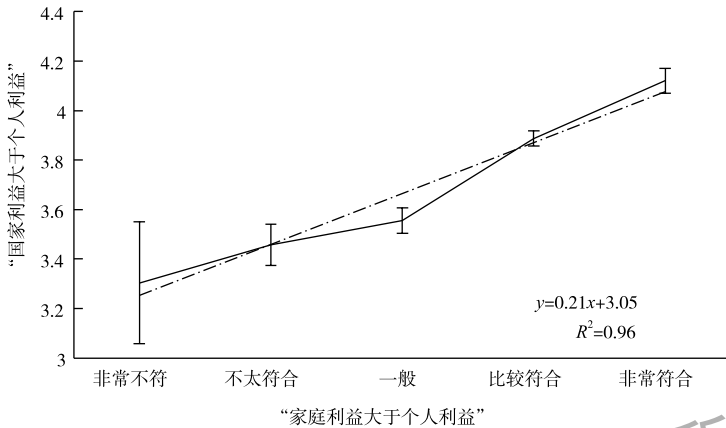


图3 家国情怀的描述性模式

表2展示了在考虑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如何在平均意义上和“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关联。与描述性发现的结论一致，回归系数为正 ($\hat{\beta}=0.236$)，且统计显著 ($p<0.001$)。

表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0.236	(0.031)	***
年龄	0.010	(0.003)	***
性别 (女)	0.007	(0.057)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是)	0.167	(0.096)	
是否中共党员 (是)	0.123	(0.094)	
婚姻状态 (在婚)	0.134	(0.084)	
地区 (东部)			
中部	0.099	(0.097)	
西部	-0.010	(0.062)	

续表

log 月收入	0.060	(0.045)	
截距	1.979	(0.390)	***
调整 R^2	0.0845		
N	959		

注：因变量为“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01$ （两端检验）。

有限混合模型分析结果参见表 3。在尝试不同的潜在群组数量之后，只有两个群组的设定能够返回具有收敛性的经验结果。因此，我们在这里报告的是基于两个潜在群组的相关发现。具体而言，在群组 1 中，“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hat{\beta}=0.440$, $p < 0.001$ ）。但是这一基本模式在群组 2 中就不成立（ $\hat{\beta}=0.066$, $p > 0.1$ ）。换言之，有限混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们分析的整个样本存在两个潜在群组，其中群组 1 表现出明显的家国情怀，群组 2 却没有呈现家国情怀的特征。由此可见，上文所报告的在平均意义上家国情怀的显著发现，应当是由群组 1 的个体主导形成的。也就是说，群组 1 和群组 2 的加权平均结果塑造了整体的基本模式。

表 3 有限混合模型分析结果

		群组 1			群组 2	
“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0.440	(0.068)	***	0.066	(0.040)	
年龄	0.006	(0.006)		-0.002	(0.003)	
性别（女）	-0.009	(0.113)		-0.074	(0.058)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是）	-0.317	(0.199)		-0.041	(0.095)	
是否中共党员（是）	0.105	(0.189)		0.262	(0.092)	**
婚姻状态（在婚）	-0.136	(0.169)		0.067	(0.086)	
地区（东部）						
中部	-0.219	(0.205)		0.059	(0.092)	
西部	-0.031	(0.122)		-0.132	(0.062)	*

续表

		群组 1		群组 2	
log 月收入	0.062	(0.095)		-0.115	(0.044) **
截距	1.109	(0.799)		4.903	(0.384) ***
类别 1 比例	40.91%				
类别 2 比例	59.09%				
log likelihood	-1149.17				
<i>df</i>	23				
AIC	2344.331				
BIC	2456.246				
<i>N</i>	959				

注：因变量为“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01$ ，** $p < 0.01$ （两端检验）。

有限混合模型的一个优势在于，基于其基本发现，可以进一步针对每个被研究对象，预测其进入特定群组的概率。这里只有两个群组，因此可以计算相对于群组 2，每个个体进入群组 1 的概率。考虑到家国情怀只在群组 1 中体现出来，这一概率也可以理解为进入具有家国情怀群组的概率，进而我们可以分析对于儒家文化的不同诠释导向如何影响这一概率的大小，相关发现参见表 4。从表 4 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否控制本文所列举的控制变量，“儒家文化与日常道德”这一变量都会显著地拉低一个个体进入群组 1 的概率，即降低其具有家国情怀的可能性（ $\hat{\beta} = -0.396$, $p < 0.001$ ； $\hat{\beta} = -0.400$, $p < 0.001$ ）。与之相比，将儒家文化和国家发展相联系的意义诠释则会提高一个个体进入群组 1 的概率，即提高其具有家国情怀的可能性（ $\hat{\beta} = 0.110$, $p < 0.05$ ； $\hat{\beta} = 0.115$, $p < 0.05$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理论论辩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对儒家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诠释和个体的家国情怀呈正相关关系，而对儒家文化意义的微观导向诠释则会降低个体具有家国情怀的可能性。以此，我们展示了家国情怀在经验层面上的人群异质性。

表 4 儒家文化诠释与家国情怀关系的分析结果

		模型 I			模型 II	
儒家与日常道德	-0.396	(0.056)	***	-0.400	(0.057)	***
儒家与国家发展	0.110	(0.051)	*	0.115	(0.052)	*
年龄				-0.001	(0.004)	
性别 (女)				-0.002	(0.086)	
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是)				-0.022	(0.152)	
是否中共党员 (是)				-0.033	(0.138)	
婚姻状态 (在婚)				0.011	(0.121)	
地区 (东部)						
中部				-0.036	(0.162)	
西部				0.030	(0.090)	
log 月收入				0.062	(0.071)	
截距	0.711	(0.193)	***	0.323	(0.598)	
Log pseudo likelihood	-504.478			-504.177		
AIC	1.058			1.074		
BIC	-6138.91			-6084.59		
观测值	959			959		

注：因变量为有限混合模型预测的个人属于群组 1（相对于群组 2）的概率。在群组 1 中，“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群组 2 中，二者之间统计独立；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01$ ，* $p < 0.05$ （两端检验）。

四 结语

家国情怀是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然而，对家国情怀的既有讨论往往存在重家轻国、忽视个体、过度嵌入历史制度、抽象化以及片面情感化的局限。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家国情怀是行动者表现出的一种认知特征，即家国在对个体超越方面所体现出的正向关联。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家国情怀的人群异质性，并以此摆脱历史制度设计的羁绊。此外，将个人作为基本参照点，这一概念化凸显出“家”与“国”的

超越性和“家”与“国”之间的一致性，避免了“重国轻家”的局限性。最后，本文以一种中立的“超越性正相关”为线索，避免了“情怀”一词的模糊性和情感导向上的片面性。通过这一概念化，家国情怀与社会学诸多主流理论之间实现贯通，我们进而可以通过丰富的国内外社会学理论资源来增强对家国情怀的理解。

基于这一概念化，本文进一步梳理和拓展了文化动机理论。本文指出，行动者所持有的文化意义是多样化的，这些文化意义可以被行动者选择和使用，从而激活特定的行动模式或者偏好。顺着这一思路，个体文化意义的使用既可以是宏观导向的，也可以是微观导向的，二者对个体的家国情怀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为了验证本文的理论论辩，我们将家国情怀背后的个体文化意义定位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观念，以此呈现一个具体的经验实例。通过对公众生活态度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对儒家文化意义的宏观导向诠释和个体的家国情怀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对儒家文化意义的微观导向诠释则会削弱个体的家国情怀。这一经验模式验证了文化意义诠释层次的差异对个体家国情怀的异质性影响。

参考文献

- 陈冬，2014，《集体主义的中西方思想渊源》，《理论月刊》第5期，第55~58页。
- 陈望衡、张文，2021，《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天津社会科学》第5期，第125~130页。
- 迟成勇，2018，《关于儒家“知行合一”的道德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38~44页。
- 范可，2016，《家国情怀与守望尊严是民族相处之道——与纳日碧力戈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第7期，第66~73页。
- 费孝通，2004，《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
- 高昕、杨威，2021，《新时代家国情怀的现实基础、价值内蕴与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第36~43页。
- 胡安宁、周怡，2013，《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28~54页。
- 胡安宁，2020，《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化传承：实践—认知图式导向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135~155页。
- 胡安宁，2022，《论传统文化之“不证自明性”》，《社会科学》第9期，第148~

158 页。

- 康晓光, 2008, 《中国归来: 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 世界科技出版社。
- 刘松, 2019, 《主体自由、民族和睦、文明提升: 家国情怀的历史衡量三维标准探析》, 《山东社会科学》第 5 期, 第 89~95 页。
- 刘余莉、聂菲璘, 2021, 《家国情怀的精神境界与历史文化内涵》, 《甘肃社会科学》第 5 期, 第 152~159 页。
- 刘紫春、汪红亮, 2015, 《家国情怀的传承与重构》, 《江西社会科学》第 7 期, 第 41~46 页。
- 马克思·韦伯, 2007,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康乐、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钱念孙, 2020, 《家国情怀的萌生与君子人格的确立》, 《江淮论坛》第 2 期, 第 5~11 页。
- 沈毅, 2007, 《“仁”“义”“礼”的日常实践: “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 《开放时代》第 4 期, 第 88~104 页。
- 塔尔科特·帕森斯, 2012, 《社会行动的结构》, 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 译林出版社。
- 肖文明, 2022, 《反思“行动中的文化”的理论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 2 期, 第 87~98 页。
- 阎云翔, 2006,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第 201~213 页。
- 杨清荣, 2005, 《儒家义利观解读》, 《道德与文明》第 1 期, 第 24~27 页。
- 叶静怡, 1999,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第 63~68 页。
- 张军, 2019, 《共同体意识下的家国情怀论》, 《伦理学研究》第 3 期, 第 113~119 页。
- Banfield, Edward. 1967.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 Berger, Peter L. and Hansfried Kellner. 1965. “Arnold Gehlen and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s.” *Social Research* 32(1), 110-115.
- Chan, Joseph. 2013. *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New Jersey,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astwood, Jonathan. 2005. “The Role of Ideas in Weber’s Theory of Interests.” *Critical Review* 17(1-2), 89-100.
- Fukuyama, Francis. 1999. “Social Capital and Civil Socie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eminar/1999/reforms/fukuyama.htm>(2023-5-22).
- Harmon-Jones, Eddie and Judson Mills. 2019.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nd an Overview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pp. 3-24 in Eddie Harmon-Jones ed. *Cognitive Dissonance: Reexamining a Pivotal Theory in Psychology*.



-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Harris, Marvin. 1976.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mic/Etic Distinc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5(1), 329–350.
- Hunzaker, M. B. Fallin and Lauren Valentino. 2019. "Mapping Cultural Schemas: From Theory to Meth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4(5), 950–981.
- Lizardo, Omar. 2017. "Improving Cultural Analysis: Considering Personal Culture in Its Declarative and Nondeclarative Mo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 88–115.
- Martin, John Levin. 2010. "Life's A Beach but You're An Ant, and Other Unwelcome News for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Poetics* 38(2), 229–244.
- McLachlan, Geoffrey J., Sharon X. Lee and Suren I. Rathnayake. 2019. "Finite Mixture Models." *Annual Review of Statistics and Its Application* 6, 355–378.
- Münch, Richard and Neil J. Smelser. 1992. *Theory of Cul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Quinn, Naomi. 2018.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American Marriage: Limitations of the Tool Kit Theory of Culture." pp. 139–184 in Naomi Quinn ed. *Advances in Culture Theory from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
- Vaisey, Stephen. 2009. "Motivation and Justification: A Dual-process Model of Culture in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6), 1675–1715.
- Zhou, Yi and Anning Hu. 2013. "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6(2), 63–90.

社会计算的内涵与前瞻

万 怡 郑 路 罗家德 吴国炜*

摘 要：社会计算近年来已获得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社会计算的历史与学科发展，界定社会计算的核心概念，厘清“社会计算”与“计算社会科学”的差异，比较国内与国际研究的侧重点。接着，本文介绍社会计算的研究主体、前沿研究领域，以及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社会”与“计算”两方面彼此促进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展望社会计算未来的发展趋势，认为社会计算作为跨学科领域，将受益于多学科领域间的对话和持续增长的社会大数据，发展出更多样化的研究工具和更丰富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社会计算 计算社会科学 跨学科研究 大数据

一 社会计算发展现状

(一) 什么是社会计算

国内外研究者对“社会计算”的概念认知存在一定混淆之处，因此，在讨论社会计算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前，我们需要先对社会计算的定义、历史和学科发展做出解释，以便为研究方向的定位提供参考。

* 万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郑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通讯作者）；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吴国炜，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感谢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清华大学社会网络研究中心的资助，同时感谢清华大学校内自主科研项目“基于通讯数据的关系强度与社会资本挖掘”（项目编号：2016THZWYY03）、腾讯研究项目“以微信及QQ大数据分析个人人脉”（项目编号：20162001703）的资金支持。本文贡献者还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蒋理慧，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系杨虎、张应杉、刘佳馨，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的傅晓明，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院的樊瑛，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黄宏。

“社会计算”一词最早于1994年出现在国际学术文章中。舒勒（Schuler, 1994）提出“社会计算是指支持收集、表示、处理、使用和传播在团队、社区、组织和市场等社会集群中分布的信息系统”。社会计算最早起源于对人际网络在机器工具上的呈现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早期社会网络的兴起拓展了社会计算定义的范围：除了使用计算设备促进或增强用户的社交互动，还包括通过“评估”这些互动获取新的资讯（Evans, 2020）。卢加诺（Lugano, 2012）对社会计算的范式进行分类时，提出社会计算是计算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个跨学科领域，认为社会计算的研究嵌入社区、社会网络、社交关系和社交行为等概念，并引用了王飞跃等人的定义，指出社会计算应当包括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与人类社会动态（human social dynamics）研究。另外，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广泛应用，社交程序收集到的数据能够被用于更好地理解 and 计算社交世界，由此进一步促进了社交互动，而更多的互动和数据也使社会计算的发展由研究小规模的二元交互升级至探索大规模的万物互联的社会。“社会计算”的概念被飞速增长的网络互动和软件的发展生产出的大量数据不断重构，研究范围也得以一再扩展。

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下，“社会计算”往往与“计算社会科学”混为一谈，虽然“计算社会科学”与“社会计算”有着重合、类似的研究主体，但是从核心概念上仍需区分两者的边界。

詹姆斯·埃文斯（James Evans, 2020）在讨论“社会计算”的历史、现状和展望时，提出社会计算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计算（Computing）与社会性（Sociality）。社会计算研究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社会性如何增强计算；二是计算如何增强社会性。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2012）认为社会性是人类的倾向，埃文斯在引用布鲁克斯的概念时这样形容，如果计算代表的是机器的认知，那么社会性和沟通就是人际网络。计算与社会性是两个能够彼此嵌入的概念。由原来单单研究人的社会性，到研究计算机器的系统和网络，两者能够彼此嵌入，拓展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提出：“社会计算”主要研究人的行为与决策和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的决策和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人机交互与人机共构网络。

2009年，拉泽（David Lazer）等15位专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

《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一文,被学界普遍认为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开山之作。在这篇宣言中,他们提出“计算社会科学正在兴起,它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规模来利用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而将这些计算能力和算法应用于复杂的数据上以研究社会现象,是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定义(Lazer et al., 2009)。这一定义类似计算可以增强社会性的面向,因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动态电脑模拟扩大了研究者对社会性的认知。

拉泽等(Lazer et al., 2009)认为,从源头来看,计算社会科学在2000年之前指的是以计算方法代替理论假设并进行电脑模拟,以考察给出一组既定的社会规则是否足够在电脑模拟中产生预期的结果;而在2000年后,社交网络的兴起和网上社会生活的丰富使计算社会科学转向从博客、社交媒体、社交网络和其他数字痕迹中获得爆炸性增长的数据,并以计算机进行辅助分析。

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数据和计算能力的增长进一步促成了一种“扩展的社会学的想象力”(Evans and Foster, 2019),数据革命使得可供社会科学研究者施为的空间从原有的调查资料扩展到线上互动数据,再到网上实验和大量的非结构化多模态数据等,譬如历史资料的大规模数字化,以及移动通信、社交媒体、线上支付和可穿戴设备自动产生的大量的数据。这些不断发展的大社会数据(big social data)给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研究人类行为,包括一些小概率但重要的事件(Evans, 2020)。相应的,大社会数据的出现同时也催生了对工具的需求,相关工具可以将非结构化数字信息转化为可供分析的形式。深度神经网络、随机森林、降维、高性能计算、复杂网络、动态建模、各类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发展极大提升了模型和工具进行模拟的可能性。大数据和计算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些数据上发现假设,并在其他数据上进行测试。社会科学乃至各领域的研究者都将受益于此。

(二) 社会计算主要内涵

在“计算社会科学”和“社会计算”在国际与国内逐步大规模使用的

背景下，黄萃与杨超（2020）对国内外“社会计算”和“计算社会科学”进行了概念辨析与研究热点的比较分析。该研究是一个基于文献计量的学科研究比较分析，在数据采集过程中使用的是明确的基础检索词，即社会计算、计算社会科学以及两者对应的英文翻译，共计四个关键词，其他子关键词、子领域——如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Sociology）、计算经济学（Computational Economics）则没有包含在内。这与当下“计算社会科学”和“社会计算”作为年轻的新兴领域其概念和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有关，在这一前提下，规避不够成熟一致的子检索词能够降低研究者因为主观认知带来的检索结果偏差。鉴于拉泽等（Lazer et al., 2009）所提出的宣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国际上，计算社会科学基本沿袭了该文提出的概念定义，而社会计算则更多被视为计算机科学，是社会行为和计算系统的交叉学科，对通过社交软件和计算机技术获得的用户交互信息进行分析，并研究计算机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以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国内学界对“计算社会科学”的理解与国际学界的一致性较高，在对“社会计算”的理解上与“计算社会科学”并无太大的差异，两者的重点都是“利用先进的计算方法和信息技术等对复杂的人类行为、社会活动、社会组织等进行深入的跨学科研究”（黄萃、杨超，2020）。

也有学者认为“计算社会科学”是传统社会科学的延续（严宇等，2022），而拉泽及其合作者的宣言开启了计算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其突破点体现在：①数据规模、结构、来源等方面有所变化；②研究视角由理论驱动研究转向数据驱动研究；③研究重点着眼于相关性而非因果性问题。由于具体学科的“可计算性”和“计算化”程度不同，社会计算在政治学、社会学、传媒学、法学等社科领域向大数据方法转型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略有差异，但社会计算仍是传统研究与大数据衔接的桥梁。

Chen等（Chen et al., 2016）注意到，虽然人类和社会行为、能力和表现均是计算社会科学与社会计算的关注重点，但计算社会科学主要关注使用现代技术、数据和算法来理解和描述在自然发生的环境中的社会互动，社会计算与之相比，更侧重于设计和构建“人机混合”系统，并引导和塑造人类的集体行为；同时他们也强调，社会计算从根本上是社会性的。



孟小峰等（2013）通过梳理社会计算的发展历程，指出虽然在概念上社会计算与计算社会科学并不相同，但两者都是关于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孟小峰、余艳（2022）提出将社会计算视为一门面向社会科学，使用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工具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进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学科。因而需要以交叉性的学科理论为基础，利用计算科学的方法，以人类社会各领域中产生的大数据为研究对象，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复杂社会问题，进而改造社会、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作为学科的社会计算所呈现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体现出技术与社会的互相渗透与融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当下的社会计算和对社会计算最初产生时的理解就应当（或已经）出现分野——不仅是计算机科学或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简单交叉，而是能够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推动具有复杂适应性的社会智能的发展。

周涛等（2022）通过对由社会计算驱动的五类社会研究的介绍，强调社会计算带来了方法论层面的革新，社会计算扎根于社会现实问题，解释和联系社会科学理论，不应将社会计算视为计算机科学和社会数据的简单叠加。

总体而言，社会计算既有着广阔的研究视野，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关切，使其日渐繁盛在社会科学的各领域。

二 社会计算的发展格局

自社会计算诞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研究机构以及互联网企业在社会计算理论和应用方面有着大量投入和成果。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近年来也步入了社会计算的领先赛道。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陈阳团队使用 DBLP 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数据驱动的研究（Wu et al., 2022），根据论文发表量及出版物数量，将社会计算研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初创期（1994~2008年）、快速增长期（2009~2014年）、稳定期（2015~2021年）。不同时期出版地点的变化也显示出社会计算研究领域多样性的增长和影响范围的扩大。而在研究合作网络显示出重要作用的核心国家大多为

欧美国家，中国则在稳定期实现了巨大飞跃，成为核心国家中的第二位。

（一）研究主体

在具体的研究主体上，社会计算并不以学术单位独大，独立研究机构、大学、互联网企业等亦结合自身特长推动着社会计算的发展，可以说，社会计算本身就呈现出“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两个时常彼此交汇的面向。

以高校为例，在学生培养方面，如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卡耐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均有直接以社会计算为主题的研究生或本科生课程，课程内容囊括社会数据挖掘与分析、在线协作、交互设计、虚拟社区等，帮助学生了解社会计算的相关技术，理解技术和社会互动是如何互相塑造与促进的。与此同时，学生还需要掌握分析、设计在线社区的方法或自行设计众包项目。尽管相关课程大多面向计算机专业开设，但并不拒斥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加入。在科学研究方面，高校当中也大量建立了社会科学、计算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验室或研究小组，如芝加哥大学的知识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哈佛大学计算与社会研究中心、剑桥大学的社会动力学研究小组等。

基于社会系统、社会网络的复杂性，社会计算与复杂系统研究有着无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作为复杂系统研究重镇的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FI, Santa Fe Institute）持续滋养着社会计算、计算社会科学。圣塔菲研究所最近关切的研究议题包括算法正义，复杂社会的涌现，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共同进化，城市、规模和可持续性……成为开拓社会系统相关研究新版图的灵感来源。

企业是社会计算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惠普社会计算技术实验室、微软社会计算小组、IBM 社会计算小组等。科技企业开展的社会计算研究在深度挖掘用户数据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并在建立推荐系统、发展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技术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科技公司所掌握的数据和算力也有助于研究的开展。比如，获得 2018 年图灵奖的三位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深学者，都是在学术单位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在科技公司



担任首席科学家或高级研究员，实现了学术和产业界的联动。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科技公司聘用经济学者组建团队也是新的热门趋势，针对自身需求，科技公司会为经济学者提供相当数量的职位，主动聘请获得学位的经济学博士或邀请已有研究成果的经济学专家，除管理领域以外，其特别会在业务领域发挥专长，解决科技公司发展的商业问题。经济学者在科技公司内担任的具体职务受到公司接纳程度的影响，除了直接招聘，科技公司也会与高校的经济学研究团队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学术研究成果，证明了经济学研究者在计算领域的潜力（Athey and Luca, 2019）。

未来，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计算领域将会有更为广泛的参与。以 OpenAI 公司于 2019 年底发表的题为《人工智能安全需要社会科学家》（*AI Safety Needs Social Scientists*）的论文为例，其认为对于人工智能对齐算法的不确定性，需要有社会科学家的加入以训练人工智能，从而避免机器学习的弊端（Geoffrey and Askill, 2019），并且呼吁有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背景的社会科学家加入 OpenAI 主导的相关实验。

应当充分认识到，发端于网络社会的社会计算将持续吸引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研究当中，它将激发更具社会性眼光的计算机科学、发展更具应用功能的社会理论研究以及更能适应经济社会需求、促进社会互动的产业变革。

（二）研究领域

对 WOS 文献数据库包含“social computing”的 1093 篇英文文献做国际“社会计算”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分析，得出关键词最集中的前 15 项聚类结果（黄萃、杨超，2020），我们将埃文斯（Evans, 2020）对“社会计算”的三个分类与这一聚类结果相结合，可以划分出如表 1 所示的三个大类。

人的行为与决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的相关研究，包括社会网络、市场环境、人为因素、用户研究、非语言行为、心理健康六个类别；人工

智能的决策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的相关研究，包括先进计算、物联网、普适计算、城市计算、大数据应用五个类别；人机交互与人机共构网络的相关研究包括协作和社会计算、计算机辅助决策、合作工作、人工社会四个类别。这三个大类的界线并不特别清晰、分明，有重合交互的部分。

表 1 “社会计算”研究关键词分类

人的行为与决策、 人与人之间的网络	人工智能的决策、 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	人机交互与人机共构网络
社会网络	先进计算	协作和社会计算
市场环境	物联网	计算机辅助决策
人为因素	普适计算	合作工作
用户研究	城市计算	人工社会
非语言行为	大数据应用	
精神健康		

在学科领域范围上，对关键词共现网络基于模块度算法进行聚类，发现整体而言，国际社会计算研究比国内社会计算研究覆盖领域更广，涉及学科更多。而在学科研究热点主题上，基于关键词共现网络计算各节点特征向量中心性，识别国内外社会计算和计算社会科学研究热点主题词，结果显示，国内社会计算研究相较国际更偏向社会科学研究（黄萃、杨超，2020）。

通过构建研究主题网络发现，社会计算经历了从应用计算度量来解决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发现和人机交互等经典问题，到将注意力聚焦于各种在线社交媒体服务以及移动设备带来的社交方式，再到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最先进的技术成为社会计算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体现于各类社会科学研究场景当中（Wu et al., 2022）。

社会计算不仅是跨学科的方法，更能够作为一种探讨全新概念和更为广阔领域的研究背景，与复杂系统、复杂网络研究等前沿领域充分结合，复杂系统研究所衍生的大量方法也是社会计算的重要方法。

复杂性科学主要包括早期研究阶段的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中期研究阶段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网络理论和元胞自动机理论，近期则有复杂网、动态网、多主体建模、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以及定性、定量与大数据的综合研究方法。复杂系统研究同时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理论，卡斯特兰尼 (Brian Castellani) 和哈弗蒂 (Frederic William Hafferty) 梳理了各类复杂性科学发展历史 (Castellani & Hafferty, 2009)，认为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复杂系统研究和社会学跨学科融合已形成五个学派，包括复杂社会网络学派 (Complexit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或称新网络科学派)、计算社会学派 (Computational Sociology)、复杂理论英国学派 (the British-based School of Complexity)、控制学派 (Sociocybernetics)、卢曼学派 (Luhmann School of Complexity)。复杂性科学研究重镇包括美国的斯塔菲研究所、西北大学复杂系统研究所、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密歇根大学复杂系统研究中心，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牛津新经济思想研究院，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复杂系统动力研究所，法国巴黎复杂系统研究所等。

基于社会计算对“社会互动”的特别关注，社会网络分析 (SNA) 乃至复杂网络分析将成为社会计算的重要阵地。梅森·波特 (Mason Porter, 2020) 结合研究旨趣与网络科学的发展情况，认为未来复杂网络研究的热点可能会有：①时序网络 (temporal networks)，即关注社会网络分析的节点中心度指标，包括介度中心度、连通度、特征向量中心度等，这些指标可以用于衡量时序网络节点的重要性如何随网络结构的改变而变化；②网络上的动力学过程 (dynamical processes on network)，即研究节点之间的互动机制，网络动力学 (network dynamics) 能够研究网络中节点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动态变化，探究网络复杂性的成因；③自适应网络 (adaptive network)，即关注节点行为与网络结构的共同演化，考察节点间的博弈如何影响节点间的合作以及群体后果 (collective outcomes)，如群体行为、群体智慧的涌现；④高阶网络 (high order network)，由于许多交互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两点之间，这使得研究者需要对网络的高阶结构有所关注，高阶网络可以用多个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复杂系统进行描述，进一步考

察节点间的互动模式导致的相变 (phase transition)、分叉 (bifurcations)。长于复杂网络研究的有美国的耶鲁大学网络科学研究所、肯塔基大学社会网络分析中心, 英国的巴斯大学网络和集群行为研究中心等科研单位, 著名学者有阿尔伯特·巴拉巴西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尤金·斯坦利 (H. Eugene Stanley)、马克·纽曼 (Mark E. J. Newman) 等。

复杂系统对社会生活的分析被称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适应性是复杂性的来源之一。对社会科学而言, 复杂适应系统促进了对涌现现象的动力与机制的认识, 不再视线性发展为社会系统的基本特征, 认识到非线性与交互效应的重要性, 促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 解释诸如市场、企业、文化等底层系统的强健性 (robustness, 又称鲁棒性); 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范式开始关注共享特定链接模式的网络, 促进了适应性动态建模的新发展, 计算模型为研究主体 (agent) 学习行为开启了新前沿 (Miller and Page, 2007)。

再以社会计算对传统社会科学的启发为例, 在社会学领域中, 随着计算社会科学、社会计算理念与方法的革新与演变, 一些分支领域得以焕发新的活力, 一篇以文献计量学为研究方法的论文发现有七个领域发展较为迅速, 包括: ①社会网络分析与群体形成; ②集体行动与政治社会学; ③知识社会学; ④文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学; ⑤文化的生产; ⑥经济社会学与组织; ⑦人口统计与人口研究 (Edelmann et al., 2020)。不难看出, 计算方法在利用新数据发展人类行为理论上颇具效能, 社会科学研究者既可以用新数据、新方法回应已有问题, 更可以对随着学科发展产生的新问题发起挑战。

埃文斯 (Evans, 2020) 指出, 社会计算领域的学术研究涉及在线协作行为、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 (CSCW)、系统与形式设计等, 而群体智慧 (或称“社会智能计算”) 也是社会计算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除这些既有的研究之外, 就像他所提出的, 以“计算”和“社会性”为核心, 社会计算的研究领域将有更加丰富的可能。麻省理工学院人类动力学实验室主任亚历克斯·彭特兰 (Alex Pentland) 试图通过“社会物理学”将大数据加以开发利用, 对网络环境中的各类相关数据进行智能化解析, 以更



精确地描述人类的行为与关系。他还特别关注“思想流”研究，以动态、创新的视角认识组织和社会系统，探究社会规则中的创新点和复杂系统的形成过程（Pentland，2014）。

（三）社会与计算的相互增强

在埃文斯对“社会计算”概念扩展的描述中，社会计算包含着“由计算增强的社会和社会科学”“由社会增强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科学”，以及两者之间复杂且能彼此促进的组合（Evans，2020）。

一方面，计算在增强对社会的研究，算法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方法和工具。例如，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数据科学家约书亚·布鲁门斯托克（Joshua Blumenstock）与合作伙伴们通过小样本的问卷调查与大数据结合的方法，在缺乏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卢旺达全国的家庭财富不平等状况和区域分布。研究使用的数据由卢旺达的手机运营商提供，在150万手机用户中随机抽取865名手机使用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设置是否拥有私人交通工具、大型家用电器等相关调查问题判断受访者的经济状况，通过与手机通话、话费数据生成的变量的比对，研究者发现受访者的通信网络使用情况和其财产状况呈高度正相关。结合这一发现，研究者将问卷调查数据作为训练集，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找到了通过手机使用数据预测财富状况的模型，再以没有参加问卷调查的其他手机用户的数据进行样本外预测，得到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精确度。研究者还以调查中得到的30个地区的数据作为扎根真相，结合手机通信网络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以手机使用数据预测财富状况的模型准确性（Blumenstock et al.，2015）。这种方法为调查经费有限的地区提供了参考。类似的研究还有2020年发表的一篇以多光谱卫星图像结合调查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的模型预测非洲多个国家集群级别的财富状况的研究，该模型同样表现出较佳的预测能力（Christopher et al.，2020）。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升在科学研究层面与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社会也在增强对计算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正在推动算法朝着改善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例如，Airbnb网站采取实名交易制度，并

且给予房东较高的自由度，房东有权在看到住客信息后直接拒绝、取消客人的租住请求。研究者们开展了一项线上的随机实验，开设 20 个新账户，头像空白但账户名称为黑人群体、白人群体各自较为通常使用的姓名，以使账户具备“种族”属性，两个种族内各设置均等的男女比例。研究者用这 20 个账户向美国境内不同城市的数千个房东发送同样的申请订单，实验结果显示：“黑人账户”的申请被接受的概率远低于“白人账户”，在模型中控制了各类变量后结果仍是如此，这说明该网站存在普遍的歧视和偏见 (Edelman et al., 2017)。研究公开后，Airbnb 受到了监管方和用户的质疑，为此，研究者向 Airbnb 提出了系列建议，包括重视算法可能存在的潜在偏见、提高交易流程自动化的程度、房东筛选住客需要付出成本、隐匿部分信息直到完成交易等措施 (Fisman and Luca, 2016)。这些方法也适用于存在类似歧视现象的网络市场，一方面维护了受歧视用户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帮助企业实现了业务增长。此后，Airbnb 成立了相关团队持续研究、解决可能存在的歧视问题。一如陈阳团队在研究中所指出的：社会计算能够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新的可能性 (Wu et al., 2022)，甚至有望革除人类社会的沉疴。

三 未来发展趋势与展望

大数据一方面带来了丰富的信息材料，使得研究范围、层次得以拓展，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现象、社会理论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从而驱动社会计算的发展。但不能否认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能运用的网络大数据可能存在数据完整性不足、数据代表性欠佳、数据质量不均衡的弊端，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结合、调整统计策略、以大数据研究的结果与传统研究的结果形成交叉验证的方式进行弥补 (罗俊, 2020)，这也与社会计算研究所具备的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取向相符。对于大数据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知识边界、伦理制约等方面的困境，则可以尝试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模式来寻求突破。

大数据方法、社会计算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均积累了一定

数量的案例和经验,促进了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上的转变,如上述的复杂系统、涌现现象、多层网络交互和演化机制等,在过去只有理论臆测,而现在不仅能够建立模型并使用资料加以验证,还可以通过各类 AI 算法探索理论的新边界与新细节(罗家德等,2021),并通过反绎方法进一步整合这些理论、建模与数据(周涛等,2022)。

随着大数据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整合,新工具、新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由理论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向由数据驱动的探索性研究与理论驱动的验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向转型,具体表现在:在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从大数据中寻找新的模式和关系,研究结果从数据中“涌现”,而非仅仅检验预设的假设;通过仿真实验,研究者能深化对复杂社会现象的理解,大数据可以提升仿真结果的准确性和泛化能力;同时,大数据与定量、定性方法的融合,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入且动态的视角。另外,数据、算法驱动社会科学研究转型的路径,在社会计算仍在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仍应当按照科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展开,先做具体的“白盒研究”,可能呈现为研究范例、算法模型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从中抽象出通用性较强的“黑盒模型”(李国杰,2012)。

在除互联网外的实践应用领域,社会计算的研究过程与成果也能提供有益借鉴。譬如,通过建立社会计算实验平台,进行“人工社会”实验,对不同实验方案进行对比,对“人工社会”与实际系统进行对比参照,以便形成对相关行为、决策的实验与评估(王飞跃、史帝夫·兰森,2004)。王飞跃(2004)在提出将人工社会和计算方法系统应用于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的“设想”时,指出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对大量动态社会经济信息的开发由于其本质的复杂性而有较高的难度,但随着新数据、新工具的长足发展,这项工作的开展在今天成为可能,在金融市场、工程领域已经得到了初步应用。未来,需要为大规模的社会计算作出计算环境、建模仿真环境、应用工具等方面的部署(王飞跃等,2010)。

作为年轻的研究领域,社会计算方兴未艾,也必然会随着社会和计算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从1994年发展之初,因为社交网络的兴起而进行的针

对人的行为与决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的研究，到算力算法增强后开展的对人工智能的决策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网络研究，再到人机互动已逐渐成为常态的当下，可以预测人机交互、人机共构网络研究将愈趋主流。已有研究发现：人类和算法在许多情况下共同作出的预测比二者各自进行的预测更准确，在未来，如何加强人类和算法的合作将成为社会计算的趋势（Hong et al., 2021）。

当然，我们无法确保正在成长的社会计算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例如人为价值判断可能进一步加深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导致的算法歧视、算法诱导沉迷等，这呼吁社会计算领域的研究者、从业者应当以更为审慎负责的态度发展社会计算的技术与理论。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技术、算力进一步的发展以及人类在各类媒体、生活场景中更为沉浸式的智能化体验，人工智能、机器已成为社会互动的重要环节，在人与机器的交互中，可能激发出更多关于社会计算的新进展、探索出更多关于社会计算的新发现，从而有机会为社会带来增益。随着人和机器以及它们所形成的网络的共同演化，社会性与计算更深入地结合、碰撞，社会计算将为计算社会科学和“有社会见地的计算机科学”提供更多崭新的议题（Evans, 2020）。

参考文献

- 黄萃、杨超，2020，《“计算社会科学”与“社会计算”概念辨析与研究热点比较分析》，《信息资源管理学报》第6期，第4~19页。
- 李国杰，2012，《大数据研究的科学价值》，《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第9期，第8~15页。
- 罗家德、高馨、周涛、刘黎春、傅晓明、刘知远、苏毓淞，2021，《大数据和结构化数据整合的方法论——以中国人脉圈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69~91页。
- 罗俊，2020，《计算·模拟·实验：计算社会科学的三大研究方法》，《学术论坛》第1期，第35~49页。
- 孟小峰、李勇、祝建华，2013，《社会计算：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第12期，第2483~2491页。
- 孟小峰、余艳，2022，《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中深发展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计算机科

- 学》第4期,第3~8页。
- 王飞跃、曾大军、毛文吉,2010,《社会计算的意义、发展与研究状况》,《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第2期,第3~14页。
- 王飞跃、史帝夫·兰森,2004,《从人工生命到人工社会——复杂社会系统研究的现状和展望》,《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第1期,第33~41页。
- 王飞跃,2004,《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平行系统——关于复杂社会经济系统计算研究的讨论》,《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第4期,第25~35页。
- 严宇、方鹿敏、孟天广,2022,《重访计算社会科学:从范式创新到交叉学科》,《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第1期,第24~33页,第123~124页。
- 周涛、高馨、罗家德,2022,《社会计算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第10期,第130~155页。
- Athey, Susan and Michael Luca. 2019. "Economist (and Economics) in Tech Companies."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1), 209–230.
- Blumenstock, Joshua, Gabriel Cadamuro and Robert On. 2015. "Predicting Poverty and Wealth from Mobile Phone Metadata." *Science* 350(6264), 1073–1076.
- Brooks, David. 2012. *The 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 Castellani, Brian and Frederic W. Hafferty. 2009. *Sociology and Complexity Science: A New Field of Inquiry*. Berlin: Springer-Verlag.
- Chen, Yiling, Arpita Ghosh and et al. 2016.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for Social Computing."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9(12), 102–108.
- Christopher, Yeh, Anthony Perez, and et al. 2020. "Using Publicly Available Satellite Imagery and Deep Learning to Understand Economic Well-being in Africa."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 2583(2020).
- Edelman, Benjamin, Michael Luca and Dan Svirsky. 2017.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Applied Economics* 9(2), 1–22.
- Edelmann, Achim, Wolff Tom, Montagne Danielle and Bail Christopher A. 2020.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6(1), 61–81.
- Evans, James. 2020. "Social Computing Unhinged." *Journal of Social Computing* 1(1), 1–13.
- Evans, James and Jacob G. Foster. 2019. "Computation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ontexts* 18(4), 10–15.
- Fisman, Raymond and Michael Luca. 2016. "Fixing Discrimination in Online Marketpla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94(12), 88–95.
- Geoffrey, Irving and Amanda Askill. 2019. "AI Safety Needs Social Scientists." <https://openai.com/research/ai-safety-needs-social-scientists>.
- Hong, Lu, P. J. Lamberson, and Scott E. Page. 2021. "Hybrid Predictive Ensembles: Synergies Between Human and Computational Forecasts." *Journal of Social Computing* 2(2),



89-102.

- Lazer, David, Alex Pentland, Lada Adamic, Sinan Aral,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Devon Brewer, Nicholas Christakis, Noshir Contractor, James Fowler, Myron Gutmann, Tony Jabara, Gary King, Michael Macy, Deb Roy, and Marshall Van Alstyne. 2009.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323 (5915), 721-723.
- Lugano, Giuseppe. 2012. "Social Computing: A Classification of Existing Paradigms."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vacy, Security, Risk and Trust and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Computing, Amsterdam.
- Miller, John and Scott E. Page. 2007.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Social Life*. New Jersey,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ntland, Alex, 2014. *Social Physics: How Good Ideas Spread: The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 Porter, Mason A. 2020. "Nonlinearity + Networks: A 2020 Vision." pp. 131 - 159 in Panayotis G. Kevrekidis, Jesús Cuevas-Maraver, Avadh Saxena (eds.). *Emerging Frontiers in Nonlinear Science. Nonlinear Systems and Complexity*. Berlin: Springer.
- Schuler, Doug. 1994. "Social Computing."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7(1), 28-29.
- Wu, Jiaqi, Ye Bodian and et al. 2022. "Characterizing and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uting Through DBLP: A Data-Driven Analysis." *Journal of Social Computing* 3(4), 287-302.

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

——基于环境保护领域的实证分析*

孙小逸**

摘要：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与政府形象两个角度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而对治理过程的关注相对缺乏。本文提出从参与有效性的视角来解释公众满意度，即公众感受到政府与民协商的诚意、觉得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参与有效性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三个维度。在实证上，本文通过对 CGSS 2015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来检验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类参与有效性与公众环保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都显著提升了公众满意度，省层面的客观污染水平对公众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而政府透明度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不稳健。由此可见，引入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丰富并拓展政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完善公众参与过程、提升政府公信力等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公众参与 参与有效性 公众满意度 政府绩效评价

一 导论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是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的重要社会基础。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和政府形象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或者取决于客观治理绩效，或者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整体印象

*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基于三重治理逻辑的城市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生成机制、成效评估及推广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YJC810011）和复旦大学“双一流”学科重点项目“面向社会转型与治理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创新平台”的资助。

** 孙小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徐国冲, 2022; 曾莉、李佳源, 2013; 范柏乃、金洁, 2016; 李文彬、何达基, 2016; Stipak, 1979; Parks, 1984; Percy, 1986; Brown and Coulter, 1983; Park and Blenkinsopp, 2011)。这种研究路径主要关注政府治理结果, 而忽视了治理过程对公众评价的重要影响。程序正义理论指出, 相比于治理结果,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更多取决于其对治理过程的感知 (Tyler, 1990; Hollander-Blumoff and Tyler, 2011;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2)。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公众评价影响深远。一方面, 参与治理过程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 提升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效能感及对政策的支持度; 另一方面, 随着治理议题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网络媒介的扩大器效应, 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工作的期望与评价标准的分化度不断提高。公众参与不仅有助于多元化观点与诉求的表达, 也能使参与者学会尊重并接受与自己期望不同的治理结果, 促进共识的达成 (Halvorsen, 2003)。

然而,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能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只有公众眼中的有效参与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当前公众参与在地方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制约, 包括制度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地方政府的形式化推行、政府对公众参与的反馈不足、公众对政府考核评价缺乏话语权等 (张紧跟, 2017; 马亮、杨媛, 2019; 颜海娜等, 2021)。名义或形式化的参与不仅不能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反而有可能加剧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危机, 促使公众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发声, 影响社会的稳定 (Johnson, 2013; Sun and Huang, 2020)。在此情境下, 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公众参与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所在。换言之, 影响公众评价的并非参与行为本身, 而是参与过程及其有效性, 参与有效性则来源于公众对参与途径是否通畅、参与程序是否公正以及自己的声音能否被听到等方面的主观感知 (Kweit and Kweit, 2007)。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 公众参与理念及其规则在立法、行政、司法领域中日益扩展 (张紧跟, 2017; 黄学贤、齐建东, 2009; 朱未易, 2010)。现有研究着重考察行政执法领域的公众参与 (吴建南等, 2016; 颜海娜等, 2021), 对立法与司法领域的公众参与关注较少。本文认为, 一个完

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必须综合考察立法、行政与司法领域的公众参与有效性。从理论上说，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对公众评价的影响机理存在差异，分别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开放性、回应性与规范性的感知。从实践上说，这三个领域的参与既不是相互独立，也不是完全重叠的，而是环环相扣，共同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总之，本文引入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阐明了参与有效性形塑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从而丰富并拓展了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视角。实证上，本文将通过分析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来验证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梳理公众满意度的现有研究；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观点，阐述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第五部分呈现统计分析结果；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与讨论。

二 公众满意度的现有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从客观绩效和政府形象两个角度来解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客观绩效论提出，政府治理绩效对公众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公众满意度也越高。不少研究表明，政府环保绩效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林挺进，2015；李文彬、何达基，2016；李文彬等，2019）。然而，学界对客观绩效能否有效解释公众满意度仍存在争议。比如，斯迪帕克（Stipak，1979）的研究显示，客观绩效的大幅提升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非常小且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只要服务质量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公众就对公共服务的关注甚少，因而难以感知到服务质量的差异。除了对公共服务的了解程度之外，公众主观评价还受到个人偏好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评价标准取决于他们对服务质量的期望。在客观绩效相同的情况下，公众对服务质量的期望越高，满意度就越低（Van Ryzin，2004）。关

于环保满意度的研究也发现，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与他们对环境质量的期望成反比（卢春天、洪大用，2015）。此外，公众在评价政府工作时还可能存在归因偏差，因混淆不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而导致评价与客观绩效间存在差距（Stipak, 1979）。

面对斯迪帕克等人的质疑，后续研究尝试厘清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客观绩效理论模型，以提高主客观绩效评价的契合度（徐国冲，2022）。帕克斯（Parks, 1984）指出，客观绩效和公众主观评价间的差距源于研究方法上的偏误，包括主客观指标所测量的概念不一致、对客观绩效指标的聚合度过高以及理论模型设定不合理。为了纠正这些偏误，帕克斯主张在主客观指标之间建立一个联结机制，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经历和体验。换言之，客观绩效通过个人经历和体验影响公众的主观评价。与缺乏公共服务经历的公众相比，公共服务经历丰富的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更加准确。珀西（Percy, 1986）进一步完善了公众主观评价公共服务绩效的理论框架，指出公众的个人特征、对服务质量的期望、公共服务相关经历以及对客观绩效的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实证分析显示，在控制这些变量后，公众能够准确感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运用这些感知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曾莉、李佳源（2013）的研究发现，在整体层面上客观绩效对公众主观评价具有显著影响，而在具体层面上主客观评价之间的契合性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流程特征导致的。

政府形象论则提出，公众满意度并非取决于对特定服务领域的绩效评价，而是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感知。布朗和库尔特（Brown and Coulter, 1983）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质量评价对多个公众满意度指标呈现一致的显著影响，而公共服务的客观水平对公众满意度缺乏解释力。范柏乃、金洁（2016）从政府责任心、进取心、诚信度和廉洁度四个方面对政府形象进行测量，发现政府形象对公共服务绩效感知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在公共服务供给对绩效感知的影响方面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外，还有研究探究政府形象的特定面向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李文彬、何达基（2016）对政府透明度展开深入研究，发现政府透明度不仅显著影响公众满意度，

还会调节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由于政府公布的绩效信息与公众感受之间存在落差，政府透明度的提升反而会降低环保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帕克和布伦金索普的研究也证实了客观绩效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透明度和政府信任（Park and Blenkinsopp, 2011）。

虽然现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公众满意度提供了重要的洞见，但是仍有可改进之处。

首先，现有文献倾向于将公众看作顾客，假定他们被动地接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对其作出评价。事实上，公众不仅是顾客，而且是具有公共精神、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登哈特、登哈特，2016）。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应当包括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Brudney and England, 1982）。其中，经济维度主要关注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效果，政治维度关注的则是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以及公共服务分配的公平性。对回应性和公平性的考量要求服务供给模式从政府向公众的单向供给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作为合作者共同参与服务的生产（Brudney and England, 1982）。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往研究较重视公共服务评价的经济维度但忽视了政治维度，公众参与对政府绩效评价及满意度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其次，治理绩效论和政府形象论没有充分考虑治理过程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事实上，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不仅取决于治理结果，还取决于治理过程是否公平（Tyler, 1990）。现有研究表明，治理过程对政府信任和政府工作评价具有显著影响（Van Ryzin, 2015）。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有机构成要素。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和体验会形塑他们对政府治理过程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引入参与有效性视角来更好地解释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三 参与有效性视角下的公众满意度：理论与假设

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客观治理效果，还取决于他们对治理过程的主观感知（Kweit and Kweit, 2007）。正如程序正义理论所指出的，如果公众认为政府的治理过程是公平的，即使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那么公

众也能够坦然接受 (Tyler, 1990; Hollander-Blumoff and Tyler, 2011)。后续研究证实了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即相比于政策结果, 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多取决于对政府治理过程的感知。换言之, 现行治理过程越符合公众认为应当采取的治理过程, 则公众对政府的评价也越高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2)。

公众参与是治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将公众偏好纳入决策过程、提高决策的质量、提升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等 (Beierle, 1999; Kostka and Mol, 2017)。赫里安等 (Herian et al., 2012) 的研究显示, 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从而显著地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对政策的支持度。此外, 有效的参与过程还能够培养参与者对不同观点的理解与尊重, 并学习在协商与妥协中寻求共识的达成 (Halvorsen, 2003)。范柏乃、金洁 (2016) 的研究发现, 公众参与在公共服务供给与绩效感知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条件下, 公共服务供给特征对绩效感知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明承瀚等 (2016) 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然而, 并非所有的参与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 只有公众眼中的有效参与才会产生积极影响。马亮、杨媛 (2019) 的研究发现, 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不大, 绩效公开环节的参与甚至降低了公众满意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政府并没有真正将公众参与视为反映民意、采纳民智的工具, 在推行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形式重于实质, 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被大大弱化。即使政府想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也大多集中于治理的末端环节, 并未赋予公众政策制定与考核评价方面的话语权, 从而使公众觉得公共事务治理与己无关, 进而选择“理性冷漠” (颜海娜等, 2021)。由于中央政治信号模糊、法律制度欠缺可操作性、地方政府激励不足等原因, 公众参与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被屡屡虚置或被施加诸多限制 (张紧跟, 2017)。在此背景下, 参与的关键在于让公众切实感受到政府与民协商的诚意, 提升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 进而提升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也就是说, 比起实际上是否参与, 公众可能更加关心自己是否有参与的机会以及自己的声音能否被听到 (Kweit and Kweit, 2007)。

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公众参与逐渐贯穿于立法、行政与司法领域（张紧跟，2017；黄学贤、齐建东，2009；朱未易，2010）。其中，立法参与是指公众对立法和决策所涉及的切身相关或公共利益问题表达意见和建议，行政参与是指公众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行政管理活动，司法参与是指公众为实现权利救济而参与诉讼过程并对诉讼结果施加影响。本文认为，综合考虑这三个领域的参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对公众评价的影响机理存在差异。立法参与旨在改变治理框架与规则，影响的是公众对政府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感知。行政参与通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影响公众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司法参与强调程序和规则，会影响公众对政府规范性与法治化的感知。从治理实践上说，这三个领域的参与环环相扣，共同形塑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满意度。邻避研究表明，当公众不认可污染性项目的选址结果时，往往会进一步质疑政府规划与决策过程的合法性，并要求参与政策制定过程（Sun and Huang, 2020）。在另一些情况下，当维权行动受阻时，公众会诉诸法律。对他们而言，司法制度不仅被认为是直接的纠纷解决途径，而且是与其他维权行动相互呼应的一种策略性手段（Lee and Zhang, 2013；Yip et al., 2014）。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单一维度的公众参与，对多维度的参与有效性的系统分析相对缺乏。基于此，下文从环境保护领域切入，从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维度综合考察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立法参与

立法参与有效性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感知，进而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已有研究指出，参与主体多元化、共同决策机制以及可信赖的调停者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Ernst, 2019）。当居民感受到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决策方面的努力，且觉得自己能够对决策施加影响时，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将会显著提高（Kweit and Kweit, 2007）。就中国环境治理而言，过去几十年间，代表经济发展的利益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与之相比，代表

环境保护的利益团体处于弱势地位，对决策过程影响甚微。在此背景下，立法参与有效性意味着公众的环保呼声能够被听到，这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环保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信心。此外，立法参与有效性还意味着公众能切实感到绿色力量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而这有助于推动更符合环保理念的政策法规的出台（Smith, 2003）。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立法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二）行政参与

在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公众与政府间存在大量互动，这将通过塑造公众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影响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已有研究发现，有效的投诉制度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居民向地方政府或环保组织反映问题的渠道通畅有助于减少他们对公共服务项目的负面评价（Russ and Takahashi, 2013）。类似地，居民就林业管理工作向政府表达意见这一参与形态对公众满意度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Halvorsen, 2003）。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环保热线、信访、微博、微信与各类环保应用程序成为公众向政府反映污染问题、协助政府开展环境执法的重要途径。政府对公众投诉及时而有效的回应表明了政府对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颜海娜等，2021；Hsu et al., 2020）。此外，行政参与有效性还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通过向政府提供污染信息并得到政府的积极反馈，公众能够感知到参与的社会价值，心理上感到自己被认同和被需要，进而会形成对政府工作的积极评价（Sjoberg et al., 2017）。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行政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三）司法参与

司法参与有效性会影响公众对政府治理过程的规范性与法治化的感知，从而影响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为推进环境法治建设，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司法改革，包括成立专门的环保法庭、推行环境公益诉讼等。这些措施不仅传递了中央政府坚决整治污染的信号（Stern, 2014），

还拓宽了环境纠纷处理的渠道。事实上,高效的环境司法会鼓励公众通过诉讼实现环境维权,减少对上访等非司法维权途径的依赖(范子英、赵仁杰,2019)。更重要的是,对司法参与有效性的感知有助于提升公众对环境纠纷处理程序和规则的认可,消除对地方政府偏袒污染企业的疑虑(范子英、赵仁杰,2019;梁平汉、高楠,2014),从而增强公众对环境治理过程的规范性与公平性的感知。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 司法参与有效性能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四 数据与测量

本文使用的个人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采用多阶分层抽样,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28个省级行政单位^①。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居民。其中,本文所使用的法制模块是总体调查的子模块,仅访问其中1/3的受访者,有效样本量为3777。地区层面的污染数据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涉及的指标包括2014年各省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之所以采用2014年的污染数据,是因为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往往是基于过去的治理绩效,客观污染水平对满意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一) 因变量

因变量是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CGSS 2015居民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是:“您对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本文将备选项“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重新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满意”和“非常满意”编码为3,从而得到一个定序因变量。

(二)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感知的参与有效性,包括立法参与、行政参与和司法

^① 不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

参与有效性三个维度。立法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如果国家正在制定一项法律，是关于拆迁、环保、汽车限行、个人所得税等与您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如果只通过正式渠道，您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立法中得到反映或得到反馈的难易程度如何？”该变量的取值为1（非常困难）~5（非常容易），取值越大意味着立法参与有效性越高。

行政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如果在您家附近有一家企业违反规定排放废气或污水，严重损害居民健康。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件事，政府会如何处理？”备选项分别为“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但会拖很久”“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但不会很快”“政府很快会派人来调查处理”“政府会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对应赋值为1~5，取值越大意味着政府的处理效率越高。

司法参与有效性使用如下问题测量：“如果居民向法院起诉要求上面这家（违规排放）企业赔偿损失，您认为一审判决出结果的速度会有多快？”该变量的取值为1（非常慢）~5（非常快），取值越大意味着司法参与的有效性越高。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各省环保绩效、经济发展水平、政府透明度以及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变量。本文使用各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来测量客观环保绩效，通过主因子法（principal factor）将两者合并成一个省环保绩效因子。为了控制经济增长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本文还纳入了省人均GDP变量（吴建南等，2016）。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李文彬、何达基，2016；Park and Blenkinsopp，2011），本文用政府透明度来测量政府形象，具体指标为公众通过正式渠道了解地方政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的难易程度，变量取值为1（非常困难）~5（非常容易），取值越大意味着政府透明度越高。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①、

① 本文将问卷中的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具体转换方法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私塾和小学=6，初中=9，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

年收入和户口类型。现有研究指出，与女性相比，男性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更高（卢春天、洪大用，2015）。现有研究对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仍有分歧（卢春天、洪大用，2015；孙小逸、黄荣贵，2019；林挺进，2015）。

（四）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ultilevel ordered logistic model）进行分析。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同时受到个人特征和省层面的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这意味着本文的解释变量同时包含个人和地区两个层次，这有可能违反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的独立性假设。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根据数据的聚类性质进行建模，能有效估计个人与省层面变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效应。

五 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1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所示，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总体偏低。只有47.42%的受访者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33.06%的受访者表示一般，19.52%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公众感知的参与有效性总体得分偏低，且不同类型的参与形态存在明显差异。立法参与有效性水平最低，只有5.72%的受访者认为只通过正式渠道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能在立法中得到反映或反馈。与之相对，行政参与有效性水平较高，18.0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对污染举报的处理效率较高。司法参与有效性水平居中，有10.45%的受访者认为法院能够快速地对环境纠纷作出判决。

在控制变量方面，各省人均GDP为5.23万元。客观环保绩效因子的标准差为0.85，表明省间的环境污染水平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在3777名受访者中，53.06%为女性，46.94%为男性；平均年龄为50.22岁，标准差为17.07；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3年，平均年收入为2.63万

元；受访者中 57.47% 是农村户口，42.53% 是城市户口。此外，仅有 5.47% 的受访者认为通过正式渠道能够非常容易和较为容易地了解地方政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表明政府透明度偏低。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N=3777)

类别变量	取值	占比 (%)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不满意	19.52 (730)
	一般	33.06 (1236)
	满意	47.42 (1773)
只通过正式渠道，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立法中得到反映或反馈的难易程度	非常困难	31.51 (1058)
	比较困难	44.25 (1486)
	一般	18.52 (622)
	比较容易	5.39 (181)
	非常容易	0.33 (11)
如果向有关部门举报污染情况，政府会采取何种处理方式	政府根本就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9.37 (329)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但会拖很久	39.34 (1382)
	政府会派人来调查处理，但不会很快	33.25 (1168)
	政府很快会派人来调查处理	16.00 (562)
	政府会立即派人来调查处理	2.05 (72)
如果向法院起诉要求企业赔偿损失，一审判决出结果的速度	非常慢	13.33 (435)
	比较慢	43.93 (1434)
	一般	32.29 (1054)
	比较快	9.90 (323)
	非常快	0.55 (18)
通过正式渠道，了解地方政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的难易程度	非常困难	32.26 (1102)
	比较困难	46.87 (1601)
	一般	15.40 (526)
	比较容易	5.15 (176)
	非常容易	0.32 (11)

续表

类别变量	取值	占比 (%)
性别	女	53.06 (2004)
	男性	46.94 (1773)
户口类型	农村	57.47 (2169)
	城市	42.53 (1605)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层面 (N=3777)		
年龄 (岁)	50.22	17.07
受教育年限 (年)	8.63	4.68
年收入 (万元)	2.63	5.84
省级层面 (N=28)		
人均 GDP (万元)	5.23	2.27
标准化客观环保绩效因子	0.00	0.85

注：括号中为选择对应选项的人数。

(二) 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模型 1 分析了控制变量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见表 2)。虽然省间方差仅为 0.04, 但统计检验结果显示, 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与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卡方值为 7.85, p 值为 0.0025), 这说明选择多层次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具有统计适当性。就个人特征而言,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满意度受年龄、受教育年限、年收入和政府透明度的影响。年龄的系数为 0.01 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明年长者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更为满意。这个结果与孙小逸、黄荣贵 (2019) 的发现一致。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年轻人的思想开放, 更有可能采纳亲环境价值观, 对环境保护和环境参与持有较高期望, 从而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较大。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 -0.05 且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较低。与低收入群体相比, 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较低 (年收入对数

的系数为-0.10 且在 0.05 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与期望较高,从而导致满意度较低。此外,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感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环保满意度(回归系数为 0.20 且在 0.001 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与政府形象论的预期相一致(范柏乃、金洁,2016;李文彬、何达基,2016)。

就省层面的变量而言,人均 GDP 的系数为-0.07 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的环保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即与来自经济不发达省份的居民相比,来自经济发达省份的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较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发达省份的居民在满足一定的物质需求后,对生活质量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中包括清洁、安全的生活环境,由此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标准也就更高。有趣的是,客观环保绩效因子对公众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客观绩效论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表 2 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自变量	模型 1 (基准模型)		模型 2 (解释模型)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女性=0)	0.14	0.08	0.12	0.08
年龄	0.01 **	0.00	0.01	0.00
受教育年限	-0.05 ***	0.01	-0.05 ***	0.01
年收入对数	-0.10 *	0.04	-0.11 *	0.04
户口类型 (农村=0)	-0.12	0.09	-0.17	0.10
各省人均 GDP	-0.07 **	0.03	-0.08 **	0.03
各省环保绩效	-0.06	0.06	-0.02	0.08
政府透明度	0.20 ***	0.05	0.08	0.06
立法参与有效性			0.15 **	0.05
行政参与有效性			0.33 ***	0.05
司法参与有效性			0.16 **	0.06
-2Log-likelihood	5468.83		4500.43	
第一层个案数	2720		2286	
第二层省份数	28		28	
省间方差	0.04		0.06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模型 2 引入三个参与有效性变量。结果显示,考虑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影响后,政府透明度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不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参与有效性变量对政府透明度的影响具有中介效应,即政府透明度通过影响公众对参与有效性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透明度对公众环保满意度不具有独立的解释力。由此可见,政府形象论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检验。年龄对公众环保满意度的影响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不同年龄(世代)的公众对参与具有不同的期待,对当前参与有效性的感知也不同,而参与有效性感知是理解不同年龄组群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变化不大。

回归分析显示,参与有效性三个解释变量均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回归系数的大小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行政参与有效性的回归系数最大,系数为 0.33 且在 0.001 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政府对污染举报的回应性越高,公众对环境的工作越满意。立法参与和司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大致相当。其中,立法参与有效性的回归系数为 0.15 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公众的环保意见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反映或反馈的可能性越大,他们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就越高。类似地,司法参与有效性的回归系数为 0.16 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环境保护工作的司法效率越高,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就越高。进一步分析显示,对因变量取值为满意而言,立法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为 0.033,行政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为 0.073,而司法参与有效性变量的平均边缘效应为 0.035。就平均边缘效应而言,行政参与有效性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总之,本文所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均得到数据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当模型 2 引入三个参与有效性解释变量后,省间的未解释方差略有增加,由模型 1 的 0.04 变为模型 2 的 0.06。这表明,随机截距与参与有效性变量之间存在关联,当模型未考虑参与有效性变量时,省间的真实方差被掩盖了。模型 2 的省间随机截距的方差为 0.06,对应的中位比数比(median odds ratio)等于 1.26。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从不同省

份中随机抽取两名具有相同特征的被访者，那么他们之间的满意度比数比有一半的概率大于 1.26。

六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公众满意度为研究对象，在整合公众参与和程序正义理论基本洞见的基础上阐明了参与有效性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对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初步验证。参与治理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效能感和对政策的支持度，还能提升公众对多元化观点的包容度，更容易接受与自己预期不同的结果。由于公众参与制度在地方实践中仍受到诸多制约，影响公众评价的关键不在于参与行为本身，而在于参与过程是否有效。换言之，能否感受到政府推动公众参与的努力形塑了公众对治理过程公平性的感知，进而影响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引入参与有效性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拓展现有政府绩效评价与公众满意度研究。对 CGSS 2015 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有效性感知对公众环保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客观绩效论和政府形象论。具体而言，各省的客观污染水平对公众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形象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不稳健。虽然基准模型中政府透明度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一旦考虑了参与有效性变量，政府透明度的影响便变得不再显著。由此可见，政府形象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二者间关系的理解，澄清并回应学界对公众参与能否提升公众满意度的争论。现有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参与都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在一些情况下，公众参与和公众满意度之间并无显著关系，甚至会对公众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马亮、杨媛，2019；颜海娜等，2021）。在另一些情况下，公众参与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范柏乃、金洁，2016；明承瀚等，2016）。本文发现，公众感知的有效参与是提升公众满意度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制度仍不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欠缺可操作性。地方政府在推行公众参与时往往流于形式，或者仅仅动员公众参与治理的

末端环节。这些现象大大抑制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此情境下,相比于公众参与的工具性意义,其象征性意义对公众评价与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公众看重的是参与渠道是否畅通、参与过程是否公平、想要参与的时候自己的声音能否被听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公众对参与有效性的感知对重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信心、促进政府与公众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笔者进一步指出,对参与有效性的考察应当包含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三个维度。从学理上说,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有效性对公众评价的影响机理并不完全相同,分别影响的是公众对政府开放性、回应性和规范性的感知。从治理实践上说,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紧密联系,在特定条件下甚至会相互影响与转化。这在邻避治理领域尤为明显。公众对污染性项目选址的不满既可能延伸到对政府规划与决策过程的质疑,也可能促使公众诉诸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三个维度的参与进行综合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CGSS 2015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参与有效性变量均有助于显著提升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满意度。就回归系数和平均边缘效应而言,行政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效应最大,立法参与有效性和司法参与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大小相当。该研究发现表明,行政参与仍然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务的主要途径,公众对此有更为深刻的切身经历和体验,对其满意度的影响也更大。

本文的局限性也值得讨论。首先,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收集于2015年,距今已有一段时间,后续的研究需要使用新数据来验证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所使用的法制模块的样本量仅为总调查样本的1/3,数据的代表性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最后,限于测量指标的可获得性,本文尚未能系统地检验公众参与行为、主客观参与有效性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后续研究有必要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考察。

参考文献

范柏乃、金洁,2016,《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政府形象的

- 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管理世界》第10期，第50~61页。
- 范子英、赵仁杰，2019，《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经济研究》第3期，第21~37页。
- 洪大用，2012，《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生态现代化——以环境社会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第82~99页。
- 黄学贤、齐建东，2009，《试论公民参与权的法律保障》，《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第117~124页。
- 李文彬、何达基，2016，《政府客观绩效、透明度与公民满意度》，《公共行政评论》第2期，第93~111页。
- 李文彬、沈涵、李雅婷，2019，《客观绩效、信任度与公众满意度——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探索》，《公共行政评论》第4期，第27~43页。
- 梁平汉、高楠，2014，《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管理世界》第6期，第65~78页。
- 林挺进，2015，《城市环保绩效、市长升迁偏好与市民环保满意度——基于2011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实证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第12~21页。
- 卢春天、洪大用，2015，《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第108~115页。
- 马亮、杨媛，2019，《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公众满意度？——面向中国地级市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行政论坛》第2期，第86~94页。
- 明承瀚、徐晓林、陈涛，2016，《公共服务中心服务质量与公民满意度：公民参与的调节作用》，《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第71~77页。
- 孙小逸、黄荣贵，2019，《不同类型环保参与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差异化影响——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2期，第64~83页。
- 吴建南、徐萌萌、马艺源，2016，《环保考核、公众参与和治理效果：来自31个省级行政区的证据》，《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第75~81页。
- 徐国冲，2022，《客观评估抑或主观评估？公共部门绩效测量的一个论争》，《行政论坛》第1期，第67~77页。
- 颜海娜、彭铭刚、王丽萍，2021，《公众治水参与：绩效结果抑或过程驱动——基于S市926个样本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第61~70页。
- 曾莉、李佳源，2013，《公共服务绩效主客观评价的契合性研究——来自H市基层警察服务的实证分析》，《公共行政评论》第2期，第72~103页。
- 张紧跟，2017，《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制度优化》，《政治学研究》第6期，第91~102页。
- 朱未易，2010，《地方法治建设中公民参与的法理分析与制度进路》，《南京社会科学》第10期，第106~114页。



- 珍妮特·V. 登哈特、罗伯特·B. 登哈特, 2016, 《新公共服务: 服务, 而不是掌舵 (第三版)》, 丁煌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Beierle, Thomas C. 1999. "Using Social Goals to Evalua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s."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16(3-4), 75-103.
- Brown, Karin and Philip B. Coulter. 1983.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s of Police Service Delive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3(1), 50-58.
- Brudney, Jeffrey L. and Robert E. England. 1982. "Urban Policy Making and Subjective Service Evaluations: Are They Compatibl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2 (2), 127-135.
- Ernst, Anna. 2019. "How Participation Influences the Perception of Fairness,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38, 368-381.
- Halvorsen, Kathleen E. 2003.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5), 535-543.
- Herian, Mitchel N., Joseph A. Hamm, Alan J. Tomkins, and Lisa M. Pytlik Zillig. 2012.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Evaluations of Local Govern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2 (4), 815-840.
- Hibbing, John R. and Theiss-Morse, Elizabeth. 2002. *Stealth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lander-Blumoff, Rebecca and Tom R. Tyler. 2011.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Fostering Legitimacy i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2011)1, 1-19.
- Hsu, Angel, Amy Weinfurter, Jeffrey Tong, and Yihao Xie. 2020. "Black and Smelly Waters: How Citizen-generated Transparency is Addressing Gap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22(1), 138-153.
- Johnson, Thomas. 2013. "The Politics of Waste Incineration in Beijing: The Limits of a Top-Down Approac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15(1), 109-128.
- Kostka, Genia and Arthur P. J. Mol. 2017. "Implemen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Loc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hina*, 1-14.
- Kweit, Mary Grisez and Robert W. Kweit. 2007. "Participation, Perception of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 Support."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5(3), 407-425.
- Lee, Ching Kwan and Yonghong Zhang.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6), 1475-1508.
- Park, Heungsik and John Blenkinsopp. 2011. "The Roles of Transparency and Trust in the

-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uption and Citizen Satisf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77(2), 254–274.
- Parks, Roger B. 1984. “Linking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asures of Perform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4(2), 118–127.
- Percy, Stephen L. 1986. “In Defense of Citizen Evaluations as Performance Measures.” *Urban Affairs Review* 22(1), 66–83.
- Russ, Laura W. and Lois M. Takahashi. 2013.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on on Programme Satisfaction: Lessons from the Ahmedabad Slum Networking Project.” *Urban Studies* 50(4), 691–708.
- Smith, Graham.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 Sjoberg, Fredrik M., Jonathan Mellon, and Tiago Peixoto. 2017. “The Effect of Bureaucratic Responsiveness 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7(3), 340–351.
- Stern, Rachel E. 2014. “The Political Logic of China’s New Environmental Courts.” *The China Journal* 72(1), 53–74.
- Stipak, Brian. 1979.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Urban Services: Potential Misuse as a Performance Indicat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9(1), 46–52.
- Sun, Xiaoyi and Ronggui Huang. 2020. “Spatial Meaning-making and Urban Activism: Two Tales of Anti-PX Protes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42(2), 257–277.
- Tyler, Tom R. 1990.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an Ryzin, Gregg G. 2004. “Expectations, Performance, and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Urban Servic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3(3), 433–448.
- Van Ryzin, Gregg G. 2015. “Service Quality,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Citizens’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U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7(3), 425–442.
- Yip, Ngai Ming, Ronggui Huang, and Xiaoyi Sun. 2014. “Homeowners’ Activism and the Rule of Law in Urban China.”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7(2), 175–188.

推迟的生育？高等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的生育计划^{*}

杜世超^{**}

摘要：以往关于教育如何影响生育的研究大多注重教育“量”的维度，缺少对教育“质”的关注。本研究引入教育水平分层的视角，考察不同类型的大学教育是否对年轻世代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本研究将高考作为自然实验，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因果分析工具，比较了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大学生生育计划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更为优质的院校对大学生是否有明确的生育计划不存在影响，但会显著推迟他们的理想生育年龄（约1年）。尽管这种推迟作用仅在高年级学生身上有所体现，但研究并未发现性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不会影响学生生育计划的明确性，但会推迟他们的理想生育年龄。

关键词：一本教育 高等教育水平分层 生育计划 断点回归设计

一 引言

中国已经进入“三孩”的政策时代，但生育率并未有所提高。“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①，虽然高于“五普”的1.22和“六普”的1.18，但是并不意味着生育水平的回升。“五普”和“六普”开展时，我国尚未开放二胎政策，而“七普”开展时，我国已经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多年。即使在生育政策放宽的背景下，我国的生育水平也并未得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新生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1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李婷教授和郑丹丹教授对本研究的帮助。

** 杜世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青年副研究员。

① 即平均每每名育龄妇女生育1.3个孩子。

到提升（郭志刚，2017；王军、刘军强，2019），这让越来越多的学者着眼于生育意愿（包括生育计划）的研究。

欧洲的人口学家率先关注到持续低迷的生育现象，并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理论（Lesthaeghe and van de Kaa, 1986）。这一理论认为，文化观念和态度上的转变是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Lesthaeghe and Surkyn, 1988；Zaidi and Morgan, 2017）。因此，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重的研究是理解一个社会生育水平最为理想的方式，但我们能获得的生育意愿的数据往往远远少于生育行为的数据，导致学界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的解释不够充分（Melnikas and Romero, 2020）^①。本研究试图对年轻世代生育计划（一种计划性的生育意愿）的社会学解释进行补充。

在众多影响生育的社会因素中，教育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Bloom and Trussell, 1984；Glick et al., 2015；Rindfuss and John, 1983）。兰福思及其合作者最早系统阐述了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教育水平的提升往往会推迟女性的生育年龄，并且提高女性不生育的可能性（Rindfuss et al., 1980）。此后的研究者在这一脉络上不断发展并解释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Axinn and Barber, 2001；Brand and Davis, 2011；Glick et al., 2015；Kravdal and Rindfuss, 2008；Musick et al., 2009；Skirbekk et al., 2004；Tropf and Mandemakers, 2017）。中国学者也为这一“教育-生育”框架提供了宝贵的非西方经验（王一帆、罗淳，2021；张丽萍、王广州，2020；赵梦晗，2019）。但以往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第一，对教育的测量往往停留在“量”（如受教育年限、最高教育成就）上而忽略了教育的“质”（同一层次教育中的不同类型）。现有的实证研究对不同类型教育的影响缺乏足够的理解（Gerber & Cheung, 2008；McClendon et al., 2014）。第二，以往的研究重关联而轻因果，没有充分使用因果推断工具解决教育与生育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朱州、赵国昌，2022；Chang et al., 2021）。第三，研究基本使用可

^①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定量研究主要聚焦低生育率的描述和解释，忽略对主观态度类问题的探讨，导致理论创新不足（宋健、郑航，2021）。

观测的生育行为数据,而忽略了生育行为发生之前的生育计划,但往往生育计划才是理解年轻世代(尤其是成人初期)未来生育行为的关键。

本研究试图将高考作为自然实验来应对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将高考系统中的一本分数线作为断点并采用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的因果推断工具来估计在一本院校的就读经历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生育计划。之所以关注一本院校的效应,是因为在我国的高考系统中,一、二本院校之间存在明确的录取分数线划分,符合断点回归设计对明确断点的要求。由于一本分数线并非考生进入一本院校的唯一标准(存在如自主招生、高考加分、志愿填报失误等情况),本研究选取模糊断点回归设计(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模型推断结果表明,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是有限的:是否进入一本院校不会对学生有无明确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在有明确生育计划的学生中,一本院校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晚于二本院校的学生,但仅在高年级的学生中有所体现。基于此,笔者得出结论:一本院校会推迟学生的生育计划,但这种推迟效应是较为有限的。

二 文献综述

(一) 教育与生育

教育对生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降低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实现;(2)推迟育龄群体的生育年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世代往往展露出更低的生育意愿,选择不生孩子(Lynn et al., 2012);同时,教育的发展使育龄群体获得更多生育控制的知识,从而降低生育实现(Axinn and Barber, 2001)。也有研究表明,教育与低生育水平之间的联系只是暂时性的,教育仅仅是推迟了女性的生育年龄和生育计划,她们的生育实现会逐步追回(D'Albis et al., 2017; Kravdal and Rindfuss 2008)。具体而言,每多受1年的教育,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就会推迟3~5个月(Chang et al., 2021; Skirbekk et al., 2004)。当然,这种推迟作用在不同育龄群体中

的效果存在异质性 (Brand and Davis, 2011)。

中国社会的本土化经验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补充。从宏观上而言,教育扩张与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育龄群体,其总体生育水平越低,生育多孩的比例也越低(张丽萍、王广州, 2020)。育龄妇女逐渐提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不断推迟的婚育年龄起到了明显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效果(李月、张许颖, 2021; 张丽萍、王广州, 2020)。在个体层面,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王一帆、罗淳, 2021; Chen and Guo, 2022)。也有研究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与孩子的胎次有关,女性受教育程度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呈 U 形关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都具有更强的生育二孩的意愿(赵梦晗, 2019)。在使用高校扩招政策作为工具变量之后,朱州和赵国昌(2022)发现,相较于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会下降 30% 左右。此外,教育还会对中国女性的生育产生推迟作用(Piotrowski and Tong, 2016),尽管这种推迟作用存在地区和世代之间的差异(Niu and Qi, 2020; Wang and Chi, 2017)。

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均把注意力放在育龄群体尤其是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实现上,较少关注在生育实现之前,育龄群体如何规划生育。换言之,相关研究缺少对生育计划的关注(靳永爱、沈小杰, 2022)。结合既有的教育对已实现生育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教育主要有两条途径影响生育计划:增加机会成本和改变文化观念(Brand and Davis, 2011)。

由于生育与劳动力生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竞争关系,生育往往意味着暂时或永久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Brewster and Rindfuss, 2000; Goldin and Katz, 2000)。那些拥有更高教育成就和更大潜在劳动生产力的育龄群体需要为生育行为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所以他们选择推迟生育计划或不制订生育计划以降低机会成本(David and Legazpe, 2014; Plotnick, 2007)。一些定性研究通过访谈的方式询问年轻世代不愿意生育或计划晚育的原因,他们一致表示对事业的规划是最主要的考虑(Brinton and Oh, 2019; Melnikas and Romero, 2020)。在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工作-家庭冲突也是低生育率和晚育的主要原因之一(蒙克, 2017; 计迎春、郑真真, 2018; 吴帆, 2020)。

另外,教育还会使育龄群体意识到婚姻和生育是两个单独的生命历程,并不需要绑定进行,所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往往在结婚与生育之间规划更长的缓冲时间,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则计划在婚后迅速进入生育期(Schwartz and Mare, 2005)。但归根到底,根本因素还是教育改变了育龄群体的文化认知,降低了他们对生育的期待,同时在高教育水平群体内部形成“早育为耻”的污名化标签(Edin and Kefalas, 2005)。在中国,传统家庭主义观念往往是强有力的生育动机(陈滔、胡安宁, 2020),而教育能通过增强个体主义的倾向来减少生育动机与明确生育计划(Allendorf, 2017)。所以说,婚姻研究需要借助文化的视角来理解教育如何改变育龄群体的计划(宋健、郑航, 2021)。

(二) 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层与生育计划

尽管从以往的研究中不难推测教育对育龄群体生育计划的影响,但对教育这个变量的测量侧重于“量”的维度(如受教育年限、最高教育成就等),忽略了对教育“质”的测量(Feng, 2022)。对教育“质”的研究通常需要借助查理斯和布拉德雷(Charles and Bradley, 2002)的教育水平分层框架。他们将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分层分成垂直分层与水平分层两类。教育的垂直分层主要指可量化的受教育年限,而教育的水平分层则为不同类型和质量的学校分化。相比于教育的垂直分层,学界对教育水平分层的影响知之甚少(Gerber and Scheafer, 2004; McClendon et al., 2014)。本研究试图将两个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领域——教育水平分层与生育计划——结合起来,探讨高等教育的水平分层(一、二本院校)对大学生的生育计划如何产生影响。直接受到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影响的对象为在校大学生,他们大多未进入婚姻市场和生育准入的社会阶段,所以研究他们的生育计划比研究他们的生育行为更加契合实际。换言之,教育水平分层与大学生生育计划之间有生命历程上的耦合性。

前文所述,教育会通过增加机会成本和改变文化观念的方式影响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那么这两个作用机制是否也适用于教育水平分层?首先,高等教育可以为学生提供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经济交换的人力资本,而更为优

质的大学能够赋予学生更丰富的人力资本，从而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Brand and Halaby, 2006; Hoekstra, 2009; Witteveen and Attewell, 2017)。因此，这些大学生通常有更好的职业规划 (Compernelle and Axinn, 2019; Mijs, 2016)。相应地，对于他们而言，婚姻和生育的机会成本较高，故他们更可能选择推迟甚至放弃他们的婚姻和生育计划 (Amin and Al-Bassusi, 2004; Harknett and Kuperberg, 2011; Plotnick, 2007; Schneider et al., 2019)。在中国，毕业于名校的精英学生拥有更好的职业规划和更为优异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Hu & Vargas, 2015; Loyalka et al., 2012)。同样地，为了完成职业规划，他们也可能 (暂时性地) 推迟或放弃生育计划。

此外，不同类型的大学也能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文化资源 (Brocic and Miles, 2021; Fielding, 2018)，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育计划。举例而言，高等教育系统是传播精英群体文化观念的制度化机构 (Brint, 1998; Jackman and Muha, 1984)，这些文化观念包括性别观念和家庭观念 (Cunningham, 2008; Shu, 2004)。家庭观念已经被证明是强有力的生育动机 (陈滔、胡安宁, 2020)，接受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学生自然会制订不一样的生育计划。另外，研究表明，优质大学通常会通过仔细的教材选择以及有意义的活动组织 (Compernelle and Axinn, 2019) 来传播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 (Shu, 2004) 以及挑战传统的婚姻想象 (Cunningham, 2008)，所以学生更可能拒绝来自社会的生育压力并改变原有的生育计划。

不同类型的大学为学生提供的社会资本也不同。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会在育龄群体的社会网络中传播 (Balbo and Barban, 2014; Diaz et al., 2011)，好友的生育实现会改变育龄女性的生育计划。在更为优质的大学中，当学生每天接触的是拥有更好职业规划和更灵活生育计划的同辈群体时，他们的生育计划也会因此而改变 (Armstrong and Hamilton, 2021; Compernelle and Axinn, 2019; Jennings et al., 2012)。

所以说，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获得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有影响，高等教育本身的差异也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高等教育水平分层的理论框架强调，不同类型大学所能提供的不同资源以及学生在其中收获的不同

人生经验,将引导学生制定不同的人生规划(Gerber and Cheung, 2008)。在本研究中,优质大学所提供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学生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改变他们的生育观念,从而降低他们有明确生育计划的可能性,或者推迟他们的生育计划。

(三) 教育与生育计划的内生性关系

本研究试图对“教育水平分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进行探究,但内生性问题是困扰教育水平分层研究的潜在挑战,因为能够被优质大学录取的学生通常是高度优异并具有特定特征的(Borgen and Mastekaasa, 2018; Gerber and Cheung, 2008)。在本研究中,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育计划对学生的学业成就(被哪个大学录取)具有影响。以往的文献表明,想要尽早成家的学生并不会在学习上花费精力,所以被优质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也更小(Jafarey et al., 2020; Raley et al., 2012; Zahra, 2020)。第二,一些未被观测的混淆变量(如才智、性格、外貌、职业规划等)有可能同时影响获得教育的类型以及生育计划,从而扰乱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朱州、赵国昌, 2022)。

解决这种内生性关系最好的方法是建立反事实的研究设计(Winship and Morgan, 1999),在研究中控制这种内生性关系往往会带来不一样的发现。例如,在使用双胞胎数据以控制无法观测的家庭背景因素和基因因素之后,研究者发现教育对生育的推迟作用从原本的6个月减少到1.5个月(Rodgers et al., 2008; Tropf and Mandemakers 2017)。也就是说,教育对生育的影响被高估了。

鉴于对教育水平分层的关注,本研究试图将高考作为自然实验,高考系统中的一、二本院校差异作为水平分层的体现,选取断点回归设计的因果推断工具来处理教育与生育计划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从而估计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作用。但是,这种因果推断工具在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例如,模型要求研究者找到边界清晰的两类大学,而不能将各大学建立在一个质量评估的连续谱上。换言之,本研究只能分析一、二本大学之间的差异,将一本院校视为优质大学。二本院校

视为普通大学，而不能将教育的“质”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一本院校对学生的生育计划有影响。

假设 1a：一本院校会降低学生具有清晰生育计划的可能性。

假设 1b：一本院校会推迟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教育水平分层依据因素众多，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的划分显然比较粗糙，但这是由数据和方法导致的。本研究想要呈现的并非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之间的独特差异，而是将一、二本院校作为不同质量的高等院校的表征，以此探究高等教育水平分层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

（四）异质性：年级与性别的影响

教育水平分层的研究框架认为，学生不同大学中的教育体验也是重要的影响机制（Gerber and Cheung, 2008）。学生需要时间来探索和接受学校提供的资源，并与学校一同成长（Beattie and Wyan, 2018），所以不同年级的学生所拥有的教育体验不尽相同。研究表明，高年级的大学生所面对的工作压力和持有的职业规划完全不同于低年级学生（Bryant and Astin, 2016; Flowers, 2002）。一项关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学生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不同年级对大学资源和大学意义的理解不尽相同（Binder et al., 2016），而这种差异也被发现存在于重视“前辈文化”的东亚社会中（Yuki and Yamaguchi, 2018）。此外，从生命历程的视角而言，整个大学是成人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的成长过程，所以高年级会对未来的婚姻和生育有更详尽的规划。

另外，生育是性别化的生命事件。以往的研究往往关注女性的生育，这很可能是因为生育实现对女性而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Halcomb, 2018; McCreight, 2004）。但就理想化的生育计划而言，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研究表明，即使在同一所大学中，男生与女生获得的教育体验也是不一样的（Barone, 2011; Sheng, 2012），并且教育对学生态度和认知的存在性别方面的异质性，通常女生的认知受到不同类型

教育的影响更大 (van de Werfhorst and Kraaykamp, 2001)。

所以说,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年级和性别的差异。由于大一新生等低年级学生刚进入大学, 他们还没有完全接触到学校资源, 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小; 相反, 高年级学生已经充分接触学校资源并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 (Loyalka et al., 2012), 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一本院校对生育计划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同样地, 女生的性别规范和家庭规划也更可能因受到教育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所以一本院校对生育计划的影响可能在女生身上更为明显。笔者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在高年级学生身上更为明显。

假设 3: 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在女生身上更为明显。

三 数据、测量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 (以下简称“调查”) 2009 年的基线数据。调查以全北京 54 所公立大学为抽样框进行配额抽样 (Cai and Wang, 2017; Hu and Wu, 2019)。具体而言, 根据大学排名, 调查将 54 所大学分为 6 个梯队, 在前 3 个梯队中共抽取 3 所大学的 25 个专业, 以及每个专业中的 20 名学生 (共计 $3 \times 25 \times 20 = 1500$ 人), 并在后 3 个梯队中选取 12 所大学的 15 个专业, 以及每个专业中的 20 名学生 (共计 $12 \times 15 \times 20 = 3600$ 人)。调查共计抽取 5100 名在校大学生, 其中 4512 名完成问卷调查, 问卷回收率为 88.5%。值得注意的是, 2009 年采集基线数据时, 有一半的受访者为大一新生, 另一半为大三学生。

选用 2009 年的基线数据而非追踪调查数据是因为调查仅在 2009 年询问了被访者的生育计划。笔者充分意识到中国的教育政策、生育政策和社会文化在近十几年间变化迅速, 所以本研究有数据过时的嫌疑。但我国高考系统中的一、二本院校差异至今存在, 并且近年来的低生育率也对育龄群体产生了一定的生育压力, 所以即使使用 2009 年的数据, 也能为理解当代青年群体的生育计划提供经验启示。

（一）因变量

因变量生育计划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的测量。第一，调查询问了大学生受访者是否有明确的生育打算/计划，回答包括“不打算生孩子”“没有考虑过生孩子”“有具体生孩子打算”。本研究将前二者合并为“无明确生育打算/计划”^①，后者为“有明确生育打算/计划”。第二，对回答“有具体生孩子打算”的受访者，调查进一步询问其理想的生育年龄范围，即“准备最早几岁、最晚几岁生孩子”。本研究选取这一回答的中间值^②作为其理想生育年龄的测量。

（二）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是否就读一本大学。一本大学的学生被看成实验组，非一本大学的学生被看成控制组。断点回归设计要求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划分建立在具体的数值之上，本研究选取了受访者的高考成绩以及各省区市的一本分数线作为划分标准。具体而言，笔者根据考生的专业、高考年份和高考地整理出各省区市每年的文理科一本分数线^③，然后将受访者自述的高考成绩与当地的一本分数线作差值处理。当差值大于等于0（高考分数高于当地一本分数线）时，样本进入实验组；当差值小于0时（高考分数低于当地一本分数线）时，样本进入控制组。另外，受访者实际的一本院校就读情况可以根据其正在就读的大学得到。

当然，这个分数线划分一定的问题。首先，受访者的高考分数为自述，可能存在受访者记忆偏差或者谎报等情况。其次，高考一本分数线并非判定考生进入一本院校的唯一标准，考生可以通过自主招生、高考加分等方式以低于一本分数线的高考成绩进入一本院校；相反，高

① 笔者清晰地认识到“不打算生孩子”和“没有考虑过生孩子”是不同的两种生育态度，但本研究仅关心明确的生育打算/计划，且断点回归设计无法处理多类别的因变量，故将二者划分为一组。

② 举例而言，若受访者回答“准备最早20岁、最晚30岁生孩子”，则本研究认为其理想生育年龄为25岁。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中国高考网 www.gaokao.cn）。

考成绩高于一本分数线的考生也有可能因为零志愿填报失误等情况而未能进入一本院校。表 1 显示, 实验组中有约一成的学生实际没有进入一本院校, 而控制组中有不到两成的学生实际上已经考入一本院校, 所以在对实验组的处理效应 (treatment effect) 进行因果推断时, 本研究选择了模糊断点回归设计以应对断点选取与实际标准不完全匹配的情况。在模型展示时, 本研究同时展示了清晰断点回归设计的模型估计结果, 以比较模型优化带来的结果变化。

(三)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就读专业 (是否为理科)、是否处于恋爱关系中、总过有过几段感情经历、是否有清晰的结婚计划、是否有兄弟姐妹、户口类型 (是否为城市户口)、家庭收入, 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生育计划不仅是个体的选择, 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 所以本研究控制了相关的家庭背景变量。另外, 按照家庭生命历程理论, 生育是恋爱以及结婚之后的生命事件, 生育计划也会受到恋爱经历和结婚计划的影响, 所以本研究也控制了相关变量。同时, 所有模型都会控制省份效应。

(四)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了断点回归设计作为因果推断工具。断点回归设计是近 20 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策略 (Cook, 2008)。由于教育系统中经常存在明确的断点 (如入学年龄、入学考试等), 断点回归设计被广泛运用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中 (Behrman, 2015; Hoekstra, 2009; Loyalka et al., 2012; Rauscher, 2019), 但尚未被充分运用在具有社会学研究意义的议题中。

断点回归设计的思路为, 寻找一个特定的选拔标准, 达到标准的一部分人会获得与未达到标准的人不一样的人生际遇, 例如, 达到一本分数线的考生可以进入一本院校进而获得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 认识不一样的朋辈群体。通过比较高考成绩接近这个标准但基于不同的个体之间的组间差异, 如高考成绩非常接近, 但一部分进入一本院校, 另一部分没有进入一本院校的考生, 就可以排除各种干扰项以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以估计由不同的人

际机遇带来的“处理效应”（本研究中为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

高考成绩并不是进入一本院校的唯一标准，所以本研究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与清晰断点回归设计相同，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目的是估计在非常接近断点区域范围内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不同于清晰断点回归设计直接比较组间差异，模糊断点回归设计比较的是组间差异与（是否进入实验组的）组间分配差异的比值 [公式（1）]。

$$\delta_{FuzzyRDD} = \frac{\lim_{X \rightarrow c_0} E[Y|X \geq c_0] - \lim_{X \rightarrow c_0} E[Y|X \leq c_0]}{\lim_{X \rightarrow c_0} E[D|X \geq c_0] - \lim_{X \rightarrow c_0} E[D|X \leq c_0]} \quad (1)$$

其中， $\delta_{FuzzyRDD}$ 表示研究所关心的“处理效应”； Y 表示因变量的取值； D 表示是否进入实验组； X 表示用于预测是否进入实验组的自变量（在本研究中为高考成绩与一本分数线的差值）； c_0 表示用于判断是否进入实验组的断点。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估计可以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模型实现。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先将个体得分与断点之间的比较作为工具变量来预测个体是否进入实验组（在本研究中是否进入一本院校），如公式（2）所示：

$$D_i = \gamma_0 + \gamma_1 X_i + \pi Z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其中， D_i 表示对个体 i 是否进入实验组（一本院校）的预测； X 表示受访者高考分数与当地一本分数线的差值； Z 表示 X 取值与断点之间的比较，如果 X 取值大于等于断点（高考得分大于等于一本分数线），则 Z 的取值为 1，反之为 0。

接着，我们可以用 D 的预测值来对因变量的取值进行第二阶段的估计，如公式（3）所示：

$$Y_i = \beta_0 + \beta_1 X_i + \delta D_i + \beta_2 D_i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其中， Y 表示因变量的取值， δ 表示本研究关心的“处理效应”（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当然，模型还可以加入控制变量以及自变量 X 高次幂的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阶段模型中 X 的取值依然应该满足仅在断点附近

区域内变化,这就需要在模型估计之前确定 X 的取值范围,也即“带宽”(bandwidth)。本研究使用最优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optimal, MSE-optimal)方式进行带宽选择。结果显示,每个二阶段模型的带宽都会存在差异,但基本稳定在断点左右的 30 分范围内,即本研究比较高考成绩在当地一本分数线 30 分上下的大学生进入一本及二本院校之后在生育计划方面的差异。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本研究使用了另一种带宽选择方式——最优覆盖误差率。

(五) 效果异质性的分析策略

为了研究一本院校效应的异质性,本研究对不同年级和性别的样本进行了断点回归估计。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仅含有大一和大三学生的样本,所以本文仅展示一本效应在大一和大三学生中的差异。所有的模型和稳健性检验均进行分样本处理。此外,模型结果显示,一本院校的效应在男生和女生中并不存在差异,所以性别异质性仅在主模型中显示,而在稳健性分析中显示。

四 结果与统计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展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中样本各变量的差异。由于不同模型的带宽选择不同,纳入控制组和实验组中的样本数量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在哪个模型中,控制组的平均高考成绩均远低于一本分数线,而实验组的平均高考成绩远高于一本分数线。同样,尽管高考成绩并非一本院校录取的唯一标准,但是实验组中约有九成学生被一本院校录取,而控制组中此比例低于 20%。换言之,本研究的设计满足断点回归要求的实验组分配在断点(一本分数线)附近有明显的跳跃。

本研究也对高考分数的分布进行了 McCrary 检验,发现在一本分数线附近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布断裂,排除了人为操纵的可能性(见图 1)。McCrary 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断点回归设计是有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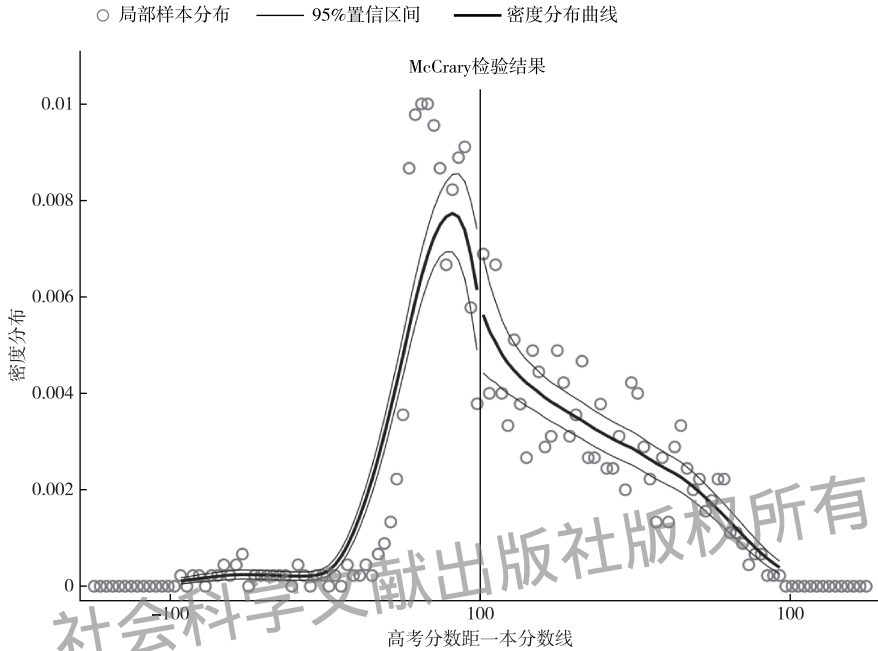


图1 断点回归设计的 McCrary 检验

断点回归设计的目的是比较在断点附近范围内极其相似的个体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中的差异，所以必须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中的样本在各个混淆变量的取值上保持一致。表1显示，本研究控制组和实验组中的学生在性别、是否有清晰的结婚计划、是否有兄弟姐妹、户口类型、家庭收入，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此带宽内的控制组和实验组样本是可比较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就读专业、感情经历和当前恋爱状态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实验组中的学生更少选择理科专业，也更少拥有感情经历，这可能跟一本和二本院校的专业设置以及校园氛围有关。尽管这些变量上的差异很有可能是进入实验组和控制组本身带来的（所以不会影响断点回归设计），但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学生的生育计划，本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了这些差异。



表 1 描述性统计 (带宽内样本)

	生育计划				理想生育年龄			
	控制组		实验组		控制组		实验组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	0.534	[0, 1]	0.604	[0, 1]				
理想生育年龄 ^b					28.46 (2.52)	[22, 40]	30.05 (2.57)	[23, 43]
高考距一本线分数 ^{a,b}	-14.86 (8.97)	[-30, -1]	16.47 (8.84)	[0, 30]	-15.17 (8.94)	[-30, -1]	16.31 (0.82)	[0, 30]
是否为一本院校 ^{a,b}	0.17	[0, 1]	0.88	[0, 1]	0.19	[0, 1]	0.89	[0, 1]
性别 (1=男生)	0.45	[0, 1]	0.49	[0, 1]	0.47	[0, 1]	0.51	[0, 1]
就读专业 (1=理科) ^{a,b}	0.54	[0, 1]	0.44	[0, 1]	0.56	[0, 1]	0.43	[0, 1]
是否处于恋爱关系中 ^{a,b}	0.46	[0, 1]	0.32	[0, 1]	0.46	[0, 1]	0.38	[0, 1]
总共有过几段感情经历 ^{a,b}	1.28 (1.37)	[0, 10]	1.16 (1.07)	[0, 7]	1.38 (1.32)	[0, 8]	1.24 (1.16)	[0, 6]
是否有清晰的结婚计划	0.71	[0, 1]	0.72	[0, 1]	0.97	[0, 1]	0.97	[0, 1]
是否有兄弟姐妹	0.43	[0, 1]	0.42	[0, 1]	0.44	[0, 1]	0.46	[0, 1]

续表

	生育计划				理想生育年龄			
	控制组		实验组		控制组		实验组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户口类型 (1=城市)	0.65	[0, 1]	0.67	[0, 1]	0.63	[0, 1]	0.65	[0, 1]
家庭收入对数	10.53 (1.21)	[6.38, 13.89]	10.36 (1.12)	[6.68, 14.51]	10.56 (1.22)	[6.38, 13.81]	10.39 (1.14)	[6.68, 14.51]
父母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0.24	[0, 1]	0.26	[0, 1]	0.25	[0, 1]	0.27	[0, 1]
高中	0.37	[0, 1]	0.36	[0, 1]	0.37	[0, 1]	0.38	[0, 1]
大学及以上	0.39	[0, 1]	0.38	[0, 1]	0.38	[0, 1]	0.35	[0, 1]
观测值	485		895		259		541	

注：a 表示生育计划样本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至少在 $p < 0.0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b 表示理想生育年龄样本中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至少在 $p < 0.0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差。

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发现, 实验组(一本院校)和控制组(二本院校)中的学生在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方面, 不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 53.4% 的二本院校学生和 60.4% 的一本院校学生有清晰的生育计划; 但在有清晰的生育计划的学生中, 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理想生育年龄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 一本院校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约为 30 岁, 晚于二本院校学生(约 28 岁), 他们的生育计划是推迟的。

(二) 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表 2 和表 3 分别展示了一本院校是否影响学生生育计划和理想生育年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笔者为大一新生和大三学生分别进行模型估计以体现教育水平分层效果的异质性。此外, 笔者还比较了清晰断点回归和模糊断点回归两种不同设计下估计结果的差异。研究发现和结论以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结果为准。

如表 2 所示, 对于大一新生而言, 是否进入一本院校并不会影响他们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对于大三学生而言, 尽管一本和二本院校学生在有清晰的生育计划的概率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但这个差异并不显著。图 2 和图 3 展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 从中可知, 大一新生有清晰的生育计划的概率并未在一本分数线两侧出现跳跃, 尽管大三学生样本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跳跃, 但这个差异并不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一本院校并不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

表 2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分年级)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一本院校	-0.030 (0.078)	-0.012 (0.069)	-0.018 (0.072)	-0.006 (0.069)	0.083 (0.073)	0.105 (0.074)	0.086 (0.056)	0.099 (0.087)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带宽	32.7	32.7	32.7	32.7	31.28	31.28	31.28	31.28

续表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带宽内观测值	701	701	701	701	679	679	679	679
总观测值	2281	2281	2281	2281	2170	2170	2170	2170

注：带宽选择方式为最优均方误差；所有模糊断点回归设计中第一阶段的预测均在 F 检验上满足统计性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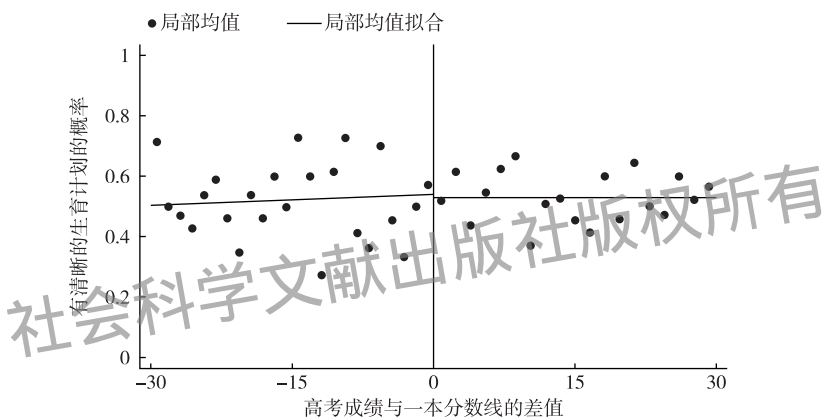


图2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大一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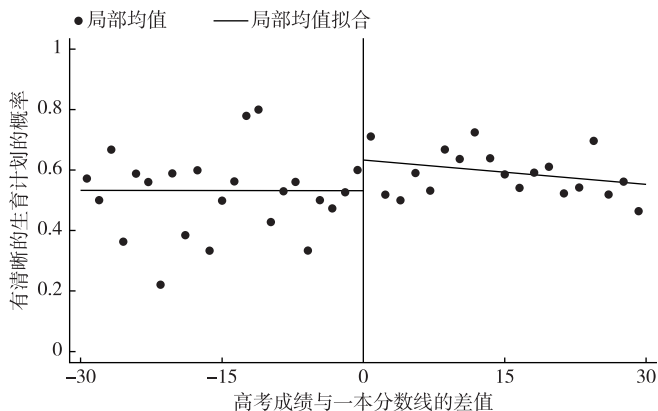


图3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大三学生）

如表3所示,对于大一新生而言,在一本院校就读并不会显著影响他们的理想生育年龄,尽管模型结果表明一本院校中大一新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比二本院校中的大一学生略晚,但是这个推迟效果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而增加,对于大三学生而言,一本院校中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比二本院校中的学生晚了约为1年(0.93年,或11个月)。图4和图5分别展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从中可知,大一新生的理想生育年龄在一本分数线附近并未出现明显的跳跃,但大三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在一本分数线左右出现了明显的跳跃,这个跳跃就是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年龄的“处理效应”。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本院校对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有推迟作用,但这种推迟作用仅体现在大三学生身上。

表3 理想生育年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分年级)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清晰断点回归设计		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一本院校	0.157 (0.357)	0.141 (0.356)	0.035 (0.349)	0.026 (0.348)	0.618* (0.283)	0.776* (0.357)	0.953** (0.361)	0.928** (0.335)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带宽	29.19	29.19	29.19	29.19	27.13	27.13	27.13	27.13
带宽内观测值	393	393	393	393	407	407	407	407
总观测值	1105	1105	1105	1105	1220	1220	1220	1220

注:带宽选择方式为最优均方误差;所有模糊断点回归设计中第一阶段的预测均在 F 检验上满足统计性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 $p < 0.05$,** $p < 0.01$ 。

在年级差异的基础上,本研究还探究了性别差异。如表4所示,一本院校对大学生生育计划(包括理想生育年龄)的影响并未在男女生之间产生差异,对男女生理想生育年龄的推迟均在1年左右。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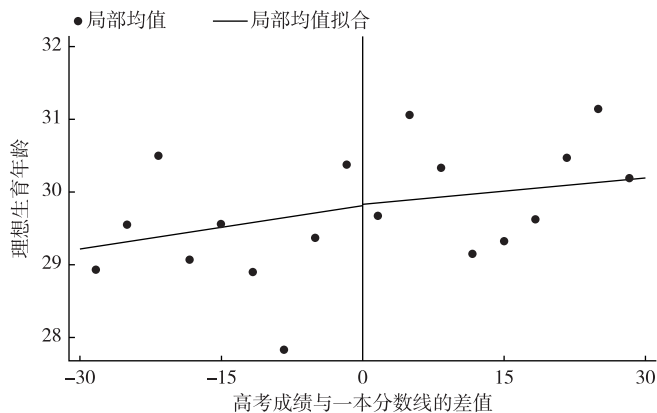


图4 理想生育年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大一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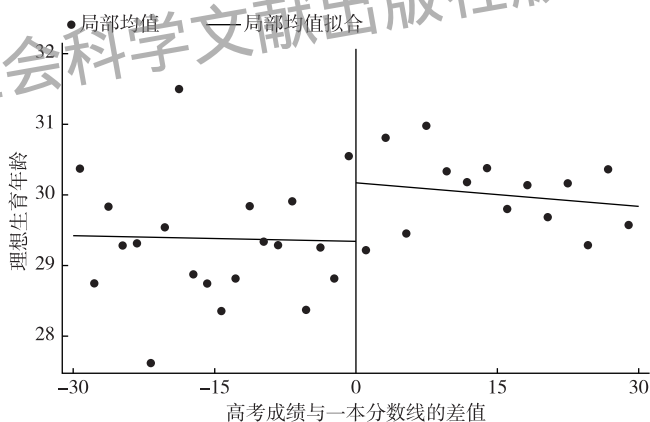


图5 理想生育年龄的断点回归设计结果（大三学生）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进行了两组检验。表5显示了不同稳健性检验下一本院校对学生生育计划和理想生育年龄的“处理效应”。

表 4 生育计划的断点回归设计 (分性别)

	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		理想生育年龄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男生样本				
一本院校	-0.011 (0.109)	0.025 (0.080)	0.204 (0.416)	1.061* (0.438)
控制变量与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女生样本				
一本院校	-0.032 (0.091)	0.091 (0.076)	0.151 (0.524)	0.948** (0.373)
控制变量与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 所有模型均使用最优均方误差的带宽选择的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结果只展示了一本院校效应的系数; 括号中为标准误; * $p < 0.05$, ** $p < 0.01$ 。

第一组稳健性检验使用了不同的带宽选择方式。在使用了最优覆盖误差率而非最优均方误差的策略下, 一本院校依然没有对学生是否有清晰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 但一本院校对学生理想生育年龄的推迟效应在大三学生样本中有所体现。

第二组稳健性检验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 笔者随机选取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分数标准作为“安慰剂断点”, 这个“安慰剂断点”并不会影响两侧的样本是否进入实验组和控制组, 以考察模型结果中发现的“处理效应”是否由真实的断点设置产生的。结果表明, 当模型分别以低于一本分数线 10 分或者高于一本分数线 10 分为“安慰剂断点”时, 原本观测到的推迟效应消失。也就是说, 原本观测到的推迟效应确实是由真实的一本院校就读情况带来的。

两组稳健性检验均表明, 本研究的发现是稳健且真实的, 并非特殊条件和模型操作下得到的偶然性结果。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一本院校效应

	生育计划		理想生育年龄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大一新生	大三学生
稳健性检验 1：不同带宽选择				
最优覆盖误差率 (CER-optimal)	-0.026 (0.038)	0.069 (0.067)	0.164 (0.405)	1.174** (0.390)
稳健性检验 2：安慰剂检验				
-10 作为断点	-0.020 (0.139)	-0.014 (0.098)	0.154 (0.214)	0.278 (0.474)
10 作为断点	0.019 (0.095)	0.029 (0.082)	0.218 (0.233)	0.314 (0.312)

注：所有模型均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设计的结果（未特别注明时候，均使用最优均方误差的带宽选择）；所有模型均纳入了控制变量并控制了省份效应；结果只展示了一本院校效应的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 $p < 0.01$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五 结论与讨论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带动了整体生育情况和人口结构的转变 (Zaidi and Morgan, 2017)。尽管这一理论在人口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多有提及，但对于育龄群体生育观念和生育计划的研究略显不足。本研究将教育研究中的水平分层框架与生育观念相关联，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大学（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是否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断点回归设计的分析工具使研究结果具有因果推断的意义。

研究表明，相较于二本院校，一本院校并不会对学生的生育计划产生影响，但会明显推迟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尽管这种推迟作用仅在大三学生身上有所体现。具体而言，一本院校大三学生的理想生育年龄比二本院校的学生晚了约 1 年（11 个月）。教育对学生生育计划的影响存在年级异质性，高年级的学生受到的影响更大，但是影响并不存在性别异质性，男生和女生受到的教育水平分层影响是相似的。就年级差异而言，优质教育资源的“处理效应”集中体现在高年级学生身上，这说明教育水平

分层的影响可能是累积性的,这补充了社会学对教育过程化理论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假设 1a 和假设 3,这可能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以往研究中发现的教育降低生育率或推迟生育很可能是由于低教育水平的女性意外怀孕造成的 (Musick et al., 2009)。换言之,教育并未改变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只是拥有更少教育资源的个体不一定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当模型处理了教育与生育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教育对不生育态度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且在男女之间不存在差异 (Kravdal and Rindfuss, 2008)。所以说,优质教育资源对学生生育的影响并不在于降低他们的生育意愿,而在于推迟他们的理想生育年龄。

需要重申的是,本研究旨在将一本和二本院校作为教育水平分层的一种表征,以探究教育水平分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并不是为了研究一本和二本院校在整个高校系统中的资源差异,所以也无法对一本和二本院校之间的资源分配优化提供指导性的建议。依照教育水平分层的理论框架,能够减少教育水平分层对学生差异化影响的唯一办法就是消除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差异。至于哪些教育资源的差异需要被消除,或是约 1 年的理想生育年龄延迟在多大程度上值得被干预,则需要更多相关的研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提出“教育水平分层-生育计划”的视角供后续研究参考。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正如其他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的研究一样,本研究结论的外推性有限。断点回归设计估计的是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即在某个特定断点附近极小取值范围内的“处理效应”。在本研究中,这个范围为高考成绩距离一本分数线 30 分上下的大学生。换言之,仅有那些较为普通的一本院校和表现较为突出的二本院校进入本研究的样本中。研究中发现的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普通一本院校和顶部二本院校之间的差异,顶部一本院校和普通二本院校并未被纳入模型估计中,它们是否会改变“处理效应”也尚未可知。

尽管如此,本研究依然具有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理论上,本研究将教育水平分层的视角引入生育研究中,扩展了原有的“教育-生育”框架,将其

从对教育“量”的关注转变为对教育“质”的讨论。方法上，断点回归设计为原有的研究提供了因果推断的证据，使我们对教育与生育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有据可循。相信本研究会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 陈滔、胡安宁，2020，《个体主义还是家庭主义？——不同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效应分析》，《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第28~38页。
- 郭志刚，2017，《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2~14页。
- 计迎春、郑真真，2018，《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第143~161页。
- 靳永爱、沈小杰，2022，《中国城市地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生育动机与二孩生育计划》，《人口研究》第6期，第88~102页。
- 李月、张许颖，2021，《婚姻推迟、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对总和生育率分解的研究》，《人口学刊》第4期，第1~11页。
- 蒙克，2017，《“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新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218~241页。
- 宋健、郑航，2021，《中国生育研究现状与问题——基于方法视角的观察》，《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第114~125页。
- 王军、刘军强，2019，《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政策研究与演进》，《社会学研究》第2期，第219~241页。
- 王一帆、罗淳，2021，《促进还是抑制？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分析》，《人口与发展》第5期，第72~82页。
- 吴帆，2020，《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218~240页。
- 张丽萍、王广州，2020，《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人口学刊》第6期，第19~34页。
- 赵梦晗，2019，《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学刊》第3期，第16~27页。
- 朱州、赵国昌，2022，《高等教育与中国女性生育数量》，《人口学刊》第1期，第16~31页。
- Allendorf, Keera. 2017. "Conflict and Compatibility? Developmental Idealism and Gendered Differences in Marital Choi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9(2), 337-355.
- Amin, Sajeda and Nagah H. Al-Bassusi. 2004. "Education, Wage Work, and Marriage: Perspectives of Egyptian Working Wom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5), 1287-1299.



- Armstrong, Elizabeth A. and Laura T. Hamilton. 2021. "Classed Pathways to Marriage: Hometown Ties, College Networks, and Life after Gradu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3(4), 1004–1019.
- Axinn, William G. and Jennifer S. Barber. 2001. "Mass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4), 481–505.
- Balbo, Nicoletta and Nicola Barban. 2014. "Does Fertility Behavior Spread among Friend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79(3), 412–431.
- Barone, Carlo. 2011.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Gender Segreg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Eight Nations and Three Decad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2), 157–176.
- Beattie, Ireneer R. and Roger J. Wyan. 2018.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Growing up Together." *Contexts* 17(3), 46–53.
- Behrman, Julia Andrea. 2015. "Does Schooling Affect Women's Desire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Malawi, Uganda, and Ethiopia." *Demography* 52(3), 787–809.
- Binder, Amy J., Daniel B. Davis, and Nick Bloom. 2016. "Career Funneling: How Elite Students Learn to Define and Desire 'Prestigious' Job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9(1), 20–39.
- Bloom, David and James Trussell. 1984.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Delayed Childbearing and Permanent Child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21(4), 591–611.
- Borgen, Nicolai T. and Arne Mastekaasa. 2018.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Field of Study, Institution, and Department for Candidates' Wages." *Social Forces* 97(2), 531–558.
- Brand, Jennie E. and Dwight Davis. 2011. "The Impact of College Education on Fertility: Evidence for Heterogeneous Effects." *Demography* 48, 863–887.
- Brand, Jennie E. and Charles N. Halaby. 2006. "Regression and Matching Estimates of the Effects of Elite College Attendance on Educational and Career Achieve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5(3), 749–770.
- Brewster, Karin L. and Konald R. Rindfuss. 2000.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271–196.
- Brint, Steven. 1998. *Schools and Societies*.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Brinton, Mary C. and Eunsil Oh. 2019. "Babies, Work, or Both? Highly Educat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East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1), 105–140.
- Brocic, Milos and Andrew Miles. 2021. "College and the 'Culture War': Assessing Higher Education's Influence on Moral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6(5), 856–895.
- Bryant, Alyssa N. and Helen S. Astin. 2016. "The Correlates of Spiritual Struggle during the

- College Year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9(1), 1–27.
- Cai, Tianji and Hongyu Wang. 2017. “Comparing Weighting Methods for Nonresponse in the HKPSSD Survey and the BCSPS.” *Chinse Sociological Review* 50(1), 1–26.
- Chang, Insu, Heeran Park, and Hosung Sohn. 2021. “Causal Impact of School Starting Age on the Tempo of Childbirths: Evidence from Working Mothers and School Entry Cutoff Using Exact Date of Birth.”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7, 997–1022.
- Charles, Maria and Karen Bradley. 2002. “Equal but Separat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Sex Segreg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4), 573–599.
- Chen, Jiwei and Jiangying Guo. 2022. “The Effect of Female Education on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Compulsory Schooling Reform.”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88, 102257.
- Compernelle, Ellen L. and William G. Axinn. 2019. “Mass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Ideal Ages at Marriage.” *Demography* 56(6), 2083–2108.
- Cook, Thomas D. 2008. “‘Waiting for Life to Arrive’: A History of the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 in Psychology,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2, 636–654.
- Cunningham, Mick. 2008.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Male Breadwinner, Female Homemaker Family Model: Influences of Women’s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over the Lifecourse.” *Social Forces* 87(1), 299–323.
- D’Albis, Hippolyte, Angela Greulich, and Gregory Ponthiere. 2017. “Education, Labor, and t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Birth Postponement in Europe.” *Demographic Research* 36(23), 691–728.
- David, Maria A. and Nuria Legazpe. 2014.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in Spain: A Simultaneous Approach.”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14), 1898–1925.
- Diaz, Belinda Aparicio, Thomas Fent, Alexia Prskawetz, and Laura Bernardi. 2011.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The Ro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ndogenous Networks.” *Demography* 48, 559–579.
- Edin, Kathryn and Maria Kefalas. 2005. *Promises I Can Keep: Why Poor Women Put Motherhood Befo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ng, Acton Jiashi. 2022. “Revisiting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 Prestige Hierarchy and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 in China.” *Demography* 59(1), 349–369.
- Fielding, David. 2018. “The Co-Evolution of Education and Tolerance: Evidence from England.” *Social Forces* 96(4), 1825–1850.
- Flowers, Lamont A. 2002. “Developing Purpose in College: Differences between Freshmen and Senior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36(3), 478–485.

- Gerber, Theodore P. and Sin Yi Cheung. 2008.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m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299-318.
- Gerber, Theodore P. and David R. Schaefer. 2004.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ussia: Trends, Gender Difference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7(1), 32-59.
- Glick, Peter, Christopher Handy, and David E. Sahn. 2015. "Schooling, Marriage, and Age at First Birth in Madagascar." *Population Studies* 69(2), 219-236.
-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2000. "Career and Marriage in the Age of the Pil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2), 461-465.
- Halcomb, Laura. 2018. "Men and Infertility: Insights from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Sociology Compass* 12(10), e12624.
- Harknett, Kristen and Arielle Kuperberg. 2011. "Education, Labor Markets and the Retreat from Marriage." *Social Forces* 90(1), 41-63.
- Hoekstra, Mark. 2009. "The Effect of Attending the Flagship State University on Earnings: A Discontinuity-Based Approac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4), 717-724.
- Hu, Anning and Nicholas Vargas. 2015.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Higher Education* 70, 337-358.
- Hu, Anning and Xiaogang Wu. 2019. "Parental Educa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Love: Surve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1(3), 584-600.
- Jackman, Mary and Michael J. Muha. 1984. "Education and Intergroup Attitudes: Moral Enlightenment, Superficial Democratic Commitment, or Ideological Refin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6), 751-769.
- Jafarey, Saqib, Ram Mainali, and Gabriel Montes-Rojas. 2020. "Age at Marriage, Social Norms, and Female Education in Nepal."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4(3), 878-909.
- Jennings, Elyse A., William G. Axinn, and Dirgha J. Ghimire. 2012. "The Effect of Parents' Attitudes on Sons' Marriage Tim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6), 923-945.
- Kravdal, Oystein and Ronald R. Rindfuss. 2008.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A Study of Women and Men Born 1940 to 196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3), 854-873.
- Lesthaeghe, Ron and John Surkyn. 1988. "Cultur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Theories of Fertility 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1), 1-45.
- Lesthaeghe, Ron, and Dirk J. van de Kaa. 1986. "Twee Demografische Transitities?" Pp. 9-24 in Ron Lesthaeghe and Dirk J. van de Kaa(eds.). *Bevolking: Groe en Krimp*. Deventer, Van

- Loghum Slaterus.
- Loyalka, Prashant, Yingquan Song, and Jianguo Wei. 2012. "The Effect of Attending Selective College Tier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2), 287–305.
- Lynn, Freda B., Barbara Schneider, and Zhenmei Zhang. 2012.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Expectations a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dolescents in the 1970s Versus the 1980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4(9), 1147–1174.
- McClendon, David, Janet Chen-Lan Kuo, and R. Kelly Raley. 2014. "Opportunities to Meet: Occupational Education and Marriage Formation in Young Adulthood." *Demography* 51(4), 1319–1344.
- McCright, Bernadette Susan. 2004. "A Grief Ignored: Narratives of Pregnancy Loss from a Male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6(3), 326–350.
- Melnikas, Andrea and Diana Romero. 2020. "Ideal Age at First Birth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Young Adults in Greater New York City: Findings from the Social Position and Family Formation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1(3), 288–311.
- Mijs, Jonathan J. B. 2016. "Stratified Failur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nd Students' Attributions of Their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in 24 Countri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9(2), 137–153.
- Musick, Kelly, Paula England, Sara Edgingto, and Nicole Kangas. 2009. "Education Differences in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Fertility." *Social Forces* 88(2), 543–572.
- Niu, Jianlin and Yaqiang Qi. 2020. "The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 in Fertility in Transitional China: Tempor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Demographic Research* 42(22), 657–688.
- Piotrowski, Martin and Yuying Tong. 2016.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Decline in China during Transitional Times: A Cohort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5, 94–110.
- Plotnick, Robert D. 2007. "Adolescent Expectations and Desires About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0(6), 943–963.
- Raley, R. Kelly, Yujin Kim, and Kimberly Daniels. 2012. "Young Adults' Fertility Expectations and Events: Associations with College Enrollment and Persistenc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3), 866–879.
- Rauscher, Emily. 2019. "Delayed Benefits: Effects of California School District Bond Elections on Achievement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93(2), 110–131.
- Rindfuss, Ronald R., Larry Bumpass, and Craig St. John. 1980.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s Women Occup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3), 431–447.
- Rindfuss, Ronald R. and Craig St. John. 1983. "Social Determinants of Age at First Bir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5(3), 553–565.
- Rodgers, Joseph L., Hans-Peter Kohler, Matt McGue, Jere R. Behrman, Inge Petersen, Paul

- Bingley, and Kaare Christensen. 2008. "Educa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y as Direct, Mediating, or Spurious Influences on Female Age at First Birth: Behavior Genetic Models Fit to Danish Twin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Suppl.), S202-S232.
- Schneider, Daniel, Kristen Harknett, and Matthew Stimpson. 2019. "Job Quality and the Educational Gradient in Entry into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56(2), 451-476.
- Schwartz, Christine R. and Robert D. Mare. 2005.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from 1940 to 2003." *Demography* 42, 621-646.
- Sheng, Xiaoming. 2012. "Cultural Capit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ren's Schooling and Higher Education Choice in China." *Gender and Education* 24(2), 131-146.
- Shu, Xiaoling. 2004. "Education and Gender Egalitarianism: The Case of Chin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7(4), 311-336.
- Skirbekk, Vegard, Hans-Peter Kohler, and Alexia Prskawetz. 2004. "Birth Month, School Graduation, and the Timing of Births and Marriages." *Demography* 41(3), 547-568.
- Tropf, Felix C. and Jornt J. Mandemakers. 2017. "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Postponement Causal? The Role of Family Background Factors." *Demography* 54, 71-91.
- van de Werfhorst, Herman G. and Gerbert Kraaykamp. 2001. "Four Field-Relat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ir Impact on Labor, Consumption, and Sociopolitical Orient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4(4), 296-317.
- Wang, Donghui and Guangqing Chi. 2017. "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Stories: A Study of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ounty-Level Fertility in China." *Demographic Research* 37(16), 493-526.
- Winship, Christopher and Stephen L. Morgan. 1999. "The Estimation of Causal Effect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659-709.
- Witteveen, Dirk and Paul Attewell. 2017. "The Earnings Payoff from Attending a Selective Colleg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6, 154-169.
- Yuki, Masaki and Susumu Yamaguchi. 2018. "Long-Term Equity within a Group: An Application of the Seniority Norm in Japan." Pp. 288-297 in Hector Grad, Amalio Blanco, and James Georgas(eds.). *Key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ondon, UK: Garland Science.
- Zaidi, Batool and S. Philip Morgan. 2017.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A Review and Appraisal."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3, 473-492.
- Zahra, Fatima. 2020. "High Hopes, Low Dropout: Gender Differences in Aspirations for Education and Marriage,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Rural Malawi."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64(4), 670-702.

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

乔治·斯坦梅茨**

摘要：社会学家正在为殖民地、帝国和后殖民研究中迅速增长的文献增添特定的学科特色。他们特别热衷于在有关帝国的历史文献中添加解释性说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率先将殖民地作为历史形态进行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方法相反，社会学家坚持研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动态交往，询问这两个群体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与当代后殖民学者一样，社会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探究海外殖民主义和殖民移民是如何重塑宗主国的。与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对殖民地研究的讨论相呼应，当前关于后殖民社会学的讨论质疑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适用性，并询问社会学本身是如何被帝国塑造的。当前对帝国的社会学研究集中于六组因果机制：①资本主义；②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③文化表征与主体性；④被殖民者的抗争与合作；⑤帝国和殖民地的制度维度；⑥殖民地国家中心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和妥协。

关键词：帝国主义 领土和非正式帝国 驻领殖民地① 内部殖民主义 去殖民化

* 本文译自 Steinmetz, George. 2014. "The Sociology of Empires, Colonies, and Postcolon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 77-103. 译者：朱宝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高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校者：马天航，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本译文已获得原作者授权。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国家理论演进及其当代意义研究”（21YJC790033）的资助。

** 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讲席教授。

① 驻领殖民地(settler colony)与占领殖民地(occupation colony)相对应，《文学诠释方法论》一书中关于后殖民文学的讨论提及了殖民地类型的划分。详见罗伯特·戴尔·帕克：《文学诠释方法论》，刘金波、杨晓强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第244~245页。——译者注

一 引言

在过去的四千年中，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帝国史或者一部关于帝国的历史”（Darwin, 2008a: 491）。民族国家是一项晚近的发明。例如，法国只有在1962年“放弃了其帝国结构的最后一个重要成分阿尔及利亚”之后才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Cooper, 2005: 156）。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像美国这样表面上非帝国的民族国家，其实一直是非正式的帝国（如 Mann, 1986–2012, vol. 4）。

最近一份仅涵盖大英帝国的文献目录就长达1000多页（Porter, 2002）。本综述并不试图调查这片浩瀚的学术海洋，而是聚焦于社会学学科自身。正如麦克伦南（McLennan, 2013）所建议的，社会学有可能在帝国研究中加入一些特殊的内容。至少，如凯勒（Keller, 1906）在一个世纪前所表明的那样，殖民主义和帝国可以对社会学有所贡献。社会学家无法回避帝国，即使是那些关注当下和本土的社会学家亦然。对于历史和跨国社会学家来说，帝国和殖民地无处不在，尽管它们可能会随着知识时尚的变化而时隐时现。

社会学对帝国的研究姗姗来迟，只因其成为一门学术科目的时间相对较短（Goudsblom and Heilbron, 2004）。但自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851 [1929]: 128–134）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2001）以来，社会学家为这些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工作的学术社会学家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参与了某种形式的殖民研究（Steinmetz, 2013a）。^① 社会学家在研究去殖民化后出现的发展和欠发达问题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社会学家是最早对殖民地进行比较历史研究的一批人（Balandier, 1955; de Dampierre, 1967; Hermassi, 1972; Wallerstein, 1959）。这一故事的最新阶段是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历史社会学（Steinmetz, 2013b）以及自称为后殖民社会学（Magubane, 2013;

^① 关于这里用来确定社会学领域成员身份的标准和历史来源，请参见 Steinmetz (2009a)。

Reuter and Villa, 2010; Steinmetz, 2006) 的出现。

在法国和英国等国家，随着公众舆论和共识转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社会学家对其学科参与殖民帝国研究的“失忆症”几乎在殖民时代结束时立即出现。如果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学教科书或百科全书中提到殖民主义和帝国，它们通常会被归并为 (be collapsed into) 经济帝国主义。因此，当前关于帝国、殖民地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是对社会学本身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和经验工作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本文是一项对“失忆症”的锻炼，也是一份该主题未来研究的指南。

在继续之前，我需要定义几个术语。对帝国的研究分布在许多学科，这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我们自己的帝国词汇主要来源于罗马帝国。当我们踏入这个概念领域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处于从古代开始的一系列激烈辩论的核心之中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二 定义

(一) 帝国

在所有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讨论中，帝国是首要的概念。名词 imperium 最初表示国王和官员指挥和惩罚臣民的合法权力 (Weber, 1921-1922 [1978]: 650, 839)。然后，统治权 (imperium) 的概念“通过类比引申为罗马有权命令其所征服的人民服从” (Lieven, 2000: 8)。中世纪时期，帝国在西欧先后具有三种主要含义：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德意志帝国理念、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卡洛林王朝的帝国意识，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所谓世界帝国 (universal empire) (Lieven, 2000: 13-17)。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帝国一词开始被用来指代通过征服造就的大型领土政治组织和单一国家的海外属地 (Pagden, 2003)。法国和英国都将其海外殖民地称为他们的帝国。

然而，在社会学中，帝国一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主要由研究古代或非西方社会的专家使用，如布罗伊尔 (Breuer, 1987)，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1963)，吉登斯 (Giddens, 1987)，格切克 (Göçek, 1987) 和曼 (Mann,

1986-2012)。只有少数人将现代政体称为帝国（如 Nederveen Pieterse, 1990）。

正如这里所定义的，帝国是扩张的、军事化的、多民族的政治组织，它极大地限制了其所征服的人民和政体的主权。正如苏尼（Suny, 2001: 25）所写，帝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支配或控制，两个单位分处在一种层级节制的、不平等的关系中……在这种情况下，宗主国主宰边缘地区，对边缘地区不利”。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无视所有削弱帝国核心政治意义的定义。帝国概念的边界是霸权、大国和国际影响力的理念（有关霸权和帝国的比较，参见 Go, 2011, vol. 3）。

（二）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最初用来谴责拿破仑的军事专制，然后被用于拿破仑三世、其他 19 世纪统治者以及整个大英帝国（Knox, 1998; Spann, 1923）。帝国这个词在 19 世纪的含义仍然大体上是正面的，与之相反，帝国主义总是暗示着非法和傲慢。抛开帝国主义的隐喻用法不谈，我们可以确定 1900~1920 年间出现的两个主要的分析性定义。霍布森（Hobson, 1902 [1965]）将帝国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在消费不足时期积极寻求海外市场和投资。熊彼特（Schumpeter, 1919 [1951]: 6）反驳说，帝国主义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无目的地进行无限的武力扩张”。

我自己的定义保留了帝国主义一词最初的政治共鸣（resonance），并拒绝将其等同于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一种对外国土地进行政治控制的战略，不一定涉及外来入侵者的征服、占领和持久统治。在这方面，帝国主义是比殖民主义“更全面的概念”，因为帝国可能不仅把殖民地“视为目的本身”，还视为更大的“全球权力游戏”中的棋子（Osterhammel, 2005: 21-22; Aron, 1959 [2006]）。

（三）殖民地、殖民主义和殖民地化

殖民主义基于拉丁语动词 *colere*（居住、耕作和栽培）。因此，殖民地和殖民地化这两个词显然与罗马扩张和罗马佃农的形象有关（Weber, 1891 [2010]）。由于这些有关土地的起源，殖民地通常被用来指代“由

‘母国’移民来占领的领土”，而没有任何额外的征服和外国统治的迹象（Gonzalez Casanova, 1965: 28）。殖民地化指的是移民，然后是定居和对景观（landscape）的改造，但这组含义并不符合对殖民统治或殖民主义的现代理解。

在当代用法中，殖民主义意味着征服一个外国民族，然后建立一个由征服国成员控制的并适合统治被征服领土的土著居民的组织。因此，殖民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范围更窄的概念。殖民主义总是涉及征服国对主权的霸占，其统治被视为永久的，或者仅限于一个遥远或定义模糊的终点。当然，主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either/or）的条件，而是逐级变化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具有不同程度的间接性和非正式性，并坚持对外国统治的委婉表达（euphemization）。对于殖民主义的定义来说，殖民地的实际寿命不如统治者对时间框架的理解重要。大多数殖民地將日常统治的某些方面委托给本土代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国主权标准。

殖民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被征服的人口在法律、行政、社会、文化和（或）生物方面的配置都低于其占领者（Burawoy, 1974: 526）。查特基（Chatterjee, 1993）称之为差别统治。所有殖民地国家都将其臣民划分为不同的部落或种族群体以加强控制，但同时，殖民地国家也将被殖民者归入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类别。正如苏尼（Suny, 2001: 32）所写，“在欧洲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存在着构建和复制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类别的根本问题，使它们保持不同，一个低于另一个”。

一些殖民地在差别统治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但与前几个世纪相比，这一规则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通常更加严格。在美洲，西班牙人的监护征赋制度（encomienda system）承担着“使人们皈依的义务”（Cooper, 2004: 264），这缩小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文化距离。近代早期法属美洲的殖民主义倾向于完全同化美洲原住民，使他们皈依“天主教和法国文明”（Belmessous, 2013: 13）。日本的殖民主义以泛亚主义为导向，这削弱了有区别的殖民统治的严重性（Duara, 2003: 99-122; Chae, 2013; Park, 2005）。然而，所有现代西方殖民地都“持续而警觉地”精心设计和执行差

别统治 (Stoler and Cooper, 1997: 5), 这阻止了大多数殖民地的臣民获得与其统治者平等的法律权利和地位, 甚至据称是同化主义的法兰西帝国也对真正的同化施加了限制。在一项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族教师培训的历史研究中, 受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启发, 科隆纳 (Colonna, 1975: 168-169) 表明, 殖民国对文化渗透的道路施加了特定的限制, 这种限制将学术卓越的品质定义为既不太接近原始文化, 也不太接近西方文化。

(四) 帝国背景下的国家

20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 社会科学出现了一种概念上的转变, 历史上被称为帝国的政体被重新归类为国家。这发生在庞大的殖民帝国逐步消失、民族国家日渐成为国际体系默认的组织单位之际。

国家需要在几个方面上被整合到对帝国的研究中。大多数帝国的中心都有一个国家 (Schmitt, 1941 [1991]: 67)。一个帝国可以被描绘成一个太阳系, 在这个太阳系中, 被殖民的边缘地区围绕着宗主国这一核心运行, 引力将它们固定在自己的轨道上, 并将它们彼此绑定在一起。^① 这个帝国太阳系中的行星也都有自己的国家。这些边缘国家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第一种是殖民地国家, 它是一种管理殖民地的行政机构, 有时从其宗主国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Blackburn, 1988: 79-85; Han, 2006; Laidlaw, 2005; Steinmetz, 2007)。第二种是间接统治的土邦 (native state)。^② 殖民者通常依赖某种形式的间接统治 (Fields, 1985; Gowda, 2013)。这里的间接性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殖民国家部分地通过土著精英的代理来统治土邦。国家扮演帝国的历史起源和终点的角色, 民族国家获得、失去帝国, 或者帝国退化为纯粹的国家。

① 帝国的轮辐式模型将殖民地设想为与枢纽等距, 在这方面不如太阳系模型合适 (Motyl, 2001)。轮辐式模型也是刚性和静态的, 而在太阳系中, 旋转行星的引力可能会动态地影响其他行星的轨道和潮汐。在一个被理解为太阳系的帝国中, 不同的行星都有它们“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夏天和冬天”, 而不是完全由中心太阳决定 (Naumann, 1915 [1964]: 664)。

② Native state 一般指 (印度) 土邦。详见 Ramusack, Barbara. 2004. *The Indian Princes and Their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3 (The British Construction of Indirect Rule)。——译者注

国家经常做与帝国（或帝国国家）相似的事情（参见 Burbank and Cooper, 2010; Kumar, 2013; Steinmetz, 2005）。这部分是因为国家和帝国都受到类似的外部制约，包括来自地缘政治和资源依赖的压力。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或民族化国家）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给当地土著的待遇（Brubaker, 1995）。在吞并新领土后不久，不断扩张的民族国家通常开始消除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法律、行政和公民身份差异。帝国保持并加强了这种差异；现代殖民帝国使这些差异尽可能僵化和不对称。民族国家普遍化推力的主要例外位于欧洲边缘地区（Bartlett, 1993）和所谓的内部殖民地，（这将在）下文讨论。

（五）后殖民主义与后帝国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对殖民主义继续塑造前殖民地和宗主国的方式的调查研究，也是理解历史殖民主义的一套新方法。后殖民主义与其说是一个阶段性的术语，不如说是一种“从理论上抵制殖民主义后果的神秘失忆症”的主张（Ganghi, 1998: 4）。后殖民研究是一个不寻常的领域，因为它不仅可以追溯到学术理论家，也可以追溯到小说和诗歌作家。事实上，一些殖民主义社会学家（如 Georges Balandier, Michel Leiris, Orlando Patterson, Leopold von Wiese）首先出版了殖民小说，然后转向了更具社会科学的风格。后殖民理论的两位先驱——阿尔伯特·梅米（Albert Memmi）和爱德华·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在从事社会科学的同时继续写小说。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罕见的科学领域，即使在 21 世纪，其中的社会科学也继续与人文学科互动。^①

后帝国理论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历史的黄昏时期形成的，在这个时期，帝国的衰落还没有伴随着文化力量的减弱。事实上，帝国意识形态在这些过渡时刻呈现出夸张的形式。后帝国理论表明，美国文化的帝国性在美帝国衰落的日子变得越发明显。黑尔和斯坦梅茨（Hell and Steinmetz, 2014）提炼

^① 然而，2013 年 11 月于芝加哥举行的社会科学史协会的年会上，正如利拉·甘地在关于斯坦梅茨（2013b）的专题讨论小组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这一评论无意轻视后殖民理论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参见罗伊特和维拉（Reuter and Villa, 2010）。

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 (Venturi et al., 1972) 中所颂扬的后现代都市主义的帝国的潜台词, 并追溯了拉斯维加斯自我呈现的演变, 从 20 世纪 40~60 年代对罗马和欧洲帝国的自信戏仿, 到今天对一个衰落中的强化军事帝国的粗笨展示。

三 帝国战略与帝国的组态

帝国通常结合不同的统治战略, 形成混合的政治形态 (Steinmetz, 2005)。我们可以区分四种基本的帝国战略: ①前现代陆基帝国; ②现代领土帝国; ③殖民主义; ④非正式、非领土型的帝国主义。18 世纪的奥地利帝国就是一个组合战略的例子: 奥地利属荷兰 (the Austrian Netherlands) 被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视为领土交换游戏中的棋子, 而匈牙利则被占领并像殖民地一样被统治。

历史学家研究从一种帝国形态到另一种帝国形态的转变, 以及在给定政治集群 (constellation) 中对不同战略相对重要性的重新安排。19 世纪英国转向“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 (Gallagher and Robinson, 1953) 是一个以殖民主义为主的战略演变为更多帝国主义方法的例子。19 世纪 80 年代, 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开始了一场回归正式殖民主义的运动。

另一种帝国模式涉及特许公司。在整个中世纪和现代时期, 投资者为了贸易、勘探和开发而创建了这样的公司。最有趣的案例, 如荷兰的联合东印度公司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是承担政府政治和镇压职能的特许公司。前者于 1800 年破产, 并将权力移交给荷兰政府; 后者于 1858 年将权力转让给英国王室 (Lardinois, 2008)。1858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 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由欧洲国家的代理人管理, 但在此期间也有一些特许公司成立了。19 世纪 80 年代至 1900 年间, 特许公司在德属新几内亚和马绍尔群岛拥有政治权力。比利时政府直到 1908 年才取得对刚果完整的行政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特许的上乌班吉苏丹国新公司 (Société Nouvelle des Sultants du Haut Oubangui) 对法国殖民地乌班吉沙立的总督行使了事实上的控制权 (de Dampierre, 1967: 494-505)。1923 年,

南罗得西亚的主权由塞西尔·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转移给半独立的驻领政府。^① 最后的抵抗者是葡萄牙属莫桑比克，直到 1942 年，那里的私人特许公司仍控制了几乎一半的领土。这些都是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相结合的情况。

（一）前现代领土帝国

古代帝国通常将不安于现状的扩张和军国主义与稳定被征服者的努力相结合，往往通过承诺和平与繁荣来换取臣服和贡品（Mann, 1986-2012; vol. 1; Pagden, 2003）。无休止的征服和合并浪潮的一个结果是，帝国往往是多文明的和多神教的，保留了文化差异（Burbank and Cooper, 2010；关于古代帝国的相反观点，请参见 Giddens, 1987: 81）。韦伯（Weber, 1891 [2010]）关注罗马帝国的衰亡，并比较了现代和古代帝国。社会学家布罗伊尔（Breuer, 1987）、艾伯哈德（Eberhard, 1965）、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 1963）、弗莱尔（Freyer, 1948）、吉登斯（Giddens, 1987）以及戈德斯通和霍尔顿（Goldstone and Haldon, 2009）以广泛的韦伯式风格分析古代帝国。根据曼（Mann, 1986-2012, vol. I）的说法，传统帝国是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权力来源的高阶联结体。

（二）现代大陆帝国

现代的领土帝国也是以不断扩张和稳定所获得的土地（两个）相互冲突的要件为导向。1938 年纳粹合并（Anschluss）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标志着中欧新大陆帝国的开始（Mazower, 2008）。纳粹社会学家如缪尔曼（Mühlmann, 1944）为管理东部被占领土上的特定人口，有选择地为将其德国化的计划做出了贡献。现代大陆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强调文化差异而非文化统一。^② 因此，在被纳粹占领的东欧，德国人受

① 参见中国外交部关于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情况介绍，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824/1206x0_677826/。——译者注

② 关于美国各州区分美洲原住民和美国公民的战略演变，请参见最近菲西科（Fixico, 2012）关于印第安事务局（BIA）的一项研究。BIA 可以与欧洲殖民办事处和殖民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比较，后者主要活动也是统治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当地 BIA 代理人的角色与英国地区专员、法国圈内指挥官（commandant du cercle）或德国的地区官员（Bezirksamtman）在殖民地的角色大致相同。

到了类似于殖民统治的差别待遇 (Lower, 2005: 162-79)。

(三) 殖民帝国

殖民帝国显示出分裂的倾向, 以及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部署的本土政策的相应变化。官员们在努力控制每个殖民地国家和宗主国殖民地办事处的行政领域中不断地相互斗争 (Steinmetz, 2008b, 2013c)。这样的分歧解释了殖民地之间的一些政策差异。这些位于殖民政府核心的分歧, 打破了单一的“帝国主义官方思想”或任何特定殖民地内部统一的官方思想的任何前提 (Robinson and Gallagher, 1961)。

与此同时, 这些自相残杀的斗争是以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假设为基础的, 其中包括一致承认殖民地国家和帝国的存在。对帝国作为整体的一致认可基于各种实践: 君主或总统访问各帝国的前哨; 在巴黎殖民学校 (*École coloniale*) 的相同课程或在牛津、剑桥的殖民地学员课程中, 培训前往特定帝国不同地区任职的公务员; 环绕全球的殖民职业路径, 还有帝国海军, 他们的旅行勾勒出了帝国的轮廓。殖民帝国存在于宗主国人们的心中和脑海里, 尽管他们对帝国的细节一无所知 (Ward, 2001)。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大英帝国处于英国自我理解和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 帝国的丧失对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欧洲的殖民展览通常展示各殖民帝国的微型版本 (Geppert, 2010)。例如, 1896 年柏林贸易展览会上, 200 多万名游客参观了由每个德国殖民地的土著村庄组成的景观, 这些村庄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这些殖民地的土著人 (Steinmetz, 1993)。类似的展览也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其他地方举行。殖民帝国在通俗文化中还通过小说、电影、纪念碑、博物馆、玩具、纸牌和学校课程被表现为融合的整体 (Steinmetz and Hell, 2006; Trepsdorf, 2006)。

(四) 近代早期殖民主义与现代殖民主义

近代早期殖民主义和现代殖民主义之间的区别, 对应于 18 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的支点从西半球转向作为帝国注意力主焦点的非洲和亚洲, 也与从殖民奴隶制逐渐转向在非洲剥削非洲劳工相对应 (Blackburn, 1997)。在英国历史上, 这段停顿 (caesura) 被称为“帝国子午线”, 也是从第一

帝国向第二帝国的过渡 (Bayly, 1989; Darwin, 2008b)。这一区别还体现为逐渐摆脱重商殖民主义和特许公司的统治,并向宗主国直接管理殖民地的西班牙模式靠拢。与此同时,在殖民地大规模重新安置外国侨民的情况也有所减少,这是近代早期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特征 (Elliott, 2006)。19 世纪中叶以后建立的大多数殖民地都位于被认为不适合欧洲人居住的地区,或者有其他定居障碍 (的地区)。甘恩 (Gann, 1984: 498, 502) 指出了现代出现的另外两类殖民地: 因其“实际或假定的陆军和海军价值”而获得的战略殖民地,以及主要为“威望问题”而获得的殖民地,如日本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帝国。

(五) 驻领殖民地

在驻领殖民地,土著居民被定居者取代或臣服于定居者,在法律和行政方面被不平等对待。沃尔夫 (Wolfe, 2006) 认为,驻领殖民地本质上是“消灭主义者”: 他们试图通过占领土地、同化、驱逐或创建偏远的保留地来瓦解土著文化。定居者常常把他们正在殖民的空间想象成一块没有人的土地 (Raum ohne Volk), 并援引无主地 (terra nullius) 学说的某种版本——认为土著居民没有有效利用的土地 (以及其隐含的经济资源) “可以由一个优越的入侵国合法征用和开发” (Lieven, 2000: 4)。更坦率地说,驻领殖民地信奉“欧洲人有权超越土著人的要求去占领和开发”他们自己的资源的理念 (Frazier, 1955: 84)。在根本没有土著居民的地方 (无论是由于驱逐还是灭绝), 我们应该谈论殖民者的殖民地化 (settler colonization), 而不是殖民主义。

殖民地定居点的可能性和定居者人口的数量是由殖民地官员决定的,他们有时会完全禁止定居。即使在定居者数量超过其他殖民者的殖民地,定居者也不一定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 (Elkins and Pedersen, 2005: 5)。

驻领殖民地的长期轨迹变化巨大。殖民统治和去殖民化通常在驻领殖民地比在非驻领殖民地更加暴力。土著居民可能被孤立 在偏远地区, 这种模式加剧了他们的经济欠发达 (程度) (Zureik, 1979: 29)。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勒斯坦和美洲, 定居者从他们的宗主国统治者手中获得了独

立，并接管了继承下来的国家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驻领殖民地因“定居者集体出走”（Veracini, 2010: 106）和白人的政治边缘化而终结。

（六）内部殖民主义

一些前驻领殖民地包含内部殖民地——受周边国家支配的土著居民。社会学家兼印第安人政策改革家科利尔（Collier, 1945: 265）分析，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待遇是“现代世界最长的‘殖民’记录”。冈萨雷斯·卡萨诺瓦（Conzalez Casanova, 1965: 27）将西班牙人向作为土著墨西哥人的统治者的“克里奥尔人”^①的转变描述为从殖民主义向内部殖民主义的转变。赫克特（Hechter, 1975）分析了英国对凯尔特外缘地区的吸纳是内部殖民主义。亚当（Adam, 1971）将1910年后的南非^②描述为内部殖民主义。对于祖瑞克（Zureik, 1979）来说，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内部殖民地，尽管正如亚当和穆德利（Adam and Moodley, 2005: 1）所指出的，定居者本身“成为土著”的临界点是模糊的。斯尼普（Snipp, 1986）将内部殖民主义的概念引入对美洲原住民的研究中。奇怪的是，对内部殖民主义概念的科学应用几乎完全局限于社会学。

只有在当前统治精英的祖先作为殖民征服者到达的地方，以及在内部殖民地是由最初殖民者征服的土著人后裔承袭的地方，内部殖民主义的理念似乎才做了有用的区分。然而，尽管本土性是内部殖民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领土集中却并非如此。几个世纪以来，美洲原住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分散在美国各地，但他们目前的保留地仍然是内部殖民地。

（七）非正式、非领土帝国

在20世纪占据主导的帝国类型是非正式的和非领土的（Mann, 1986—

① 克里奥尔（Creole）一词的含义在不同的社会和时期有所不同，一般是指“来自旧大陆但在新大陆发展起来的人群和文化”。冈萨雷斯·卡萨诺瓦（1965）一文中是指首批定居在西印度群岛或南美的欧洲人的后裔，或定居在美国南部诸州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另可参考 Bolland, O. Nigel. 1998. “Creolisation and Creole Societies: A Cultural Nationalist View of Caribbean Social History.” *Caribbean Quarterly*, 44 (1-2): 1-32。——译者注

② 当时权力被转移给唯一的白人少数群体（Wolpe, 1975: 231）。

2012: vol. 4)。国际控制是通过军事、经济和其他手段进行的，但不存在征服或永久夺取政治主权的情况，因此不可能有系统地实施差别统治。非正式帝国比霸权更具强制性。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是1918年以前德国统治中欧的“中欧”（*Mittleuropa*）计划（Naumann, 1915 [196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社会学家开始讨论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新的、高度“弹性”的形式，这种形式“给受害者留下了政治自主的假象，并对最低限度的政治暴力感到满意”（Salz, 1923: 569; 另见 Gerth and Mills, 1953: 205）。施密特（Schmitt, 1941 [1991], 1950 [2003]）将帝国“更大空间”（*Großraum*）或内在规则的概念建立在美国门罗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这是一种将美国利益强加给西半球国家而不直接统治它们的制度。阿隆（Aron, 1945, 197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讨论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问题。直到20世纪中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驻领殖民地的自治领地位代表了“殖民状态和独立状态之间的中间地带”，此时王室对英联邦国家的权力被从根本上削弱（McIntyre, 1999: 194）。非正式帝国主义的技术包括被操纵的市场交易、治外法权安排、秘密监狱（black sites），以及特别引渡、无人机袭击、不平等的军事联盟和部队地位协定。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建立在由数百个半永久性军事基地和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临时军事设施组成的全球网格之上。

（八）去殖民化、帝国衰落和帝国的来世

蒂利（Tilly, 1997: 1）写道，“我们文化的标准文学形式”之一是“为一个堕落的帝国而写的挽歌”。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帝国建立者们一直痴迷于帝国的衰落。他们为看似不可避免的衰败编造了无数的解释，并炮制了阻止衰落的方法（Hell, 2009）。然而，直到最近，社会科学家还没有像关注帝国的获得、成长和治理那样关注帝国的瓦解（Howe, 1993）。一些分析人士将殖民帝国的衰落归因于对领导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少数年轻人”的西式教育（Aron, 1957: 11.04-12）。其他人则将矛头指向了战争、二战后欧洲经济的衰退、冷战及美苏争夺非洲和亚洲的忠诚度、帝国的经济“过度扩张”（Kennedy, 1989; Schäffle, 1887），以及宗主国公

众和政界对帝国日益强烈的反对。

世界体系理论 (Wallerstein, 1986) 为殖民征服和去殖民化的历史模式以及 19 世纪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殖民经济向欧洲核心剥削非洲人和非洲资源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模型。在非霸权时期, 核心分裂且每个有竞争力的大国都声称拥有全球外围的特定区块, 并与之建立了专属的、受保护的贸易和资源开采关系 (Bergesen and Schoenberg, 1980)。当核心是霸权化的, 主导大国则实施自由贸易, 避免保护主义和殖民主义; 去殖民化随之而来。这种说法的经验问题是, 像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这样的重要殖民地是在英国非殖民霸权阶段被吞并的。此外, 美国积极支持欧洲在除南亚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坚守其关于殖民地的努力, 直到去殖民化成为定局 (Louis and Robinson, 1993)。葡萄牙帝国在 1974 年之前一直保持完整, 南部和中部非洲的驻领殖民地甚至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尽管如此, 世界体系理论仍为解释全球殖民活动浪潮的问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答案。

关于陆地帝国衰落的理论比较分散 (diffuse)。古代作家遵循奥古斯丁的模型, 认为帝国财富导致奢侈、颓废和虚弱 (Demandt, 1997: 225)。历史学家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提出了数百个原因。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1963) 《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一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古代帝国的永存, 而不是它们的衰落, 但在其他地方, 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1967: 2-4) 指出, 不同的前现代帝国的衰落是由于同一组决定因素, 包括官僚阶级和食利者阶级的增长、商业和耕地面积的下降, 以及统治者和传统精英之间政治联盟的破裂。目前大多数关于帝国终结的研究都是多原因的, 正如蒂利 (Tilly, 1997: 5) 所言, “如果四千年来的帝国都是如此……千差万别, 那么除了琐碎的内容, 我们不太可能从它们的历史中得出任何不变的东西”。

帝国的来世呢? 如前所述, 这是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新殖民主义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赫尔马西 (Hermassi, 1978: 250) 指出, “理论家们普遍认为, 外围经济体和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源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最近, 科利 (Kohli, 2004) 和马奥尼 (Mahoney, 2010) 发现殖民地国家的结构

和政策对后殖民经济增长有着持久的影响。殖民奴隶制的后果继续影响着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和不平等。如果殖民时期的大屠杀对后殖民时期的经济表现没有容易测量的影响，那么其遗产则是以不太可量化的方式持续存在。例如，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赫雷罗人继续在政治和心理上与一个多世纪前结束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后果作斗争（Durham, 1993）。在萨摩亚，德国殖民者引入的一些机构，如土地和产权法院，一直在后殖民地国家中保留着（Steinmetz, 2008b）。

四 帝国的理论透视

本节围绕已提出的解释帝国各个方面的因果机制组织起来。这些理论方法围绕着六种不同的因果机制或机制集合：①资本主义；②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③文化表征与主体性；④被殖民者的抵抗与合作；⑤帝国和殖民地的制度维度；⑥殖民地官员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一）马克思主义帝国理论

马克思并非集中关注帝国主义，但他的作品包含了三个相关论点。第一，马克思（Marx, 1867 [1976]: 929）坚持认为，鉴于“资本主义政权的国际性质”，资本主义不能在国家尺度上得到充分的分析。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效仿列宁（Lenin, 1917 [1939]），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Hardt and Negri, 2000）或资本主义的最高级阶段。第二，马克思认为帝国主义客观上是一种现代化的力量，是恶所引起的历史作用。他批评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但认为其客观上对印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它将统一印度国家，并结束了该国奄奄一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Marx, 1969）。第三，马克思勾勒了一个驻领殖民化理论。事实上，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殖民地”的“大部分土地”仍然是“公共财产”，因为它已经从其土著所有者那里被整体征用，这意味着“每个殖民者”都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他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生产资料”，从而抵制自己的“（再）无产阶级化”（Marx, 1867 [1976]: 934, 938）。

马克思认为欧洲殖民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恶，这一观点遭到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反对（见 Warren, 1980）。对霍布森（Hobsen, 1902 [1965]）和卢森堡（Luxemburg, 1913 [2003]）来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与对宗主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一样具有毁灭性。希法亭（Hiferding）和列宁将帝国主义等同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型。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些观点重新表述为“欠发达的发展”、经济“依附”、“不平等的发展”和“不平等的交换”（Bortoluci and Jansen, 2013: 211-213）。雷（Rey, 1973）的生产方式的连接模型认为，殖民主义重建并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另见 Alavi, 1975; Wolpe, 1980）。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86）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部分是为了解释后殖民时期非洲发展的失败。这一理论将全球边缘（国家）描述为注定要生产供核心（国家）加工的原材料。沃勒斯坦还试图解释 19 世纪摆脱奴隶制的运动以及世界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的浪潮（见上文）。在哈特和奈格里（Hardt and Negri, 2000: xii）看来，帝国不再以征服国家为中心，而是以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为中心，它“由在单一统治逻辑下联合起来的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有机体组成”。

一些帝国分析家关注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卢森堡（Luxemburg, 1913 [2003]: 350）认为，“每一次新的殖民扩张都理所当然地伴随着资本对土著人的社会和经济纽带的无情斗争，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被强行剥夺”。在拉兹雷格（Lazreg, 1976: 53）看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导致了土地的“原始积累”，“将已经有人居住的地区变成定居点殖民地”。哈维（Harvey, 2003）认为，“通过剥夺来积累”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起点，还是一个经常以帝国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复过程。

（二）地缘政治、战争和暴力

第二组方法将帝国理解为沐浴在血泊之中。这些观点在第一代中欧社会学家中是正统的。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 1883: 194, 218）认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争夺统治权的种族斗争”是“历史进程中所有事件的轴心”。“几乎不间断的战争”的历史进程的顶峰

(Gumplowicz, 1883: 176) 是国家和帝国的建立。舍弗勒 (Schäfffle, 1887: 148) 同意国家为了“自我保护”而追求扩张。拉采尔 (Ratzel, 1923) 将他的分析建立在所谓的一般“自然”规律基础上, 认为所有人 (Völker) 都被驱使去扩张和征服。这种趋势在现代性中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各国越是意识到全球空间关系, 它们就越参与到空间斗争中来” (Ratzel, 1923: 266)。米歇尔斯 (Michels, 1912: 470; 1932: 708-710) 从人口压力、民族自豪感和“空间斗争”中自然的“政治扩张本能”等方面解释了意大利在北非何以转向殖民主义。韦伯 (Weber, 1921-1922 [1978]) 一如既往地持续辩论的对立两极之间达成了平衡, 并将帝国主义归因于古老的地位因素、地缘政治和军事来源, 以及资本主义。奥本海默 (Oppenheimer, 1926: 789-790) 还将国家的军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追求外国市场和“外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利润的解释相结合。很久之后, 蒂利 (Tilly, 1990) 效仿韦伯和奥本海默, 将龚普洛维奇式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因果机制结合起来。曼 (Mann, 1986-2012) 将意识形态权力添加其中, 并将龚普洛维奇式的权力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即军事的和政治的。

社会学家经常通过将暴力缩小到人际或微观层面, 或将其转化为因变量来尽量减少暴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帝国研究的子领域避免了任何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和解的诱惑。根据金 (King, 1990) 和冯·特罗塔 (von Trotha, 1994) 的研究, 军营是殖民地国家的原始单位。许多人认为, 驻领殖民主义产生了灭绝主义的动力。暴力是施密特 (Schmitt, 1941 [1991], 1950 [2003]) 关于国家、帝国、“更大空间”、内在规则和土地分配理论的核心。施密特 (Schmitt, 1950 [2003]) 认为, 殖民战争归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司法和文化框架, 而非早期现代国际法中的友好线或欧洲公法 (*jus publicum Europaeum*) 范围内的常规的、传统的 (bracketed)^① 战争。地缘政治的差

①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解释, bracketing 的军事学含义是 A method of adjusting fire in which a bracket is established by obtaining an over and a short along the spotting line, and then successively splitting the bracket in half until a target hit or desired bracket is obtained。参见 https://www.militaryfactory.com/dictionary/military-terms-defined.php?term_id=786。所以, 按照军事学的解释, bracketed 应该翻译为“交叉射击的”或者“交叉法的”, 即一种炮兵试射击的方法。——译者注

别统治引发了针对非欧洲人的大规模暴力，甚至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也被认为不适用于帝国战争。殖民战争经常依赖于宣布戒严令、紧急状态和例外状态（Füredi, 1994）。根据施密特的说法，欧洲内在规则的终结在欧洲内部引发了同样的暴力。现代帝国战争率先使用了随后被引入宗主国的武器和做法（Graham, 2011）：机关枪、达姆弹、空中轰炸、特殊防暴警务方法和水刑。帝国战争与传统的（bracketed）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土武装、游击队和非正规战斗人员的普遍存在；暴力升级；权力的不对称性（Schmitt, 1962a）。自1914年以来，友好线内外的战争区别已经基本消失。

（三）文化与帝国

长期以来，关于殖民地和帝国的研究一直专注于文化表征和主体性的形式。殖民者文化被解析为与其他殖民者的关系，与被殖民者的关系及殖民地状况的结果。巴特利特（Bartlett, 1993: 313）总结了他对欧洲中世纪殖民主义的研究，他观察到“欧洲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心理习惯和制度诞生于中世纪世界：墨西哥的征服者知道穆德哈尔人（Mudejars）的问题”。锡德（Seed, 1995）分析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帝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和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在殖民地占有仪式中的作用。杜波依斯（Du Bois, 1945 [1975]）将现代种族主义视为殖民主义的产物和决定因素。

另一项研究追踪了殖民者文化对殖民统治的影响。研究西班牙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天主教和新教为殖民者提供了主要的文化参照框架，也是他们将美洲视为神圣空间的愿景的来源（Elliott, 2006）。布莱克本（Blackburn, 1997: 22）指出，美洲的殖民种植园主“喜欢区分不同的非洲民族，把真实或想象的技能 and 气质都归因于他们”，并且“混血和黑白混血人群被精心分类”；除“好的和坏的本地人”之间的首要区别之外，这些想法也为奴隶主的做法提供了信息。斯特里茨（Streets, 2004）重建了英国军事思想中锡克人、廓尔喀人和高地人的形象，并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塑造帝国实践的。亚当斯（Adams, 2005）追溯了对家族的独特理解对荷兰殖民时期特许公司政策的影响。

其他人则追随萨义德 (Said, 1978: 117) 的暗示性主张, 即“殖民地是由旅行者的故事”创造的, 询问了前殖民时期的表现对殖民征服和治理的因果影响。伯克 (Burke, 1972: 193-194) 证明, 法国在殖民地摩洛哥的“柏柏尔人政策”是由“对阿尔及利亚卡拜尔社会的浪漫成见”塑造的, 这导致了旨在“保护”柏柏尔人免受“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政策。斯坦梅茨 (Steinmetz, 2002, 2007) 表明, 前殖民时期的欧洲民族志对被殖民者的描述为德国在非洲、亚洲的殖民地的所有本土政策提供了原材料, 即使这些故事不像萨义德所说的那么统一, 并且它们对政策的影响是由殖民地国家领域调解的 (见下文)。吴 (Goh, 2007) 展示了英属马来亚和美属菲律宾的殖民地国家的类似情况。威尔逊 (Wilson, 2011: 1438) 证明, 英国在马拉斯和孟加拉管理印度人的不同制度基于对印度人的两种不同愿景, 分别是“与英国人有本质区别”和“与英国人基本相似”, 并且这些愿景形成了不同的收益汲取体系。研究人员还研究了传教士会社及其特定文化如何促成殖民霸权, 助长反殖民民族主义 (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1; Leenhardt, 1902 [1976]), 或促进独立后民主的力量 (Woodberry, 2012)。

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文化影响也受到了更多关注。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社会科学家们一直认为, 被殖民的民族有选择地占有和拒绝殖民文化的不同部分。赫斯科维茨 (Herskovits, 1941: 184-185) 指出, 欧洲和非洲传统的混合是“新世界黑人 (New World Negroes) 所经历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机制”, 但他用“重新解释”替换了“融合”一词, 并将其定义为“文化借用”, 即允许“一个民族在采用新的外部制度形式的同时保留传统上认可的行为模式的内在含义” (Herskovits and Herskovits, 1947 [1964]: vi)。

莫斯 (Mauss, 1934 [1969]: 353-354)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过所有主要的法国殖民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 他同意赫斯科维茨的观点, 即“殖民主义诞育了新的社会”, “在这里, 就像通婚 (*métissage*) 一样, 这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观察领域”。莫斯的学生研究了殖民主义导致的各种文化转型。莱恩哈特 (Leenhardt, 1953: 213) 将新苏格兰的土著文化解释为融合 (文化), 并认为殖民时期的跨文化现象在欧洲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之间是双向进行的。《殖民地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Colonies*) 一书的

作者莫尼耶 (Maunier, 1949: 124, 535) 讨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相互模仿, 开发出一种殖民混合理论, 即“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改变”及其反面”。莫斯的另一位学生德弗罗 (Devereux G.) 在他关于单个大平原印第安人 (Plains Indian) 的著名研究中, 开篇发问“印第安文化的哪个阶段与美国文化的哪个特定部分发生了接触和冲突”, 并分析了“边疆白人”中“对印第安人虚构的优越感”综合征 (Devereux, 1951: 8, 10)。巴斯蒂德 (Bastide, 1960) 发展了一种动态的“文明相互渗透的社会学”, 认为土著文化接受了欧洲文化的某些方面, 抵制了其他方面, 而“反文化适应”的研究 (Bastide, 1948: 4) 是与民族学形成对比的社会学的适当领域。苏斯特尔 (Soustelle, 1943: 117) 将拉坎敦印第安人 (Lacandon Indians) 与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 (Mexican Otomi Indians) 进行了比较, 前者是一个相对“未受欧洲人改变和影响”的玛雅群体, 后者“与其说是放弃他们的旧信仰, 不如说是将其并入一种新的”融合式文化 (Soustelle, 1971: 137)。巴朗迪尔和梅西耶 (Balandier and Mercier, 1952: 212, 131) 解释说, 塞内加尔的勒布人“过滤并衡量”来自其他文化的“外部影响”, 包括殖民地国家, 玩着“保护和创新”的“游戏”。布迪厄的社会学生涯始于其他中世纪殖民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晚期殖民文化背景。布迪厄感兴趣的是被殖民者如何应对殖民环境, 是通过认同和适应其要求, 还是通过抵抗和拒绝。^① 英国殖民社会学家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讨论。在沃斯利 (Worsley, 1957) 看来, 货物崇拜代表着对殖民主义的象征性拒绝。米切尔 (Mitchell, 1956: 12) 认为, 罗得西亚铜带 (Rhodesian Copper Belt) 上的非洲人使用欧洲符号, 试图“在幻想中跨越不可逾越的障碍”。

精神分析有时被批评为殖民实践 (Brickman, 2003), 但这是一种误导。首先, 弗洛伊德关于现代文明核心的“原始”驱动力的论点, 与他对普遍心理结构的信念一样, 都是殖民种族主义者所憎恶的。其次, 在殖民地环境

^① 米德 (Mead, 2013) 从布迪厄最早的阿尔及利亚作品开始, 为布迪厄理论问题的整体连续性开发了令人信服的论点。具体而言, 布迪厄致力于发展一种惯习理论, 这种惯习是通过选择性地认同 (而非被动模仿) 社会环境的某些部分而产生的, 并赋予其一种深刻的实践社会知识, 使主体能够在社会空间中定位自己, 并对新的情况作出反应。

中的执业分析师往往对殖民主义持高度批判态度（例如，Devereux, 1951；Fanon, 1952 [1967]）。最后，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情感理论和社会结构的体现，精神分析非常适合理解与殖民者活动相关的夸张的种族主义、施虐狂甚至“法西斯主义诱惑”（Memmi, 1957 [1967]: 62）的无意识根源。斯坦梅茨（Strinmetz, 2007）运用拉康主义的概念，认为殖民者形成了跨越殖民者-被殖民者边界的想象的认同，并且这些认同有时会影响政策制定。精神分析可以阐明困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自我怀疑和精神病理学（Fanon, 1952 [1967]；Mannoni, 1950 [1956]；Nandy, 1983；Sachs, 1937），以及殖民统治本身的矛盾心理和脆弱性（Bhabha, 1994）。

（四）被殖民者对殖民统治的影响：抵抗与合作

与前一节中讨论的内容重叠的大量文献重点关注被殖民者的抵抗、合作和其他实践，因为它们塑造了帝国，并被帝国所塑造。社会学家蒙塔涅（Montagne, 1936）对比了不同土著民族抵抗殖民冲击的不同能力。巴朗迪尔（Balandier, 1955）的《当前的黑非洲社会学》（*Sociologie actuelle de l'Afrique noire*）将加蓬的芳人（Gabonese Fang）和法属刚果的巴刚果人对殖民主义的不同反应追溯到内部和欧洲诱发因素的混合。由于缺乏中央领导，芳人早已成了闲置的（unemployed）征服者，其抵抗法国入侵的能力也较低。巴刚果人曾参与奴隶贸易，他们更扎根于自己的领地，分等级组织起来，熟悉其他部落，因此更能抵抗法国人（Balandier, 1955: 354-55）。德·当皮埃尔（de Dampierre, 1967）分析了前殖民征服和法国殖民主义给现在的中非共和国的三个班迪亚王国带来的转变。他指出，恩扎卡拉人试图捍卫他们的传统，但最终看到他们的文化被摧毁，而赞德兰（Zandeland）中部和东部文化相似的文加拉王朝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殖民世界（de Dampierre, 1998）。英国社会学家追随格拉克曼（Cluckman, 1954）研究了“反叛的仪式”和欧洲人的文化挪用（Mitchell, 1956）。帕特森（Patterson, 1967）在其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论文中，讨论了牙买加奴隶的抵抗和应对策略，包括拒绝工作、逃跑、讽刺和自杀。

一些北美社会学家也分析了殖民地人民的抵抗。菲尔茨（Fields, 1985:

99) 追溯了守望台教派在英属中非演变为一种“反殖民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邦克 (Bunker, 1983, 1991) 证明, 乌干达的吉苏农民利用退出咖啡生产的威胁来支持自给自足的农业, 以向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政府施压。拉莫斯 (Ramos, 2006) 研究了加拿大的土著抗议。吴 (Goh, 2007) 和戈 (Go, 2008a) 认为, 被殖民群体有时能够塑造和改变殖民政策。费讷隆 (Fenelon, 1998) 提出了一种美洲原住民抵抗形式的类型学, 从顺从到拒绝, 中间的做法如 19 世纪的鬼舞 (另见 Hall and Fenelon, 2009)。一批迅速增长的文献追踪了美洲原住民和其他被殖民的民族通过模仿欧美人的暴力征服和奴隶贩卖的做法为自身增权的方式 (Gallay, 2003; Hämäläinen, 2008), 以及利用相互竞争的殖民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帝国之间的边境空间 (为自身增权) 的方式 (Adelman and Aron, 1999; Hämäläinen and Truett, 2011)。

民族主义与帝国有着因果关系。最早民族主义形式出现在美国殖民地国家的行政单元, 那里的“克里奥尔人的官员”发现他们的职业流动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受到了阻碍。“叛乱后的殖民行政-市场统一”也助长了印度的民族主义 (Anderson, 1983: 64)。18 世纪和 19 世纪欧洲的民间和官方民族主义是在陆地帝国相互竞争的背景下产生的 (Anderson, 1983, ch. 6; Charle, 2001)。在新的去殖民化国家中, 民族主义经常是土著文化的重新配置, 以反对外国统治 (Busia, 1956: 5; Hermassi, 1972; Wyrzten, 2013)。然而, 正如阿明扎德 (Aminzade, 2013) 所示, 民族主义并不是独立后用于统一前殖民地的唯一政治文化形式。

剑桥历史编纂学派将印度和非洲的合作描述为殖民征服的重要来源。罗宾逊和加拉格尔 (Robinson and Callagher, 1961) 认为, “帝国主义是海外而非西方社会内部压力的产物” (Stokes, 1969: 287)。罗宾逊 (Robinson, 1986) 对帝国历史的所谓非中心主义方法, 从边缘地区的行动者和利益的角度, 解释了殖民统治和去殖民化的模式。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这种方法过于机械化, 对意识形态问题充满敌意 (Dubow, 2009: 4), 但它在关注殖民边缘地区在塑造帝国进程中的因果影响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由古哈 (Guha, 1997) 创立的历史编纂学的底层学派出现在南亚历史的分支领域, 并自那时起与后殖民研究相互交织 (Prakash, 1992)。这种

方法也强调以殖民地为中心来研究帝国，但它拒绝了剑桥学派对本土精英的强调，而是将重点放在非精英的主体性和行动上。根据这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底层（subaltern）被殖民者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欧洲殖民者和本土精英的控制。宗教、社区、种族、亲属关系和领土权为主张差异和民族自决提供了资源。

（五）作为因果力的殖民地国家的组织和政策

最后一套方法将殖民地国家或更广泛的帝国结构的体制框架和内部动态视为土著做法和帝国长期轨迹的决定因素。在某些方面，这会将前一节中被视为因变量的对象变成自变量。米切尔（Mitchell, 1988: xi）（对此）做了一般性的观察，“殖民地的臣民及其抵抗模式是在殖民地国家的组织领域内形成的”。这种有组织的国家领域最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土著政策，即旨在调节土著人生活和主体性的政府计划。所有殖民统治者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法律和实际框架来管理被殖民群体，从而使他们彼此对立。本土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Evans, 1997），并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Steinmetz, 2007）。

仔细研究现代殖民历史可以发现，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之间被夸大的区别只是粗略地映射到实际的统治做法中。间接统治和直接统治标志着一个多维政策空间中的两个极端，其中，殖民统治的间接方式一直占主导地位（甚至在法兰西帝国也是如此）。除少数土著人以外，完全同化其他所有人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太多土著人被承认与他们的征服者平等，那么外国主权的合法性就会被削弱。在另一端，完全由征服国代理人进行治理通常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殖民政府将统治转包给土著参与者。

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由针对特定部落或特定殖民地内不同群体的不同本土政策计划所支持的。在区分土著群体的同时，殖民地国家亦将所有被殖民者归入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类别。拆分和归并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威胁着每个殖民政权。正如范登伯格（Van den Berghe, 1970: 89-90）所言，过于僵化的“种族隔离”可能会在被殖民者的所有阶层中产生“激进变革的共同利益”。相反，种族差异的扩散阻碍了殖民时代的发展项目（Schuknecht, 2010）

和后殖民时代的发展 (Avineri, 1972; Lange, 2009), 并且播下了种族间冲突的种子 (但见 Barkey, 1997: 103)。

来自宗主国的自治权是殖民地国家的另一个关键方面, 即使它们的自治总是部分的。自治权甚至是将殖民地说成带有国家特征的先决条件。在一个极端, 殖民地只执行宗主国的指令; 另一个极端是一些驻领国家的自治权几乎没有限制 (Blackburn, 1988: 70, 1997: 9; Fernández-Armesto, 1987: 182)。在其他殖民地, 总督和地方官员同样对定居者和土著人实行统治, 并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来执行那些在宗主国各部门和议会中遭到反对或与宗主国经济利益相矛盾的政策。自治权的主体也影响了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1963) 关于传统帝国的委托-代理解释。

作为殖民地或帝国的直系后裔的国家通常会复制继承下来的行政程序、制度结构和政治类别 (Mathur, 2010)。一些独立后的国家延续了它们所来自的殖民地的基本宪法和组织结构 (Go, 2010)。

殖民地国家的其他结构特征包括规模、官僚化程度、渗透社会的能力, 以及不同部门的数量和定义。一些殖民地国家只有少数官员, 特别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 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 许多非洲殖民地有数千名公务员。20 世纪的殖民地国家变得更加官僚化 (Evans, 1997)。殖民地国家的能力不一定取决于规模, 而是取决于对资源的熟练使用, 有时甚至是野蛮地使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德国在东非的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帝国的几位历史社会学家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网络方法。事实上, 社会网络分析最早出现在殖民地社会学家约翰·巴恩斯 (John Barnes) 和 J. 克莱德·米切尔 (J. Clyde Mitchell) 的工作中 (Scott, 2004: 688)。亚当斯 (Adams, 1996) 认为, 17 和 18 世纪亚洲特许东印度公司的宗主国负责人与其在殖民地的代理人之间的网络结构, 决定了前者可以控制后者的程度。巴基 (Barkey, 1994) 利用新制度主义, 展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如何通过交易和庇护来管理与土匪的关系。在其他地方, 巴基 (Barkey, 2008) 借鉴了莫蒂尔 (Motyl, 2001) 的轮辐式模型来解释奥斯曼帝国在几个世纪内持续存在的能力。

研究帝国和殖民地的一种不同的方法植根于布迪厄的场论 (Bourdieu, 2013)。如果按照布迪厄 (Bourdieu, 1999, 2014) 的建议, 将宗主国作为一个场或一组场域来分析, 那么海外殖民地国家也可能代表不同的类似场域的形态, 其特征是来自宗主国和殖民地其他场域的特定形式的相对自主性, 以及殖民地国家代理人之间对独特形式的象征资本的竞争 (Bazenguissa-Ganga, 1997; Steinmetz, 2008b)。殖民地和宗主国通过其他跨国场域联系在一起, 例如科学或文化场域 (Steinmetz, 2013a)。场论也可以扩展到理解帝国内部关系 (Go, 2008b; Steinmetz, 2013c)。

(六) 帝国史上的并发因果关系

前文已介绍了因果机制, 但阅读时应注意, 对帝国 (或任何其他社会分析对象) 的最佳研究要避免将历史或社会科学简化为单因素解释或一般规律的诱惑 (Boutroux, 1874; Durkheim, 1888; Steinmetz, 1998)。当前社会学对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历史研究大多数倾向于偶然的、并发的因果解释和模型。这项研究的重要先驱们在最新的解释中被忽视了。赫尔马西 (Hermassi, 1972) 重点关注北非殖民精英的结构, 以及殖民占领的不同时间跨度、本土政策的特征和殖民前的本土国家的力量, 以理解法属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帕特森 (Patterson, 1967: 275-276) 认为, 与殖民地新大陆 (colonial New World) 的其他地区相比, 牙买加奴隶起义的记录更多, 这是因为白人的高缺勤率和由此造成的控制松懈, 使奴隶与主人的比例增大, 加上大量“生来就是自由人的奴隶”, 尤其是那些来自“高度发达的军国主义”阿坎政权的奴隶。由坚持“偶然和并发决定”的方法论的历史社会学家创作的大部头 (book-length) 的帝国研究, 包括亚当斯 (Adams, 2005)、阿亚拉 (Ayala, 1999)、巴恩斯 (Barnes, 1954)、邦克 (Bunker, 1991)、科隆纳 (Colonna, 1975)、德科托 (Decoteau, 2013)、德·当皮埃尔 (de Dampierre, 1967)、埃里克森 (Erikson, 2014)、埃文斯 (Evans, 1997)、菲尔茨 (Fields, 1985)、吉列特和萨亚德 (Gillette and Sayad, 1976)、戈 (Go, 2008a)、戈斯林 (Gosselin, 2002)、兰格 (Lange, 2009)、马奥尼 (Mahoney, 2010)、曼 (Mann, 1986-2012)、马

斯奎雷 (Masqueray, 1983)、马瓦尼 (Mawani, 2009)、诺顿 (Norton, 2012)、帕克 (Park, 2005)、里德 (Reader, 1961)、萨达 (Saada, 2007 [2012])、萨亚德等 (Sayad et al., 1991)、斯坦梅茨 (Serinmetz, 2007) 和韦伯 (Weber, 1891 [2010])。综合来看, 这些研究为殖民主义、帝国和后殖民主义历史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未来研究的问题

关于帝国和殖民主义的社会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子领域, 它与许多其他学科相互作用, 并不断产生新的理论、经验和方法上的见解与困惑。迄今为止, 该研究领域尚未讨论的一些新兴主题包括: 不同欧洲帝国之间的互动 (Lindner, 2011)、帝国都市主义 (Clarno, 2013; Graham, 2011; Hell and Steinmetz, 2014; King, 1990; Pula, 2013; Wright, 1991)、帝国环境中的性别、家庭关系和意识形态 (Charrad, 2001; Saada, 2007 [2012]; Wang and Adams, 2011)、后殖民文化和文学 (Ducournau, 2012)、帝国暴力 (Lazreg, 2008)、地缘政治统治的新技术 (Bergesen, 2013; Mann, 2013; Scheppele, 2013)。

最后, 我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讨论。后殖民理论起源于人文学科,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在社会学领域取得了发展。在最初将后殖民主义融入现有的社会学研究 (如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 之后, 四种不同的后殖民主义路径已被证明与社会学特别相关 (见 Bortoluci and Jansen, 2013)。我已经讨论了其中的前两个: 第一个询问了欧洲民族志、种族主义、社会本体论和文化的其他方面是如何塑造帝国的; 第二个探讨了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的矛盾性以及殖民混合的形式。

后殖民分析的第三条分支 (Chakrabarty, 2000) 批评西方知识不足以理解 (后) 殖民的非西方文化, 或者甚至对非西方的存在持敌对态度。本质上, 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论点, 始于18世纪的赫尔德 (Herder, 1784 [1985]), 一个世纪后, 中欧人类学的文化圈 (*Kulturkreis*, cultural circles) 学派延续了这一论点 (Mancini, 1999)。这种对普遍范畴的批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的德国新历史主义社会学家中达到了顶峰 (Steinmetz, 2010), 其中一些人认为所有社会科学范畴都必须是单一时间和地点所独有的 (Freyer, 1926)。在这方面,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 其灵感来自尼采 (经过福柯; 参见 Said, 1978) 和海德格尔 (参见 Chakrabarty, 2000)。康奈尔 (Connell, 2007) 主张南方 (Southern) 社会学; 桑托斯 (Santos, 2012) 反对他所谓的知识谋杀 (epistemicide), 支持南方的认识论。齐贝尔 (Chibber, 2013) 否定了这种论证, 反驳说资本主义确实是普遍化的, 在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可以使用相同的概念来分析。

后殖民研究的最后一条分支受到了霍布森 (Hobson, 1902 [1965]) 和卢森堡 (Luxemburg, 1913 [2003]: 143-148, 646) 关于帝国“回弹”的见解以及法农 (Fanon, 1961 [2004]: 58) 关于“欧洲实际上是第三世界所创造的”主张的启发。社会学家德·当皮埃尔认为, 将“欧洲, 甚至是宗主国的背景与非洲的背景相对应” (de Dampierre, 1968)。这种对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进行“对位”解读的想法是萨义德 (Said, 1993) 关于“后殖民主义方法论”的基础性研究、《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一书的核心。霍尔 (Hall, 1996: 246) 写道, 殖民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帝国大都市社会的外部”, 而是“始终深深地铭刻在其中”。历史学家们展示了帝国是如何重新配置国内文化和政治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最初关注与宗主国有关的高级文化 (Gilroy, 1993; Said, 1993; Spivak, 1988)。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殖民文化回流到宗主国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 英国掀起了一波对跨国殖民移民的社会学研究浪潮 (如 Banton, 1955; Braithwaite, 2001; Collins, 1951, 1952; Ndem, 1956; Silberman and Spice, 1950), 并利用殖民地的范畴分析了宗主国的种族关系 (Rex, 1959: 124)。梅和科恩 (May and Cohen, 1974: 112, 124) 探讨了“英格兰的种族主义与维护殖民秩序所固有的矛盾”之间的“因果互联”。马古班 (Magubane, 2004) 认为, 被殖民男性身体的图像 (images) “提供了固定的一组形象和隐喻”, 这些形象和隐喻被引入宗主国关于贫困和公民身份的辩论中。其他社会学家研究了殖民主义的“来世”, 表现在纪念碑、视觉文化、语言、集体记忆、忧郁症和怀旧等方面 (Gilroy, 2005; Hall and Rose, 2006; Steinmetz, 2008a; Steinmetz

and Hell, 2006; Trepsdorf, 2006)。

与第三条和第四条分支相关的是一类文献，它发展了对作为帝国产物的社会学本身的自我批判 (Bhambra, 2007; Kemple and Mawani, 2009; Khalaf, 1979; Wallerstein, 1991)。阿拉塔斯 (Alatas, 2003)、贝尔克 (Berque, 1962)、布迪厄 (Bourdieu, 1976) 和斯塔文哈根 (Stavenhagen, 1971) 呼吁学科的去殖民化 (另见 Connell, 1997; Costas, 2007; Gutiérrez Rodríguez et al., 2010; Magubane, 2013; Reuter and Villa, 2010; Seidman, 2013; Steinmetz, 2006)。然而，为了避免错误的概括，关键是要对社会学家与殖民地政府和资助机构实际互动的各种方式进行更系统和仔细的实证研究 (Steinmetz, 2009a, 2013a)。毕竟，在早期专业社会学家队伍中，帝国也有同样多的反对者，从霍布森 (Hobson, 1902 [1965])、杜波依斯 (Du Bois, 1915) 和反帝国主义联盟开始，该组织被斯莫尔 (Small, 1916: 775) 描述为美国社会学协会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 的前身。布迪厄关于文化场域相对自主性的研究激发了当今社会学中一些最有趣的研究，这是防止后殖民社会学退回到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主义或片面“简化” (short circuit) 的外部主义方法的关键资源 (Bourdieu et al., 1968 [1991]; Camic and Gross, 2001)。

参考文献

- Adam, Heribert. 1971. *Modernizing Racial Domination: The Dynamics of South African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dam, Heribert and Kogila Moodley. 2005. *Seeking Mandela: Peacemaking Between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dams, Julia. 1996. "Principals and Agents, Colonialists and Company Men: The Decay of Colonial Control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12–28.
- Adams, Julia. 2005. *The Familial State: Ruling Families and Merchant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delman, Jeremy and Stephen Aron. 1999. "From Borderlands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states, and the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3): 814–841.
- Alatas, Syed Farid. 2003. "Academic Dependenc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 Social Sciences. "Current Sociology 51(6): 599-613.
- Alavi, Hamza. 1975. "India and the Colonial Mode of Production." *Socialist Register* 12: 160-197.
- Aminzade, Ronald. 2013. *Race, N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Post-Colonial Africa: The Case of Tanzan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ron, Raymond. 1945. *L'Age des empires et l'avenir de la France*. Paris: Défense de la France.
- Aron, Raymond. 1957. "Nations et empires." In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Vol. 11: 11. 04-1-11. 06-8. Paris: Société Nouvelle de l'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 Aron, Raymond. 1959 (2006). Impérialisme et colonialisme. In *Les sociétés modernes*, pp. 987-1001. Paris: PUF.
- Aron, Raymond. 1973. *République impériale. Les États-Unis dans le monde (1945-1972)*. Paris: Calmann-Lévy.
- Avineri, Shlomo. 1972. *Modernization and Arab Society: Some Reflections*.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
- Ayala, César J. 1999. *American Sugar Kingdom: The Plantation Economy of the Spanish Caribbean, 1898-193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
- Balandier, Georges. 1955. *Sociologie actuell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UF.
- Balandier, Georges and Paul Mercier. 1952. *Particularisme et évolution. Les pêcheurs Lébou du Sénégal*. Saint-Louis, Sénégal: Cent. IFAN-Sénégal.
- Banton, Michael. 1955. *The Coloured Quarter: Negro Immigrants in an English City*. London: Cape.
- Barkey, Karen. 1994. *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arkey, Karen. 1997. "Thinking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Empire." Pp. 99-115 in K. Barkey, M. von Hagen (ed.). *After Empire: 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ussian, Ottoman, and Habsburg Empires*. Boulder, CO: Westview.
- Barkey, Karen. 2008.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John A. 1954. *Politics in a Changing Socie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Fort Jameson Ngoni*. Cape Town, South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rtlett, Robert. 1993.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stide, Roger. 1948. *Initiation aux recherches sur l'interpénétration des civilisations*. Paris: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Universitaire.
- Bastide Roger. 1960. *Les religions africaines au Brésil. Vers une sociologie des interpénétrations*

- de civilisatio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Bayly, Christopher Alan. 1989.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don: Longman.
- Bazenguissa-Ganga, Rémy. 1997. *Les voies du politique au Congo. Essai de sociologie historique*. Paris: Karthala.
- Belmessous, Saliha. 2013. *Assimilation and Empire: Uniformity in French and British Colonies, 1541–195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gesen, Albert J. 2013. “TEN The New Surgical Colonialism China, Africa, and Oil” . Pp. 300–318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rgesen, Albert and Ronald Schoenberg. 1980. “Long Waves of Colonial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In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231–277.
- Berque, Jacques. 1962. “Sciences sociales et décolonisation.” *Tiers-Monde* 9–10: 1–15.
-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Bhabra, Gurminder K. 2007. *Rethinking Modernity: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 Blackburn, Robin. 1988.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Verso.
- Blackburn, Robin. 1997.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 1492–1800*. London: Verso.
- Bortoluci José H. , Robert S. Jansen. 2013. “Toward a Postcolonial Sociology: the View from Latin America.” *Polit. Power Soc. Theory* 23: 199–229.
- Bourdieu, Pierre. 1976. “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production sociologique: sociologie coloniale et décolonisation de la sociologie.” pp. 416–427 in H. Moniot (ed.). *Le mal de voir*. Paris: Union Générale. Éditions.
- Bourdieu, Pierre. 1999. “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Pp. 53–75 in G. Steinmetz (ed.). *State/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2013. Séminaires sur le concept de champ, 1972–1975.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 4–37.
- Bourdieu, Pierre. 2014. *On the State*. Cambridge, UK: Polity.
- Bourdieu, Pierre, Chamboredon Jean-Claude and Passeron Jean-Claude. 1968 (1991) . *The Craft of Sociology*. New York: de Gruyter.
- Boutroux, Emile. 1874. *De la contingence des lois de la nature*. Paris: G. Baillière.
- Braithwaite, Lloyd. 2001. *Colonial West Indian Students in Britain*. Kingston, Jamaica: University West Indies Press.
- Breuer, Stefan. 1987. *Imperien der alten Welt*. Stuttgart, Germany: Kohlhammer.
- Brickman, Celia. 2003. *Aboriginal Populations in the Mind: Race and Primitivity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1995. "National Minorities, Nationalizing States, and 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s in the New Europe." *Daedalus* 124(2), 107-132.
- Bunker, Stephen G. 1983. "Dependency,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from Bugisu, Ugand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4(2), 182-207.
- Bunker, Stephen G. 1991. *Peasants Against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Market Control in Bugisu, Uganda, 1900-1983*.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74. "Race, Class and Colonialism." *Social Economic Studies* 23(4), 521-550.
- Burbank, Jane and Cooper Frederick. 2010.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E III. 1972. "The Image of the Moroccan State in French Ethnological Literature." Pp. 175-199 in E. Gellner, C. Micaud (ed.). *Arabs and Berber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 Busia KA. 1956. *The Aftermath of Colonialism*. Wageningen, Netherland: Wageningen University.
- Camic, Charles and Neil Gross. 2001. "The New Sociology of Ideas." Pp. 236-249 in Blau J. 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 Chae Ou-Byung. 2013. "Japanese Colonial Structure in Kore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396-414 in George Steinmetz.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rle, Christophe. 2001. *La Crise des sociétés impériales. Allemagne, France, Grande, 1900-1940*. Paris: Seuil.
- Charrad, Mounira. 2001. *States and Women's Rights: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Tunisia, Algeria, and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tterjee, Partha.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ibber, Vivek. 2013.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 Clarno, Andy. 2013. "The Constitution of State/Space and the Limits of 'Autonomy' in South Africa and Palestine/Israel." Pp. 436-464 in George Steinmetz.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John. 1945. "United States Indian administration as a laboratory of ethnic relations." *Social Research* 12(1), 265-303.
- Collins, Sydney F. 1951. "The Social Position of White and "Half-caste" Women in Colored Groupings in Brit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6), 796-802.
- Collins, Sydney Fitzgerald. 1952. "Moslem" and "Negro" Groupings on Tyneside: a Comparative

- Study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Intra-group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Colonna, Fanny. 1975. *Instituteurs algériens, 1883–1939*.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Comaroff, Jean, and John L. Comarof. 1991.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mte, Auguste. 1851 (1929). *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 ou, Traité de sociologie, instituant la religion de l'humanité*. Paris: Société positiviste. 5th ed.
- Connell, Robert William. 1997.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6), 1511–1557.
- Connell, Raewyn. 2007.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UK: Polity.
- Cooper, Frederick. 2004. "Empire Multiplied. A Review Ess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2), 247–272.
- Cooper, Frederick. 2005.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sta, Sérgio. 2007. *Vom Nordatlantik zum "Black Atlantic": Postkoloniale Konfigurationen und Paradoxien transnationaler Politik*.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 Darwin, John. 2008a. *After Tamerlane: The Global History of Empire Since 1405*. New York: Bloomsbury.
- Darwin, John. 2008b. "Britain's Empires." Pp. 1–2 in S. Stockwell (ed.). *The British Empire*. Oxford: Wiley-Blackwell.
- de Dampierre E. 1967. *Un ancien royaume Bandia du Haut-Oubangui*. Paris: Plon.
- de Dampierre E. 1968. *Soutenance, thèse de doctorat ès lettres*. Univ. Paris. Document available for consultation at Bibliothèque Éric-de-Dampierre, Nanterre, France.
- de Dampierre E. 1998. "Les idées-forces de la politique des Bandia, à travers les propos de leurs souverains (1870–1917)." *Africa* 53(1): 1–16.
- Decoteau, Claire Laurier. 2013. *Ancestors and Antiretrovirals: The Biopolitics of HIV/AID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mandt A. 1997. "Die Weltreiche in der Geschichte." Pp. 211–233 in A. Demandt (ed.). *Das Ende der Weltreiche: Von den Persern bis zur Sowjetunion*. Munich: CH Beck.
- de Sousa Santos, Boaventura. 2012. Public Sphere and 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 *Africa Development* 37(1): 43–67.
- Devereux, George. 1951. *Reality and Dream. Psychotherapy of a Plains Indi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Du Bois WEB. 1915. "The African Roots of War." *Atlantic Mon.* 115(5): 707–714.
- Du Bois WEB. 1945 (1975). *Color and Democracy: Colonies and Peace*. Millwood, NY: Kraus-Thomson.
- Duara, Prasenjit.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Dubow, Saul. 2009. "How British was the British World?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7(1), 1-27.
- Ducournau, Claire. 2012. *Écrire, lire, élire. L'Afrique les mécanismes de réception et de consécration d'écrivains contemporains originaires de pays francophones d'Afrique subsaharienne*. PhD Thesis, EHESS.
- Durham, Deborah Lynn. 1993. *Images of Culture: Being Herero in a Liberal Democracy (Botswana)*.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Durkheim É. 1888. Cours de science sociale. Leçon d'ouverture. *Rev. Int. l'Enseign.* 15: 23-48.
- Eberhard, Wolfram. 1965.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Neth.: E. J. Brill. 2nd ed.
- Eisenstadt, Shmuel Noah.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London: Free Press Glencoe.
- Eisenstadt SN, ed. 1967. *The Decline of Empir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Elkins, Caroline, and Susan Pedersen. 2005.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jects, Practices, Legacies*. New York: Routledge.
- Elliott, John Huxtable. 2006.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Emily. 2014. *Between Monopoly and Free Trade: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00-175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Ivan. 1997. *Bureaucracy and Race: Native Administration in South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non, Frantz. 1952(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 Fanon, Frantz. 1961(2004).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 Fenelon, James V. 1998. *Culturicide,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of the Lakota*. New York: Garland.
- Fernández-Armesto, Felipe. 1987. *Before Columbus: Explor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Atlantic, 1229 - 1492*.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Fields, Karen Elise. 1985. *Revival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Central Af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xico, Donald Lee. 2012.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 Frazier E. F. 1955. "Impact of Colonialism on African Social Forms and Personality." Pp. 70-96 in CW Stillman(ed.). *Publication of Norman Harris Memorial Foundation Lectures on Africa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yer, Hans. 1926. "Soziologie als Geisteswissenschaft."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16(2), 113-126.

- Freyer, Hans. 1948. *Weltgeschichte Europas*. Vols. 1, 2. Wiesbaden, Ger. : Dieterich.
- Füredi, Frank. 1994. *Colonial Wars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 London: Tauris.
- Gallagher, John, and Ronald Robinson. 1953.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1), 1–15.
- Gallay, Alan. 2003. *The Indian Slave Trade: The Rise of English Empire in the American South, 1670–171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andhi, Leela. 1998. *Postcolon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ann, Lewis H. 1984. "Western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 Pp. 497–525 in RH. Myers, MR Peattie (ed.).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 1895–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eppert, Alexander. 2010. *Fleeting Cities: Imperial Expositions in Fin-de-siècle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erth, Hans and Mills C. Wright. 1953.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Giddens, Anthony. 1987.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lette, Alain, and Abdelmalek Sayad. 1976. *L'immigration algérienne en France*. Paris: Editions entente.
- Gilroy, Paul.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roy, Paul. 2005. *Postcolonial Melanchol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luckman, Max. 1954. *Rituals of Rebellion in South-East Africa*.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o, Julian. 2008a.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o, Julian. 2008b. Global Fields and Imperial Forms: Field Theory and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Sociological Theory* 26(3), 201–229.
- Go, Julian. 2010. "Modeling States and Sovereignty: Postcolonial Constitutions in Asia and Africa." Pp. 107–139 in Christopher J. Lee (ed.). *Making a World After Empire: The Bandung Moment and Its Political Afterlive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 Go, Julian. 2011.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öçek, Fatma Muge. 1987. *East Encounters West. Franc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h, Daniel PS. 2007. "States of Ethnography: Colonialism, Resistance and Cultural Transcription in Malaya and the Philippines, 1890s – 1930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 Society and History* 49(1), 109–142.
- Goldstone, Jack A. and Haldon John E. 2009. “Ancient States, Empires and Exploitat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p. 3–29 in Ian Morris, Walter Scheidel (ed.). *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 State Power from Assyria to Byzant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sanova, Pablo Gonzalez. 1965.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4), 27–37.
- Gosselin G. 2002. “Histoire d’un clan Gbeya(R. C. A.).” Pp. 165–186. *Sociologie interprétative et autres essays*. Paris: Harmattan.
- Goudsblom, Johan and Johan Heilbron. 2004. “Sociology.” Pp. 14574–14580 in Neil J Smelser, Paul B. Baltes (ed.) .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 Gowda, Chandan. 2013. “Empire and Developmentalism in Colonial India.” Pp. 340–365 in George Steinmetz(ed.).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raham, Stephen. 2011. *Cities Under Siege: The New Military Urbanism*. London: Verso Books.
- Guha, Ranajit. 1997.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umplowicz, Ludwik. 1883. *Der Rassenkampf: Soc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nnsbruck, Austria: Wagner’schen University Buchhandlung.
- Rodríguez, Encarnación Gutiérrez, Manuela Boatcă, and Sérgio Costa. 2010. *Decolonizing European Sociology: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Burlington, VT: Ashgate.
- Hall, Catherine and Rose Sonya. 2006. “Introduction: Being at Home with the Empire.” Pp. 1–31 in C. Hall, S. O. Rose (ed.). *At Home with the Empire: Metropolitan Culture and the Imperial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1996. “When was ‘the Post-colonial’? Thinking at the Limit.” Pp. 242–260 in I. Chambers, L. Curti (ed.) .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New York: Routledge.
- Hall, Thomas D. , and James V. Fenelon. 2009. *Indigenous Peoples and Globalization: Resistance and Revitalization*. Boulder, CO: Paradigm.
- Hämäläinen, Pekka. 2008. *The Comanche Empi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ämäläinen, Pekka, and Samuel Truett. 2011. “On Borderland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8(2), 338–361.
- Han, Suk-Jung. 2006.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Manchukuo, 1932–1937.” *Positions* 12(2), 457–478.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ch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 Hell, Julia. 2009. “Katechon: Carl Schmitt’s Imperial Theology and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The Germanic Review: Literature, Culture, Theory* 84(4), 283–326.
- Hell, Julia and George Steinmetz. 2014. “Ruinopolis: Post-imperial Theory and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8(3), 1047–1068.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84 (1985).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Wiesbaden, Germany: Fourier.
- Hermassi, Elbaki. 1972. *Leadership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North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rmassi, Elbaki. 1978. “Changing Patterns in Research on the Third Worl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 239–257.
- Herskovits, Melville Jean. 1941. *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 New York: Harper.
- Herskovits, Melville J. and Frances S. Herskovits. 1947. *Trinidad Village*. New York: Octagon Books.
- Hobson, John Atkinson. 1902 (1965). *Imperialism: A Study*.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h. Press.
- Howe, Stephen. 1993. *Anticolonialism in British Politics: The Lef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18–1964*. Oxford, UK: Clarendon.
- Keller, Albert G. 1906. The Value of the Study of Colonies for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3), 417–420.
- Kemple, Thomas M. and Renisa Mawani. 200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its Imperial Shadow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6(7–8), 228–249.
- Kennedy, Paul M. 198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 Khalaf, Samir. 1979.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19th Century Lebanon: A Sociological Essay*. Beirut, Lebanon: American University Beirut.
- King, Anthony. 1990.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Knox, Bruce. 1998. “The Earl of Carnarvon, Empire, and Imperialism, 1855–1990.”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6(2), 48–66.
- Kohli, Atul. 2004.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mar, Krishan. 2013. “Empires and Nations: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Pp. 279–299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aidlaw, Zoë. 2005. *Colonial Connections, 1815–1845: Patronage,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Colonial Government*.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ange, Matthew. 2009. *Lineages of Despotism and Development: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State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rdinois, Roland. 2008. "Entre monopole, marché et religion. L' émergence de l' État colonial en Inde, années 1760–1810."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71–172, 90–103.
- Lazreg, Marnia. 1976. *The Emergence of Classes in Algeria: A Study of Colonialism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Boulder, CO: Westview.
- Lazreg, Marnia. 2008. *Torture and the Twilight of Empire: From Algiers to Baghd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enhardt, Maurice. 1902 (1976). *Le mouvement éthiopien au sud de l'Afrique de 1896 à 1899*. Paris: Acad. Sci. O. -M.
- Leenhardt, Maurice. 1953. *Gens de la grande terre*. Paris: Gallimard. 2nd ed.
- Lenin V. I. 1917 (1939).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 Popular Outli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Lieven, Dominic C. B. 2000.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London: John Murray.
- Lindner, Ulrike. 2011. *Koloniale Begegnungen: Deutschland und Großbritannien als Imperialmächte in Afrika 1880–1914*. Frankfurt, Germany: Campus.
- Louis, Wm Roger, and Ronald Robinson. 1993. "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zatio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2(3), 462–511.
- Lower, Wendy. 2005. *Nazi Empire-Building and the Holocaust in Ukrain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Luxemburg, Rosa. 1913 (2003).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 Magubane, Zine. 2004. *Bringing the Empire Home: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Britain and Colonial South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gubane, Zine. 2013. "Common skies and divided horizons? Sociology, race,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Polit. Power Soc. Theory* 24, 81–116.
- Mahoney, James. 2010.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Spanish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cini, Silvia. 1999. "Les civilisations comme 'absolu esthétique' . L'approche morphologique de la Mittel-Europa." *Diogène* 186: 83–109.
- Mann, Michael. 1986–2012.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s. 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n, Michael. 2013. The Recent Intensific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Imperialism: Are they Connected? Pp. 213–244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annoni, Octave. 1950 (1956). *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 New York: Praeger.
- Marx, Karl. 1867 (1976).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arx, Karl. 1969.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 S. Avineri (ed.). Garden City, NY: Anchor.
- Masqueray, Emile. 1983. *Formation des cités chez les populations s'édentaires de l'Algérie: Kabyles du Djurdjura, Chaouia de l'Aouras, Beni Mezab*. Aix-en-Provence, France: Edisud.
- Mathur, Nayanika. 2010.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State in the Indian Himalay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Cambridge.
- Maunier, Rene. 1949. *The Sociology of Colonies*. London: Routledge.
- Mauss, Marcel. 1934 (1969) . “Fragment d'un plan de sociologie générale descriptive.” Pp. 303–358 in M. Mauss (ed.). *Sociologie générale* Fasc. Paris: Ed. Minuit.
- Mawani, Renisa. 2009. *Colonial Proximities: Crossracial Encounters and Juridical Truths in British Columbia, 1871–1921*. Vancouver, Can. : Univ. B. C. Press.
- May, Roy, and Robin Cohen. 197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ace and Colonialism: A Case Study of the Liverpool Race Riots of 1919.” *Race Class* 16, 111–126.
- Mazower, Mark. 2008. *Hitler's Empire: 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 McIntyre, W. David. 1999. The Strange Death of Dominion Statu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7(2), 193–212.
- McLennan, Gregor. 2013. Postcolonial Critique: The Necessity of Sociology. *Political Power Social Theory* 23, 199–229.
- Mead, G. 2013. *Sense of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of Sense: Pierre Bourdieu's Habitus as a Generative Principle*. PhD Thesis, 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Memmi, Albert. 1957(1967).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Boston: Beacon.
- Michels, Robert. 1912. Elemente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Imperialismus in Italien. *Arch. Sozialwiss. Sozialpolit* 34, 55–120, 470–497.
- Michels, Robert. 1932. Die Theorien des Kolonialismus. *Arch. Sozialwiss. Sozialpolit* 67 (6), 693–710.
- Mitchell, James Clyde. 1956. *The Kalela Dance. Aspect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Urban Africans in Northern Rhodesia*.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Timothy. 1988. *Colonising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ontagne, Robert. 1936. L' évolution moderne des pays arabes. *Annales Sociologiques. Série A. Sociologie générale*(2), 29–76.
- Motyl, Alexander J. 2001. *Imperial Ends: The Decay,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Empi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ühlmann, Wilhelm Emil. 1994. *Assimilation, Umvolkung, Volkwerdung: ein globaler Überblick und ein Programm*. Stuttgart, Germany: Kohlhammer.
- Nandy, Ashis.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umann, Friedrich. 1915(1964). "Mitteleuropa." Pp. 485–767 in T. Schieder (ed.). *Naumann, Werke*, Vol. 4. Köln, Germany, Westdeutscher.
- Nederveen Pieterse, Jan P. 1990. *Empire and Emancipation: Power and Liber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Pluto.
- Norton, Matthew Armstrong. 2012. *Culture and Coercion: Piracy and State Power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Empire*.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Oppenheimer, Franz. 1926. *Der Staat*. Jena, Germany, Gustav Fischer.
- Osterhammel, Jürgen, and Shelley Laura Frisc. 2005.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 Pagden, Anthony. 2003. *Peoples and Empires: 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Exploration, and Conquest, from Greec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Park, Hyun Ok. 2005. *Two Dreams in One Bed: Empire, Social Lif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atterson, Orlando. 1967. *The Sociology of Slavery: Black Society in Jamaica, 1655–1838*. London: MacGibbon & Kee.
- Perdue, Peter C. 2005.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Andrew. 2002. *Bibliography of Imperial, Colon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Since 1600*.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akash, Gyan. 1992.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Indian Historiography. *Social Text* (31–32), 8–19.
- Pula, Besnik. 2013. "Building the Cities of Empire: Urban Planning in the Colonial Cities of Italy's Fascist Empire." Pp. 366–395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amos, Howard. 2006. What causes Canadian Aboriginal protest? Examining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Identity, 1951–2000.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 31(2), 211–234.
- Ratzel, Friedrich. 1923. *Politische Geographie*. München: R. Oldenbourg. 3rd ed.
- Reader, Desmond Harold. 1961. *The Black Man's Portion: History, Demography,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Native Locations of East London, Cape Province*.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id, Janet. 1956. Employment of Negroes in Mancheste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4(2), 199–211.
- Reuter, Julia and Villa Paula-Irene. 2010. *Postkoloniale Soziologie*. Bielefeld, Germany: Transcript.
- Rex, John. 1959. "The Plural Society in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14–124.

- Rey, Pierre Philippe. 1973. *Les alliances de classes: sur l'articulation des modes de production*. Paris: Maspero.
- Robinson, Ronald E. 1986. "The Excentric Idea of Imperialism, with or without Empire." Pp. 267–289 in W. J. Mommsen, J. Osterhammel (ed.). *Imperialism and After: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London: Allen & Unwin.
- Robinson, Ronald and Gallagher John. 1961.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 Saada, Emmanuelle. 2007 (2012). *Empire's Children: Race, Fili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e French Colonies*.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 Sachs, Wulf. 1937. *Black Hamlet. The Mind of an African Negro Revealed by Psychoanalysis*. London: G. Bles.
- Santos B. S. 2012. Pulic Sphere and Epistemologics of the South *Afr. Dev.* 37 (1), 43–67.
-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aid, Edward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 Salz, Arthur. 1923. Der Imperialismus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Arch. Sozialwiss. Sozialpolit* 50, 565–616.
- Sayad, Abdelmalek, Jean-Jacques Jordi and Emile Témime. 1991. *Le choc de la décolonisation (1945–1990)*. Aix-en-Provence, France: Edisud.
- Schäffle. 1887. "Kolonialpolitische Studien. Zweiter Artikel."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43, 123–217.
- Scheppele, Kim Lane. 2013. "The Empire's New Laws: Terrorism and the New Security State After 9/11." Pp. 300–318 in George Steinmetz (ed.). *Sociology and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chmitt, Carl. 1941 (1991). *Völkerrechtliche Großraumordnung mit Interventionsverbot für raumfremde Mächt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Schmitt, Carl. 1950 (2003). *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 New York: Telos.
- Schmitt, Carl. 1962a. "El orden del mundo después de la Segunda Guerra Mundial." *Rev. Estud. Polít* 122, 19–36.
- Schmitt, Carl. 1962b(2007). *Theory of the Partisan*. New York: Telos.
- Schuknecht, Rohland. 2010.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erlin: LIT Verlag Münster.
- Schumpeter, Joseph A. 1919 (1951).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Scott, John. 2004. "Networks, Social." Pp. 687–689.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2). London: Routledge.
- Seed, Patricia. 1995. *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in Europe's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1492–*



164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idman, Steven. 2013. "The Colonial Unconscious of Classical Sociology." *Postcolonial Sociology* 24, 35–54.
- Silberman, Leo and Spice Betty. 1950. *Colour and Class in Six Liverpool Schools*. Liverpool, UK: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 Small, Albion W. 1916. "Fif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5 – 191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1(6), 721–864.
- Snipp, C. Matthew. 1986. "The Chan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From Captive Nations to Internal Colonie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5(2), 145–157.
- Soustelle, Jacques. 1943. "The Lacandone Indians of Southern Mexico." Summary of a Communication by Dr. J. Soustelle, 25 May, 1943. *Man* 43(88–91), 117.
- Soustelle, Jacques. 1971. *The Four Suns.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of an Ethnologist in Mexico*. New York: Orion.
- Spann O. 1923. "Imperialismus." Pp. 383–385 in L. Elster, A. Weber, F. Wieser (ed.).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ol. 5. Jena, Germany, Gustav Fischer.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Stavenhagen, Rodolfo. 1971. "Decolonizing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Human Organization* 30(4), 333–357.
- Steinmetz, George. 1993. *German Colonial Culture Before WWI*. Lecture, Smart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Chicago, Dec.
- Steinmetz, George. 1998. Crit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1), 170–186.
- Steinmetz, George. 2002. Precoloniality and Colonial Subjectivity: Ethnographic Discourse and Native Policy in German Overseas Imperialism, 1780s–1914.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5, 135–228.
- Steinmetz, George. 2005. "Return to Empire: The New U. S. Imperialism in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Theory* 23(4), 339–367.
- Steinmetz, George. 2006. "Decolonizing German Theory." *Postcolonial Studies* 9(1), 3–13.
- Steinmetz, George. 2007. *The Devil's Handwriting: Precolonial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 Samoa, and Southwest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 Steinmetz, George. 2008a. "Harrowed Landscapes: White Ruingazers in Namibia and Detroi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emory." *Visual Studies* 23(3), 211–237.
- Steinmetz, George. 2008b. "The Colonial State as a Social Fifiel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4), 589–612.

- Steinmetz, George. 2009a. "Neo-Bourdieuian Theory and the Question of Scientific Autonomy: German Sociologists and Empire, 1890s–1940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20, 71–131.
- Steinmetz, George. 2009b. "The Imperial Entanglements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Ab Imperio* 4, 1–56.
- Steinmetz, George. 2010. "Charles Tilly, Historicism, and the Critical Real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1(4), 312–336.
- Steinmetz, George. 2013a. "A Child of the Empire: British Sociology and Colonialism, 1940s–1960s."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49(4), 353–378.
- Steinmetz, George. 2013b. *Sociology and Empire: The Imperial Entanglements of a Discipli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teinmetz, George. 2013c. "Toward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Empires: Rescaling Fifield Theory."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Workshop*, Oct. 30. University Chicago.
- Steinmetz, George and Julia Hell. 2006. The Visual Archive of Colonialism: Germany and Namibia. *Public Culture* 18(1), 141–182.
- Stokes, Eric. 1969.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Attack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2(2), 285–301.
- Stoler, Ann Laura, and Frederick Cooper. 1997.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Pp. 1–56 in F. Cooper, A. L. Stoler (ed.).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 Streets, Heather. 2004. *Martial Races: The Military, Race and Masculinity in British Imperial Culture, 1857–1914*.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Suny, Ronald Grigor. 2001. "The Empire Strikes Out: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ories of Empire." Pp. 23–66 in R. G. Suny and T. Martin (ed.).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Alan. 2001. *American Colonies: The Settling of North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 Tilly, Charle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Tilly, Charles. 1997. "How Empires end." Pp. 1–11 in K. Barkey, M. von Hagen (ed.). *After Empire: 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ussian, Ottoman, and Habsburg Empires*. Boulder, CO: Westview.
- Tocqueville, Alexis. 2001.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ripsdorf, Daniel K. W. 2006. *Afrikanisches Alter Ego und europäischer Egoismus: eine komparative Studie zur Selbstund Fremdenperzeption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 und Spätviktorianischen Grossbritannien (1884–1914). Dresden, Germany: TUDpress.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70. "Toward a Sociology of Africa." Pp. 79–93 in PL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Ethnicity: Essays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Venturi, Robert, Denise Scott Brown, and Steven Izenour. 1972.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Veracini, Lorenzo. 2010. *Settler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von Trotha T. 1994. *Koloniale Herrschaft*. Tübingen, Germany: J. C. B. Mohr.
- Wallerstein, Immanuel Maurice. 1959. *The Emergence of Two West African Nations, Ghana and the Ivory Coast*. 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 Wallerstein, Immanuel Maurice. 1986. *Africa and the Modern World*. Trenton, NJ: African World.
- Wallerstein, Immanuel Maurice.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UK: Polity.
- Wang, Liping, and Julia Adams. 2011. Interlocking Patrimonialism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Qing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36(1), 164–181.
- Ward, Stuart. 2001. "Introduction." Pp. 1–20 in S. Ward (ed.). *British Culture and the End of Empire*.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Warren, Bill.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LB.
- Weber, Max. 1891(2010). *Roman Agrarian History in Its Relation to Roman Public and Civil Law*. Claremont, CA: Regina.
- Weber, Max. 1921 – 1922 (1978) . *Economy and Society*. Vols. 1, 2.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 Wilson, Nicholas Hoover. 2011. From Reflection to Refraction: State Administration in British India, circa 1770–185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5), 1437–1477.
- Wolfe, Patrick. 2006.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4), 387–409.
- Wolpe, Harold. 1975. "The Theory of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South African Case." pp. 229–252 in I. Oxaal, T. Barnett, D. Booth (ed.).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London: RKP.
- Wolpe, Harold (ed.). 1980. *The 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 Essays from Economy and Society*. London: RKP.
- Woodberry, Robert D. 2012. The Missionary Roots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 244–274.
- Worsley, Peter. 1957.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 Study of "Cargo" Cults in Melanesia*. London: MacGibbon & Kee.



- Wright, Gwendolyn. 1991. *The Politics of Design in French Colonial Urb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 Wyrzten, Jonathan. 2013. "National resistance, *amazighité*, and (re-) imagining the Nation in Morocco." Pp. 184–199 in D. Maghraoui (ed.). *Revisiting the Colonial Past in Morocco*. New York: Routledge.
- Zureik, Elia T. 1979.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 A Study in Internal Colonialism*. London: RK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约束云帝国：数字时代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

——评《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

张 健*

摘 要：《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是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学与数字社会教授威利·莱顿维塔的新著。该书通过多个故事，讲述了当代欧美数字平台企业从崛起壮大再到扩张为“云帝国”的故事，以及这一新型平台组织带来的社会冲击与秩序重构。《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将基本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制度和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进行比较，清晰阐释了数字平台的本质特征，以及现代国家与社会对数字平台进行监管、保护民众福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未来，更多研究可关注平台与国家、平台与社会的本土治理议题。

关键词：数字平台 云帝国 平台社会 平台权力 监管

数字技术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是重要的前沿探索课题，如数字技术的社会关切、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与数字平台的公共治理。当前国际社会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政策层出不穷，常态化与更具体的监管细则也将陆续面世。欧盟已经出台了《数字市场法案》、《数字服务法案》和《平台与商户关系条例》，同时在酝酿“欧洲媒体自由法案”。英国建立起新监管机构数字市场处，并打造《在线安全法案》。德国修订了《反限制竞争法》，也颁布了《网络执行法》。美国着手《开放应用市场法案》和改革《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款。中国逐步更新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了对平台企业在金融科技、内容治理等领域的监管举措，明确了平台

* 张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博士候选人。

企业的主体责任，也正在引导数字平台企业布局智能制造、数字农业等领域。人们不禁发问：为何数字平台成为世界主要大国都关心的事物？为什么数字平台监管能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当代数字平台企业与人类历史文明当中的铁路、石油、传媒、电信巨头相比，有哪些本质上的运作差异？我们又有哪些与之对应的解决之道？针对这一新兴事物，学者们在法学、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

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学与数字社会研究教授威利·莱顿维塔（Vili Lehdonvirta）在2022年10月出版了一本新书《云帝国：数字平台正如何超越国家及我们如何重新驭之》（*Cloud Empires: How Digital Platforms Are Overtaking The State and How We Can Regain Control*）（以下简称《云帝国》），对当下的全球数字平台监管问题结合欧美实践展开了深入讨论（Lehdonvirta, 2022）。莱顿维塔结合9个人物与数字平台的故事，生动讲述了“为何要监管数字平台”与“如何监管数字平台”的底层逻辑。莱顿维塔曾经是一名程序员，后来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担任数字经济与社会发展教授，也曾担任欧盟委员会在平台经济、数字转型与劳工保护等领域的高级顾问。横跨业界与学术界，他对平台经济有独特而深刻的商业思考和理论见解。在《云帝国》一书中，莱顿维塔将基本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和当代数字平台的运作机制进行比较，清晰阐释了为什么超级数字平台企业可以被称为当代“云帝国”，及现代国家与社会进行平台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莱顿维塔将《云帝国》一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经济制度，包括平台上“黄金准则”互惠机制、声誉建立、隐私难题、地理距离和边境感的消失、“中央计划”类型的自由市场几个方面；第二部分阐释政治制度，探讨了网络效应带来的帝国效应、线上协作与集体行动难题的解决；第三部分探讨社会制度，深入分析了“数字安全网”（Digital Safety Net）这个平台经济中的社会保护难题。从经济维度到政治与社会维度，莱顿维塔在《云帝国》一书中将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一一道来，并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将民营平台企业对数字社会的秩序冲击生动展现出来。在每个部分，莱顿维塔都以一个例子开头：或是平台企业创始人的浪潮之巅峰

迹，或是平台技术提供方的社会道德困境，或是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通过对这些例子及其背后社会经济逻辑的探讨，莱顿维塔展示了“云帝国”的“张牙舞爪”及其对数字社会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在《云帝国》一书出版之前，由几位荷兰学者合著的《平台社会》（*The Platform Society*）一书，也描绘了新型数字平台公司对不同细分行业与社会的冲击（Van Dijck et al.，2018），引起了欧美学界对平台与社会议题的广泛关注；而在新书《云帝国》中，莱顿维塔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维度的底层逻辑出发，将数字平台的强力冲击更为系统而深刻地展示出来。

本文将结合莱顿维塔在《云帝国》一书中讲述的三个故事与欧美学者对平台治理的前沿讨论，分析数字平台的本质特征、为何及如何监管当代的数字平台企业。最后，本文将总结《云帝国》一书的重要贡献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 数据、计算与要素流动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阐释数字平台到底是什么。20世纪50年代，苏联采用计划经济去调配资源、开动生产，取得了众多成就但也产生了大量的资源错配现象。大量的生产数据和消费信息无法及时收集和反馈给苏联中央做决策；即使反馈上来，当时苏联的计算能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分析数据并做出决策。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先进的计算机名为Ural-4，但它占据了200平方米，需要18个工程师去共同操作且每秒只能做5000~6000次运算。而当时莫斯科的工程师认为，至少需要百万次每秒运算级别的计算机，才能出台像样的经济政策。根据苏联人当时的算力水平，中央决策者想要的数据分析难以在短期内被计算出来。莱顿维塔随后引用了1945年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困境。哈耶克认为，经济运行中的细节信息与具体知识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流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以被人工计算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价格系统才能自发实现。因此，哈耶克认为，即使苏联人能单纯通过计算做出经济决策，这一决策的有效性也仍然有待检验。

但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企业也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中央控制类型的生产要素流动与分配过程。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数字出行平台 Uber 和滴滴的调度中心，数字内容平台推特、脸书和小红书的算法推送，Just Eat、饿了么与美团外卖平台的任务派单模型。由此，莱顿维塔提出“中央计划的自由市场”（centrally planned free markets）一词，来类比当代数字平台企业的运作模式，并问道：这算不算是线上程序化的“苏联 2.0 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数字平台在充分利用数据推动生产和交易的过程中，并未采用苏联中央计划中的强制手段让平台用户失去自主性和能力，但也并未采用完全的“自由放任”。因为数字平台企业发现，最好的方法是将平台的中央协调与平台用户的自主性相结合，以更好地结合平台的两个重要功能：优化生产要素分配与释放平台创新潜力。数字平台的本质特征，就是不断地收集、标注、使用数据、信息等，并通过算力、算法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推动对关系型大数据的深入使用，以更好地匹配供需侧信息、促进平台内的要素流动、带动平台用户的创新能力、吸引平台用户的注意力，进而持续增强其网络效应和推动交易达成，形成平台资本主义系统内的“正向”循环（Srniczek, 2016）。当然，数字平台公司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提高民众福祉，而是在本土和世界范围内持续汲取财富与权力，打造“云帝国”。

“云帝国”有三个重要性质：一是全球顶尖的数字平台都是民营且主要发源于美国硅谷；二是这些超级平台公司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既解决了平台内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问题，又释放了平台上的网络效应与创新潜力；三是这些超级平台公司通过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重构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与数字政治的诸多逻辑。作为超级平台，苹果和微软只成立了不足半个世纪，而谷歌和亚马逊成立至今也只有 20 多年，但是它们通过“云帝国”模式，对数字时代的经济与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云帝国”的形象阐释和荷兰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数字社会与人文教授范迪克描绘的数字“平台树”（Platform Tree）非常相似：数字“平台树”扎根于终端硬件、芯片、数据中心等土壤，生成以云计算、邮箱、地图、程序开发为代表的垄断型树干，再在枝叶层打造出购物、金融、教育、医疗、音乐、

视频、外卖、零工等多个场景的社会生活应用（Van Dijck, 2021）。在大数据、先进算法、网络效应、多生活场景应用程序中逐步扩张的“云帝国”，覆盖到从北美到西欧、从安第斯山脉东西两侧到亚洲大陆、从大洋洲岛屿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世界多地。在莱顿维塔生活的欧洲，从美国西海岸走出来的“云帝国”更是占据了大部分重要的数字市场：在 B2C 领域，谷歌搜索引擎在欧洲长期占据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在 B2B 领域，欧洲云计算市场份额的前三名经常是亚马逊、微软和谷歌。

因而，莱顿维塔调侃道：现在的欧洲终于实现了统一的数字市场，但不是通过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所在地）的努力，而是通过美国硅谷的数字平台。

二 交易声誉、平台权力与社会责任

我们通过第二个故事来分析平台与社会的关系。从古至今，经济中的交易达成要解决三个问题，即交易场景、信息匹配和基本的信任，三者缺一不可。在一个小山谷中，谷中居民知道，想好好生活，就要相互协作、建立互惠和个人声誉。但是与山谷的当地人珍惜彼此之间的合作声誉不同，在全球范围内，线上买卖、产品竞拍交易在最初阶段并没有一个信任条件作为交易基石。买卖双方、供需侧大都是陌生人。在传统市场，信任建立需要买卖双方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在平台市场，信任更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与公权力的监管支持。从博弈论“一报还一报”的机器模拟最优解来看，建立买卖双方的相互评价线上系统，是一个有效的信任与声誉制度。美国的 eBay 平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线上声誉系统。从理论上讲，平台的声誉体系设计好后，可以成为一个“自组织”系统，不过它的运作维系需要大量真实的用户评价信息。这是线上交易达成的底层信任逻辑，但是搭建这一评价系统在实践中并非易事。因为平台用户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例如参考其他人的评价进行购买，而非自己主动填写评价。因此，平台要通过采取多种激励措施，推动交易双方提供真实且有效的评价信息。但是平台也需要平衡交易双方的评价权，因为消费者可能通过差评

来威胁商户，商户也可能自己编造、购买海量的虚假用户评价。过往中美电商平台上不乏此例。线上平台虚假评价信息、假冒伪劣产品甚至违禁商品的泛滥，将导致声誉系统失灵、市场失灵与社会秩序的破坏。

当市场失灵或者既有秩序遭到破坏时，政府就需要站出来。从市场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嵌入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中：既少不了法律约束，也离不开社会网络与规范，还需要有政府作为竞争秩序的维系者、私有产权的保护者、基础研发的投资者、战略产业的支持者、监管规则的制定者、国内和平的守卫者等（Block and Evans, 2005; Ebner, 2008; Fligstein, 2001; Mazzucato, 2013），平台市场亦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平台上遥远的、陌生的、虚拟的用户之间产生信任。交易声誉系统需要平台建立，声誉系统管理与社会秩序维系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因为公权力可以对民营的数字平台形成威慑（Cusumano et al., 2021）。美国历史中的电影分级制度、烟草广告禁播、在线游戏限制，均在提醒当代的数字平台企业：新的平台权力不可以滥用。这些平台权力广泛存在于市场层面，如垄断，而且渗透到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例如送餐平台提供的算法路线给外卖员带来的骑行安全风险、脸书平台设定的内容“选择与分发”机制对用户政治偏好的塑造。因此，欧美学者近年来一直在提醒决策者们：我们不能只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看待数字平台带来的效率提高和价格降低，更要关注数字平台冲击下民众的社会福祉、用户权利与公共秩序（Khan, 2017; Gawer and Srnicek, 2021; Van Dijck et al., 2018; Wu, 2018）。莱顿维塔在《云帝国》一书中将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同一个大方向：当数字平台企业冲击市场规则、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之后，谁来保护普通民众免遭“云帝国”的侵害？

其实也可以这样追问：是谁给予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等民营平台这些新的市场权力与社会权力？它们可以优待自营产品、收取平台经济租、控制平台间要素流动、设置平台上的准入规则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规则、挑选与分配用户能看到什么信息、塑造用户的社会认知与政治偏好（Culpepper and Thelen, 2020; Gawer, 2022; Gillespie, 2017）。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公权力赋予美国数字平台这些权力。

数字平台“云帝国”拥有众多平台权力，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莱顿维塔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讲述了一个名叫索菲娅的女孩的故事。索菲娅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她毕业时赶上了经济危机，因此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经过努力，她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上打零工，但几年后不幸被确诊为乳腺癌。索菲娅不能再工作了，但这个零工经济平台并没有为她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高昂的治疗费用迫使索菲娅通过在线众筹寻求帮助。幸好索菲娅上过一所好大学，有同学们可以帮助她；也多亏了众筹平台的网络效应，让她获得了不少资金支持。然而，最终这些爱心资助还是没有凑齐她的治疗费用。索菲娅的故事是莱顿维塔虚构的，但其中的道理发人深省，也在映射社会现实：如果平台企业不将零工经济从业者视为员工，或者不强制平台公司为零工经济从业者购买社会保险，那么谁来保护基层的零工经济从业者？

时光拉回到 19 世纪的欧洲，当几个大国上演均势协调时，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力排众议在德国国内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保险制度，这一制度促进了德国本土劳动人才队伍的崛起，提高了国家竞争力，成为后来欧洲各国效仿的对象。100 多年后，国民数据管理、社会福利保障、劳工保护、产权保护等逐步由现代国家的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搭建和支撑。在平台经济时代，平台供应商、程序开发商、中小企业主、平台消费者、内容创作者、零工经济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也依然需要现代国家的支撑。

《云帝国》一书讲述的内容与《平台社会》一书揭示的现象异曲同工：这些平台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基础设施，而且是一种社会基础设施（Van Dijck et al., 2018）。数字平台企业成了当代数字经济的中坚，但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保护平台上的公共数据、保护平台用户的隐私、保障平台上的零工经济从业者、维护平台上的青少年权利、遵守平台业务当地的社会规范与公共价值。数字平台造成的社会冲击前所未有，需要公权力主导下的新制度建设。

三 如何监管数字平台

第三个故事关于如何监管数字平台。面对数字平台滥用权力的问题，各国的行政与法律机构已经付出了一系列努力。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案》已在2022年11月正式生效，我们在未来的新闻中会继续看到欧盟委员会对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推特等美国平台企业的罚款和新要求。面对数字平台企业对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冲击（Frenken and Fuenfschilling, 2020; Gawer and Srnicek, 2021），在数字社会当中建立针对数字平台的治理机制成为必然。将数字平台企业拆分或者国有化也被国际学者提及，但是数字平台企业拆分或者国有化只能部分地解决市场结构与国民核心数据保护等问题，并且很有可能会带来市场活力下降与激励机制重构等新问题。

莱顿维塔在《云帝国》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条路径，即培养和支持数字平台上的中产阶级。莱顿维塔认为，一个强大的数字中产阶级可以对新平台权力进行制衡。莱顿维塔提出的数字中产阶级包括依靠数字平台存活、拥有一定财富或小有成就的新技术中产，如平台员工或平台应用程序开发者。莱顿维塔提到了加兹德基的例子。加兹德基创办的 Bizness 公司为美国的中小企业提供了简单的数字应用程序产品，利润不错。但是 Bizness 公司在被收购之前几乎面临灭顶之灾，因为根据苹果公司在2017年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公布的 iOS 应用程序规则，Bizness 公司的产品将无法再次发布和使用。受 iOS 应用程序开发平台新规则影响的不止 Bizness 公司一家，而是千万家提供相似产品的公司。不满情绪和正式诉求迅速集聚，加兹德基和曾经的竞争对手组建了一个“中产阶级联盟”，通过《告苹果书》、社交媒体宣传和政治游说不断对苹果公司施加压力。最终在2017年底，苹果公司平台放弃了之前的新开发规则，Bizness 公司和千万家相似的企业得以存活。数字中产阶级获得了胜利。

中产阶级联盟能够与苹果公司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们是中产。数字中产阶级在平台上获得了财富，也就有时间、精力和资源去解决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困境”，对平台上的其他中产阶级进行快速而广泛的

动员。而平台经济中的计件工人、送餐员或其他自由职业者，并没有这样的资本和时间组建联盟并持续地抗争。在当代数字平台上孕育出的这样一个新中产阶级可以结成一个联盟，抗议平台上新的开发规则、新的抽成比例等。公共政策可以适当向这些新中产阶级联盟倾斜，支持它们对数字平台权力进行的合法抗争。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当平台设置的新规则与该中产阶级无关时，迅速而广泛的联盟动员是无法形成的。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平台权力制衡不能寄希望于数字中产阶级的联盟抗争，公权力在行政与司法维度的监管举措依然不可或缺。

四 总结与讨论

新书《云帝国》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从经济维度到社会与政治维度，系统地描绘了当代欧美数字平台企业从崛起到壮大再到扩张为“云帝国”的底层逻辑，及其带来的平台冲击与秩序重构。在《云帝国》一书的其他章节，莱顿维塔还讲述了区块链的先驱如何利用技术手段，降低人性善恶的不确定性，但依然要面对“采用谁的区块链版本来升级”和“制定由谁主导的区块链规则”等利益分配（政治）问题；为追求个人自由与尊重用户隐私建立的非实名制药品在线交易平台，却要面对泛滥的非法毒品交易、比特币的敲诈勒索与犯罪行为。这些问题需要公权力的监管介入。出版过《虚拟经济》一书的莱顿维塔教授，采用了一种更加审慎的视角看待“云帝国”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与重构，分析了现代国家与社会对数字平台进行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路径。《云帝国》一书值得深入阅读。

在《云帝国》一书出版之前，也有作品深刻思考了数字平台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及其监管回应。事实上，早在 70 多年前，卡尔·波兰尼就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市场力量冲击社会的“第一运动”必然会导致国家和社会抵制市场破坏性的“第二运动”（Kenney et al., 2020; Polanyi, 1957）。欧洲社会经历了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市场的剥削和无情，在圈地运动中保护着社会中的脆弱民众，后来建立起福利制度。再后来，欧洲多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重要限

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协作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身在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学者，莱顿维塔强调的就是如何减少“云帝国”对数字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如何将数字平台“重新嵌入”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框架之中。

不过，《云帝国》一书有三个地方可以进一步讨论。第一，与《平台社会》一书类似，《云帝国》一书也是采用了欧洲人的视角看待发生在欧美的平台冲击故事。那么，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亚洲的故事、非洲的平台冲击故事又是如何？既然监管政策需要因地制宜（Ebner, 2008），当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或无法凝聚成一个数字中产阶级时，当地监管机构如何平衡平台的自我监管与公权力的强制性监管？第二，“云帝国”的概念突出了数字平台企业利用数据、算法、基础设施、网络效应和数字内容在全球范围内汲取财富和权力的特征，但是“云帝国”毕竟是民营企业，没有暴力机关。尽管谷歌、微软与美国政府多有科技与信息合作，脸书、推特也被指出在全球多地进行政治信息筛选与政治抗争动员，但是这些“云帝国”本身并不合法地持有军队与警察机构，更不用说战略性武器。虽然扎克伯格自称“脸书可以被喻为一个国家”，但是脸书、亚马逊、谷歌等超级数字平台缺少进行“最后一击”或释放威慑信号的合法暴力机关。暴力机关和执法权都在公权力手中，即现代政府。这也再次凸显了在平台市场与平台社会当中进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非民选的民营数字平台作为一个新型组织，其肆意冲击破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行为必须被公权力监管。第三，欧美国家和中国均走在应对平台冲击的前沿，其是否形成了符合本土社会情境的平台监管路径？已有分析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Boyer, 2022），但是因地制宜地探索“平台与国家”“平台与社会”的治理路径，依然需要更多优秀的研究。

参考文献

- Block, Fred and Peter Evans. 2005.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pp. 505–526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nd ed.). New Jersey,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yer, Robert. 2022. "Platform Capitalism: A Socio-Economic Analysis." *Socio-Economic Review* 20(4), 1857–1879.



- Culpepper, Pepper D. and Kathleen Thelen. 2020. "Are we all Amazon Primed? Consu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2), 288–318.
- Cusumano, Michael A., Annabelle Gawer, and David B. Yoffie. 2021. "Can Self-Regulation Save Digital Platform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30(5), 1259–1285.
- Ebner, Alexander. 2008.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ance." Pp. 287–308 in Alexander Ebner and Nikolaus Beck (eds.).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Market: Organizations, Soci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Jersey,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renken, Koen and Lea Fuenschilling. 2020. "The Rise of Online Platform and the Triumph of the Corporation." *Sociologica* 14(3), 101–113.
- Gawer, Annabelle. 2022. "Digital Platforms and Ecosystems: Remarks on the Dominant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the Digital Age."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 Management* 24(1), 110–124.
- Gawer, Annabelle and Nick Srnicek. 2021. *Online Platforms: Economic and Societal Effects*.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
- Gillespie, Tarleton. 2017. "Regulation of and by Platforms." Pp. 254–278 in Jean Burgess, Alice Marwick and Thomas Poel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Media*. London: Sage.
- Kenney, Martin, John Zysman, and Dafna Bearson. 2020. "Transformation or Structural Change? What Polanyi Can Teach Us About the Platform Economy." *Sociologica* 14(3), 227–240.
- Khan, Lina. 2017. "Amazon Antitrust Paradox." *The Yale Law Journal* 126(3), 564–907.
- Lehdonvirta, Vili. 2022. *Cloud Empires: How Digital Platforms are Overtaking the State and How We Can Regain Control*. Boston, MA: MIT Press.
- Mazzucato, Mariana. 2013.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Anthem.
-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Srnicek, Nick. 2016.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Van Dijck, José. 2021. "See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 Visualizing Platformiz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New Media & Society* 23(9), 2801–2819.
- Van Dijck, José, Thomas Poell, and de Waal, Martijn.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the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Tim. 2018.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清华社会学评论》征稿启事

《清华社会学评论》是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自 2000 年创刊以来，始终以“面对中国社会真问题，关注转型期实践逻辑，推动本土化理论研究”为宗旨，刊发了许多在学术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清华社会学评论》开始以热点主题的形式组稿出版，以独到的视角、精辟的论述，掀起了学界对“面向社会转型的民族志”“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历史社会学”“劳工社会学”“科技与社会”等问题的讨论热潮，搭建起一个交流共进的学术平台。本集刊先后获得 2017、2019、2020、2021、2022、2023 年度优秀学术集刊奖。在 2018 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本集刊全文转载率位列“社会学学科期刊”全国第一，综合指数位列“社会学学科期刊”第十二。

本集刊现热诚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征稿，欢迎惠赠研究论文、译文和学术书评。《清华社会学评论》编辑部将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流程进行稿件审核，择优录用。

建议投稿之前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格式要求。

1. 每篇文稿以 20000 字以内为宜，除海外学者外，稿件一般使用中文。

2. 稿件应包括以下信息：(1) 文章标题；(2) 作者姓名、单位、职称、联系电话、通信地址、E-mail 等；(3) 250 字以内的中文摘要；(4) 3~5 个中文关键词。

3. 基金项目。获得基金资助的文章，应依次注明基金项目来源、名称、项目编号等基本要素。

4. 引文必须明确出处。注释（解释、说明）用脚注。文中引文需加括号注明作者、出版年份，例如“××××××××××（孙立平，2003）”。详细文献出处作为参考文献列于文后；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按照中文在前，英文在后，按照首写字母排序，具体的格式大致为：作者姓名、文章题目或书名，报刊或出版社名称、年号期号或出版时间，并标明页码。例如：

(1) 专著

孙立平，2003，《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期刊文章

郭于华，2008，《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第1期，第53~67页。

李强、张莹，2015，《社会运行视角与社会学的本土化》，《社会学研究》第5期，第24~35页。

(3) 报纸文章

李强，2016，《新型城镇化与市民化面临的问题》，《北京日报》11月14日。

(4) 未刊文献

① 学位论文

方明东，2000，《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② 会议论文

〔日〕中岛乐章，1998，《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

③ 工作论文

方慧容，1997，《“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史资料研究中心。

(5) 外文文献

① 专著

Fei, Hsiao-tu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②期刊

Freedman, Maurice. 1962. "Sociology in and of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3(2): 106-116.

Olick, Jeffrey K. and Joyce Robbins.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05-140.

③章节

Calhoun, Craig. 1996.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pp. 305-337.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④报纸

Strout, Richard L. 1978. "Another Bicentenni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0 November 1978.

5. 图表格式应尽可能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表格应有表序和表题，序号和表题居中排于表格上方，两者之间空一格；图注放在图下方，示例格式为“资料来源：2003年统计年鉴、2008年统计年报”。

6. 本刊加入网络系统，如有不加入网络版者，请在来稿时注明，否则视为默许。

7. 对未录用的稿件本刊将会于2个月内邮件告知作者，请收到退稿邮件之后再另行投稿。

8. 投稿办法：请将邮件主题命名为“《清华社会学评论》投稿”，并将论文 Word 版加至附件，电子邮件发送至严飞老师：feiyang@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清华社会学评论》编辑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 王天夫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12

ISBN 978-7-5228-3012-4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37144 号

清华社会学评论 第二十辑

主 编 / 王天夫
执行主编 / 严 飞

出 版 人 / 冀祥德
责任编辑 / 赵 娜 孟宁宁 李 薇
责任印制 / 王京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010)59367002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 2023 年 12 月第 1 版 202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28-3012-4

定 价 / 128.00 元

读者服务电话: 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